

R U S S I A N S T U D I E S

俄羅斯研究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4年 第5期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俄罗斯研究

汪道涵 题



目 录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 3 张燕生 / 全球经济形势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大金砖合作研究

- 17 徐秀军, 周宜顺 / 大金砖合作的演进逻辑与理论启示
- 39 朱杰进, 刘瑛琛 / 身份叙事、利益偏好与金砖国家的政策选择

海外俄罗斯研究

- 61 封 帅, 薛世锬, 李苗苗 / 对危机关系的多元解读: 英国的俄罗斯研究 (2014—2024 年)
- 85 韩冬涛, 廖正杰 / 外生冲击下的结构性调整: 斯堪的纳维亚的俄罗斯、东欧研究 (2014—2024 年)
- 110 邱宇鹏, 阎德学 / 区域国别研究的日本进路——兼论日本的俄罗斯研究

乌克兰危机的多重影响

- 136 易鑫磊 / 北极地缘政治反思: 批判与重构
- 164 石稚瑄 / 全球产业链竞争加剧背景下俄罗斯战略性矿产政策调整的分析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 刘 军

副 主 编: 陈大维 (常务)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 021-62233816; 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 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24 年 10 月 28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4 年第 5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Чжан Яньшэн

Глобальн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итуация и стратегии реагирования Китая ... (3)

Сюй Сюэцзюнь, Чжоу Ишунь

Эволюционная логика 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е просвещение расширен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БРИКС (17)

Чжу Цзецинъ, Лю Инчэнъ

Нарративы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предпочтения в интересах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выбор стран БРИКС (39)

Фэн Шуай, Сюе Шикунь, Ли Мяомяо

Множественные трактовки кризис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оссии в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2014-2024 гг.) (61)

Хань Дунтао, Ляо Чжэнцзе

Структурная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в условиях экзогенных шоков: российские и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Скандинавии (2014-2024 гг.) (85)

Цю Юйпэн, Янь Дэсюе

Японский подход к региональным и страновы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оссии в Японии (110)

И Синьлэй

Анализ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геополитики: критика и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136)

Ши Чжисюань

Анализ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минерально-сырьев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в условиях обострения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ой цепочке (164)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24 年第 5 期 (双月刊)

Contents

Zhang Yansheng

Global Economic Landscape and China's Response Strategies..... (3)

Xu Xiujun, Zhou Yishun

Evolution Logic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Greater BRICS
Cooperation (17)

Zhu Jiejun, Liu Yingchen

Identity Narratives, Interest Preferences, and Policy Choices of the BRICS (39)

Feng Shua, Xue Shikun, Li Miaomiao

A Plur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Crisis Relations: Russian Studies in the UK
(2014-2024) (61)

Han Dongtao, Liao Zhengjie

Structural Adjustment under External Shocks: Russian and Eastern European
Studies in Scandinavia (2014-2024)..... (85)

Qiu Yupeng, Yan Dexue

Japanese Approaches to Area Studies: Russian Studies in Japan (110)

Yi Xinlei

Rethinking Arctic Geopolitics: Critiques and Reconstruction (136)

Shi Zhixuan

An Analysis of Russian Strategic Mineral Policy Adjustments in the Context of
Intensifying Global Supply Chain Competition (164)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全球经济形势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张燕生**

【内容提要】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当前，国际环境多变，全球经济形势复杂，中国需要在大变局下选择适合自身情况的经济发展策略。坚持国际化方向，提升要素生产率；尝试建立全球金融中心，加强上海与香港的联系；加大教育投入，培养一流人才；加大创新投入，提升研发强度；坚持改革，推动制度变迁；利用规模效应，建立统一大市场；加快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在全球化的新时代中，通过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应对国际环境的挑战，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发展的核心目标，需要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寻求平衡，推动全球治理新模式的建立。

【关键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经济形势 全球经济形势 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4)05-0003(14)

一、中国经济的基本形势

现在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如果要与某个历史年代进行对比，我认为当前的形势很像1978年，即新时代即将开始的时刻。

1978年是中国开始实事求是地看待世界的一年。这一年，邓小平同志

* 2024年9月6日，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张燕生研究员在华东师范大学作《全球经济形势及我国应对策略》主题讲座。本文根据讲座内容整理而成，并经作者审阅同意。

** 张燕生，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曾七次出国访问，这也是他一生之中出访次数最多的一年。谷牧副总理带团出访欧洲，深刻地感受到了当时的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从而也明确了下一步发展的路径和方向。1978 年对于我国此后四十多年的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78 年 7 月，在广东东莞建立了“三来一补”的代工厂——太平手袋厂。8 月，在广东佛山顺德建立了第一家生产牛仔裤的“三来一补”的代工厂——大进制衣厂。这可以被视为改革开放的先声。市场经济的第一桶金就是从代工贴牌、全球低端、汗水驱动开始的，这种模式被称为“离岸制造模式”。而我更倾向于将这一过程称作参与国际大循环、嵌入国际工序分工体系——为全球跨国公司代工。但这个模式的缺点在于没有自主的知识产权，没有自主的品牌，没有自主的营销渠道。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只能分享极为微薄的利润。例如，原本欧美、日本等地的消费者愿意为一只笔付出 2 美元，而一只在中国生产的笔，只需要 80 美分就可以买到，消费者获得了经济福利。但是，中国的消费者买不到这支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也买不到，所有的消费者剩余都被发达国家所享受。这是因为，首先，在跨国公司看来，发展中国家，或者说所有“穷国”、“穷地区”的制度性风险都比较高，跨国公司不会前往。而在上述这个模式中，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卖给谁又都是由跨国公司决定的。

这个模式当然不是一个完美的模式，但我们确实通过这样的模式开启了我们的改革开放。这种离岸制造模式持续了三四十年。我们整个国家持续到 2008 年，江苏持续到 2014 年，广东持续到 2016 年，东莞持续到 2020 年。直到这个时间节点之后，一般贸易出口才首次超过了加工贸易出口。

我们常常会批评自己，说中国在知识产权、自主品牌方面有着严重缺失，但在作这样的批评之前，我们也必须要看看自己的发展是从哪里起步的。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至少有三十年的时间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没有自己的品牌，也没有自己的市场营销渠道。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学习，学习如何发展市场经济，如何发展工业经济，如何发展外向型经济。这三十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通过离岸制造模式，中国的制造业得到了充分发展。截至目前，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已经是美国、德国、

日本、巴西和印度的总和。并且，中国在工业研发领域的投入也越来越大，到 2023 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工业研发投入主体。

从全球范围来看，在 1990 年至 2021 年的这三十年期间，日本和德国 GDP 占美国 GDP 的比重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但中国 GDP 占美国 GDP 的比重却出现了翻番式的提升。并且，这种提升不仅体现在 GDP 数据上，更体现在高铁、特高压、盾构机、大飞机等一个个具体的产业案例中。

那么，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这四十五年时间里，中国做对了什么才获得了这样的成果？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思想方面，我们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理念，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①，这十六个字是我们需要反复学习的，也是需要反复思考的，是我们在过去四十五年里能够取得发展的根本。

第二，在行动方面，我们坚持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基本思路。我们坚信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才取得了这样的成绩。

二、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剧变

客观地说，在过去五年时间里，中国经济的发展遭遇了很大的困难。过去五年平均经济增速没有达到 5%。按照“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如果要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那么应该保持 5.5% 的经济增速。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在合理区间运行。

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最主要因素是国际环境的变化，按照党中央的说法就是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当今世界处于动荡变革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其中最大的变动来自全球化进程的周期性调整。

根据著名计量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统

^①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15 页。

计，1820 年，美国 GDP 占世界 GDP 的比例是 1.8%，当时美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等规模的新兴国家。但到了 1894 年，美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这七十年天翻地覆的变化源自何处？第一个原因是全球化，美国赶上了 1870 年至 1913 年的全球化扩张期。第二个原因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和德国作为两个新兴中等国家，把握住了 1870 年至 1913 年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在工业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共同作用下，当时的霸权国英国和法国由盛而衰，而两个中型新兴国家美国和德国则由弱变强。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与之类似，也是中国很好地把握了 20 世纪新一轮全球化进程的历史机遇。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对国际环境作出了非常准确的判断，毅然决定参与国际大循环，嵌入国际分工体系，发展外向型经济。但发展外向型经济是小经济体的选择，中国作为一个大经济体必须双轮驱动，这两个轮子分别是出口和吸引外资。外向型战略的结果必然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形成紧张关系，但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发展市场经济，我们选择了这个战略。

在 2000 年前后，党中央对于当时的世界形势作出了一个判断，并且在 2002 年党的十六大上将其作为我国制定国家政策的基本背景提出，即在将来二十年（2000—2020 年）我国将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作出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类似 1870—1913 年美国 and 德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将是全球化大发展的时代，是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时代。因此，中央作出决定，必须牢牢把握这个时代机遇，把中国经济搞上去。

因此，在 1999 年，朱镕基总理亲临谈判现场，直接作出决策，完成了中美关于中国加入 WTO 的谈判。在很多人看来，中方在谈判最后作出了非常大的让步。为什么要作这些让步？相关负责人对此给出了三句话的解释：一是为了参与全球化，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把握住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二是为了让国内机制体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三是只有在开放条件下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产业才会有生存的可能。从中央的角度来看，全球化时代已经充分展开，IT 革命迫在眉睫，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一定要把握住历史的机遇。最终的结果也证明，中国在这一时期迎来了最为辉煌的经济发

展时段。

转折时刻出现在 2008 年。以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为标志，世界经济贸易增长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一个超级全球化的时代也结束了。

为什么全球化的时代不会一直延续下去？这与全球化进程的内在特征密切相关。全球化有三个内在缺陷始终无法解决，造成了它始终以周期性的方式存在。

第一个内在缺陷是全球失衡和再平衡的责任和调节机制。全球化缺少这种全球失衡和再平衡的机制，只能靠国家政策进行调节。美国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在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这场危机是失衡造成的。”中国参与了这场危机的救助，也承担了很大的损失。2008 年年底，中国宏观杠杆率 142%，是世界上经济基本面较为稳健的大国之一，现在中国宏观杠杆率是 290%。中国用宏观杠杆率翻番，把世界从危机的泥潭里拉出来，也把美国从危机的泥潭里拉出来。美国经济在 2015 年触底，当年美联储原计划加息 4 次，最后加了 1 次；2016 年原计划加息 3 次，最后加了 1 次。然而，当美国经济触底时，2008 年危机中美国、欧洲的量化宽松所发出的流动性没有进入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是有相当一部分流入了中国，在中国炒作房地产等资本。2015 年美国经济触底后，这些投资大规模流出，开始回流美国、欧洲，中国自己也有很大一部分资本流出，以至于 2015 年中国外汇储备净损失了一万亿美元，最后不得不采取了比较严厉的外汇管制，以避免短期国际收支失衡。这便是全球化的第一个缺憾。由于没有世界政府，所以全球失衡的矛盾是没有内在机制能够解决的。从 1990 年开始，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从 1000 亿美元增加到 8000 亿美元，这是两场危机造成的，一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 IT 革命走向 IT 泡沫的破灭；二是 2000 年以后，美国走向金融和房地产泡沫，他们以高杠杆率拉起了 2002 年至 2007 年的全球非理性繁荣。一路把逆差拉到了 8000 亿美元的规模。而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的大幅增长出现在 2005 年，简而言之，就是美国泡沫拉起全球非理性繁荣，全球非理性繁荣拉起中国出口的繁荣。

第二个内在缺陷是全球化悖论。全球化在历史上从来都走不远，因为每一轮全球化都有受益者和受损者，而每一轮全球化的受损者后来就会成为全

全球化的反对者。1870—1913 年的全球化是英国人推动的，高举的是自由贸易的大旗。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英国人的轻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无人能比。然而，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后，资本密集型产品成为国际市场的主要工业品。英国逐渐落后，英国的产品无法同美国、德国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行竞争。英国转向了贸易保护主义，又把贸易的大门关起来。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这场全球化是美国推动的，但在 2008 年以后，奥巴马、特朗普、拜登三任美国政府又一步步地走向了保护主义。这便是全球化的宿命，损益不平衡的结果导致全球化从来都走不远。

第三个内在缺陷来自国际政治层面。在全球化的时代，大国实力对比会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的结果很可能是大国冲突、经济萧条，甚至走向战争。国际格局的转变和国际秩序的演化都有可能导致国际矛盾激化，最终走向冲突的结局。从历史上看，几乎每一场全球化进程的尾声都会导致军事冲突。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的国际环境与 1870—1913 年的国际环境非常相似。全球化时代，世界贸易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经戛然而止，它会引发一系列的现象和问题。从产业上看，世界可能会形成两大平行的产业体系。而从中国发展的视角来看，它会直接冲击中国的发展。我们现在面临的订单外迁，资金外迁，技术、设备、人才外迁，产业链供应链外迁，以及出现消费降级、生产降级、品质降级、价格降级、产业链供应链降级的压力，从根本上说，无不源于全球化的终结。全球化造成的大国矛盾已经非常突出，美国正在试图采取各种手段瓦解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根基，要让西方世界摆脱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依赖，这场博弈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三、对于中美竞争的评估

当前，中美两国在很多领域的国际竞争已经展开。关于双方得失的各种评论文章也有很多。在我看来，从经济的视角来看，比较中美两国战略竞争的内容，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展望。

第一个指标，看中国名义 GDP 占美国名义 GDP 的比重变化。名义 GDP 衡量的是三个指标，实体经济增加值的增长、货币汇率的稳定和一般价格水

平的管理。通过这三个指标可以看到，2021年，中国名义GDP占美国名义GDP的77%，但在2024年的第一个季度，这个数值下降到了59%。上述三项能力展现出过去五年宏观经济治理能力的竞争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变化。但由于这是一场长期的竞争，我们也不必囿于短期的数据变化，还是要坚持过去四十年里那些正确的东西，继续向前推进。如果我们偏离了过去四十年的成功经验，有可能要交更多的学费。

第二个指标，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与美国的比重。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每年达到3个百分点，美国每年贡献一个百分点。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贡献每年为两个百分点，美国则是不到0.7个百分点。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几年里，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到1.2~1.3个百分点。因此，未来五年，我们能不能改变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趋势，将影响到中美竞争的结果。在2000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占美国的比例不足30%，到2014年上升到42%，那么到2035年能否超过65%，甚至70%？中美竞争能力的对比，实际上就是相对生产率的竞争，看效率的增长谁做得更好。

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在反思，反思全要素生产率持续下降的原因。美国反思的重点在教育、科技和产业、工业领域。在1980年里根的自由化政策以后，基础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过度自由化究竟引发了什么问题？如何纠偏？在过去的四五十年，美国科技为什么缺少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针对科技方面又可以有怎样的政策调整？为什么会出现工业的空心化和产业的空心化？这三个领域的反思和纠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看未来五年或者十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会不会改变过去四五十年中持续下降的趋势，以及与中国对比的态势。同时我们也要观察，中国能否像过去四五十年那样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这是我们看待中美竞争的第二个重要因素。

第三个指标，加入企业资产的净收益率（ROE）的竞争。比如，谁的企业更赚钱，无论传统产业、新兴产业还是未来产业；谁的企业更能够发展硬科技、绿色低碳、履行社会责任，同时更赚钱。这个指标实际上对比的是中美两个国家货币谁能够更多获利，股票市场谁更能获利，包括财富效应、激

励效应和盈利情况。对于研究者来说，总量上对比要看宏观数据，结构上对比要看相对生产率的数据，而微观对比要看经济效益的数据。这样才能全面地衡量出两个大国的竞争能力，大致上推断出未来场景，并对此进行评估。

中美经济竞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要在一两年内产生结果，而是要在二十多年或者更远的未来看最后的竞争结果是什么。美国方面希望获得的胜利结果是：或者将中国以他们能够满意的方式纳入西方体系，或者将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边缘化。但在中国看来，中美竞争的结果将会证明，合作是中美两个大国唯一正确的选择。中国在争取的胜利结果是全面提升中国的经济实力，迫使美国放弃对华经济战，将中美重新拉回经济合作共存的轨道上，承认中国在全球的地位，尊重中国特色。这个结果对于世界来说意味着建立全球治理的新模式，以中美长期合作为基础构建新的治理模式。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来考虑超主权货币的方案，如何超越特里芬困境，怎样给全球经济提供稳定的锚，怎样为全球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支持。

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全球化的浪漫时代结束了，国际产业链的严冬来临，脱钩、“去风险”和安全的泛化等负面因素席卷全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国际关系研究者在当下的责任是什么？在我看来，那就是通过各种方法做工作，做工作的目的就是避免全面脱钩这一最坏结果的出现。西方的再全球化，或者说新全球化，其实质却是“去中国化”，而中国的新全球化的实质是再中国化。我们如何继续推动开放，继续推动改革？就是要建立战略互信。要实现这个建立战略互信的目标，需要我们做很多具体的工作，让世界更容易来中国，让中国人更容易去世界，让双方的交流打破各种成见和误解，在广泛接触中才能眼见为实，化敌为友，才能增进战略互信。从这个角度来讲，在越困难的情况下，国际关系研究者承担的责任也就越重。

四、大变局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策略

现在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一方面是全球化黄金时代的结束，另一方面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全面转向。2023 年 7 月 13 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

文章《这是一场战争行为》，在文章中，美国商务部官员承认，在芯片、微电子、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技术，后续还包括清洁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美国都要用战争行为对待中国，把美国所有的优势都转化为武器。可以说，在未来二十年里，美国会采取各种非经济手段阻遏中国的发展，中国经济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面对这种局面，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很多，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仅需要应对当下的很多具体问题，还要对未来的发展有系统的规划。

第一，继续坚持国际化的方向不能动摇。要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专业化的生产不断提升要素生产率。像上海这样的城市，需要坚持城市国际化、产业国际化、人才国际化、经济国际化，通过国际化进程打造世界大脑，要让全球的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愿意来到上海，愿意住在上海，形成一个开放的生态，这样各种要素就有无限排列组合的可能性。上海是中国国际化的城市，但我们也要看到，上海与香港等城市相比，国际化水平仍有差距，在市场化、法制化等方面还存在一定距离，我们仍然需要向这个方向努力。

第二，需要尝试建立全球金融中心。目前，全球顶级的金融中心都是普通法系国家，当前，大陆法系国家在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全球金融资源配置能力方面明显落后于英美法系。这是不是必然的规律？而上海又应该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才能真正成为金融中心？加强上海与香港的关系可能是突破口之一。

第三，教育是另一个重要因素。未来的经济建设和发展需要大量的人才，要培养人才就需要有一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我们需要在教育领域继续加大投入，让中国的大学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聚集地和培养地。新一代中国青年和以往各代人不一样的地方，是许多孩子有优渥的家庭环境，从事科学研究就是源于热爱，会很纯粹。这样才会有一批真正能够沉下来做科学的人，而中国科学的春天才会真正到来。而我们要做的是，把各种教育条件准备好，包括正规教育和成人教育，也包括职业教育等。

第四，要继续加大创新投入。2023年，中国的研发强度为2.65%，OECD国家2023年的研发强度约为2.67%。中国2023年的创新投入达3.3万亿，如果用研发强度作为指标来观察中国，中国有三个完全不同发展阶段和动能

的变化。

从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金额占 GDP 的比重来看，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浙江六个省市最为突出。在这六个省份中研发强度最低的是浙江，浙江 2022 年研发强度为 3.2%，2023 年研发强度为 3.19%。因此可以说，这六个省市的研发强度已经明显高于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已经逐渐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在增量方面已经反超。目前与世界的差距，主要还是存量，人才的存量、知识的存量、技术的存量，积累的时间还不够。

从创新制度的维度来分析，在 2023 年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中国整体排名是第 12 位，但在创新制度这一项的排名是第 43 位。这说明，中国在创新制度方面还存在明显的短板。只有加强制度领域的创新，才能更好地解决专业化、国际化的问题，让世界一流人才聚集起来。

用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来衡量，现在的比重是略超过 6%，而“十四五”规划中的目标是提高到 8%。现在看来，完成这个目标有些困难。未来这个比例还应该持续提升，在每一个新的五年计划中都应该有更高的目标，争取用三十年的时间，将基础研究赶上去，实现创新驱动的转型。

第五，还是要坚持改革不动摇。不断根据现实情况推动制度变迁，不受任何教条干扰，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调整各种体制机制。

第六，充分利用规模效应，建立统一大市场。规模效应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优质条件之一，是我们在很多新领域能够有所突破的基础动力。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虽然美国在技术上一直保持着领先优势，但中国可能凭借规模效应，始终保持紧紧追赶的状态。组成这种规模优势的，既有包括链接的规模优势、终端的规模优势，更有全产业链带来的巨大优势。由于规模效应的存在，中国的产业化、工程化能力很强，场景的转化能力强，利用这些方面的优势，我们也可以逐步向产业链高端延伸，逐渐在数据基础设施、算法、算力，以及各种顶层技术领域进行追赶，未来人工智能技术产业竞争的结果尚未可知。

第七，加快两个转型进程，分别是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这本身是中国经济适应新时代的客观要求，也是产业转型的内在趋势。

从 2010 年开始，全球的产业政策、全球保护政策、全球政府干预大幅

度上升。面对这种局面，中国也适时调整了发展战略。总体来看，我国已经从外向型战略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转向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国内大循环为主导和主体，但也要在不利条件下继续推动开放，继续提升国际化水平，要在困难中发掘新的契机，研究怎么提高人才的国际化、城市的国际化、经济的国际化、产业的国际化。对于中国而言，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坚持全方位开放，坚持发展仍是硬道理。

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内涵就是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现代化。对于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而言，绝对不能仅仅考虑自身的发展，一定要从全球视野来考虑自己的发展。一定要把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系，从过去战略的紧张关系变成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包容共享的和谐关系，做负责任的大国。一个大国赢者通吃，很可能别人没饭吃。中国式现代化要做的是有饭大家吃。什么叫有饭大家吃？中国在全球的受益，它的回报有我的一份，有东道国的一份，还有第三方的一份。一个大国，无论在欧洲、非洲、亚洲，还是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在自己发展的同时带动别的国家发展，这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诉求。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一次重要的会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这次全会的主题，也彰显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中国式现代化是党和国家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工作，中国式现代化有几个重要的问题要突破，第一是弄清人口规模巨大的大国怎么搞现代化；第二是如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用怎样的方法来实现；第三是如何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第四是怎样实现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相协调的目标；第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确保发展进程不被战争所干扰。

有人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一场新的改革开放，因为它提出的目标是，对内要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要全面建成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制，与改革开放的内外目标形成了对应关系。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中国要怎么搞，如何吸收历史的经验教训，理顺中国式现代化与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这是摆在每个研究者面前的重要议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关于统一市场、制度型开放等重要内容，提出了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

金融等领域要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和国际高标准规则相通相容。还明确表示保障外资企业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政府采购等方面享有公平的国民待遇。这些都是对于新一轮改革开放非常重要的举措。相关政策措施如果能够顺利落地，我相信中国在高标准市场体系、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方面会取得长足的进步。

【Abstract】 From July 15th to 18th 2024,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held in Beijing, during which the Central Committee made decisions on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s and advanc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a volati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a complex global economic landscape, China must choos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at suit its specific circumstances amid these major changes. Key strategies include maintaining an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 and improving factor productivity; establishing a global financial center by strengthening ties 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to cultivate world-class talents; boosting innovation and intensifying R&D efforts; adhering to reforms to drive institutional changes; leveraging economies of scale to build a unified domestic market; and accelerating digital and green transitions. China must continue to pursue a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n the new era of globalization through reform, opening up,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o achieve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and comprehensive social progress. Additionally,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remains the core goal of China's development, necessitating a balance betwe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while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global governance models.

【Key Words】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hina's Economic Landscape, Global Economic Landscape, China-U.S. Relations

【Аннотация】 С 15 по 18 июля 2024 года в Пекине прошёл 3-ий пленум ЦК КПК 20-го созыва. ЦК КПК принял решение о дальнейшем всестороннем углублении реформ и продвижени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в китайском стиле.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обстановка нестабильна, а глобальн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итуация сложна. Китаю необходимо выбрать стратегию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подходящую для

своей собствен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условиях больших перемен. Следует придерживаться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и и повышения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ости факторов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попытаться создать глобальный финансовый центр и укрепить связи между Шанхаем и Гонконгом; увеличить инвестиции в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и возвращать первоклассные таланты; увеличивать инвестиции в инновации и повышать интенсивность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 разработок; продолжать реформы и продвигать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а также вос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ми эффекта масштаба, создать единый большой рынок, ускорить цифровую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ю и зелёную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ю. Китаю необходимо продолжать придерживаться пути мир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и в новую эпоху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посредством реформ, открытости и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еагировать на вызов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реды и добиваться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и всестороннего соци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в китайском стиле является основной целью 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я, которая требует поиска баланса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и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а также содействия созданию новой модели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3-ий пленум ЦК КПК 20-го созыва,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в китайском стил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Китая, глобальн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итуация, кита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责任编辑 宋羽竹)

大金砖合作研究

大金砖合作的演进逻辑与理论启示*

徐秀军 周宜顺**

【内容提要】新一轮扩员后，金砖机制迈上了大金砖合作的新征程。相比以往，大金砖合作在成员差异性、产业互补性和成效协同性方面呈现更加明显的内涵特征，并在理念、行动和制度上为金砖机制提供了应对集体行动难题的新方式。具体来说，自愿加入保障了大金砖合作理念的共融性，非正式对话提升了大金砖合作行动的灵活性，渐进扩员维持了大金砖合作机制的稳定性。并且，大金砖合作统筹了共同利益与包容利益，创造积极效应并避免消极效应，致力于以自身发展促进共同发展，为构建更具包容性、适应性和可持续性的国际合作机制提供了重要启示。作为国际合作的代表性范例，大金砖合作实践已成为国际合作理论的创新之源。

【关键词】大金砖合作 国际合作理论 集体行动难题 渐进性扩员 包容利益

【中图分类号】D814.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4)05-0017(22)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01年，高盛公司时任首席经济师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提出“金砖四国”（BRICs）概念，强调巴西、俄罗斯、印度与中国的经济潜力。2006年，四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标志着金砖机制的正式启动。2009年，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会晤，推动金砖机制升级至领导人峰会层次。2011年，金砖吸纳南非加入，实现首次扩

* 本文系贵州省2023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课题编号：23GZZD29）研究成果。

** 徐秀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周宜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员，并形成新的金砖机制（BRICS）。此后，随着机制内部治理结构和发展需求逐渐进入新阶段，金砖机制迎来了新的扩员窗口期。

在 2022 年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金砖国家在汇聚共识的基础上启动新一轮扩员进程。^①2023 年 8 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正式决定邀请埃及等国加入金砖机制。^②2024 年 1 月 1 日，沙特阿拉伯、埃及、埃塞俄比亚、阿联酋和伊朗五国成为金砖机制的正式成员，并由此开启了“大金砖合作”的新征程。^③2024 年 6 月，在下诺夫哥罗德举行的金砖国家外长会议上，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机制的重要作用和扩员成果。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指出，“大金砖”要有大担当、大作为，并提出“要充分发挥‘大金砖’的战略意义和政治效果，将金砖打造成基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面向全球、开放包容的新型多边合作机制。”^④这次会议发表的《金砖国家外长会晤联合声明》为“大金砖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当前，“大金砖合作”实践正在持续推进，深入探讨“大金砖合作”的形成逻辑正当其时。为此，我们在分析“大金砖合作”内涵特征和梳理“大金砖合作”应对合作困境方式的基础上，讨论了“大金砖合作”对国际合作理论带来的启示。

一、国际合作的集体行动难题

在国际合作研究中，集体行动难题受到广泛关注。20 世纪 60 年代，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描述的“公地悲剧”深刻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这一集体行动难题。^⑤在国际关系领域，这一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查尔斯·格

①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北京宣言》，《人民日报》，2022 年 6 月 24 日第 2 版。

②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约翰内斯堡宣言（摘要）”，《人民日报》，2023 年 8 月 25 日第 2 版。

③ “‘大金砖合作’前景光明”，《人民日报》，2024 年 1 月 7 日第 3 版。

④ “凝聚同舟共济力量，共创金砖光明未来——王毅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晤上的发言”，新华网，2024 年 6 月 10 日，<http://www.news.cn/20240611/48d6ce012c0f45ab990a3d43c7626d8c/c.html>

⑤ G.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968, Vol.162, No.3859, pp.1243-1248.

拉泽（Charles Glaser）指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被假定为理性行为体，它在合理考虑自身利益及所面对的国际约束和机遇的基础上，作出有目的的决定。^①也就是说，国家在国际合作中主要考虑自身利益与目的的达成，这会阻碍集体行动的形成。总体来看，合作成本与收益的分析方法为理解国际合作中的“集体行动难题”提供了重要视角。比较与权衡合作的成本与剩余，决定了合作剩余的大小，也决定了合作能否出现、能否持续、能否扩展等一系列重要问题。^②

（一）合作成本与“搭便车”现象

合作成本是行为体开展合作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搭便车”现象则是由于合作成本分摊不均而产生的典型问题。奥尔森认为，提供公共或集体物品是组织的基本功能；在提供公共物品的过程中，理性的个体会倾向于不承担成本而坐享其成，这种行为被称为“搭便车”。^③奥尔森将合作理论建立在理性选择的基础之上，假设行为体会理性地权衡行动的成本和收益。在国际合作中，由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一个成员在获得利益时不能排除其他成员获得同样的利益，各成员有动机避免承担成本而坐享其成，国际合作往往因此而难以达成。

奥尔森进一步指出，集团规模与集体行动效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他据此提出“集体规模悖论”。换言之，随着集团规模的增大，集体行动的难度也会相应增加。而在大规模的集团中，个体贡献与集体成果之间的关联变得更为模糊，增加了“搭便车”的可能性。在国际合作中，特别是涉及众多国家的全球性问题上，这一悖论表现得尤为明显。大国可能因为利益攸关而愿意承担更多责任，而小国则更容易采取“搭便车”策略。这种不均衡的成本分担不仅影响合作的效率，还可能导致合作的不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集团中的大成员可能因不满而减少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最终导致国际合作

① [美]查尔斯·格拉泽著：《国际政治的理性理论：竞争与合作的逻辑》，刘丰、陈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页。

② 孙杰：《合作与不对称合作：理解国际经济与国际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58页。

③ [美]曼瑟·奥尔森著：《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物品与集团理论》，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

的瓦解。

（二）合作收益与制度非中性

在国际合作中，合作收益的分配问题往往与国际制度设计密切相关。由于涉及合作成果中的权力和利益分配，收益分配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从本质上讲，合作的各方应当是平等的，但是，当涉及成果分配时，则面临分配原则和分配制度是否公正的问题。制度非中性理论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视角。所谓制度非中性，是指“同一制度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在同一制度下不同的人或人群所获得的往往是各异的东西。”^①换言之，制度反映了权力和利益的不平衡分配，制度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包含权力关系和利益考量，因而对不同行为体具有不同影响。这一理论源于新制度经济学。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强调，制度不仅是约束行为的规则，更是塑造利益分配的重要机制。^②在国际关系领域，制度非中性主要体现在国际组织和合作机制的设计和运作过程中，具体表现为成员利益的不平衡分配和权力结构的不平等分布。

制度非中性对国际合作收益的分配具有深远影响。首先，在制度设计阶段，拥有更多资源和影响力的国家能够根据自身利益诉求塑造于己有利的国际制度框架并进行垄断，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其次，在制度执行过程中，既得利益集团中的国家往往拥有更多的解释权和操作空间，这种非中性将导致国际合作收益的不均等分配。由于制度的路径依赖性，制度一经产生就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此，处于制度框架边缘的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会发现自身长期处于不平等地位。然而，非中性制度并非静态不变，国际环境变化和新兴市场国家崛起都可能使国际制度变迁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看，金砖机制是对现行国际制度框架的有益补充。这种动态过程也反映了国际合作中权力、利益与制度之间的复杂互动，为理解金砖国家等新兴力量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提供了理论解释。

（三）国际合作中的公共产品赤字

在世界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公共产品对国际合作具有重要作用。1954

① 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改革》，1994年第2期，第98页。

② D.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年，萨缪尔森提出公共产品理论，并认为公共产品具有集体供给性、非分割性、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①后来，该理论被应用于讨论国际关系中的集体合作问题。由于“搭便车”效应和制度非中性，国际合作中的公共产品赤字问题日益凸显。在国际社会中，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等许多议题的应对措施都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尽管所有国家都能从这些公共产品中受益，但每个国家都有理性自利的动机来减少自身在合作中的投入，并期待其他国家承担合作成本，从而形成所谓的“国际公共产品赤字”。

为顺应国际社会追求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的呼声，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创新制度设计并形成有效的制度激励来解决公共产品供给赤字问题。在制度变革问题上，一种主张强调自下而上地建立差异化责任机制，通过“市场力量”将国际公共产品“私有化”，即根据国家能力、意愿和受益程度分配责任，采用私有化产权制度解决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问题。^②这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得到应用，例如据此提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另一种主张则强调通过自上而下的顶层制度设计创造正面激励，例如将公共产品供给与其他利益挂钩，增加参与合作的吸引力。此外，声誉机制也可能在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③在重复博弈中，国家可能出于维护长期声誉的考虑而选择合作，即使短期内可能承担较高成本。这些视角为分析“大金砖合作”的逻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大金砖合作的内涵特征

在新一轮扩员后，金砖机制成员数量从5个增加到10个。“大金砖”首先反映了这一变化，因而“大金砖”是相对于原来的“金砖五国”而言的。同时，金砖成员都是各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在经济贸易、能源安全

① Paul A. Samuelson,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54, Vol.36, No.4, p.387.

② 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7-200页。

③ 关于制度激励与声誉的分析可参见[美]曼瑟·奥尔森著：《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物品与集团理论》，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8-71页。

与地区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新一轮扩员后，“大金砖合作”的代表性更强，合作范围和领域将进一步扩展，合作程度也将进一步深化。总体来说，“大金砖合作”的内涵特征突出表现在成员差异性、产业互补性与成效协同性三个方面。

（一）大金砖合作的成员差异性

成员差异性是大金砖合作所呈现的最为直观的特征之一。新一轮扩员后，金砖成员数量翻了一倍，10 个成员涵盖亚洲、非洲、南美洲和欧洲的重要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文化宗教、国际诉求与影响力方面，它们各具特色，并由此导致了大金砖合作较为突出的差异性。

在经济社会与民生发展方面，“大金砖”成员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从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看，中国和印度已分别成为世界第二和第五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 17.66 万亿美元，印度的 GDP 也达到 3.57 万亿美元，而埃塞俄比亚的 GDP 约为 1597 亿美元；2023 年阿联酋的人均 GDP 达到 5.19 万美元，沙特阿拉伯为 3.25 万美元，而埃塞俄比亚则不足 1511 美元。^①从人口规模看，“大金砖”包括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印度和中国的人口都达到 14 亿人以上，阿联酋的人口则不到 1000 万人。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上，社会发展状况也各不相同。2022 年 3 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显示，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进入“极高人类发展水平”行列，全球排名分别为第 17 名、第 40 名和第 56 名。这表明，这些成员拥有较好的社会福利和教育水平。但是，埃塞俄比亚的全球排名为第 176 名，处于“低人类发展水平”，面临更高的贫困率和教育普及不足的问题。^②这种成员间的总体发展水平差异，不仅决定了各自在金砖合作中的角色定位，也决定了各自在资源配置与政策推行时的优先事项。

在政治历史和文化宗教方面，“大金砖”成员之间也具有显著的差异性。

① *World Economic Outlook: Steady but Slow: Resilience amid Divergence*, New York: IMF, 2024.

② “Breaking the Gridlock: Reimagining Cooperation in a Polarized World”,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23/2024*, New York: UNDP, 2024, p.297-300.

在政治体制方面，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印度实行议会制，政党政治和地方自治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俄罗斯实行半总统制，总统权力较强，权力较为集中。而沙特阿拉伯与阿联酋则同为君主制国家，前者采取政教合一的君主专制，而后者是由七个酋长国组成的联邦制君主国，国家权力相对分散。伊朗则以什叶派为主导，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制，伊斯兰教在其社会中享有至高无上的道德权威，成为公共生活的最高准则。其他成员的政治体制也各有特色。在历史文化传统方面，各成员也有所不同。中国、埃及和印度在历史上都曾为文明古国，具有悠久丰富的历史积淀和鲜明的传统文化标识；其他各成员也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历史。此外，在宗教信仰方面各成员也同样有着显著差异，比如印度主要信仰印度教、巴西主要信仰天主教，俄罗斯、埃塞俄比亚主要信仰东正教。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中，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的逊尼派与伊朗的什叶派之间也存在差异。这些政治历史和文化宗教因素共同影响着金砖成员的政策制定、外交策略以及在国际合作中的立场和行动。

在国际诉求与影响力方面，各成员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从政治外交领域来看，中国和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政治舞台和全球安全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印度、巴西则谋求世界大国地位，与德国和日本组成了“四国联盟”，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南非、埃及与埃塞俄比亚都是非洲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寻求通过金砖平台为非洲国家发声，推动非洲一体化。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朗等国在海湾地区拥有较强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在国际能源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经济领域来看，金砖国家各自产业发展位势、经济诉求也不相同。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致力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战略，着眼于基础设施建设与贸易互联互通。印度的软件服务业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关注提升自身在信息技术和服务领域的话语权，积极参与数字经济的全球治理。俄罗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与伊朗等资源型国家则需要降低对化石能源出口的过度依赖，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巴西与埃塞俄比亚的出口以农产品和初级原料为主，经济结构相对单一，因此需要加快工业化进程，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二）大金砖合作的产业互补性

产业互补性是“大金砖合作”的重要基础，这一特征重点体现在成员间资源禀赋的独特分布和产业成长的不同阶段上。随着金砖国家的扩员，其产业互补性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这一特性为大金砖合作提供了将各自资源禀赋与能力优势转化为合作动力的机遇，更为深化大金砖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资源禀赋差异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咖啡和糖生产地，巴西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能够为其他成员提供丰富的农产品；俄罗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与伊朗都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依靠其天然气和石油的丰富储量，在全球能源市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南非、埃及和埃塞俄比亚都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可以向其他成员提供战略性矿产原料；中国和印度则在全球制造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资源分布和产业优势使金砖成员在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中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资源禀赋和能力优势的多样性不仅提高了“大金砖”内部供应链的灵活性，也为各成员在国际市场上形成合力和增强竞争力提供了条件。通过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禀赋优势，发挥合作的“长板效应”，大金砖合作在推动经济增长和提升产业竞争力方面可以实现互利共赢的局面。

新一轮扩员后，金砖国家产业合作的范围和领域进一步拓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很多金砖成员都是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经济体。根据瑞士洛桑国际发展学院（IMD）发布的《2024 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阿联酋、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依次为第 7 名、第 14 名和第 16 名。^①随着新成员的加入，金砖国家产业优势的互补性为更大范围的金砖合作创造了新的基础。例如，巴西、南非、埃塞俄比亚和埃及等国能够依托金砖机制创造的良好政策环境更加便利地向中国供应农产品和矿产资源。与此同时，通过与中国的合作，这些国家也能够不断提高自身的制造业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推动其国内市场发展与产业升级转型，提高其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总之，金砖国家产业布局特点以及产业优势的互补性，使各成员能够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在国际市场上形成更大合力，从而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实现互利共赢。

① “WCR-Rankings”, World Competitiveness Center, June 18, 2024, https://www.imd.org/centers/wcc/world-competitiveness-center/rankings/world-competitiveness-ranking/rankings/wcr-rankings/#_tab_Rank

（三）大金砖合作的成效协同性

成效协同性是大金砖合作的重要特色和优势，它主要表现为经济上的规模效应与在政治上的联动效应。新一轮扩员后，大金砖合作的成效协同性更加凸显。在经济上，随着成员数量从 5 个增加到 10 个，“大金砖”的市场规模显著扩大。目前，金砖国家的人口、国土面积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份额分别约为 46%、35% 和 36%，在经济规模上超过了欧盟，也超过了七国集团。^①除此之外，成员数量的增加也推动了各成员经济贸易的发展，为成员的进出口贸易带来了更大机遇。据中国海关统计，金砖扩员后的第一个季度，中国对其他 9 个金砖国家的进出口额达 1.49 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3%，占同期中国进出口总额的 14.7%。^②具体而言，随着大金砖合作的启动与推进，诸如中国与印度等在技术产品与服务、工程建设与承包等领域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成员，在推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能为其他成员的企业提供重要的市场拓展机会，从而实现合作共赢。

大金砖合作的规模效应在能源和金融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新一轮扩员后，金砖国家在能源储量规模上变得更大，能源产量也大幅增加。在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前 10 名的国家中，有 5 个国家为金砖成员。^③2023 年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前 10 名的国家中，金砖国家分别占了 6 席和 5 席。^④这无疑提升了金砖国家在全球能源市场的地位。金砖扩员不仅提升了金砖国家在国际经济贸易中的谈判地位和影响力，还为各成员提供了更多的合作选择和机遇。在开放性金融领域，金砖国家汇聚各成员以及其他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成立了新开发银行。新开发银行应国际需求而产生，它的宗旨是支持金砖国家及其他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

① 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和世界银行数据库。

② “我国与其他金砖国家贸易往来日益紧密”，新华网，2024 年 5 月 3 日，<http://www.news.cn/fortune/20240503/fe3cf12db5564064889fdb75c30fa69f/c.html>

③ Magnus Nysveen, Elliot Busby, “Global Recoverable Oil Reserves Hold Steady at 1536 billion Barrels; Insufficient to Meet Demand without Swift Electrification”, July 25, 2024, <https://www.rystadenergy.com/news/global-recoverable-oil-barrels-demand-electrification>;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1: A Dramatic Impact on Energy Markets”, KPMG, July 8, 2021, <https://www.bp.com/content/dam/bp/business-sites/en/global/corporate/pdfs/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bp-stats-review-2021-full-report.pdf>

④ “Global energy industry – statistics & facts”, July 16, 2024, <https://www.statista.com/topics/6148/global-energy-industry/#topicOverview>

展。^①截至 2024 年 8 月，新开发银行已批准了 96 个项目，总融资额达到 328 亿美元，帮助建设和升级 17000 公里的道路、1390 公里的水道和运河以及 820 座桥梁，还获得了国际权威评级机构 AA+ 级的评定，^②有力地支持了各成员以及其他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大金砖合作的成效协同性还体现在政治领域。随着金砖成员的增多，金砖成员身份有助于各成员在各自地区及某些功能领域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同时，在国际社会中，大金砖合作以其多元化的成员构成与共融的合作理念，能够在塑造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制度规范方面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声音。例如，金砖成员作为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由众多能源型国家或处于工业发展阶段的国家构成，这些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相对较大，因此这些国家在气候变化议程中的影响不容小觑，在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性议题上也同样负有重大责任。大金砖成员有义务也更有能力通过联合发声，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南方声音”。目前，金砖各成员已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等领域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和合作意向，强化了金砖国家在全球应对气候危机中的话语权。

三、大金砖合作对集体行动难题的应对

新一轮扩员后，成员数量的增加对金砖机制来说既创造了发展机遇，也带来了潜在挑战。金砖机制内部可能会因扩员而面临集体行动难题，即各方立场和利益诉求的差异可能导致机制内部决策效率下降以及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等问题。但是，这一逻辑存在片面性。作为“金砖”概念的提出者，吉姆·奥尼尔在评论金砖扩员时也指出，金砖国家的影响力将取决于其效率，而不是成员组成和规模。^③迈克尔·莱维（Michael Laver）也曾指出，“并非只有一条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道路，我们采用的方法取决于我们需要的物

① *Agreement on the New Development Bank*, July 15, 2014, <https://www.ndb.int/wp-content/uploads/2022/11/Agreement-on-the-New-Development-Bank.pdf>

② “All Projects”, September 15, 2024, <https://www.ndb.int/projects/all-projects/>

③ Jim O’Neil, “Does an Expanded BRICS Mean Anything?” August 27, 2023,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3/08/does-expanded-brics-mean-anything>

品的属性”^①。十多年来，金砖机制通过在理念、行动与机制三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已逐渐探索出集体行动难题的应对之道。

（一）自愿性加入与合作理念的共融性

在金砖机制扩员过程中，自愿性加入是一个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是指，成员基于自身意愿和利益考量主动申请加入合作机制。自愿的方式反映了成员对金砖机制的认同和期待。具体而言，有意加入金砖机制的国家需要提出正式申请，经过现有成员的充分讨论并一致同意后才能加入。例如，2022年6月，阿根廷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经过一年多的讨论与考察，2023年8月的约翰内斯堡峰会上，金砖国家领导人一致同意邀请阿根廷等六国加入。但在米莱总统上台后，阿根廷国内对于加入金砖机制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最终决定不加入这一机制。这一过程充分展示了大金砖合作自愿性加入的特点。自愿性加入之所以能够形成共融的合作理念，主要是因为它确保了新成员与原有成员在发展诉求和价值观念上的高度契合。只有那些认同金砖精神、认为加入该机制能够促进本国发展，同时也愿意维护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家才会主动申请，并经现有成员的一致同意后才能最终加入。

新成员加入的过程也是甄别志同道合的伙伴的过程，因而能够为成员之间的协调互进与合作共赢奠定共融的理念基础。这种理念上的共融反映了大金砖成员在国际秩序观、全球治理和发展理念上的高度一致。金砖成员都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致力于维护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2009年，金砖国家建立了领导人会晤机制，此后每年都会举行峰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在历年的峰会声明中，金砖国家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应对气候变化等很多议题上都拥有一致的立场。2023年，金砖峰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并就共同关注的地区和国际问题达成广泛共识，一致呼吁进行多边体系改革，以便更好地反映当下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特别是提升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这一格局中的权益。^②另外，共融的理念还有助于减少金砖内部分歧，提高决策效率，以增

^① Michael Laver, “Political Solutions to the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Political Studies*, 1980, Vol.28, No.2, pp.195-209.

^② 参见“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约翰内斯堡宣言（摘要）”，《人民日报》，2023年8月25日第2版。

强集体行动能力。例如，2024 年 3 月，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经过中国斡旋，恢复了外交关系，并同时加入了金砖机制，充分反映了两国共融的合作理念。两国都是重要的石油出口国，面对动荡的国际能源市场，都具有通过多边合作平台追求共同利益以促进转型发展的需求。理念共融能促进战略互信的深化，推动金砖国家在更广泛的领域和范围内开展合作，从而提升金砖国家作为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群体代表的国际影响力。

（二）非正式对话与合作行动的灵活性

非正式对话表现为金砖国家在机构设置上采用了较为松散、灵活的沟通机制，并没有建立严格的制度化框架。虽然没有正式的组织形态，但大金砖合作却具有比较成熟的机制化安排并不断加以完善。具体来说，金砖机制主要通过定期举行领导人正式会晤、部长级会议以及各种功能性工作组会议等形式运行。

目前，金砖机制形成了以国家领导人正式会晤为核心、超过 30 个部长级会议、超过 60 个工作组机制共同组成的定期会晤机制。由于组织形式的非正式性，大金砖合作中的具体行动，能够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和各成员的需求，灵活调整合作的议程和方式，在不同议题上形成金砖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金砖机制因应疫情变化，不断创新开展成员之间卫生合作的方式和机制，通过在政府、民间以及金融领域的合作来应对疫情。^①2022 年 3 月，金砖国家在线上设立金砖国家疫苗研发中心，制订了“新冠疫苗实施计划”，并发布“全球合作加速开发、生产、公平获取新冠肺炎防控新工具倡议”，据有关统计，金砖国家在疫情期间通过赠款和捐赠等方式共提供了 10 亿多剂疫苗，^②灵活的机制化方式助力金砖成员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灵活性的特点有助于机制在面对新挑战时保持活力，更好地协调成员利益，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为大金砖合作提供了灵活的实践基础。

大金砖合作延续了通过非正式对话提升合作行动灵活性的做法。首先，

① 高石、张博岚、刘融：“为全球抗疫贡献金砖力量”，《人民日报》，2022 年 6 月 16 日第 3 版。

②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三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人民日报》，2021 年 9 月 10 日第 2 版。

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通常可以避免复杂的官僚决策程序，降低了大金砖合作的制度运行成本。从组织架构来看，金砖国家并未常设秘书处和委员会，而是在内部采用轮值主席国制度，每年由一个成员主要负责协调这一年的各项金砖活动。其次，大金砖合作对成员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各成员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灵活参与。再次，大金砖合作强调通过对话进行协商合作，而非正式对话的方式则为成员提供了更多直接沟通交流的机会，有利于成员之间增进互信与理解。最后，作为非正式对话，大金砖合作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的平台，这一平台并不涉及权力与利益的分配，因此，大金砖合作能够有效地规避权力和利益分配带来的潜在矛盾。不仅如此，大金砖合作还在保持整体框架稳定的同时，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提高合作效率。

（三）渐进性扩员与合作机制的稳定性

大金砖合作的推进具有渐进性的特点，金砖机制在扩员过程中采取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的方式来吸收新成员。渐进性扩员维护了金砖机制发展的稳定性，使其能够在扩员过程中保持合作精神、运作方式和决策机制的延续性。渐进性还有助于金砖机制在发展过程中不会偏离原来的轨道，同时也为机制内的新、老成员提供了一个可预期的合作环境。由于成员对于大金砖合作的积极预期，渐进性扩员有利于推动大金砖合作的稳步发展。例如，作为金砖合作的重要成果，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成立以来也进行了多轮扩员，新开发银行在扩员过程中始终保持稳定运营与发展势头，并逐步吸收新成员。截至2024年9月，孟加拉国、阿联酋、乌拉圭、埃及与阿尔及利亚已经作为新成员加入了金砖新开发银行，凸显了大金砖合作的吸引力与稳定性。渐进性扩员还有助于维护和增进大金砖成员之间的互信，促进长期合作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推动大金砖合作的可持续发展，为进一步深化大金砖合作提供了稳固的制度基础。

渐进性扩员能够保障合作的稳定性，主要是因为它给予现有成员和潜在的新成员充分的时间来适应和融合。从扩员过程来看，老成员会倾向于在内部治理架构相对完善和稳定时再吸收新成员。对新成员来说，其在正式加入前就已经通过各种形式，以非成员身份积极参与金砖机制的合作进程，实现

从外围接触到正式加入的角色转变。^①这种方式既能确保新成员与金砖机制的合作理念和目标相契合,又能避免因大规模快速扩张可能带来的内部失衡和协调困难。因此,它有助于维护大金砖合作的凝聚力和效率。早在 2011 年,金砖机制开启了首次扩员并吸纳南非作为正式成员。自 2017 年厦门峰会提出“金砖+”概念以来,金砖国家已经连续多年邀请非成员参与“金砖+”对话会,逐步加深合作。2022 年 6 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北京宣言》明确表示,支持通过讨论推进金砖国家扩员进程。^②随后,经过深入评估和协商,金砖国家决定正式扩大成员范围,2023 年 8 月,金砖国家在约翰内斯堡峰会上正式宣布邀请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六国加入。最终,除阿根廷外的 5 个国家在 2024 年 1 月 1 日正式加入金砖机制。从以上的过程来看,本次扩员之前,金砖国家与本次加入的新成员已经在“金砖+”等框架下进行了多年的沟通交流与对话合作,为它们最终正式加入金砖机制奠定了重要的合作基础。

四、大金砖合作对国际合作的理论启示

作为新兴的国际合作范式,大金砖合作为国际合作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独特视角。大金砖合作实践彰显了国际合作模式的创新,从而为国际合作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具体来说,大金砖合作通过统筹共同利益与包容利益创造了合作动力;通过创造积极效应、避免消极效应增强了合作的可持续性;以自身发展促进共同发展,不断巩固了合作基础。

(一) 共同利益、包容利益与国际合作

长期以来,国际合作理论强调共同利益在促进国家间合作中的核心作用。而共同利益被认为是各国国家利益中存在共性与趋同的部分,由共同收益和共同威胁所构成,二者共同形成国际合作的基础。^③但新自由制度主义

① 徐秀军:“全球治理的金砖模式:生成逻辑与实践路径”,《拉丁美洲研究》,2022 年第 5 期,第 2-19 页。

②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北京宣言”,《人民日报》,2022 年 6 月 24 日第 2 版。

③ 刘笑阳:“国家间共同利益:概念与机理”,《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 6 期,第 102-121 页。

认为，国际关系中，利益完全趋同和利益完全冲突的极端现象都极少存在，而大部分的互动关系都是既存在利益冲突又存在利益趋同的。^①这为我们重新思考国际合作动力提供了新的视角。大金砖合作的事实表明，即使在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国家之间仍可以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并通过统筹共同利益与包容利益不断创造合作动力。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指出，由于利益冲突，博弈中的每一方必须与对方进行协同，否则只能两败俱伤。^②也就是说，即使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行为体也具有合作空间。

在现实中，各国之间不仅具有共同利益，还存在包容利益。所谓包容利益，是指博弈的参与方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不损害其他各方的利益，甚至有利于其他各方利益的实现，因而与其他各方的利益在本质上是相同的。^③合作中的利益契合不等于利益相同，因此合作各方能够“求同存异”。在大金砖合作中，各成员虽然在具体利益上存在差异，但在追求国际秩序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改革等方面的战略诉求上拥有契合点。因此，金砖国家在很多议题上达成广泛共识，例如共同倡导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这种“利益多样性中的统一性”为国际合作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与传统理论中对利益同质性的过度强调不同。大金砖国家通过灵活的合作机制进一步拓展了合作的包容性，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参与全球治理的新平台。

包容利益的概念在大金砖合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为国际合作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大金砖合作表明，利益的异质性也可以成为合作的基础。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强调，国家利益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互动过程中不断被构建和重塑。^④大金砖合作为各成员提供了一个重新挖掘和协调利益的平台，使得原本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能够转化为合作的动力。例

① [美]罗伯特·基欧汉著：《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信强、何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页。

② [美]托马斯·谢林著：《冲突的战略》，王水雄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9年，第61-70页。

③ 徐秀军：“制度非中性与金砖国家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6期，第77-97页。

④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8-237页。

如，新开发银行的建立就是这种包容性利益的具体体现。传统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往往根据成员的偿还能力、项目盈利的潜力以及其他附加条件进行贷款，导致众多急需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得不到贷款，形成了利益冲突，而新开发银行的贷款项目不仅覆盖传统基础设施，还包括可再生能源等新兴领域，反映了成员多样化的发展需求。2021 年，新开发银行批准了巴西圣保罗州可持续恢复计划贷款，同时也支持了印度可再生能源项目，展示了金砖合作如何在不同需求阶段的国家间创造包容利益。这种动态的利益构建过程挑战了新现实主义对国家利益的静态理解，为国际合作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即如何在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构建有效的合作机制。

（二）积极效应、消极效应与国际合作

在国际合作理论中，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的概念对理解合作与冲突的动态至关重要。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理念，倾向于强调合作带来的积极效应，如获得经济收益、提高政治影响等。然而，这种视角往往忽视了合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消极效应，如利益分配不均、主权让渡等问题。大金砖合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即通过在合作中创造积极效应，避免消极效应，从而增强国际合作的可持续性。

金砖合作作为“通过合作来管理冲突”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这种做法与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提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形成鲜明对比。米尔斯海默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国家间的权力竞争是不可避免的。^①然而，大金砖合作表明，即使在有潜在竞争冲突的情况下，国家之间仍然可以通过制度化合作来管理分歧，通过创造积极效应、避免消极效应来增加合作的可持续性。例如，尽管中印两国在领土和边境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仍在金砖框架下保持了合作，共同推进实现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2017 年，金砖厦门峰会期间，中印在洞朗地区发生对峙，但因金砖峰会的召开，双边关系得到了缓和。在会议上，中印领导人就反恐等议题达成共识，体现了金砖机制在管控双边分歧方面的积极作用。金砖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合作提供了另一个典型案例。尽管各成员在

①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33-39 页。

应对疫情的策略上存在差异，但它们仍然通过大金砖框架来协调抗疫行动，如共同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开展工作、建立金砖线上疫苗研发中心等。这些措施不仅避免了疫情带来更大的损失，还为大金砖合作创造了积极效应。

在重复博弈中，合作行为或利他行为是可以通过塑造形成的，行为体可以通过学习和适应来发展合作策略。^①大金砖合作正是这种动态学习过程的体现，各成员通过持续地互动和调整，逐步建立起了管理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的有效机制。例如，大金砖国家在应对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不公平问题时，不是采取对抗性的策略，而是通过构建新的金融机构来补充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新开发银行和金砖应急储备安排的成立，就是这种策略的具体体现。这些机构不仅为各成员提供了额外的融资渠道，还推动了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这种做法不仅增强了合作的可持续性，还为国际合作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即如何设计能够自我调节和适应的合作机制，以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实现积极效应的最大化和消极效应的最小化。

（三）自身发展、共同发展与国际合作

在国际合作中，自身发展与共同发展的关系一直是各方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这一议题实际上讨论的是合作中的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N. Waltz）等结构现实主义学者强调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必须首先考虑自身安全和利益。^②新自由制度主义也认为，国家广泛追求自身利益，只要合作有助于增强自身实力，国家就会推动建立合作的制度，并以此来获取合作的收益。^③这种观点往往将自身发展与共同发展视为潜在的矛盾。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各国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传统的二元对立视角越来越难以解释错综复杂的国际现实。事实上，自身发展与共同发展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体两面的相互依存关系。与传统的零和博弈思维不同，大金砖合作为理解自身发展与共同发展之间冲突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

大金砖合作强调以自身发展来促进各成员的共同发展，体现了一种协同

① [美]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著：《合作的进化》，吴坚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②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③ [美]罗伯特·基欧汉著：《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信强、何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发展的理念。当前，相互依存的世界使得各国难以独善其身，因此国际合作不可避免。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认为，相互依赖意味着行为体的目标无法独立实现，只有与其他行为体合作才能够实现，否则所有行为体都会为此付出代价。^①大金砖合作的实践深化了这一理论，展示了在多元利益结构中如何推动自身发展和共同发展的协同。2020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新开发银行迅速响应，设立了 100 亿美元的应急贷款额度，为成员提供紧急援助。这一举措在帮助各成员应对危机的同时，也强化了金砖国家整体应对疫情风险的能力。另一个典型案例是金砖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2017 年，金砖国家发布了《金砖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合作倡议》，旨在通过数字化转型推动金砖各成员的经济增长。金砖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的推进，既为各成员创造了数字产业的发展机遇，也提升了作为一个整体的金砖国家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大金砖合作将各方力量汇聚在一起，实现了“1+1>2”的协同效应。

中国的发展观念也为分析自身发展与共同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思路。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在国际合作中，中国既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以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在大金砖合作中，中国也秉承了这种发展观念，通过提供中国方案和贡献中国智慧，展现了中国作为和平力量、稳定力量、进步力量的国际角色。这一观念不仅为中国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思路，也为金砖国家共同发展与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例如，在 2017 年举行的厦门金砖峰会上，基于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中国提出并推动了“金砖+”合作模式。这一模式旨在通过金砖国家与其他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扩大金砖合作的辐射和受益范围，打造开放多元的发展伙伴网络。这种合作模式有助于推动更多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深化合作、共同发展。通过“金砖+”合作模式，中国实现了自身的发展，提升了自身的经济地位，其他金砖成员与发

^① Helen Milner, “The Assumption of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qu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1, Vol.17, No.1, pp.65-85.

展中国家也因此受益，从而实现了共同发展和进步。

五、结 语

长期以来，国际合作受到集体行动难题的困扰，国际公共产品赤字问题也因此普遍存在。大金砖合作通过塑造共融的合作理念，在行动上提供有效激励，并进行创新性制度设计，在集体行动难题的应对上探索出特色鲜明的“金砖方案”。大金砖合作的实践经验不仅丰富了国际合作理论，还为构建更具包容性、适应性和可持续性的国际合作机制提供了重要启示。

大金砖合作具有独特的内涵特征，并展现了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合作中进行合作模式创新的现实背景。总体来看，大金砖合作的独特内涵主要体现在成员差异性、产业互补性和成效协同性方面。成员差异性为产业互补性带来契机，产业互补性推动成效协同性形成，三者共同构成了大金砖合作的动力基础。成员之间的差异性不仅体现了大金砖合作内涵的多样性，也凸显了金砖合作精神所蕴含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产业的互补性为金砖成员间的互利共赢奠定了经济基础，成员间的合作将有助于维护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在金砖成员之间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全球价值链，增强了大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产业竞争力。成效协同性则体现在两个方面：大金砖合作在经济上具有规模效应，在政治上能够产生联动效应，规模效应与联动效应的存在显著提升了大金砖国家在国际经济贸易和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大金砖合作的独特优势，为其能够有效应对国际合作中的集体行动难题提供了现实基础。

同时，通过在理念、行动和制度上的努力，大金砖合作找到了集体行动难题的应对之道。具体来说，自愿性加入保证了新加入成员与原有成员在发展诉求和价值理念上的高度契合，形成了共融的大金砖合作理念。这为大金砖合作的行动开展打下了坚实的观念基础，也为大金砖合作的机制运行提供了思想指引。非正式对话机制提升了大金砖合作行动的灵活性，降低了制度运行成本，同时为成员提供了更多沟通与交流的机会，有利于增进金砖成员之间互信与理解。行动是观念的落脚点，共融的合作观念通过金砖的具体合

作实践得以落实，合作机制也通过合作实践的反馈得以改进。渐进性扩员保障了大金砖机制的稳定性，渐进性的扩员过程给予现有成员和新加入成员充分的时间进行相互适应并融合，避免了因大规模快速扩张可能带来的内部失衡和协调困难。理念与行动要发挥作用，就要有稳定的运行机制作为保障，金砖机制的制度安排为共融理念的落实与共同行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理念、行动和制度上的有机结合，使得大金砖合作能够保持其合作精神、核心理念、运作方式和决策机制的连续性发展和一致性认同。

最后，大金砖合作对国际合作理论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统筹共同利益与包容利益创造合作动力。大金砖合作对传统国际合作理论中过度强调利益同质性的观点进行了有益补充，展示了在利益多元化的国际背景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构建有效合作机制的方式。包容利益的概念在大金砖合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一视角为国际合作理论注入了新的动力。

第二，平衡积极效应与消极效应来增强合作可持续性，通过创造积极效应、避免消极效应。大金砖合作提供了“通过合作来管理冲突”的合作新思路，启发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集体进行自我调节和灵活适应现实的国际合作机制设计，以实现国际合作的积极效应最大化和消极效应最小化。

第三，协调自身发展与共同发展不断巩固合作基础。大金砖合作强调以自身发展促进共同发展，展示了如何在利益多元的国际体系中推动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共同实现。协同发展的理念深化了国际合作理论，也为国际合作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大金砖合作的实践不仅对成员自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动力。未来，随着大金砖合作的进一步深入与扩展，其有望成为推动形成更为均衡发展的全球经济格局的重要动力，为塑造更为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秩序、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Abstract】 After the latest round of expansion, the BRICS mechanism has embarked on a new journey of greater BRICS cooperation. Compared with the past, the greater BRICS cooperation demonstrates mor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member diversity, industrial complementarity, and effective coordination. It offers new approaches to addressing collective action challenges within the BRICS framework through its principles, actions,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Specifically, voluntary membership ensures inclusiveness in greater BRICS cooperation's guiding principles, informal dialogues enhance the flexibility of its actions, and gradual expansion maintains the stability of its mechanism. Moreover, greater BRICS cooperation balances shared and inclusive interests, creating positive outcomes while avoiding negative effects. It aims to promote joint development through its own growth, providing important insights for building a more inclusive, adaptive, and sustainabl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As a representative exampl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practice of greater BRICS cooperation has become a source of innov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ories.

【Key Words】 Greater BRICS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ory, Collective Action Challenge, Gradual Membership Expansion, Inclusive Benefits

【Аннотация】 После нового раунда расширения механизм БРИКС вступил на новый путь расширен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прошлы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расширенного БРИКС имеет более очевидные коннотатив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различий между членам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й взаимодополняемости и синергии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а также предоставляет механизму БРИКС новые способы решения проблем коллективных действий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концепций, действий и систем. В частности, добровольное членство обеспечивает инклюзивность концеп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расширенного БРИКС, неформальный диалог повышает гибкость действий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а постепенное расширение членства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механизма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Более т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расширенного БРИКС координирует общие интересы и инклюзивные интересы, создаёт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е эффекты и избегает отрицательных последствий, стремится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общему развитию посредством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и обеспечивает платформу для построения более инклюзивного, адаптируемого и устойчивого механизм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Будучи показательным примеро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практика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БРИКС стала источником инноваций в те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асширен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БРИКС, теор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трудности коллектив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прогрессивное расширение членства, инклюзивность интересов

(责任编辑 崔 珩)

身份叙事、利益偏好与金砖国家的政策选择*

朱杰进 刘瑛琛**

【内容提要】在金砖国家当中，同样是发展中大国，印度全面坚持了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政策，中国部分坚持了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政策，而巴西却放弃了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政策。身份叙事和利益偏好共同影响了金砖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政策选择。印度突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叙事，利益偏好带有较为明显的保护主义，使得印度全面坚持了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政策。中国强调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叙事，但利益偏好以开放型经济为主，从而中国部分坚持了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政策。巴西突出地区性大国的身份叙事，利益偏好以开放性经济为主，使得巴西放弃了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政策。

【关键词】金砖国家 身份叙事 利益偏好 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 政策选择

【中图分类号】D814.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4)05-0039(22)

一、引言

作为发展中大国以及全球南方利益的维护者，金砖国家一直主张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并强调世贸组织改革过程中要格外注意维

* 本文系上海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改革的路径研究”（项目批准号：2020BGJ001）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 朱杰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刘瑛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护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权利和利益。^①但值得关注的是，当美国等发达国家提出要取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时，金砖国家却选择了不同的政策立场：中国“部分坚持”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印度“全面坚持”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而巴西却“没有坚持”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②

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SDT）是指多边贸易体制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具体而言，为更好地实现建立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的宗旨和目标，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和需要，发展中国家可以在特定条件下背离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协议中规定的一般性权利和义务，从而享有特殊和差别的待遇。^③

具体来看，针对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的问题，中国采取了“制度层面坚持、实践层面灵活”的部分坚持政策，既维护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这一自身的制度性权利，又在具体谈判实践中采取灵活务实、实事求是的方针。印度采取了“全面坚持”的政策立场，不仅强调特殊与差别待遇是所有发展中成员不可谈判的权利，还积极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致力于提升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巴西没有坚持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政策，不再将其视为发展中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提出要反思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的适用范围以及明确“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分类标准。

同样是发展中大国，为什么金砖国家当中印度全面坚持了发展中国家特

①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巴西利亚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9年11月15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jzgj_682158/zywj_682170/201911/t20191115_7664885.shtml

② 金砖国家成员国数量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过程，目前已经有 10 个正式成员国。2006 年，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 4 个国家的外长举行首次会晤，拉开了金砖国家合作的序幕。2011 年，南非加入金砖国家，金砖 4 国变成了金砖 5 国。2024 年，沙特阿拉伯、伊朗、阿联酋、埃及、埃塞俄比亚加入金砖国家，金砖 5 国变成金砖 10 国。由于本文重点探讨金砖国家关于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政策选择问题，中国、印度、巴西分别采取了部分坚持、全面坚持和不坚持这三种有代表性的政策立场，因此，本文将重点探讨这三个国家关于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政策选择差异及其形成原因。

③ 柯静：“新一轮世贸组织特殊和差别待遇之争及其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19 年第 8 期，第 26 页；任靓、林创伟：“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问题的特征与改革方向”，《国际贸易》，2023 年第 7 期，第 51 页。

殊和差别待遇的政策，中国部分坚持了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政策，而巴西却没有坚持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政策？^①这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对此，本文提出，身份叙事和利益偏好共同影响了金砖国家的政策选择。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叙事与保护主义的利益偏好，使得印度全面坚持了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政策。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叙事和开放主义的利益偏好，导致中国部分坚持了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政策。地区性大国的身份叙事和开放主义的利益偏好，使得巴西放弃了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政策。

解释金砖国家政策选择的差异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理论上，金砖国家的政策选择究竟由什么因素决定，一直是金砖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②既有研究更多地从金砖国家作为发展中大国的身份出发，认为发展中大国的身份可以解释金砖国家的政策选择。本文补充了利益偏好的解释变量，从而进一步丰富了金砖国家的身份政治理论。在现实意义上，随着近年来沙特、伊朗、阿联酋、埃及、埃塞俄比亚等新成员国的加入以及金砖伙伴国名单的确定，“大金砖合作”的格局正逐步形成，金砖国家的身份叙事和利益偏好会变得更加多元。因而，理解大金砖合作中其他国家的政策选择及其背后的决定因素，对于中国更好地开展金砖外交以及提高中国金砖机制中的话语权都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主要内容包括：从历史演进的角度介绍究竟什么是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探讨中国会部分坚持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政策的原因；分析印度选择全面坚持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政策的原因；探讨为什么巴西会放弃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政策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得出

① 参见王金永：“发展议题大辩论：中国还需要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吗？”，载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艰难时刻：世贸组织与中国（2018—201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6—62页；Till Schöfer, Clara Weinhardt, “Developing Country Status at the WTO: the Divergent Strategies of Brazil, India and China”,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2, Vol.98, No.6, pp.1937-1957.

② Fabiano Mielniczuk, “BRIC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Changing Identities, Converging Interests”,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13, Vol.34, No.6, pp.1075-1090; Michael Papa, Zhen Han, Frank Donnell, “The Dynamics of Informal Institution and Counter-hegemony: Introducing a BRICS Convergence Index”,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23, Vol.29, No.4, pp.960-989.

结论。

二、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的历史演进

在多边贸易体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是否可以享受优惠待遇，还是所有成员国适用统一的权利和义务，一直存有争议。

1947 年 10 月，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建立。关贸总协定的基本原则强调，所有成员国的权利与义务对等。但与此同时，在发展中国家的争取下，关贸总协定的第 18 条作为例外条款，讨论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第 18 条提出，为了促进本国的工业发展，发展中国家在取得事先一致同意的条件下，可以不履行关贸总协定规定的一般性义务。^①

1955 年 3 月，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了关贸总协定，关贸总协定审查会议对第 18 条进行了修正，要求给予发展中国家在履行关贸总协定协议时更大的灵活性，以促进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的发展。具体来看，发展中国家为了促进国内某一产业的发展，既可以撤回事先约定的关税减让表，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采取不符合关贸总协定协议的措施，还可以采用对进口产品实施数量限制的办法来应对外汇储备不足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修正案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仅仅涉及了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的发展，而没有涉及如何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②

1966 年 5 月，关贸总协定增加了“贸易与发展”部分，作为关贸总协定的第 4 部分，明确承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非互惠原则，强调要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具体包括：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特殊商品最大可能地扩大以优惠条件进入市场的机会；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特殊

① “Report of the 2nd session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Employment, E/PC/T/186”, U.N., August 1947,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743530?v=pdf>

② 杜明、李红波：“GATT/WTO 体制中特殊和差别待遇的历史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 8 期，第 69-74 页；车丕照、杜明：“WTO 协定中对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的法律可执行性分析”，《北大法律评论》，2005 年第 1 期，第 291 页。

商品削减或者降低贸易壁垒；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商品提供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需要强调的是，关贸总协定第4部分的通过，明确了贸易与发展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强调多边贸易体制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第4部分总体上是鼓励性的、政治性的，并没有法律约束力。^①

1979年11月，关贸总协定达成了“授权条款”，为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提供了法律基础，是特殊和差别待遇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授权条款”的主要内容是授权发达国家可以背离关贸总协定第1条的最惠国待遇原则，给予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需要注意的是，授权条款虽然从法律上确认了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的合法性，但并没有确立如何实施的具体法律义务，属于“最佳努力”（best effort）的条款。^②

1995年1月，世界贸易组织（WTO）建立，取代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也进一步扩大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关于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数量和适用范围。^③2001年11月，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多哈举行。《多哈部长宣言》承认，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是WTO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进一步提出，各成员应重新审视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所有条款，以加强条款的准确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④但是，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特殊和差别待遇问题上矛盾重重，多哈回合谈判迄今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经历了较长的历史演进过程，虽然一直存有争议，但仍然在缓慢地向前发展。在此背景下，作为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坚定维护者，金砖国家为什么在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的问题上选择了不同的政策？中国部分坚持了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

① 漆彤、范睿：“WTO改革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待遇问题”，《武大国际法评论》，2019年第1期，第93-108页。

② 王中美、徐乾宇：“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改革的分歧与对中国的方案建议”，《国际经济法学刊》，2022年第2期，第3页。

③ 柯静：“新一轮世贸组织特殊和差别待遇之争及其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8期，第26-34页。

④ 任靓、林创伟：“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问题的特征与改革方向”，《国际贸易》，2023年第7期，第53页。

别待遇的政策，印度全面坚持了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政策，而巴西却放弃了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政策。^①

三、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

（一）中国的政策选择

针对 GATT/WTO 协议中赋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中国采取了“制度层面坚持、实践层面灵活”的“部分坚持”的政策立场：一方面，中国强调，需要维护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这一自身的制度性权利；另一方面，中国会根据自身国力的增强和能力的提高适度“让利”，在具体谈判实践中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采取灵活务实、实事求是的方针。^②

1986 年 7 月，中国向关贸总协定提交申请时，就将维护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作为“复关三原则”之一，随后一直伴随着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全过程。^③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远未实现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和充分性，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着较大差距。此外，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是天然盟友，在维护人类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保持一致。^④

2001 年 12 月，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仍然致力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这一制度性权利。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中，美国等发达国家提出，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的最终目标应是所有成员加速对等开放和贸易自由化，而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则是对多边贸易规则的严重偏离。目前，所有世贸组织规则只适用于少数发达国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游离于规则之外，这种结构性歧视严重损害了世贸组织的功能，是导致世贸组织谈

① Till Schofer and Clara Weinhardt, “Developing Country Status at the WTO: the Divergent Strategies of Brazil, India and China”,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2, Vol.98, No.6, pp.1937-1957.

② 张向晨、徐清军、王金永：“WTO 改革应关注发展中成员的能力缺失问题”，《国际经济评论》，2019 年第 1 期，第 9-33 页。

③ 另外两项原则是“中国是申请‘恢复’而非‘加入’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中国准备以‘关税减让’而非‘承担进口义务’的方式来进行复关谈判”。参见王毅：《世纪谈判：在复关/入世谈判的日子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年，第 24 页。

④ 朱杰进、魏宇航：“中国入世二十年：从艰难融入到部分引领”，《国际观察》，2021 年第 5 期，第 5 页。

判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中国则一针见血地提出，当前世贸组织谈判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不愿意承担与自身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相一致的义务，特殊和差别待遇是发展中国家在历次多边贸易谈判中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谈判结果。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必须得到坚持，这是世贸组织包容性的一种体现。^①

与此同时，中国也强调，随着发展进程的加快，中国愿意在世贸组织中承担与自身发展水平和能力相适应的义务，灵活对待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

在世界贸易组织《信息技术协定》（ITA）扩围谈判中，中国积极促成协议达成并为之付出了艰苦的努力，相关产品关税从 6.5% 降到 0，是所有参加方中削减水平最高的。在实施《贸易便利化协定》的过程中，中国 94.5% 的承诺属于 A 类，即协定生效后立即实施，不要求过渡期和技术援助，并未寻求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

为什么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会采取“制度层面坚持、实践层面灵活”的“部分坚持”的政策立场？这实际上与中国的身份叙事和利益偏好有关。

（二）中国的身份叙事

在中国的身份叙事中，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的基础，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立足点。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外交的基础作用一直贯穿于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全过程。

在“站起来”阶段，中国从全球政治格局的高度看待发展中国家，将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确定为中国外交的战略基础。新中国建立后，如何巩固新生政权，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孤立和封锁，成为中国外交的优先任务。对此，中国与印度、缅甸等发展中国家共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随后的亚非万隆会议上得到进一步推广和发展，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与欢迎。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中国明确表明自己的身份属于发展中国家，这既奠定了中国对外战略的理论基础，也为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叙事打

^① 王金永：“发展议题大辩论：中国还需要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吗？”，载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艰难时刻：世贸组织与中国（2018—201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6-62页。

下了历史根基。^①

在富起来阶段，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领域互补性较强，开展了全方位、多领域的国际合作。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以国内经济发展为中心，外交工作迅速适应了这一新的主题和目标。一方面，中国开始与东南亚、非洲、拉美、中东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了促进共同发展的区域性机制，如“东盟+中国”合作机制、中非合作论坛、中拉论坛、中阿论坛等；另一方面，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多边机制内倡导建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将促进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作为自己的使命和担当，这就使得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战略有了更为坚实的经济基础，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叙事。^②

在强起来阶段，中国将自身的发展机遇与发展中国家共享，与发展中国家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了进一步突出发展中国家身份，中国提出了新型义利观，“在外交工作中要妥善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政治上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经济上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国际事务中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做到义利兼顾、义利平衡”^③。针对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的非洲地区，中国提出了“真实亲诚”的工作理念。“对待非洲朋友，我们讲一个‘真’字。真朋友最可贵。我们始终把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础，这一点绝不会因为中国自身发展和国际地位提高而发生变化”^④。

简言之，中国的身份叙事决定了自己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不会改变。在全球贸易治理中，中国必须坚持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这一制度性权利，才能在更大范围内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与发展中国家保持一致。但与此同时，中国所选择的开放型经济发展道路以及自身不断转变的利益偏好，也使得中国需要对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采取更为灵活的态度。

① 王逸舟、谭秀英主编：《中国外交六十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② 刘青建：“中国外交的战略基础：形成、发展与挑战”，《当代世界》，2014年第10期，第16-18页。

③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38页。

④ 同上，第139页。

（三）中国的利益偏好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加快以及开放型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中国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利益偏好变得更加复杂，打破了既有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利益两分法。

在国际投资领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偏好存在较大差别。发达国家通常是资本输出国，而发展中国家通常是资本输入国。一般情况下，资本输出国希望建立一套统一的多边投资规则，营造开放的国际投资环境；而资本输入国则担心建立国际投资规则会损害自己的经济主权以及政策自主性，往往采取保护主义的政策措施。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发达国家推动达成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和《服务贸易总协定》，而发展中国家则不断降低这些国际投资协定的雄心水平。具体来看，在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下，《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和《服务贸易总协定》管辖的投资措施范围极为有限，在投资领域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对外开放的新兴经济体，中国正在转变成为一个“资本输出”和“资本输入”同时并存的大国。^①因此，中国的利益偏好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中国既希望推动建立统一的国际投资规则，又希望在国际投资规则中兼顾南北利益。^②

2016年9月，中国在主办G20杭州峰会时，主动将全球投资议题纳入G20的全球经济议程，并推动达成了《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为各国制定国内政策和商签对外投资协定提供指引。具体来看，该指导原则提出，全球投资对全球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各国要避免与跨境投资有关的保护主义；投资政策应以促进投资为宗旨，但也应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一致等。^③这实际上反映出，中国在投资领域的利益偏好是希望推进全球统一的投资规则，营造开放透明的国际投资环境，这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投资领

① 朱杰进、魏宇航：“中国入世二十年：从艰难融入到部分引领”，《国际观察》，2021年第5期，第20页。

② 周子绚：“头羊初体验：中国引领投资便利化议题的不平凡历程”，载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艰难时刻：世贸组织与中国（2018—201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58—175页。

③ 《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人民网，2016年9月7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907/c1002-28696142.html>

域的保护主义利益偏好形成鲜明对比。

在电子商务领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偏好同样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希望建立统一的电子商务国际规则，推动数据跨境自由流动、互联网开放、保护个人信息等，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监管能力和国内产业竞争力，希望维护网络安全、发展国内产业，因而不愿意参与电子商务的国际谈判。例如，印度在电子商务税收领域，关注重点是“避免税收流失”而非“减税促发展”，在电子商务数据流动领域，以“本地存储”为基本原则而将“允许流动”列为例外情况。^①

而中国的利益偏好则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不同，需要一个开放、稳定、可预测的电子商务国际制度环境。中国国内电子商务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发展，在全球的电子商务市场上逐渐处于领跑者的地位。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数据流动、本地存储要求、电子商务税收等领域出台一系列保护主义的国内政策和立法，客观上加剧了国际电子商务政策的碎片化，对中国造成不利影响。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希望通过世贸组织框架内的电子商务谈判，就相关问题开展国际协调，制定统一的国际规则。

综上所述，中国的身份叙事需要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保持一致，但伴随着中国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国在很多议题领域的利益偏好正在发生变化，客观上要求中国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扮演一种桥梁的角色，更加灵活地对待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因此，中国采取了“制度层面坚持、实践层面灵活”的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政策。

四、印度与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

（一）印度的政策选择

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印度采取了“全面坚持”的政策立场：一方面，印度强调，特殊和差别待遇是所有发展中成员不可谈判的权利，

^① 丁力：“发展中国家与电子商务谈判”，载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艰难时刻：世贸组织与中国（2018—201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76-187页。

必须得到保留；另一方面，印度还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要求强化特殊与差别待遇，试图推动世贸组织在发展问题上取得实际的进展。

首先，印度十分关注世贸组织改革中的发展问题，并不断强调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必须得到保留。2019年7月11日，印度等十个发展中国家共同向世贸组织总理事会提交了《加强世贸组织以推动发展和包容性》的联合提案（又称“十国提案”）。这份提案中指出，“特殊和差别待遇是所有发展中成员不可谈判的权利，在当前和未来的世贸组织协定中保留和加强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是必要的，并且应当优先关注最不发达国家”^①。2021年年底至2022年年初，在世贸组织第十二次部长级会议召开前夕，印度政府不断强调要保留世贸组织对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核心原则。例如，2022年1月12日，印度商工部长皮尤什·高耶尔（Shri Piyush Goyal）曾表示：“我们需要在保留协商一致的核心原则和保障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人民和发展应该成为世贸组织未来议程的核心。”^②

其次，在保留发展中成员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基础上，印度还要求加强世贸组织协定中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准确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2019年5月，世贸组织发展中成员部长级会议的成果文件中有如下表述：“特殊与差别待遇是发展中成员的权利，必须在当前和未来的世贸组织协定中予以保留和加强，并优先关注最不发达国家问题。我们强调通过强化综合框架、贸易援助和其他工具，向发展中成员，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方面支持的重要性。”^③在2019年7月的“十国提案”中，印度等国明确要求加强世贸组织协定中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可操作

① “Strengthening the WTO to Promote Development and Inclusivity”, July 18, 2022, [https://web.wtocenter.org.tw/downloadFiles/13120/373762/00MaPTOI24B9Hm11111fEJeWrbmqPiQHVqnxJ98yoXQuvQyHX77QNHKlhBT2HefrlthnWsKbjloA4uFkhL4u11111fFmktpA==#:~:text=WT/GC/W/778/Rev.5%2018%20July%202022%20\(22-5427\)%20Page](https://web.wtocenter.org.tw/downloadFiles/13120/373762/00MaPTOI24B9Hm11111fEJeWrbmqPiQHVqnxJ98yoXQuvQyHX77QNHKlhBT2HefrlthnWsKbjloA4uFkhL4u11111fFmktpA==#:~:text=WT/GC/W/778/Rev.5%2018%20July%202022%20(22-5427)%20Page)

② “India makes a strong pitch for 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developing and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at the WTO”, June 13, 2022, <https://pib.gov.in/Pressreleaseshare.aspx?PRID=1833651>

③ “Outcome of the WTO Ministerial Meeting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king Collectively to Strengthening the WTO to Promote Development and Inclusivity”, May 14, 2019, <https://pib.gov.in/newsite/PrintRelease.aspx?relid=190000>

性。^①2024 年 5 月，在世贸组织第十三次部长级会议召开后，印度向世贸组织总理事会递交了《世贸组织三十年：如何推进发展维度与前进道路》的提案。该提案指出，“三十年来，发展一直是《世贸组织协定》的宗旨与核心内容……在世贸组织成立三十周年之际，各国应当反思世贸组织是如何支持‘发展’这一崇高理想和所有成员的期待的，并思考其发展需求和挑战……各国需要重振发展维度的讨论，以使世贸组织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和有意义的成果”^②。

最后，在世贸组织改革进程中，印度始终在努力动员发展中国家联盟，维护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一方面，印度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同一立场，并以领导者的姿态进行协调。在世贸组织关于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问题讨论最为激烈的 2019 年，印度先后多次同南非、委内瑞拉等一众发展中国家递交了相关提案，坚决捍卫发展中国家权利。2019 年 5 月，印度牵头在新德里召开了世贸组织发展中成员部长会议，埃及、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和南非等国参加了此次会议。2021 年 11 月，印度商务部联合秘书沙马尔·米斯拉（Shyamal Misra）表示，“印度将在即将举行的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上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而奋斗”^③。

印度对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采取“全面坚持”的政策立场，实际上与印度的身份叙事和利益偏好有关。

（二）印度的身份叙事

从 1947 年摆脱英国殖民统治正式独立至今，印度始终以发展中国家这一概念来构建其对外战略的身份叙事。^④从尼赫鲁时代的理想主义，到 20 世

① “Strengthening the WTO to Promote Development and Inclusivity, Communication from the African Group, CUBA, India and Pakistan”, July 18, 2022, [https://web.wto.org/tw/downFiles/13120/373762/00MaPTOI24B9Hm11111fEJeWrbmqPiQHVqnxJ98yoXQuvQyHX77QNHKlhBT2HefrIthnWsKbjloA4uFkhL4u11111fMktpA===#:~:text=WT/GC/W/778/Rev.5%2018%20July%202022%20\(22-5427\)%20Page](https://web.wto.org/tw/downFiles/13120/373762/00MaPTOI24B9Hm11111fEJeWrbmqPiQHVqnxJ98yoXQuvQyHX77QNHKlhBT2HefrIthnWsKbjloA4uFkhL4u11111fMktpA===#:~:text=WT/GC/W/778/Rev.5%2018%20July%202022%20(22-5427)%20Page)

② Amiti Sen, “India calls for priority to trade issues that impact developing nations at WTO”, May 9, 2024, <https://www.thehindubusinessline.com/economy/india-calls-for-priority-to-trade-issues-that-impact-developing-nations-at-wto/article68157654.ece>

③ “India for Special Treatment to Developing Nations at WTO”, November 26, 2021,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business/india-business/india-for-special-treatment-to-developing-nations-at-wto/articleshow/87920664.cms>

④ Shantanu Chakrabarti, “Global South rhetoric in India’s policy projection”,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16, Vol.38, No.9, pp.1909-1920.

纪 60 年代中期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现实主义，再到今天的经济实用主义，^①印度始终没有放弃“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叙事。

尼赫鲁时代，印度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叙事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强调民族主义、亚洲团结与去殖民化。尼赫鲁怀有一种民族主义的信念，并将民族主义信念与亚洲团结以及去殖民化的愿景联系起来。^②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参加了带有去殖民化色彩的万隆会议，并在随后的不结盟运动和 77 国集团中扮演发展中国家领袖的角色。

英迪拉·甘地时代，印度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叙事转向现实主义。这一时期，印度更加重视对发展中国家领导力的投射，并将不结盟运动的成员资格视作其国际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以动员广大发展中国家反对西方在贸易、发展、知识产权、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垄断地位。^③

冷战结束以后，印度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叙事更加具有实用主义的色彩。^④这一时期，印度一方面重视与西方加强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将外交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政策上，将其视为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平台。俄乌冲突爆发后，莫迪政府开始将“全球南方”作为其外交的主要抓手之一。^⑤一是举办“全球南方之声峰会”，将印度打扮成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二是利用主办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的契机，推动非盟加入 G20，借机提高印度在非洲的影响力。

简言之，印度的外交始终受到“发展中国家”身份叙事的影响。^⑥印度坚决维护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并在这一议题上积极动员组建广大发

① Rohan Mukherjee, David Malone, “India Foreign Policy and Contemporary Security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1, Vol.87, No.1, pp.87-104.

②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著：《印度的发现》，向哲濬、朱彬元、杨寿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474-493 页。

③ Kanwal Sibal, “Don’t Be Limited by the Non-Aligned Movement Anyhow”, August 27, 2012, <https://www.dailymail.co.uk/indiahome/indianews/article-2194504/Don-t-limited-Non-Aligned-Movement-anyhow.html>

④ 吴琳：“大国身份叙事重塑与印度的新‘全球南方’外交”，《太平洋学报》，2023 年第 11 期，第 1-15 页。

⑤ 张立、辛逸伦：“印度莫迪政府的‘全球南方’外交转向”，《现代国际关系》，2024 年第 4 期，第 77-95 页。

⑥ Shantanu Chakrabarti, “Global South rhetoric in India’s policy projection”,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16, Vol.38, No.9, pp.1909-1920.

展中国家的联盟，与其长期的外交传统及其对自身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定位有关。与此同时，印度贸易战略的保护色彩及其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客观条件，也推动了印度在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议题上采取了“全面坚持”的政策立场。

（三）印度的利益偏好

与中国不同，印度的贸易战略保护主义色彩较为浓厚。印度国内产业发展水平较低，促使印度更多地寻求和利用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来保护本国国内市场。

一方面，印度曾长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和贸易保护政策。即便 21 世纪以来不断推动经济自由化，印度经济发展仍然保有较强的“内向”色彩。印度独立后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一直奉行的是“进口替代”战略，并建立了一套以高关税和复杂的非关税壁垒为核心的贸易保护政策体系。冷战结束后，印度开始经济自由化改革，但改革的步伐十分缓慢，印度始终不愿意开放本国市场，担心市场开放的步伐太快会影响国内的就业和经济增长。^①

另一方面，印度国内的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特别是其农业和电子商务产业尚属于“幼稚产业”，客观上限制了印度经济的对外开放水平。在农业方面，印度 60%~70% 的国内人口以农业为生，农业发展关系着国内大部分人口的生计，具有高度脆弱性。^②这种自给型农业和对粮食安全的担忧持续地影响着印度在农业贸易自由化问题上的立场。为此，印度充分地研究和利用了 WTO 规则中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利用政策的弹性对本国农业进行战略性保护。在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中，印度要求发达国家削减农业补贴，提供更多的政策工具以扩大特殊与差别待遇（例如差别化的国内支持津贴、政策实施时间框架和补贴豁免权利），并在发展中国家农产品特别保障机制和粮食公共安全储备问题上立场坚定。在电子商务产业方面，印度由于能力不足，更多地采取了保护主义的立场。印度尽管赞成对电子商务领域进行必要的改革，但却担心该领域的改革在未来可能会对自己造成更

① 贺平、周倩茹：“身份悖论与印度自由贸易战略的困境”，《太平洋学报》，2018 年第 11 期，第 35-45 页。

② Priyanka Pandit, “China an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Questioning the Revisionist Hypothe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6, Vol. 503, No.3, pp. 255-271.

多的限制。^①

综上所述，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叙事使得印度不仅在本国的对外战略中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定位，积极组建发展中国家的联盟，意图充当发展中国家的领袖，而且，印度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与较低的产业水平也在客观上限制了印度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其在贸易问题上的利益偏好更多地倾向于保护性政策。在这种背景下，印度选择了全面坚持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政策。

五、巴西与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

（一）巴西的政策选择

针对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巴西选择了放弃，不再将其视为发展中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巴西的政策立场与中国、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大国拉开了距离。

一方面，巴西自愿在未来的世贸组织谈判中放弃使用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②相比于韩国、新加坡等其他放弃使用特殊和差别待遇的国家，巴西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同时也是金砖国家中第一个宣布放弃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政策的国家。

另一方面，巴西提出要反思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的使用范围以及明确“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分类标准。2019年2月28日，在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举行的关于发展中成员特殊和差别待遇的辩论中，巴西提出要反思发展中国家的概念。^③2019年4月，巴西外交部在关于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新闻声明中表示，“特殊和差别待遇的多样性以及其中一些待遇仅在特

① “An Inclusive Approach to Transparency and Notification Requirements in the WTO”, July 23, 2019, <https://report.ndc.gov.tw/ReportFront/PageSystem/reportFileDownload/C10802802/012>

② “Memorandum on Reforming the Statu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July 26, 2019,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presidential-actions/memorandum-reforming-developing-country-status-world-trade-organization/>

③ “Compte Rendu de la Réunion, WT/GC/M/176”, February 28, 2019, [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SS/directdoc.aspx?filename=r:/WT/GC/M176.pdf&Open=True#:~:text=WT/GC/M/176%2015%20avril%202019%20\(19-2501\)%20Page](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SS/directdoc.aspx?filename=r:/WT/GC/M176.pdf&Open=True#:~:text=WT/GC/M/176%2015%20avril%202019%20(19-2501)%20Page)

定时期内有效的事实表明，特殊和差别待遇是动态的和不断演变的”^①。2019 年 10 月，巴西在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会议上表示，特殊和差别待遇应当被视为“灵活的概念”。^②除此之外，巴西还表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能力存在着重大差异，一些国家更加需要特殊和差别待遇……因此，适用特殊与差别待遇应当基于单个国家的‘真正需要’”^③。巴西外交部长埃内斯托·阿劳若（Ernesto Araújo）还在 2021 年世贸组织非正式部长级会议上表示，“特殊和差别待遇不应成为部分国家免于承担对多边贸易体制承诺的借口”^④。

巴西选择放弃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与巴西的身份叙事和利益偏好有关。

（二）巴西的身份叙事

在巴西的身份叙事中，“地区性大国”比“发展中大国”更为根本。尽管巴西在将自身定位为全球性大国还是地区性大国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但巴西始终在国际舞台上追求大国地位。^⑤

在巴西追求大国身份的过程中，“发展中大国”或“南南合作”的身份叙事只是一种短期定位，或是说只是获得“地区性大国”身份的手段。巴西认为自己“既是西方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力图从这种两重性地位出发，既周旋于美国、西欧国家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之间，也发展同拉美、非洲和亚洲地区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从历史上看，在第三世界国家去殖民化浪潮发展之时，巴西并没有坚定地采用“全球南方”的身份叙事。在 1947—1964 年的民主政府时期，由于

① Ministério das Relações Exteriores, “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and the WTO”, April 1, 2019, <https://www.gov.br/mre/en/contact-us/press-area/press-releases/special-and-differential-treatment-and-the-wto>

② “Acta de la Reunión, WT/GC/M/180”, October 17, 2019, <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SS/directdoc.aspx?filename=s:/WT/GC/M180.pdf&Open=True#:~:text=WT/GC/M/180%20de%20diciembre%20de%202019>

③ “Acta de la Reunión, WT/GC/M/179”, September 25, 2019, <http://www.puntofocal.gov.ar/doc/gcm179.pdf>

④ “Remarks by Minister Ernesto Araújo in the WTO Informal Ministerial Meeting”, January 29, 2021, <https://www.gov.br/mre/en/content-centers/speeches-articles-and-interviews/minister-of-foreign-affairs/speeches/ernesto-araujo-2019-2021/remarks-by-minister-ernesto-araujo-at-the-wto-informal-ministerial-meeting>

⑤ 周志伟：“巴西参与金砖合作的战略考量及效果分析”，《拉丁美洲研究》，2017 年第 4 期，第 110 页。

精英阶层更加认同“西方”或“天主教”国家的身份，巴西的外交政策更多受到其同美国同盟关系的影响。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即使不结盟运动和 77 国集团运动逐渐兴起，巴西政治家雅尼奥·夸德罗斯（Janio Quadros）仍然将巴西定义为“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桥梁，并认为自身处在一个独特的位置。^①

冷战结束后，随着巴西经济的发展和对美国依赖程度的降低，巴西在外交上更多地追求自主性。在卢拉和罗塞夫执政期间，劳工党政府提出要通过加强南南合作来提高巴西的大国地位，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来增强巴西在国际舞台上博弈的能力。然而，随着巴西国内政府的更迭，其后上台的特梅尔政府和博索纳罗政府调整了巴西的外交政策，更加注重发展巴西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

简言之，在身份叙事上，不同于中国和印度始终将“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叙事置于外交传统之中，巴西更多地偏向自己是“地区性大国”而非“发展中大国”，在多重身份定位中，并没有突出“发展中国家”。在利益偏好上，巴西希望推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偏好开放性的经济。这导致巴西放弃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

（三）巴西的利益偏好

作为传统的农产品出口大国，巴西希望推动农业部门的贸易自由化。与此同时，巴西加大力度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走开放型经济发展道路。

一方面，巴西是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家，推进农业部门贸易自由化始终是巴西最基本的利益诉求。自乌拉圭回合谈判至 21 世纪初，巴西的贸易优先事项始终与凯恩斯集团（Cairns Group）紧密结合。凯恩斯集团是世贸组织下一个由农产品出口国组成的非正式联盟，其主要诉求是推动农业部门的贸易自由化，包括撤销贸易壁垒以及削减影响农业贸易的补贴。^②

坎昆会议上，巴西成功弥合了发展中国家在农业谈判中的不同立场，并带领 20 国农业谈判集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一时期，巴西能够主动搁置

^① Gelson Fonseca, “Notes on the Evolution of Brazilian Multilateral Diplomacy”, *Global Governance*, 2011, Vol.17, No.3, p.379.

^② Ian Taylor, “The Cairns Group and the Commonwealth Bridge-Building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Commonweal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0, Vol.85, No.5, pp.375-386.

自身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准入问题上的诉求，并将众多利益不同的发展中国家聚集在一起。然而，2010 年前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使用农业补贴制度造成市场扭曲的问题不再局限于欧美等发达工业化国家，印度尼西亚等新兴经济体也成为较大的农业贸易补贴国，这对巴西在农业议题上的利益造成了重要冲击。^①在农业部门谈判陷入僵局和巴西在农业议题上的利益受到冲击的双重背景下，巴西逐渐脱离其发展中国家盟友，并与欧盟联合向世贸组织提交了一系列谈判倡议，其内容包括完全取消农业部门出口补贴等。^②

另一方面，为克服国内产业结构单一的问题，巴西坚定实行开放型经济，并采取诸多措施来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从 2014 年开始，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下跌，终结了拉美地区的“出口繁荣”，这使得巴西持续面临着经济下行的压力，国内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高企。2015 年 9 月，标准普尔公司将巴西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 BB+，^③导致巴西在国际投资市场上进行融资的成本上升。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巴西政府希望加快其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通过改善商业环境和吸引外国投资来促进经济稳定，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④

一方面，巴西积极申请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希望通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身份来为进行自由化和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提供保证。^⑤2015 年，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总统领导下的劳工党政府签署了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合作协议。2017 年，特梅尔政府提交了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正式申请。2019 年，博索纳罗总统上台

① Till Schöfer, “From Developing Country Leader to Flexible Negotiator: New Directions in Brazilian Trade Strategy”, *World Trade Review*, 2023, Vol.22, No.5, p.643.

② “Export Competition-Ministerial Decision of 19 December 2015”, December 21, 2015, <https://www.tralac.org/documents/resources/external-relations/wto/1707-export-competition-ministerial-decision-of-19-december-2015-mc10-nairobi/file.html>

③ “Brazil Credit Rating Cut to Junk by S&P Amid Budget Strain”, September 10, 2015,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5-09-09/brazil-credit-rating-cut-to-junk-by-s-p-amid-budget-strain>

④ Kristen Hopewell, “How China Lost its Wolf Pack: The Fracturing of the Emerging-Power Alliance at the WTO”,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2, Vol.98, No.6, p.1925.

⑤ Presidência da República, “Brazil’s application for membership to OECD: doing business in Brazil can be easier”, June 4, 2018, <https://www.gov.br/casacivil/pt-br/assuntos/centrais-de-conteudo/eventos/ocde/2018/workshop-na-secao-americana-do-conselho-empresarial-brasil-es-tados-unidos/apresentacao/brazilsapplicationmembershipoecd-doingbusinessbrazil.pdf/view>

后，巴西更加坚定地追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身份，并将美国的支持视为其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重要条件。2020年9月，博索纳罗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在我的政府领导下，巴西终于抛弃了保护主义传统，并将贸易自由化作为经济增长和转型的关键工具……我们还在推进巴西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正式程序。”^①2022年1月25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正式启动了巴西加入的谈判。

另一方面，巴西在世贸组织内部积极推动关于投资便利化的谈判。2017年，巴西作为《促进投资便利化发展的联合部长级声明》的首批提案国之一，与中国、阿根廷、加拿大、欧盟和新加坡等共同寻求就多边投资便利化议题展开结构性讨论。^②2018年1月，在关于投资便利化的结构性讨论中，巴西提交了一份草案，其中包括“通过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监管环境及其效率和竞争力，促进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资本流动”等内容。^③2019年《促进投资便利化发展的联合部长级声明》修订后，巴西再次强调需要将发展中国家适当地纳入国际资本流动中。^④

总体而言，巴西在农产品贸易问题上一贯的自由化偏好，加之巴西近年来大力推动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改革，促使其形成“未来利用发展中国家的灵活性所带来的好处是有限的”这样一种预期，因而巴西在2019年选择了放弃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

综上所述，巴西的身份叙事更多地偏向“地区性大国”，“发展中国家”只是获得“地区性大国”身份的手段。与此同时，为推进农产品出口以及克服国内产业结构单一的问题，巴西实行开放型经济改革，大力推动国际贸易

① Ministério das Relações Exteriores, “Remarks by President Jair Bolsonaro at the General Debate of the 75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September 22, 2020, <https://www.gov.br/mre/en/content-centers/speeches-articles-and-interviews/president-of-the-federative-republic-of-brazil/speeches/remarks-by-president-jair-bolsonaro-at-the-general-debate-of-the-75th-session-of-the-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september-22-2020>

② “Joint Ministerial Statement on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for Development, WT/MIN(17)/59”, December 13, 2017, <https://worldtradesscanner.com/Investment%20Facilitation%20for%20Development.pdf>

③ “Structured Discussions on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JOB/GC/169”, February 1, 2018, <http://docs.wto.org/dol2fe/Pages/SS/directdoc.aspx?filename=q:/Jobs/GC/169.pdf&Open=True>

④ “Joint Ministerial Statement on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for Development, WT/L/1072/Rev.1”, November 22, 2019, https://www.regjeringen.no/contentassets/4799122821084456a27665bcb4d79b7b/ministererkl_wto_2019.pdf

和投资的自由化，最终导致巴西放弃了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

六、结 论

通过对中国、印度、巴西的身份叙事和利益偏好的比较分析，本文探讨了金砖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问题上的政策选择差异及其形成原因。金砖国家的身份叙事和利益偏好共同影响了其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政策选择。具体而言，印度突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叙事，利益偏好带有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导致印度全面坚持了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政策。中国强调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叙事，利益偏好以开放性经济为主，使得中国部分坚持了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政策。巴西突出地区性大国的身份叙事，利益偏好以开放性经济为主，导致巴西放弃了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政策。

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本文尝试构建一个“身份叙事+利益偏好”的新理论框架来解释金砖国家政策选择的差异。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认为，国家身份界定了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决定了国家的政策选择，因而，国家身份对国家的政策选择具有根本意义。^①然而，本文在研究金砖国家的政策选择时发现，身份叙事具有重要意义，但不能对国家利益起决定性作用，而是与国家利益相并列的一个变量：第一，身份叙事不是给定的，而是存在多种可能性的。虽然中国、印度、巴西都是金砖国家，但是在各自的外交传统中，中国和印度把金砖国家合作理解为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而巴西却把金砖国家合作理解为地区性大国谋求全球影响力的平台，认为发展中国家身份以及南南合作都只是手段。这种身份叙事的差异对金砖国家的政策选择产生了影响。第二，身份叙事往往不能直接决定国家利益。在贸易议题上，金砖各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以及贸易结构都存在很大差异，使得各国在贸易议题上的利益偏好存在很大差异。例如，中国和巴西采取了开放型的发展道路，因此，中国和巴西在贸易议题上偏好维持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而印度长期采

^① 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29页。

取进口替代型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因此，印度在贸易议题上保护主义利益偏好十分严重。

【Abstract】 Within the BRICS, despite being larg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ir approaches to 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SDT) polici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vary: India fully adheres to these policies, while China partially upholds them, while Brazil has abandoned them. Identity narratives and interest preferences jointly influence the BRICS' policy choices regarding SDT. India emphasizes its identity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with a clear preference for protectionist policies, leading to a comprehensive adherence to the SDT policies. China, while also emphasizing its identity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has interest preferences that lean towards an open economy, resulting in a partial adherence to SDT policies. Conversely, Brazil, although similarly oriented towards an open economy, underscores its identity as a regional power, which has led it to abandon the SDT policies.

【Key Words】 the BRICS, Identity Narrative, Interest Preference, 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Policy Choice

【 Аннотация 】 Среди стран БРИКС, которые также являются крупными развивающимися странами, Индия полностью придерживается политики особого и дифференцированного режима для развивающихся стран, Китай частично придерживается политики особого и дифференцированного режима для развивающихся стран, а Бразилия отказалась от политики особого и дифференцированного режима для развивающихся стран. Нарративы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и предпочтения интересов совместно влияют н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выбор стран БРИКС в отношении особого и дифференцированного режима для развивающихся стран. Индия подчёркивает свою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как развивающаяся страна, а её интересы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протекционистские, что заставляет Индию полностью придерживаться политики особого и дифференцированного режима для

развивающихся стран. Китай подчёркивает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развивающейся страны, но его интересы отдают предпочтение открытой экономике.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Китай частично придерживается политики особого и дифференцированного режима для развивающихся стран. Бразилия подчёркивает свою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как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держава, а её предпочтения в интересах основаны на открытой экономике, что привело Бразилию к отказу от политики особого и дифференцированного режима для развивающихся стран.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Страны БРИКС, нарративы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предпочтения в интересах, особого и дифференцированного режима для развивающихся стран, выбор политики

(责任编辑 宋羽竹)

海外俄罗斯研究

对危机关系的多元解读： 英国的俄罗斯研究（2014—2024年）*

封 帅 薛世锷 李苗苗**

【内容提要】从2014年开始，英俄关系进入了持续下滑的新周期，英国的俄罗斯研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14年至今，乌克兰危机主导了英国对俄研究议程，议题网络被重新建构，新阶段的研究围绕着乌克兰问题、普京问题、经济制裁问题重新展开。核心议题的调整促使学者的代际更替加速进行。围绕着对于核心研究问题的回应，英国俄罗斯研究领域形成了新的思想谱系，主张对俄强硬的“强硬反对派”学者成为其国内的主流声音，坚持以理论研究解释和回应俄罗斯挑战的“温和批评派”学者团体也持续壮大，还有学者参与到相关支撑性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中间议题派”，少部分学者仍然试图理解俄罗斯的行为模式与政策选择，构成了规模较小的“亲俄理论派”，他们都就相关议题阐释了自己的观点。总体而言，英国的俄罗斯研究在2014年后进入了温和变革的新阶段，研究的议题、议程、研究者的基本立场、以及主要观点都出现了变革，但在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上仍延续了英国社会学科的传统。目前这个新阶段仍在延续，其发展趋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关键词】英俄关系 英国的俄罗斯研究 议题网络 思想谱系

【中图分类号】D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4)05-0061(24)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俄乌冲突后‘后西方世界’及其对中俄关系的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22JJD810007）的阶段性成果。感谢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于洁研究员为本文写作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 封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青年研究员；薛世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李苗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学领域的学术史撰写是一个连续且没有终点的旅程。在每一段历史叙事落笔成文之后，新的学术研究就会在同一时刻继续展开，从来都不会间断。那些新出现的研究内容既是对于既有思想理论观点的沿袭，又是针对国际环境新变化的回应；既是对过去经典的继承，又是对正在发生的现实的解释和应对。随着时间的延续，最终积累下来的，正是新阶段的那些最活跃的思想所留下的印记。所以，每当一段时间过去，就有必要再次续写相关领域的学术史，从而留下最鲜活的关于研究的记忆。

在全球俄苏研究的版图上，英国学者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英俄两国从 1553 年的意外邂逅开始，一路纠缠至今，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演绎了一幕幕全球争霸、军事对抗、共抗强敌、尔虞我诈的精彩故事，成为国际关系发展和演变的重要推动力量。从 16 世纪开始，英国的探险家、旅行者、外交官、商人、记者和研究者前赴后继，不断探索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历史和文化等多个方面，在数百年的历程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成为全球俄苏研究领域的宝库之一，堪称全球俄苏研究领域的标杆。为了全面展示英国俄苏研究的历史积累、研究成果与思想谱系，笔者曾在 2010—2013 年间致力于对英国俄苏研究的历史与现实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并发表了相应的研究成果。^①

这批研究成果的时间线大约截止于 2013 年，距今已有十年。在这十年时间里，英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开始，英俄关系就开始大幅倒退。2018 年，前俄罗斯谍报人员斯科里帕尔中毒事件再次唤醒了英国对于利维年科事件的记忆，也促使英俄关系再次滑落。到 2021 年，英国政府在官方报告中已经将俄罗斯视为本国国家安全“最严重的直接威胁”，^②英俄关系彻底走上了对抗的轨道。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英国全面支持乌克兰，在经济、政治、军事情报等方面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全力

① 参见封帅：“俄罗斯研究领域的‘英国学派’：历史沿革、思想谱系与时代特征”，《俄罗斯研究》，2016 年第 3 期，第 3-36 页；封帅：《冷战后英国的俄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

② “Global Britain in a competitive age: The Integrated Review of Security, Defence,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Policy”, HM Government, March 2021,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global-britain-in-a-competitive-age-the-integrated-review-of-security-defence-development-and-foreign-policy/global-britain-in-a-competitive-age-the-integrated-review-of-security-defence-development-and-foreign-policy>

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并积极推动在经济领域与俄罗斯脱钩，主动冻结俄罗斯在英国的资产。在乌克兰危机的刺激下，英俄关系已经进入全面对抗的阶段。^①

在英俄关系出现剧变的背景下，英国的俄罗斯研究显然也将出现新的局面。那么，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追问，英国学者对于俄罗斯的认知和理解又会出现怎样的变化？英国学术界对于俄罗斯研究的议题、议程又出现了怎样的调整？专家学者的思想谱系将呈现出哪些趋势性的嬗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笔者选择在对既往的英国俄苏研究进行梳理、归纳并提交了研究成果十年之后，再次着手撰写本主题的文章。本文将主要针对2014年至2024年这十年间英国学者对于俄罗斯的研究进行概括分析，希望展示在英俄关系陷入危机的十年里，英国学者开展俄罗斯研究的整体进程，以接续考察英国俄苏研究的学术史。

一、英国俄罗斯研究的议程转向

从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开始，乌克兰问题就成为英俄关系中最受关注的地缘政治焦点。在漫长的危机背景下，英俄关系在几乎没有太大阻力的状况下不断下滑，两国关系一再突破底线。目前，双方仅仅维持着基本的外交关系，相互驱逐外交官已经是家常便饭，除直接的军事冲突尚未出现外，几乎已经进入全面对抗的状态。危机与对抗主导了这十年来英国的俄罗斯研究议程，也推动了新的议题网络的构建。

为了更好地展示这十年时间里英国的俄罗斯研究议题分布情况，笔者对《欧亚研究》（*Europe-Asia Studies*）杂志2014—2023年发表的全部文章的主题进行了量化分析。^②近十年来，英国的俄罗斯研究议题变得更加集中，

^① 参见李冠杰：“俄乌冲突背景下英国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新变化”，《俄罗斯研究》，2023年第3期，第98-129页。

^② 由格拉斯哥大学主办的《欧亚研究》杂志创刊于1949年，原名《苏联研究》（*Soviet Studies*），从冷战时代开始就是英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科学者最重要的专业研究刊物，能够充分反映不同时期英国俄罗斯研究的主流观点。因此，通过对该杂志议题演变分析，能够很好地观察英国俄罗斯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变化趋势。

主要聚焦在五个领域，分别是“乌克兰问题”、“政治与经济体制转型”、“普京问题”、“外交战略”与“经济制裁”。几乎所有文章都不能脱离这五个方面的内容，数据统计的结果形成图 1。

如图 1 所示，乌克兰问题是近十年来英国的俄罗斯研究集中关注的要点，共有 24.6% 的文章讨论了乌克兰问题。除了对 2014 年的克里米亚危机和 2022 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进行重点分析外，英国学者还围绕乌克兰问题的诸多侧面，包括地缘政治、大国博弈、军事战略和国际法等多项内容展开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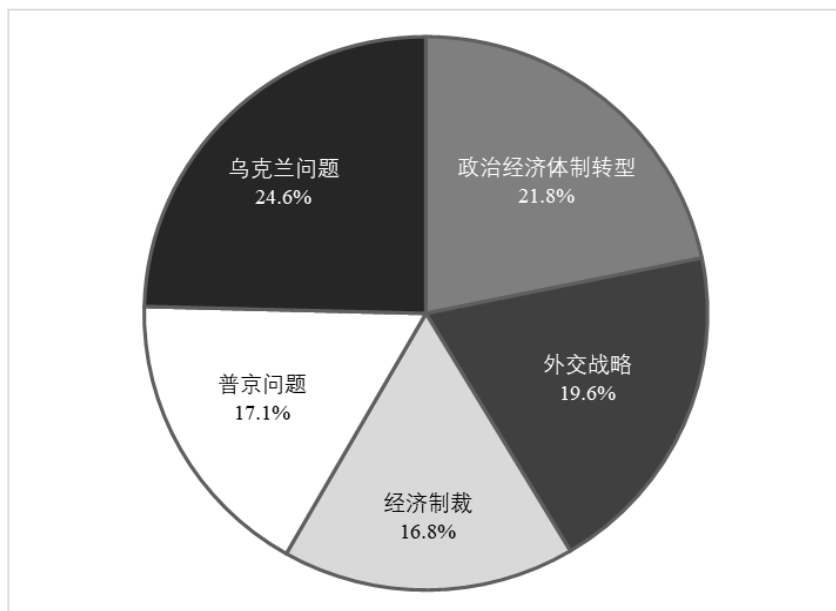


图 1 英国俄罗斯研究的议题分布（2014—2023 年）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除乌克兰问题外，英国学者原本最为关注的转型问题的影响力依然很大，关于俄罗斯政治经济体制转型议题占了研究成果的 21.8%。这可以看作是“转型时期”的延续。同样也是因为 2014 年后，西方制裁进一步加剧了俄罗斯经济的困境和政治压力，但俄罗斯体制的韧性超出了英国学者的普遍

预期，促使其对俄罗斯的多元经济结构、国家资本主义和政府干预经济等进一步跟进，对政治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和转型路径进行深入探讨。

普京问题同样是英国俄罗斯研究的传统热点议题，在这十年中依然保持着很高的热度，占据了议题总比例的 17.1%。由于持续的乌克兰危机的影响，英国学者对于普京的研究除了传统的对其个人的分析、对于普京体制的分析之外，还加入了他在国际和地区战略上的选择、普京的国内外支持者和反对派、其个人形象塑造问题，以及普京与俄乌冲突的关系等具有时代特征的新议题，试图通过相关研究揭示俄罗斯国内政治走向和权力继承问题。

在这十年中，俄罗斯的外交战略及对俄经济制裁议题的关注度得到了大幅提升，分别占据了议题总量的 19.6% 和 16.8%，几乎 1/3 的研究成果都与这两个领域密切相关，这非常明确地显示出乌克兰事件对于英国俄罗斯研究议程的影响。关注俄罗斯的外交战略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释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选择背后的逻辑，并且对于俄罗斯未来与西方的整体关系发展作出判断。而经济制裁问题则是在乌克兰危机发生后，西方世界对于俄罗斯的制裁持续加码之后，研究者希望对制裁效果进行评估，试图展示制裁对于俄罗斯的金融市场、能源产业和整体经济结构都造成了哪些影响，后续应如何继续。当然，在这一板块中，还有部分研究成果涉及了俄罗斯与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合作问题。

为了更好地研究英国学者研究议题的演变规律，我们按照时间维度将《欧亚研究》十年来的议题进行分类整理（见图 2）。如图 2 所示，英国俄罗斯研究的重点议题与国际政治现实情况联系非常紧密。2014 年不仅是英俄关系的重要分水岭，^①也是英国的俄罗斯研究新的研究议程开启的关键时间点。克里米亚危机之后，乌克兰问题就开始主导英国学者对俄研究的核心议程。从 2015 年开始，除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个别年份外，^②乌克兰问题

① 刘军：“俄罗斯与西方：三十年来俄罗斯外交的路径选择”，《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125-131页。

② 2021年是2014—2023年这十年中英国对俄研究议题设置最为“另类”的一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爆发，英国学者对于俄罗斯在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成果比重极大，对其他议题方向造成了挤压。但除此之外，英国的俄罗斯研究在其他年份的研究议程都明显受到了乌克兰问题不同程度的影响。

始终都是英国俄罗斯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议题，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一直处于高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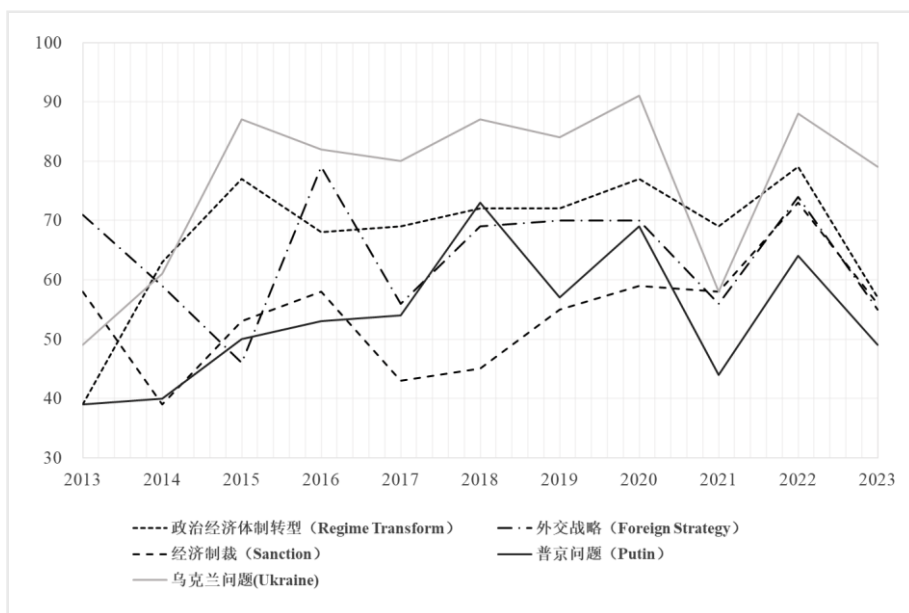


图 2 英国俄罗斯研究议题的年度变化趋势 (2014—2023 年)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乌克兰危机的影响对于英国对俄研究议程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英国研究者不仅直接关注危机的进展，探讨关于主权和领土完整、安全诉求、大国对抗等问题，还在不断加强对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政治格局的重新思考。在 2016 年前后，受到乌克兰危机与美国大选“通俄门”事件的影响，英国学者明显加强了对于俄罗斯对外战略的关注，并且加强了对于俄罗斯网络战、信息战和数字战略的研究，对于俄罗斯区域安全理念和国际法认知的研究也随之出现。在 2018 年以后，在斯克里帕尔中毒事件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对于俄罗斯的制裁不断加码，讨论经济制裁的相关议题开始出现显著的上升趋势。在 2020 年俄罗斯修改宪法后，围绕着普京个人和俄罗斯政治体系的研究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大幅增长。2022 年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乌克兰议题再

次毫无疑问地成为主导性议题，并且带动所有相关议题数量大幅增长，对外战略、经济制裁、普京问题等都展现了重大的现实需求。乌克兰议题所引发的研究热度至今居高不下。

综合来看，在过去十年时间里，英国的俄罗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乌克兰问题展开的，既有直接指向乌克兰的各种议题讨论，也有为探索乌克兰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而开展的系统性研究，这种议题网络变化的趋势似乎在暗示，英国学者 2014 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具有显著的共同渊源，似乎可以考虑将其设置为一个独立的新阶段。

二、英国俄罗斯研究者的代际更替

在关于 2013 年前英国俄苏研究的讨论中，笔者根据研究议题分布选取了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英国俄罗斯研究领域最为活跃的数位学者作为代表^①，通过分析他们对俄研究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勾勒英国俄苏研究的思想谱系，将其概括为五个思想流派，较为全面地阐述了英国学者的思想立场。^②然而，当我们观察 2014 至今的英国俄罗斯研究状况时，会很容易地注意到，对俄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的代际更替已经悄然发生。

一方面，那些活跃于冷战时期和 20 世纪 90 年代的老一辈研究者正在逐渐让出学术舞台中央的位置。如阿奇·布朗（Archie Brown）、史蒂芬·怀特（Stephen White）等苏联问题专家，以及大卫·雷恩（David Lane）等新

① 当时所选择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阿奇·布朗（Archie Brown），牛津大学教授，政治与历史问题专家；理查德·萨科瓦（Richard Sakwa），肯特大学教授，政治问题专家；史蒂芬·怀特（Stephen White），格拉斯哥大学教授，政治问题专家；大卫·雷恩（David Lane），剑桥大学教授，经济问题专家；菲利普·汉森（Philip Hanson），伯明翰大学教授，经济问题专家；罗伊·埃里森（Roy Allison），牛津大学教授，政治与军事问题专家；多米尼克·列文（Dominic Lieven），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历史学家；罗伯特·谢伟思（Robert Service），牛津大学教授，历史学家；波波·罗（Bobo Lo），原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外交问题专家；爱德华·卢卡斯（Edward Lucas），专栏作家，政治与外交问题专家。

② 这五个思想流派为强硬反对派、中间理论派、中间反对派、亲俄派、新左翼理论派。具体论述可参见封帅：《冷战后英国的俄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244-251 页。

左翼理论专家，由于年龄等方面的问题，已经不再活跃于学术舞台。在 21 世纪成名的中生代学者成为业界的中坚力量，但他们也正在面临着更加年轻、观点更加激进、鲜明的青年学者的挑战。

另一方面，乌克兰危机的延续实际上深刻影响了过去十年英国俄罗斯研究的议程，那些能够在乌克兰问题上给出严肃和深刻回应的青年学者获得了更大的学术话语权，在潜移默化中推动了从业者的代际更替。这种基于议题刷新而出现的更替，最明显地表现在“新左翼理论派”与俄罗斯研究渐行渐远，逐渐无法被纳入俄罗斯研究的整体版图。很多传统议题的研究者也因为热点的变化而逐渐减少了在行业中表达观点的空间。取而代之的是很多智库学者和前外交官员由于对俄罗斯国内事务或乌克兰事务更加熟悉而跻身行业中坚行列。当然，很多历史学家、战略问题研究专家也在这一阶段展现了自己独特的视角，对于最热门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总之，与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后前 20 年的情况相比，最近十年是一个英国俄罗斯研究学者代际更替的高潮期。这实际上是研究议程调整带来的必然结果。在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英国社会对于俄罗斯研究有了更加紧迫的需求，实际上也迫使英国学者将研究重心转向现实议题、外交议题、安全议题和普京研究等英国政府和社会更加关注的议题（参考图 1）。苏联研究、苏联解体研究、戈尔巴乔夫研究、叶利钦研究等老议题逐渐淡出了主流研究者的视野，以此作为自己核心研究方向的老一辈研究者也随之渐渐淡出，不再占据学术舞台的中心位置。那些对乌克兰问题和普京体制保持着密切关注的新兴力量填补了他们的位置。

鉴于这种情况，要想理解近十年来英国俄罗斯研究的真实状况，我们需要对研究者代际更替的情况予以把握。所以笔者在本文的写作中放弃了上一轮研究中很多重点关注的经典专家。转而通过资料搜集和学术访谈，选择了一批新的重点关注对象。筛选的条件是，过去十年时间里英国对俄研究方面最为活跃、更受英国社会重视和关注的学者。与此同时，笔者在选择时有意排除了一些主要活跃于社交媒体上的“新型”学者，仍将关注重点集中在那些具有理论深度的系统性研究成果上。经过反复权衡，选择的重点研究对象名单如下：

罗伊·艾利森（Roy Allison），来自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俄罗斯政治、外交政策、国际关系研究专家，英国俄罗斯研究的资深学者代表。

安德鲁·莫纳汉（Andrew Monaghan），来自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曾在多家智库机构任职，俄罗斯政治与战略问题专家。

蒂姆·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来自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活跃的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问题专家。

伊恩·邦德（Ian Bond），欧洲改革中心（CER）副主任，前高级外交官，从智库研究的视角分析俄罗斯国际战略与欧洲事务。

奈杰尔·古德—戴维斯（Nigel Good-Davis），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高级研究员，曾在外交和商务部门任职，关注俄罗斯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

理查德·萨克瓦（Richard Sakwa），来自肯特大学，俄罗斯政治与普京研究专家，英国俄罗斯研究的资深学者代表。

古尔纳兹·沙拉夫迪诺娃（Gulnaz Sharafutdinova），来自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俄罗斯政治问题专家。

塞缪尔·格林（Samuel Greene），来自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俄罗斯政治问题专家。

马克·加莱奥蒂（Mark Galeotti），来自伦敦大学学院，俄罗斯政治与安全问题专家。

在这份名单中，笔者保留了罗伊·艾利森与理查德·萨克瓦两位在上一轮研究中被重点关注的学者，同时又选择了另外七位近十年来在英国俄罗斯研究核心议题上影响较大的学者作为代表，尝试对他们的观点进行系统剖析，并且归纳其所展现出来的思想倾向。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俄罗斯保持强硬态度和批判立场是英国学者的主流观点，大部分英国学者都表现出该特点。但为了更为全面地展示英国学者对俄研究的内容，笔者在主流观点之外，特意选取了部分对俄罗斯持有一定同情态度的少数派观点。笔者深知，二者在英国社会的受欢迎程度并不在同一层次上，对于英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也有明显差异，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少数派观点也同样代表着英国研究者的某些重要的思想理念，也应给予合理关注，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仍将用一定篇幅对其加以描述。

三、英国俄罗斯研究的观点分布

2014—2024 年，英国学者对俄罗斯的研究围绕着如何处理乌克兰危机这个核心议题展开，但要想解决这个核心问题，需要有其他多个领域的研究作为支撑。例如，怎样判断乌克兰危机的性质、怎样理解普京和普京体制、如何评估俄罗斯对外战略的目标与方法、经济制裁是否能够推动乌克兰危机的解决等。在回应这些关键问题的过程中，英国学者展现了不同的思想理念与政治态度，既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又展现出较为清晰的差异性思想流派。新的思想流派与旧有的思想谱系存在着显著的内在联系，但又出现了结构上的微妙变化。在此，笔者将以部分具有代表性的英国学者的观点为基础，对此加以描述，并对其变化趋势给出简要解释。

整体来看，根据英国学者对俄罗斯的政治立场和研究方法的评估，目前英国的俄罗斯研究可以划分为四个板块，分别是强硬反对派（Hard-line Critics）、温和批判派（Moderate Critics）、中间议题派（Neutral Issue Studies）和亲俄理论派（Pro-Russian Theorists）。^①各种流派观点之间的差异和分歧也非常清晰，可以用于描述英国俄罗斯研究的现状。

（一）强硬反对派

持“强硬反对派”观点的英国学者认定，乌克兰危机的根源就是俄罗斯政权本身，将俄罗斯界定为有强烈侵略性的国家，将普京政权认定为英国和西欧的威胁，同时也是全球秩序的破坏者。他们大多主张要以积极和强烈的反制手段扼杀俄罗斯的扩张倾向，摧毁俄罗斯维持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多对俄罗斯持强烈抵触和反感的态度。毋庸置疑，强硬反对派是 2014 年以来英国俄罗斯研究领域活动最频繁、声量最大的力量，也是英国社会的主流声音。他们不仅人数最多，而且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力极大，对英国政府的政策制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由于成果数量众多，各种观点良莠不齐，很多观点的情绪表达都非常强烈。为此，笔者选取了蒂姆·加顿·阿什和伊恩·邦德作为该派别的代表进行分析。

^① 笔者参考了自己之前的研究成果中对于英国学者思想派系的划分，并且为了展现相关思想群体的延续性，笔者在命名过程中会对有联系的派系设定类似的名称。

蒂姆·加顿·阿什是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除在牛津大学任职外，他还兼任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对于欧洲历史和地区国际关系有深入的研究。阿什对于俄罗斯持极为负面的看法。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把俄罗斯描述为一个强大而脆弱的独裁国家，认为乌克兰战争的根源在于普京政权以打败乌克兰来维持其生存和合法性。“普京不仅决心摧毁乌克兰的主权，而且通过独裁手段迅速加强军备，利用伊朗和朝鲜的武器支援，试图通过军事压制达到目的”^①。阿什擅长通过历史学视角解释乌克兰危机以来的当代国际关系。在他看来，“普京试图通过重新殖民乌克兰来恢复俄罗斯帝国，为后帝国主义欧洲打开大门。为了确保后帝国主义时代的欧洲安全与抵抗俄罗斯的侵略，欧盟本身必须具备帝国的一些特征”。^②这种需要外因驱动来维持内政的战略模式，导致俄罗斯未来可能面临更多的内部动荡和分裂。^③

强硬反对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欧洲改革中心（CER）副主任伊恩·邦德。他在英国外交部门工作了 28 年，直接接触英国的对外事务与决策制定，离开外交部门后加入智库机构开展研究。邦德对俄罗斯总体持批判态度，并且程度逐渐加深。2014 年，邦德将普京比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中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④指出普京试图通过不合法的行为恢复俄罗斯的“伟大”，但这种做法只会带来贫困、压迫和孤立。^⑤2015 年，邦德直接批判俄罗斯利用欧洲的分歧和对乌克兰的武装恐吓巩固其在乌克兰地区的控制能力，并通过虚假宣传和军事侵略分裂乌克兰，强调西方应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以抵御俄罗斯的侵略。^⑥2017 年，邦德批判俄罗斯仍未脱离

① Timothy Garton Ash, “Ukraine’s Fate, Europe’s Choice”, *Prospect*, January 24, 2024, <http://www.prospectmagazine.co.uk/world/europe/ukraine/64563/ukraines-fate-europes-choice>

② Timothy Garton Ash, “Postimperial Empire: How the War in Ukraine is transforming Europe”, *Foreign Affairs*, Vol.102, No.64, 2023, p.70.

③ Timothy Garton Ash, “Putin, Pushki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Russian Empire”, *Financial Times*, August 19, 2023, <https://www-ft-com.ezp-prod1.hul.harvard.edu/content/04cc3b42-6432-4020-8019-206a32a60e70>

④ 关于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叙述可参见[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朱海管、王文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第 134 页。

⑤ Ian Bond, “Plenty of Crime but No Punishment for Putin”, September 3, 2014,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14/09/03/plenty-of-crime-but-no-punishment-for-putin-a39035>

⑥ Ian Bond, “Russia’s War in Ukraine: Is Minsk the End, or Just the Start?”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February 13, 2015, <https://www.cer.eu/insights/russias-war-ukraine-minsk-end-or-just-start>

帝国主义的阴影，仍将周边国家视为“特权利益区”。^①2018 年后，邦德对俄罗斯的关注又转向其经济结构与西方对其实施经济制裁的效果。“普京通过操纵选举确保自己再次当选，但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改革计划，表明他更可能在未来六年里继续推行民族主义和侵略性政策，而非经济改革”^②。普京的经济政策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波动，当价格高企时没有推动改革的动力，而在价格下跌时则缺乏资金进行必要的改革和社会保障，这种策略将使俄罗斯陷入长期经济困境。^③在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邦德对俄罗斯的态度急转直下，开始以更加系统犀利的观点对俄罗斯进行批评。邦德建议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应重点打击普京及其身边的精英，冻结他们在西方的资产，切断他们对西方金融体系和生活方式的利用。^④而欧洲每天花费高达 8 亿欧元去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实际上是在为普京的战争机器提供资金支持。^⑤随着俄乌冲突的加剧，邦德多次强调乌克兰如果战败的后果，呼吁西方国家帮助乌克兰直接摧毁俄罗斯的国防能力。^⑥

总之，强硬反对派的空前壮大是 2014 年以来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基本趋势之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英俄关系的急转直下，让英国学者对俄罗斯表达出强烈的失望与不满情绪。对于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强硬反对派学者将攻击对象聚焦到了普京上，将普京政权定性为“邪恶”的代表，以此来反对俄罗斯的所有安全意图，这构成了其理论观点的核心。从研究方法来看，该类

① Ian Bond, “Russia, the West and Eastern Europe: Lenin's Long Shadow”,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January 26, 2017, <https://www.cer.eu/publications/archive/bulletin-article/2017/russia-west-and-eastern-europe-lenins-long-shadow>

② Ian Bond, “No Shock in Russian Election: But Can Europe Surprise Putin?”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March 26, 2018, <https://www.cer.eu/insights/no-shock-russian-election-can-europe-surprise-putin>

③ Ian Bond, Igor Yurgens, “Putin's last term: Taking the long view”,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Report 2019, p.8, https://www.cer.eu/sites/default/files/pbrief_putin_view_ib_22.1.19_0.pdf

④ Ian Bond, “Stronger sanctions on Russia: Essential, but not a strategy”,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February 25, 2022, <https://www.cer.eu/insights/stronger-sanctions-russia-essential>

⑤ Ian Bond, “Europe must stop paying for Russia's war”,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March 30, 2022, <https://www.cer.eu/publications/archive/bulletin-article/2022/europe-must-stop-paying-russias-war>

⑥ Ian Bond, “Does it matter if Ukraine loses?”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Report 2024, p.4, https://www.cer.eu/sites/default/files/pbrief_pb_ukraine_loses_24.4.24.pdf

别的学者大多采用经验式的路径，核心逻辑是“因为俄罗斯之前如何，现在如何，所以将来会如何”。在此基础上又辅以大量的数据与案例表述，十分容易使政府官员与大众信服，因此也对英国的外交决策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近十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实际上促使许多原本属于“中间反对派”^①的学者转变为强硬反对派，使中间派的力量逐渐变弱。伊恩·邦德的研究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在 2014 年左右还用修辞手法来拟喻俄罗斯的行为，到 2024 年则用大量的报告警示放任俄罗斯的后果，呼吁西方各国共同摧毁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很明显，英国学术界对俄罗斯的极端态度是一步步升级的，这也反映了当前英国的俄罗斯研究发展的总体趋势。

（二）温和批判派

温和批判派是近年来英国俄罗斯研究领域的又一大重要派别，可以被看作英国学术传统在当前英国社会对俄极端敌视的状态下展现出的某种状态。总体上看，温和批判派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其他问题上的表现也持非常激烈的批判态度。但与强硬反对派相比，他们避免以极端的表述和过分强烈的情绪影响研究的客观性。这一派学者保持了“英国学派”传统的客观冷静、理性务实的态度，他们承认对俄罗斯的安全担忧，但仍坚持以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观念解释近十年来的一系列与俄罗斯有关的国际政治事件，其观点也更加符合学术标准。这一派别的代表学者包括安德鲁·莫纳汉、罗伊·艾利森与奈杰尔·古德-戴维斯等。

牛津大学的安德鲁·莫纳汉的任职经历非常丰富，不仅在学术行业内颇有成绩，且与很多智库机构保持密切关系，还运营着自己的个人学术网站。也许正是这种兼具智库与学术机构研究者的双重角色，使得莫纳汉对于俄罗斯的理解多了一层理性和学术的意味。莫纳汉认同普京的领导方式是一种“民主的倒退”，包括对独立媒体的控制、减少地方政府的自主权、直接任命州长、削弱联邦议会等。但他批评西方观察者过分地将普京形容为专制暴政的独裁者，认为这种形容并不恰当。^②他批判“普京学”（Putinology）是

^① 封帅：“俄罗斯研究领域的‘英国学派’：历史沿革、思想谱系与时代特征”，《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3期，第25页。

^② Andrew Monaghan, *The New Politics of Russia: Interpreting Chang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6, p.38.

一种简单化的心理学分析，试图通过普京的个性来理解俄罗斯的政治行为，而这种方式常常将普京妖魔化。^①在他看来，“普京在具体的政策实施层面，对权力的掌控其实并不清晰，总统的指令也经常被忽略”。^②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将所有问题归结于普京一人的结论，是因为西方对俄罗斯的理解存在严重的“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即以西方的参照点去评判俄罗斯，忽视了俄罗斯自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③“俄罗斯的战略是复杂的，谨慎地审视俄罗斯的战略不仅能揭示俄罗斯如何看待世界，也能解释俄罗斯如何运作，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如何失败。”^④西方观察者常常无法“正常理解俄罗斯”，而且由于预期被打破，这种惊讶感持续存在，观察者必须在俄罗斯同时表现出来的强大与脆弱之间找到平衡。^⑤正因为如此，莫纳汉建议学界与政府部门不仅要关注此时此刻的冲突状况，还要具备战略远见，保持对俄罗斯的战略定力。^⑥

罗伊·艾利森是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英国俄苏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多年来，他既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牛津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又曾经担任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俄罗斯和欧亚项目负责人。艾利森的研究，选择从国际法专业知识和国际关系理论概念层面阐述其对俄罗斯各种行为的观点。例如，艾利森认为，2014 年的乌克兰危机是俄罗斯进行的“可否认”干预行为，通过采取一系列合法性模糊的手段，试图重新定义地区规则，以破坏既定的国际秩序。^⑦例如，普京声称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军事存在是为了保护俄罗斯公民的安全，并帮助当地居民表达自决的权利。尽管这些法律辩解缺

① Andrew Monaghan, *Russian Grand Strategy in the Era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22, p.61

② Andrew Monaghan, *The New Politics of Russia: Interpreting Chang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6, p.51.

③ Andrew Monaghan, *Russian Grand Strategy in the Era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22, p.16.

④ Andrew Monaghan, *Power in Modern Russia: Strategy and Mobilisa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9.

⑤ Ibid, p.2.

⑥ Andrew Monaghan, “Strategic Foresight and the War in Ukraine”,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April 6, 2022, <https://www.rusi.org/explore-our-research/publications/commentary/strategic-foresight-and-war-ukraine>

⑦ Roy Allison, “Russia and the Post-2014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Revisionism and Realpolitik”,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7, Vol.93, No.3, pp.519-543.

乏国际法依据，但其仍试图利用法律语言来制造不确定性，减少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但实际上，俄罗斯这种通过“自决”和“人民意愿”来证明其合法性的手段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中的领土完整原则，尤其是处于俄罗斯军事压力的情况下的克里米亚公投。^①艾利森通过自己的理论研究，将俄罗斯的这种行为归纳为俄罗斯的修正主义，即俄罗斯开始试图通过武力手段改变既有的国际边界，并削弱西方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②此外，他还特别讨论了乌克兰中立的可能性，认为俄罗斯对中立性的理解并不明确，其更倾向于通过控制乌克兰来实现其安全目标，而非单纯的中立安排。^③

奈杰尔·古德-戴维斯也是一位具有丰富实际工作经验和外交经验的研究者，对俄罗斯内部政治与经济结构的剖析细致入微。在2016年，他就指出普京在总统任期内有两个主要目标：控制国家和促进经济繁荣，而普京的核心困境就是管理这些目标之间的紧张关系。为了达到该目标，俄罗斯制定了“主权全球化”战略，旨在利用相互依存来追求权力政治目的，也是其第一次利用经济关系——它的传统弱点——作为力量的源泉。但随后，包括能源出口拉动型增长的下降、全球能源市场的发展以及欧盟对俄罗斯政策的反应在内的一系列事态，导致俄罗斯在与全球经济互动中机会与风险之间的平衡发生了急剧而不利的变化。俄罗斯战略的瓦解鼓励了俄罗斯对未来悲观情绪的诞生，催化了乌克兰危机的发生。^④2018—2020年，古德-戴维斯重点关注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问题。他认为，尽管经济制裁被认为对俄罗斯这样的威权政权影响有限，但象征性地重申了国际规范，还在关键时刻阻止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进一步军事升级。^⑤2022年之后，古德-戴维斯重新聚焦俄罗斯内部政治结构。他认为，普里戈任的叛乱是普京总统任期中的一次全面危机，表明普京对国内局势的隔绝，以及他对乌克兰局势的误判，同时

① Roy Allison, "Russian 'Deniable' Intervention in Ukraine: How and Why Russia Broke the Rul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4, Vol.90, No.6, pp.1260-1265.

② Roy Allison, "Russian Revisionism, Legal Discourse and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Europe-Asia Studies*, 2020, Vol.72, No.6, pp.976-995.

③ Roy Allison, "Russia, Ukraine and State Survival through Neutral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2, Vol.98, No.6, pp.1849-1872.

④ Nigel Gould-Davies, "Russia's Sovereign Globalization: Rise, Fall and Future", *Chatham House Research Paper*, January 2016.

⑤ Nigel Gould-Davies, "Russia, the West and Sanction", in IISS (eds.)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February-March 2020, pp.7-28.

也暴露了俄罗斯安全结构的分裂，削弱了普京一贯宣传的“权力垂直化”体制。^①

总之，在过去十年中，温和批判派学者也在英国俄罗斯研究界占据着重要地位。就研究者数量而言，他们仅次于强硬反对派，且在学术界占很大比重。他们之所以显得“温和”，并不代表他们对于俄罗斯的行为更加认同，而是他们更加坚持理性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以更加客观中立的态度对俄罗斯的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他们将关注点置于俄罗斯本身，承认俄罗斯问题的复杂性，以求真实地反映俄罗斯的内部结构与战略目标，希望挖掘俄罗斯行为的深层逻辑，而不是像强硬反对派学者一样过多地宣传西方国家应用尽手段以对抗俄罗斯，或者用煽动性的语言来描述俄罗斯。当然，也正因为他们坚持以学术性的分析为基础，所以在舆论场的声量较之强硬反对派差距很大。但温和批判派集结了英国俄罗斯研究的中坚力量，其观点更加值得分析和研究。

（三）中间议题派

回应乌克兰问题和讨论普京体制是近十年来英国俄罗斯研究的核心议题，但这十年的俄罗斯研究却不仅限于上述内容。为了更好地回应核心议题，很多专业研究者选择了对于当代俄罗斯的诸多侧面进行研究和展现，从多个视角为核心议题提供更加丰富的理论支撑，这也是英国学术研究传统的重要体现。类似支撑性议题包括俄罗斯的信息权力、社会心理、战争形式等。在这类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不会先入为主地对俄罗斯产生情感倾向，而是更加就事论事，或“就议题论议题”，客观呈现俄罗斯在该领域的表现后，再给予评价。由于这部分的内容更加学术化，在舆论场上的影响力相对有限，但塑造了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学术根基。该类别的代表学者有古尔纳兹·沙拉夫迪诺娃、塞缪尔·格林与马克·加莱奥蒂等。

沙拉夫迪诺娃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俄罗斯研究所所长，她对俄罗斯的研究从传播政治学、公众舆论、社会心理学入手，以探讨俄罗斯的权力合法性问题为主要目标，近年来十分活跃。沙拉夫迪诺娃认为，普京在总统任期内

^① Nigel Gould-Davies, “Six Lessons of Prigozhin’s Revolt”,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July 6, 2023, <https://www.iiss.org/online-analysis/online-analysis/2023/07/six-lessons-of-prigozhins-revolt/>

成功地将自己的形象宣传为俄罗斯公民共同民族身份的体现。这种民族认同来源于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俄罗斯转型过程中遭遇的各种痛苦经历和羞辱，引发了强大的群体情绪并建立了社会共识。普京将这些情绪转化为自豪感和爱国主义，并且内化为例外主义意识，激发公民对外国威胁的警惕。普京在乌克兰危机上的强硬决定确保了俄罗斯公民“不安全”的民族身份，自上而下的领导体制和自下而上的集体身份驱动过程融合在一起，产生了一个新的复仇主义俄罗斯。^①因此，沙拉夫迪诺娃提出，传统地依赖于新制度主义和个体中心的研究范式，忽视了集体情绪和群体身份在政治决策和行为中的影响力，这导致学术界无法准确预测 2014 年的乌克兰危机和 2022 年的俄乌冲突等重大政治事件。^②

同样来自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塞缪尔·格林在俄生活多年，对于俄罗斯国内政治有着深刻的感受和理解，他的研究关注于俄罗斯的权力结构对抗和国家动员模式。格林认为，俄罗斯的政治体系能够在微观经济困境的背景下维持宏观政治稳定，部分归因于俄罗斯公民与国家间存在一种“疏离”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公民对政治体制及领导人的明显不满，同时伴随着一种根深蒂固地对执政精英的反感，这种反感成为在多个抗议场景中的推动力量。俄罗斯的社会和政治前景将取决于其能否实现从被动反应型的公民动员向自下而上的议程设定过程的转变。^③格林还擅长通过访谈与民意调查等传统社会科学方法与社交媒体分析等创新方法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分析出俄罗斯的国家动员方式。俄罗斯政府通过媒体、学校、宗教机构等渠道，推动对普京的广泛支持，使用“楔子议题”，如宗教情感和反对性少数群体(LGBTQ)权利的立法，来激发社会保守派的支持，化解反对派与支持者之间的意见分歧，稳固普京的政治地位。^④按照格林的观点，俄罗斯政府将普京塑造成国家生存和身份认同的象征，以使普通民众支持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决策。

① Gulnaz Sharafutdinova, *The Red Mirror: Putin's leadership and Russia's Insecure Ident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10-30.

② Gulnaz Sharafutdinova, "On double Miss in Russian Studies: Can Social and Political Psychology Help?" *Post-Soviet Affairs*, Vol.39, No.1,2023, pp.86-91.

③ Samuel Greene, "From Boom to Bust: Hardship, Mobilization & Russia's Social Contract", *Daedalus*, 2017, Vol.146, No.2, pp113-127.

④ Samuel Greene and Graeme Robertson, *Putin v. the people: The perilous politics of a divided Russia*,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33-39.

伦敦大学学院的加莱奥蒂主要从事对俄罗斯的战争和军事问题研究，对于俄罗斯混合战争（Hybrid War）和信息战（Information Warfare）理论有深入研究。加莱奥蒂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并不是全新的战争方式，而是以往苏联军事实践的延续。这些战术的独特之处，在于对“非动能”手段，如信息战的优先使用、非国家行为体的大规模整合以及政治和军事指挥结构之间的紧密联系。^①这种战争形式其实是一种非线性的“全面战争”，强调政治手段的优先地位，战争的主要目标通过破坏敌方的意志和能力实现，而并非通过直接的军事打击。^②加莱奥蒂在 2022 年出版的专著中对俄罗斯的战争形式进行了总结，指出俄罗斯的战争在近年将以“非接触”作战、流动性等特点，在非传统战场和多领域进行战斗，以实现“信息优势”和对敌对国家的整体打击。^③

分析中间议题派学者的文献著作可以发现，他们比温和批判派学者对俄罗斯的态度更加务实。该类别大部分学者的著作中都没有流露出明显的情感色彩，相对于其他类别的学者来说，更像是自然科学研究者对一个物理规律进行探讨般研究俄罗斯的某项议程，在论证部分运用了大量的定量与实验方法，以求得出准确客观的数据，最后再根据调查的结果进行分析和评论。最后的评价或许是说明形式的，也或许是深刻的批判，但至少这些学者并未将情感态度代入到研究本身。这更符合社会科学界行为主义革命后的研究范式的要求，其得出的结论更具学术性。

（四）亲俄理论派

尽管在过去十年里，对于俄罗斯的批判、斥责甚至谩骂，成为英国社会舆论对俄的主要声音，英国学者对俄也大体上抱有负面印象。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仍有少部分英国学者没有改变自己在学术研究中的基本立场，构成了所谓的“亲俄派”。亲俄派的学者其实未必真的对俄罗斯有好感，很多时候或是因其对俄罗斯政策的同情性解释，或是因为对西方立场的批判，而被

① Mark Galeotti, “Hybrid, ambiguous, and non-linear? How new is Russia’s ‘new way of war?’”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2016, Vol.27, No.2, pp.282-301.

② Mark Galeotti, *Russian Political war: Moving beyond the Hybrid*, London: Routledge, 2019, pp.36-58.

③ Mark Galeotti, *Putin’s Wars: From Chechnya to Ukraine*,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22, pp.6-15.

打上了“亲俄派”（Pro-Russia）这样一种具有政治色彩的标签。但这样的表述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类学者的对俄研究态度。同时，该类学者通常以政治学或国际关系理论为切入点，对俄罗斯的战略与行为进行理论性阐述，故笔者也将这些学者称为亲俄理论派。

该类别当之无愧的代表是肯特大学的理查德·萨科瓦，他是过去几十年来英国学术界“亲俄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观点能够基本反映英国亲俄理论派学者对俄研究的主要认知。2015年，萨科瓦指出，冷战后欧洲安全秩序的瓦解，既是乌克兰危机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这场危机是1990年《巴黎宪章》所阐明的创建“完整和自由的欧洲”愿望未能实现的三重失败，即欧盟的行为从规范性转向地缘政治战略，未能实现某种形式的统一制度化，以及未能在欧洲大陆建立规范和地缘政治多元化框架，这意味着俄罗斯被排除在欧洲新秩序之外。在与乌克兰签订东部伙伴关系和联系国协议的背景下，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欧盟和大西洋联盟走向了一种更加封闭和普遍的大西洋主义。与此同时，俄罗斯却从倾向于大西洋主义的立场转向了更具批判性的新修正主义。^①萨科瓦对俄罗斯的研究态度并没有因为一系列事件的出现而发生根本性转变，而是根据新的素材调整了理论依据。他认为，普京的治理应该定义为“管理型威权主义”。在这种模式下，俄罗斯虽然具有形式上的民主制度，但实质上受到高度控制。普京通过掌控总统职位和限制反对派的手段，确保了政府的稳定和延续，其代价是牺牲了俄罗斯民主制度的真实性和活力。^②为了描述当代俄罗斯的性质，萨科瓦提出了“主权国际主义”的概念。他认为，俄罗斯并不是颠覆性的修正主义国家，尽管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存在分歧，但并不意味着俄罗斯试图破坏整个国际秩序。相反，俄罗斯的目标是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尤其是北约和欧盟的扩张政策，反对这些国家的“干预主义”，以此来实现维护国家安全与主权的目標。^③在他看来，西方社会对俄罗斯的担忧往往被夸大，形成了一种“俄罗斯恐惧症”（Russophobia）。这种恐惧源自历史上西方将俄罗斯视

① Richard Sakwa, “The death of Europe? Continental fates after Ukraine”,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5, Vol.91, No.3, pp.553-579.

② Richard Sakwa,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2020, pp.597-603.

③ Richard Sakwa, “Greater Russia: Is Moscow Out to Subvert the Wes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21, Vol.58, No.1, pp.336-342.

作威胁的刻板印象，忽视了现代俄罗斯外交政策更为复杂的动机，导致双方的对立加剧，而并非基于现实的威胁。^①

2022 年的俄乌冲突爆发后，萨科瓦探讨了冲突背后的深层次原因，重点关注了两种不同国际关系范式及其引发的对立。他指出，“俄乌冲突暴露了后冷战秩序中两个关键范式之间的矛盾：国家自由选择安全结盟的权利（主要由西方强调）和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由俄罗斯强调）”。这些原则都属于联合国宪章的框架，但在欧洲安全的语境下，成了无法调和的矛盾，从而导致了冲突的爆发。^②此外，俄乌冲突不仅是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还是两种对国际秩序本体论截然不同的理解之间的对立。俄罗斯将国家关系视为持续斗争的场所，强调主权、权力平衡和不干涉原则，而西方则认为自由主义和民主能够超越国家间的竞争，推动全球和平与稳定。这种本体论上的差异使得两者在处理冲突时难以达成共识。^③

从萨科瓦的观点中可以窥见，亲俄理论派学者跳脱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视角，给予了俄罗斯同样的学术尊重。这些学者并未将俄罗斯当作“敌人”，而是同样视作一个国际体系中的国家行为体来对待，试图用权力原则、国际秩序本体论、安全理论等理论路径来解释俄罗斯的战略动机与行为原因。这种研究态度同时摒弃了“欧洲例外论”和“俄罗斯例外论”两种研究偏见，承认行为体的复杂性，呼吁学界与民众深刻系统地理解俄罗斯。遗憾的是，亲俄理论派的学者数量并不多，声音也不够强，很多原本亲俄的理论学者也逐渐转向抨击俄罗斯的军事活动，这也可以看出当前英国俄罗斯研究发展的基本方向。

四、结论：英国俄罗斯研究的温和变革时期

如果将英国的俄苏研究视作一段完整的历史，那么从 2014 年到 2024 年

① Richard Sakwa, “Greater Russia: Is Moscow Out to Subvert the Wes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21, Vol.58, No.1, pp.336-342.

② Andrej Krickovic, Richard Sakwa, “War in Ukraine: The Clash of Norms and Ontologies”, *Journal of Military and Strategic Studies*, 2022, Vol.22, No.2, p.90.

③ Andrej Krickovic, and Richard Sakwa, “War in Ukraine: The Clash of Norms and Ontologies”, *Journal of Military and Strategic Studies*, 2022, Vol.22, No.2, p.91.

的十年时间可以看作是一段较为温和的变革时期。在英俄关系剧变的背景下，英国的俄罗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转型时代”的基本研究议程，转而开启了一段以乌克兰问题为核心的新阶段。

在这个新阶段，英国对俄研究的议题、议程、研究者的基本立场和主要观点都出现了明显的“变革”，这也促使英国学界出现了清晰的代际更替。

从议题层面上看，英国学者这十年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如何处理乌克兰危机”、“如何评价普京政权”和“如何应对俄罗斯的挑战”这三个问题展开。其中最为核心的观点和理念，都是尝试对上述三个问题给予回答。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些核心问题，研究者还相应衍生出诸如经济制裁研究、俄罗斯政治经济体制研究、俄罗斯外交战略研究等支撑性子议程。各层次议题研究形成了一个以“乌克兰危机”为核心的议题网络，并不断产生优秀成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学者这十年的对俄研究可以说是非常聚焦。

从研究者的立场和态度来看，近十年来英国学界对俄罗斯的批判和抨击之声愈发强烈，整个学术界在对俄立场上更为强硬。尽管仍存在部分理解和同情俄罗斯的声音，但在人数与声量上都非常有限。无论是理论研究者还是智库研究者，都更加倾向于以强硬的立场与态度应对俄罗斯的挑衅。作为这种趋势的结果之一，强硬反对派的规模在短时间内迅速膨胀，已经成为英国俄罗斯研究界的主流，很多原本对俄较为温和的学者在这一阶段也都转向强硬。即便是那些归属于温和批判派和中间议题派的学者，虽然在研究出发点方面相对中立，但他们关于俄罗斯的大部分研究结论也都较为负面。这种立场和态度上的变革实际上驱动了研究者的代际更替，在研究议题方面更加接近乌克兰危机主题、对俄态度更趋强硬的一批中青年学者迅速崭露头角。而他们走到学术舞台中央之后，又会反过来促使英国学术界对俄更加强硬。这种底层逻辑也应该成为我们评估过去十年英国俄罗斯研究的一个基本标尺。

当然，这十年的英国俄罗斯研究仍然延续了英国学者在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等方面的优秀传统。新一代学者在研究方法上以经验主义为主，同时结合了英国哲学传统中的实用主义与多元主义。^①他们也不拘泥于单一的理论

^① Barry Buzan, “The English School: an underexploited resource in I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1, Vol.27, No.3, pp.471-488.

框架，而是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分析工具。^①这些都彰显了英国俄罗斯研究中尊重优秀传统、开放包容的特点。^②

综上所述，2014 年的克里米亚危机开启了英俄关系的新阶段，推动了英国俄罗斯研究进入温和变革的新周期。然而，截至 2024 年，乌克兰危机尚未缓和，这个围绕乌克兰危机形成的特殊历史时段仍在延续，其结果尚不可知。因此，英国的俄罗斯研究也将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在现有的路径中前行，为我们的学术史书写提供更加丰富的内容。

^① Tim Dunne, Ian Hall, “The English School”, in Thomas Weiss, Rorden Wilkinson (e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 London: Routledge, 2023, pp144-154.

^② 关于英国俄苏研究传统的叙述可参考封帅：《冷战后英国的俄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251-258 页。

【Abstract】 Since 2014, British-Russian relations have entered a new cycle of continuous decline, and Russian studies in the UK have also embarked on a new developmental phase. From 2014 to the present, the Ukraine crisis has dominated the agenda of Russian studies in the UK, leading to a restructuring of research topics. This new phase of research revolves around issues such as the Ukraine crisis, the Putin question, and economic sanctions. The shift in core topics has accelerated the generational turnover among scholars. In response to these core research issues, a new intellectual spectrum has emerged within the UK's Russian studies field. Scholars advocating a hardline stance towards Russia, referred to as the "Hardline Opposition", have become the mainstream voice domestically. Meanwhile, a group of scholars, known as the "Moderate Critics", who insist on explaining and addressing Russian challenges through theoretical research, continues to grow. Additionally, some scholars have engaged with related supportive topics, forming the "Middle Issue Group". A smaller group of scholars, labeled the "Pro-Russia Theorists", still attempt to understand Russia's behavior patterns and policy choices, offering their perspectives on relevant issues. Overall, since 2014, Russian studies in the UK have entered a phase of moderate transformation. While there have been changes in research topics, agendas, scholars' basic stances, and dominant viewpoints, the methodological and intellectual approach remains rooted in the UK's social science tradition. This new phase is ongoing, and its development trends remain to be further observed.

【Key Words】 British-Russian Relations, Russian Studies in the UK, Agenda Network, Intellectual Spectrum

【Аннотация】 С 2014 года британ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ступили в новый цикл непрерывного спада, и россий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также вступили в новый этап развития. С 2014 года и по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укра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доминирует в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ой тематике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по России. Была ре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а

тематическая сеть, и возобновился новый этап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округ вопроса Украины, вопроса Путина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анкций.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а основных тем ускорила смену поколений учёных.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ответов на основ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е вопросы в област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сформировалась новая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линия. Учёные «жёсткой оппозиции», выступающие за жёстк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России, стали основным голосом в стране. Группа учёных-«умеренных критиков», которые настаивают на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для объяснения и реагирования на вызовы России, также продолжает расти. Некоторые учёные участвовали 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по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 вспомогательным вопросам. Среди них была сформирована «группа по изучению промежуточных вопросов», и небольш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учёных всё ещё пытаются понять модели поведения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выбор России, образуя меньшую «пророссийскую теоретическую группу». Все они высказывают свою личную точку зрения по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 вопросам. В общем, после 2014 года россий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вступили в новый этап умеренных изменений. Тем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программы, основные позиции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и основные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 всё изменилось, но метод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е идеи остались прежними. Этот новый этап ещё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и тенденцию 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ещё предстоит проследить.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ей,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оссии в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тематическая сеть,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генеалогия

(责任编辑 宋羽竹)

外生冲击下的结构性调整：斯堪的纳维亚的俄罗斯、东欧研究（2014—2024年）*

韩冬涛 廖正杰**

【内容提要】斯堪的纳维亚学界的俄罗斯东欧研究并未随着苏联解体而衰落，在政府增加投入的支持下呈现出发展的态势。2014年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由于受到地缘政治变化的外生冲击，该地区的研究议程、议题分布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对既有研究方法的反思和探讨也同步进行。俄欧关系的持续恶化乃至脱钩，促使斯堪的纳维亚学界对俄罗斯政治体制特点、对外决策逻辑的关注度超过经济议题，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评估对俄关系前景。斯堪的纳维亚学界对俄认知整体呈负面化，在俄乌冲突发生后更加强调防范俄罗斯的潜在威胁。对于美国学界倡导俄罗斯研究“去殖民化”、“去中心化”等主张，该地区学者持审慎态度，坚持在批判性吸收的基础上形成符合该地区需求的研究范式，避免简单套用而造成偏差性理解。斯堪的纳维亚学界仍在继续对俄罗斯、东欧研究进行结构性调整和反思，呈现整体繁荣增长的趋势，而更具特色的地区成就的形成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关键词】斯堪的纳维亚 俄罗斯东欧研究 议题与方法 结构性调整 乌克兰危机

【中图分类号】D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4)05-0085(25)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1世纪以来俄罗斯边疆治理与发展战略研究”（项目批准号：21CGJ050）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 韩冬涛，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讲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青年研究员。廖正杰，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区域国别研究深受地缘政治变化影响。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下滑，全球化研究兴起，俄罗斯、东欧研究对决策者和研究从业者的吸引力大大减退，资金投入、人才产出也相应出现萎缩。2014 年，欧美外交决策界和俄罗斯、东欧研究群体对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俄罗斯出兵叙利亚等事件缺乏预见，引发西方国家决策者、商界领袖、学界精英对缺乏俄罗斯问题专家这一状况的关注和担忧。2016 年，理查德·萨克瓦（Richard Sakwa）及其项目组对全球俄罗斯、东欧研究机构和群体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报告认为，冷战后全球俄罗斯、东欧研究总体衰落趋势明显，在涉及俄罗斯研究的 637 家智库中，集中力量研究俄罗斯的仅占 5%，单独将俄罗斯作为研究对象地区的占 19%，非常规的对俄研究机构占比 76%。萨克瓦强调，美国、西欧、日本的俄罗斯、东欧研究的衰落是造成专家队伍不足、研究能力下降、对俄罗斯认知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①2017 年，蒂莫西·弗莱（Timothy Frye）在《国家利益》杂志撰文指出，虽然，客观事实是研究和培训资金大幅削减，学习俄语的本科生和申请攻读俄罗斯研究领域的研究生人数明显减少，但俄罗斯研究并没有消亡，至少在政治学领域正当繁荣。^②萨克瓦也注意到，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危机激发了对俄罗斯、东欧研究的需求和关注，2014—2015 年关于俄罗斯政治、经济、军事能力研究的作品大幅增加。^③

实际上，在美国、中国、西欧、日本等俄罗斯、东欧研究重镇经历衰落阵痛的时期，斯堪的纳维亚的俄罗斯、东欧研究反而在苏联解体后逆势增长，包括政府投入、研究机构建设、人才培养以及研究成果数量，在长时间内保持了稳定发展，并逐渐形成具有一定地区特色的俄罗斯、东欧研究。

一、冷战后斯堪的纳维亚学术性俄罗斯、东欧研究的逆势繁荣

斯堪的纳维亚在地理意义上一般指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包括挪威、

① Richard Sakwa, Thomas Graham, et al., *Think Tank Atlas: Russian Studies Abroad*, Rethinking Russia, 2016, <http://rethinkingrussia.ru/en/2016/06/think-tank-atlas-russian-studies-abroad>

② Timothy Frye, “Russian Studies Is Thriving, Not Dying”, October 2017,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russian-studies-thriving-not-dying-22547>

③ Richard Sakwa, Thomas Graham, et al., *Think Tank Atlas: Russian Studies Abroad*.

瑞典和芬兰北部地区。文化意义上的斯堪的纳维亚是指具有历史、文化、语言联系的三个北欧国家——瑞典、挪威、丹麦，三国祖先是中世纪之前就居住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的、几个使用日耳曼语的部落。^①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挪威、瑞典、丹麦先后形成独立王国以及各自的语言。三国语言虽有所区别，但同源性非常明显，彼此之间能够相互理解。虽然芬兰在人种和语言上与瑞典、丹麦、挪威不同，但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与三国形成了密切联系，深受斯堪的纳维亚文化的影响。1154 年，瑞典国王埃里克九世将基督教带入芬兰之后，瑞典就成为芬兰的宗主国，1581 年芬兰正式成为瑞典的一个公国，此后 700 年间芬兰深受瑞典的影响。瑞典语曾经与芬兰语同为芬兰的官方语言，今天芬兰 6% 的人口是瑞典族，许多芬兰族人能够同时熟练使用芬兰语和瑞典语。因而，《大英百科全书》就将芬兰纳入斯堪的纳维亚的范围。^②本文梳理的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东欧研究，涉及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四国的总体发展状况。

（一）冷战“锋线”地缘结构条件下侧重对苏政策性研究

挪威、芬兰与俄罗斯接壤，瑞典、丹麦与俄罗斯隔海相望。相较于美国、西欧及日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无论在体量上还是全球影响力方面都是小国，俄罗斯、东欧研究的规模、传统也相对较弱。本地区专门性的俄罗斯、东欧研究直到二战后才逐渐出现。丹麦-挪威联合王国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被英国击败，瑞典在北方大战中被沙俄帝国击败，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相继退出了欧洲大陆政治的中心舞台，开始了漫长的中立主义政策时代，专注国内发展和维护自身安全，不像英、法、德那样，因为与俄罗斯在欧洲大陆争霸以

^① “斯堪的纳维亚”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使用最早见于 18 世纪，由早期语言、文化斯堪的纳维亚主义运动所引入，强调的是这三国之间密切的文化联系和语言联系。斯堪的纳维亚还曾在 19 世纪上半期被用作政治词汇。受到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的影响，瑞典、丹麦、挪威三国的青年学生开始将斯堪的纳维亚作为一个政治术语来使用。鉴于三国历史上、文化上、语言上的密切联系，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努力推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合作。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代表人物丹麦作家、诗人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德森（Hans Christian Andersen），他在 1839 年的一首诗中写道：“我们是同一种人，我们是斯堪的纳维亚人。” See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nd Music”, http://wayback-01.kb.dk/wayback/20101105080532/http://www2.kb.dk/elib/noder/hcamusik/skandinav/index_en.htm

^② “Scandinavia”,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Scandinavia>

及争夺殖民地而产生对俄研究的需要。二战结束之初，瑞典、丹麦、挪威三国寄希望于美苏平衡维持国际和平，努力充当西方国家与苏联之间的“桥梁”。美国在推动北约成立的过程中，考虑到瑞典、丹麦、挪威的重要战略位置，积极吸收三国加入。丹麦、挪威迫于美国压力加入了北约，^①但不允许北约在本国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不参与针对苏联的军事演习。瑞典则坚持维护武装中立，既可以从美国进口武器，又可以避免苏联进一步威胁芬兰，使芬兰成为瑞典和苏联之间的战略缓冲带。芬兰被迫与苏联签订《苏芬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在保有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屈从于苏联的对外政策，失去了部分独立性。处于冷战“锋线”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呈现出多样性安全结构，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地区平衡格局。这种在美苏间保持平衡、避免刺激苏联、实现“自保”的战略取向，也影响了该地区冷战时期的俄罗斯、东欧研究。

这一时期，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俄罗斯、东欧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主导的政策性研究机构，特别是与军事有关的研究机构中，^②研究议题以苏联的武器装备、军事战略以及外交政策为主，研究的主要目标在于向政府提供关于苏联军力和外交政策变化的详细分析，作为政府决策的必要参考。学术性研究力量相对较弱，专门从事俄罗斯、东欧研究的学术性机构仅有乌普萨拉大学的东欧研究所，主要关注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发展相关议题。其他学术性研究分散于语言文化和俄罗斯古代史领域，涉及苏联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发展等领域的成果较少。^③

（二）1991—2013 年该地区学术性俄罗斯、东欧研究快速繁荣

苏联解体后的国际格局变化改善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安全环境，为地区国家与俄罗斯进行更为深入的交往提供了基础，这些国家对俄罗斯的政策

① 1948 年 5 月末，瑞典提出“北欧防务联盟”的建议，希望北欧国家组成一个区域性防务联盟，在美苏两大集团之间继续保持中立。美国在三国加入北约的谈判中，向瑞典施压，反对其中立政策，加强对挪威和丹麦的引导，甚至以不向三国出售武器相威胁，令本就基础薄弱的北欧防务联盟计划最终落空。

② Lena Jonson,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in Sweden: New Challenges and Possibilities”, *Slavic Eurasian Studies*, 2003, No.6, p.37.

③ 相关统计数据和分析可参见韩冬涛：《冷战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俄罗斯、东欧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15-18 页。

目标和利益诉求也随之变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制造业发达，属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俄罗斯经济转型带来广阔的市场前景促使地区国家增加对俄罗斯转型进程及经济、外交政策了解的需求，刺激了该地区冷战后俄罗斯、东欧研究的蓬勃发展。在政治空间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地区学者倾向在俄欧关系框架下讨论俄罗斯的外交战略、后苏联空间政策、能源政策、北极战略，同时给予高加索、中亚地区更多的关注。在方法上，包括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比较政治理论、国际社会理论、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信息政治学理论等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本地区俄罗斯、东欧研究的主要工具。

学术性研究机构大幅度增加，特点鲜明。如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在 1990 年代早期就建立了东欧经济研究所，随后更名“斯德哥尔摩转型经济研究所”，以原来的东欧、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经济改革为主要研究对象。该学院积极帮助原苏东集团国家建立独立的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推动计划命令型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研究，逐渐形成一个国际研究网络，为田野调查和在地研究提供了基础。学术性研究机构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府的重视和投入的增加。面对俄罗斯以及原苏东地区复杂的社会和商业部门变化，政府希望促进学术性研究为国家决策提供更为准确和系统性的信息基础。亚历山大研究所就是政府增加投入的典型成果，该所虽隶属赫尔辛基大学，但系芬兰政府推动并提供主要资金支持的国家级研究中心，与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和民间团队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此外，在政府的推动下，许多大学纷纷设立了与俄罗斯有关的研究项目。^①

俄罗斯、东欧研究人才梯队培养逐渐规范化。地区国家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逐渐密切，对了解俄罗斯的实用性人才的需求增加，促使地区国家加强对俄罗斯、东欧地区研究的教育投入，相关的政治学、历史、文化史及语言方向的研究生数量明显增加。如瑞典政府 1996 年建立的索德托恩大学，专门将独立后的波罗的海国家以及东欧国家转型作为重点研究方向，并建立了波罗的海与东欧研究生院，招收硕士研究生。东芬兰大学于 2013 年成立了

^① Waldemar Melanko, “A Few Remarks on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in Finland”, *Slavic Eurasian Studies*, 2011, No.6, p.42.

维拉俄罗斯边境研究中心，开设了多门专攻俄罗斯发展问题的硕士研究生培养课程。

研究议题快速扩展，俄罗斯经济、政治、社会发展、能源、北极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加。该地区国家冷战后的俄罗斯、东欧研究，除了保持语言文化和历史研究的传统优势外，对俄罗斯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发展的关注度明显增加。其中，对俄罗斯经济的关注度最高，相关成果占总数的 31%，外交和政治的研究成果总量分列第二位（24%）、第三位（17%）。^①这种变化体现出斯堪的纳维亚学界在对俄罗斯开放市场寄予较高期望的同时，对俄罗斯转型可能造成的难民、民族冲突、经济动荡等消极后果会波及自身的担忧。

斯堪的纳维亚的俄罗斯、东欧研究发展表现出较强的务实性特点。俄罗斯作为欧洲能源的主要供应者，其能源战略及相关政策对斯堪的纳维亚有着重要影响。挪威作为产油大国，与俄罗斯存在竞争关系，对于俄罗斯的能源政策走向以及能源企业发展格外关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俄罗斯同为北极国家，在北极地区划界、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等方面既有共同利益，也存在差异性。因而地区国家需要了解俄罗斯的战略意图和利益偏好，与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管控分歧、促进合作。面对俄罗斯转型可能带来的经济机会，斯堪的纳维亚学者不仅关注俄罗斯转型过程中的宏观经济政策，还注重对各产业发展状况、银行金融市场变化、劳动力资源、投资环境、地区层面经济发展特征的分析，甚至细微到俄罗斯企业的组织模式、行为方式等。

二、2014—2024 年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东欧研究机构与议题的新发展

相较于欧洲历史上多次体系性变革，苏联解体虽然结束了欧洲长达数十年的紧张对峙，但对之后的国际秩序缺乏相应的制度性安排及相关法律文件。用以维系欧洲安全共识的仍是冷战中期签署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全球化深入发展与俄罗斯市场化改革合力推动了双方密切的经济联系，俄罗

^① 相关统计和分析可参见韩冬涛：《冷战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俄罗斯、东欧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17-21 页。

斯向欧盟提供稳定、廉价的能源，欧盟向俄罗斯出口丰富的工业制成品和农副产品。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还是没能真正解决双方深层次的认知错位：一方面，欧盟将“中东欧、波罗的海、外高加索”地区国家作为扩员目标，试图利用“吸纳”来推动和帮助地区国家的“民主转型”，但俄罗斯希望通过传统的历史、文化、宗教、经济联系，维系对后苏联空间的主导权；另一方面，欧盟对俄罗斯抱有一种混杂“他者”和“冷战胜利优越感”的认知，对普京开启的“非西方化”转型表现出“居高临下”的怀疑和批评态度，导致俄罗斯“没有得到应有尊重”的不满情绪不断累积。认知错位在 2014 年乌克兰危机中爆发，并于 2022 年 2 月 24 日爆发的俄乌冲突中达到顶峰。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颠覆了赫尔辛基进程确定的“不可分割的安全”、“边界不可变动”等欧洲安全基本原则，改变了冷战后欧洲地缘政治格局，也对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东欧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规模保持增长的同时，研究议题出现了结构性变化。

（一）研究机构稳步增长与优化调整同步进行

2014 年乌克兰危机被俄罗斯、东欧研究学者视为欧洲冷战后最严重的地缘政治危机。欧盟国家总体对俄罗斯的认知明显趋于负面化，信任度大幅下降，认为俄罗斯的行为是对欧盟价值观和利益的威胁。^①但因为地缘位置和利益需求的差异性，欧盟国家对俄罗斯的“威胁感知”有所区别。德国、法国、意大利与俄罗斯经济联系紧密，虽然支持对俄罗斯采取一定措施，但立场较为温和，强调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避免局势升级。包括波兰、波罗的海三国在内的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扩张行为”警惕且敏感，主张对俄采取强硬立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俄罗斯隔海相望，与波罗的海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俄罗斯的“威胁感知”与西欧国家相比更为强烈一些，^②主

^① “Damage Assessment: EU-Russia relations in crisis”, in Łukasz Kulesa, Ivan Timofeev, Joseph Dobbs (eds.), *European Leadership Network Special Report*, June 2017, <https://www.europeanleadershipnetwork.org/wp-content/uploads/2017/10/170615-ELN-RIAC-Damage-Assessment-EU-Russia-Relations-in-Crisis.pdf>

^② 相关论述参见丁一凡：“乌克兰危机对欧洲经济的影响”，《欧洲研究》，2014 年第 6 期，第 16-19 页；吴志成：“乌克兰危机对欧洲秩序的影响”，《欧洲研究》，2014 年第 6 期，第 22-27 页；Henrik Boesen, Lindbo Larsen, “Great Power Politics and the Ukrainian Crisis: NATO, EU and Russia After 2014”, *DIIS Report*, 2014, p.18, <https://www.diiis.dk/en/research/great-power-politics-and-the-ukrainian-crisis>

张在乌克兰领土主权恢复完整之前限制与俄罗斯的合作，保持在北极等特定领域合作的可能性，准备通过政治、外交甚至军事手段为波罗的海国家维护主权提供帮助。

新的地缘政治变化促使斯堪的纳维亚的俄罗斯、东欧研究机构进一步发展，并呈现出以下三方面较为明显的特征。

首先，研究机构增加与优化升级同步进行。如表 1 所示，乌克兰危机发生前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涉俄罗斯、东欧研究的相关机构增加了 6 个，总数达到 34 个。^①其中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在 2021 年建立了斯德哥尔摩东欧研究中心，主要针对俄罗斯和其他原苏联国家（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的国内政治、外交、安全政策以及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向瑞典政府和欧盟提供政策建议。这是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对俄罗斯、东欧研究框架的优化升级，东欧研究中心作为独立实体在瑞典外交部的直接资助下运行，取代原有的非固定的“俄罗斯与欧亚项目组”，在管理和资金方面得到了有效保障，研究人员也从原来的 3~4 人扩充到固定的 9 人，且全部具有区域国别研究的培养和学术经历。除东欧研究中心是政策型研究机构外，其他 5 个新增机构均为依托高校的学术型研究机构。

其次，新增的俄罗斯、东欧研究学术型机构的研究侧重点更为鲜明。马尔默大学俄罗斯、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研究中心是斯堪的纳维亚首个、也是唯一一个明确将乌克兰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机构，研究范围涉及民族与国家认同、政治模式发展、文化与社会动态等。斯拉夫和东欧研究中心是挪威首个专门性的俄罗斯、东欧研究机构，研究区域包括俄罗斯和其他后苏联国家、中欧和巴尔干地区国家，主要关注上述地区国家的语言、文化、历史、社会和政治。东芬兰大学俄罗斯和边境研究中心专注于俄罗斯与其他后苏联国家边境地区的边界、移民、跨文化接触以及历史变化进程研究，其中俄罗斯与芬兰边境、俄罗斯与瑞典边境一直是研究议程的重点。哥本哈根大学在跨文化与区域研究系下设东欧研究项目组，重点研究俄罗斯、乌克兰、西巴尔干和波兰的历史、文化、社会和政治问题。在强化区域研究的同时，还将俄罗

^① 冷战时期和冷战之前的涉及俄罗斯、东欧研究的机构共 11 个，其中，丹麦国际和平研究所 2003 年被拆分，并入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参见韩冬涛：《冷战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俄罗斯、东欧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11-13 页。

斯、东欧国家案例纳入国际冲突解决中心和现代欧洲中心的议题研究中。^①

表 1 斯堪的纳维亚地区 1980 年代末之后新增的俄罗斯、东欧研究机构

成立时间	机构名称	所属国家	机构类型
1987 年	图库大学泛欧洲研究所	芬兰	学术型
1988 年	拉普兰大学北极中心	芬兰	学术型
1989 年	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转型经济研究所	瑞典	学术型
1989 年	芬兰俄罗斯和东欧研究协会（FAREES）	芬兰	学术型
1991 年	芬兰银行转型经济体研究所（后调整为新兴经济研究所）	芬兰	政策型
1993 年	芬兰国防大学	芬兰	政策型
1990 年代	坦佩雷大学	芬兰	学术型
1996 年	赫尔辛基大学亚历山大研究所	芬兰	学术型
19 世纪（1997 年改组）	瑞典国家国防学院	瑞典	政策型
1998 年	阿尔托大学市场转型研究中心	芬兰	学术型
2000 年	索德托恩大学波罗的海与东欧研究中心	瑞典	学术型
2002 年	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	丹麦	政策型
2004 年	哥本哈根大学跨文化与地区研究系	丹麦	学术型
2006 年	南丹麦大学冷战研究中心	丹麦	学术型
2007 年	哥本哈根大学欧洲政治研究中心（CEP）	丹麦	学术型
2008—2012 年	北极地缘政治研究项目	挪威	政策型
2010 年	乌普萨拉大学俄罗斯与欧亚研究中心	瑞典	学术型
2011 年	奥尔堡大学文化创新与北极研究中心	丹麦	学术型
2013 年	哥本哈根大学国际冲突解决中心（CRIC）	丹麦	学术型
2013 年	东芬兰大学俄罗斯和边境研究中心（VERA）	芬兰	学术型
2016 年	马尔默大学俄罗斯、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研究中心（RUCARR）	瑞典	学术型
2019 年	奥斯陆大学斯拉夫和东欧研究中心	挪威	学术型
2021 年	斯德哥尔摩东欧研究中心（SCEEUS）	瑞典	政策型
2023 年	现代欧洲研究中心（CEMES）	丹麦	学术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① 国际冲突解决中心由丹麦战略研究委员会资助，重点关注人权与和平建设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冲突的预防和转化；现代欧洲中心是由隆德大学、马尔默大学、哥本哈根大学合作组成的研究网络，旨在通过跨学科方法探索欧洲几个世纪以来的变革以及与其他地区的关系。

再次，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东欧研究机构的地区合作发展趋势增强。冷战结束后，芬兰和瑞典为了搭建一个国内外研究学者、官员、记者等专业人士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平台，推进俄罗斯、中东欧研究，先后成立了“芬兰俄罗斯与东欧研究协会”和“瑞典俄罗斯、中东欧、中亚研究协会”，但组织松散，在资源整合、学术共同体构建等方面未能发挥充分作用。近十年来，本地区研究机构间的网络化合作明显加强。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联合在中东欧国家的相关经济研究机构发起了东欧和新兴经济体研究论坛（The Forum for Research on Eastern Europe and Emerging Economies, FREE Network），旨在构建由中欧、东欧和原苏联经济问题专家组成的研究网络，弥合学术研究 与政策制定之间的差距，推动不同国家和地区学者、决策者和商业代表之间的沟通与互动。本地区主要研究机构之间形成了较为密切的合作网络。赫尔辛基大学亚历山大研究中心、索德托恩大学波罗的海与东欧研究中心、乌普萨拉大学俄罗斯与欧亚研究所、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等机构将彼此列为重要的学术合作伙伴，合作方式主要包括举办联合论坛、组织联合研究项目、学术资料共享以及研究生课程互选等。

（二）研究议题出现结构性变化

1992—2013 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普遍关注俄罗斯的转型进程及其市场前景，决策需求推动了冷战后本地区俄罗斯、东欧研究议题结构的形成。虽然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因各自利益需求以及对俄关系的侧重点不同，在研究议题的涵盖面以及相应议题的占比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重点议题及排序上具有明显的相似性。综合统计数据显示（见图 1），俄罗斯经济发展和外交政策取向是地区国家共同关注的重点，对于经济议题的关注占据首位。随着乌克兰危机爆发、持续、升级造成的欧洲地缘政治形势紧张和改变，本地区俄罗斯、东欧研究不仅成果数量出现了大幅度增长，研究议题也呈现出结构性变化。

在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34 个研究机构系统性梳理中，共获取包括专著、学术论文、研究报告、研究简报、会议论文在内的有效样本 1313 个，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历史、能源、北极等议题。从数量上看，2014 年后本地区俄罗斯、东欧研究成果呈现出“井喷式”增长，相比 1992—2014

年的 548 篇成果样本，^①增幅高达 240%。高速增长的背后，一方面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政府和高校在俄罗斯、东欧研究机构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持续投入产生的长期累积效应。2010—2014 年的统计显示，本地区涉及斯拉夫研究的学者约为 268 人，其中从事俄罗斯、东欧研究的学者约为 127 人。2014—2024 年的统计显示，本地区专职研究人员增长到 189 人，研究力量的壮大是成果大幅度增加的重要基础。促进高速增长的另一方面原因是该地区国家对俄罗斯及邻近国家的关注度上升。虽然《明斯克协议》就乌东问题达成妥协，但并没有实际解决俄乌之间的矛盾，加上制裁的持续，本地区国家急于了解俄罗斯未来的战略选择及其对俄欧关系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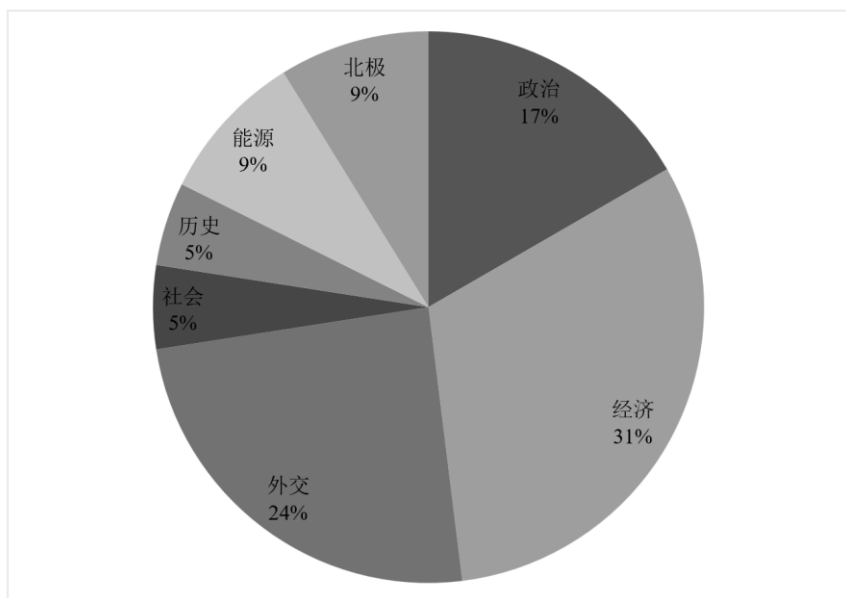


图 1 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研究议题比例分布（1992—2013 年）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2014 年之后，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东欧研究的议题分布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如图 2 所示，在地缘政治变化的驱动下，经济领域不再是地区国家

^① 参见韩冬涛：《冷战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俄罗斯、东欧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10 页。

关注的核心议题，政治议题的比重快速上升，对外交议题的关注得以保持，所占比重分列第一位、第二位，其后是社会、历史议题，经济议题降至第五位。相较于 1992—2014 年不同地区国家的议题分布情况，^①虽然各国在议题占比和具体排序上仍表现出一定差异性，但均重视政治和外交议题的研究（见表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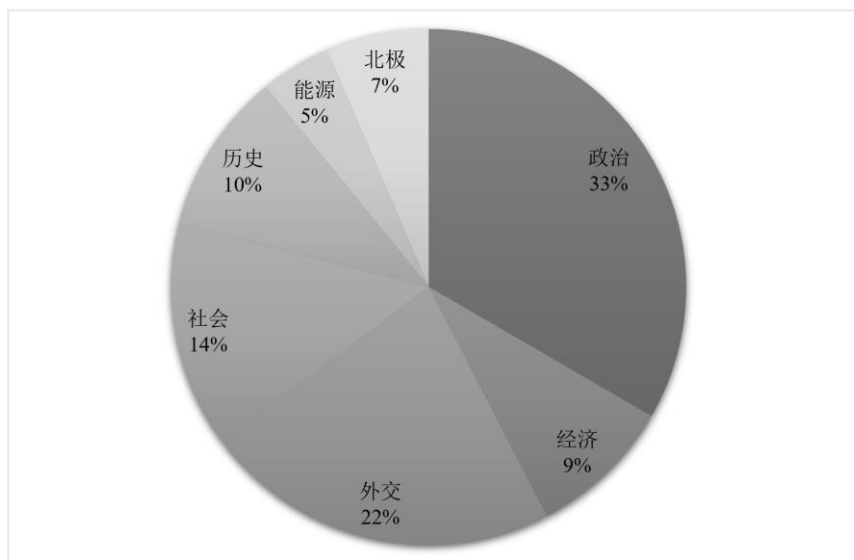


图 2 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研究议题比例分布（2014—2024 年）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 2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研究议题分布情况（2014—2024 年）

	政治	经济	外交	社会	历史	能源	北极
丹麦	28%	3%	40%	8%	8%	6%	8%
芬兰	46%	9%	21%	11%	11%	6%	4%
挪威	26%	11%	26%	5%	8%	7%	16%
瑞典	35%	8%	15%	26%	11%	1%	4%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① 参见韩冬涛：《冷战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俄罗斯、东欧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17—19 页。

（三）对俄罗斯政治模式和治理效能的深入观察

在政治议题研究中，对俄罗斯政治模式和治理效能的研究占据突出地位。1992—2013 年，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学者对俄罗斯政治模式的研究主要基于民主化转型范式。安德斯·奥斯隆德（Anders Åslund）、斯蒂芬·赫德兰（Stefan Hedlund）等有代表性的学者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苏联体制的“缺陷”、转型进程中的宪政改革与民主化、叶利钦时代西方化转型失败的原因和解释，以及普京逆转西方化转型的现实原因与历史根源等。^①而俄罗斯在 2000—2012 年构建本土化特色政治秩序的过程并没有引起斯堪的纳维亚研究人员的深入探讨。一方面，构建本土化特色政治秩序的过程实现了国家稳定，保持了开放性市场经济，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发展与俄罗斯经济合作的诉求没有造成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俄罗斯与挪威完成了巴伦支海划界，与地区国家在北极的机制化合作不断加强，双边关系的稳定消减了对俄罗斯的负面认知。但是，在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俄欧关系下行的影响下，增加对俄罗斯政治的深层次了解成为地区国家评估双边关系及未来发展的必要基础。2014—2024 年，对俄罗斯政治模式的研究聚焦于其自身制度特点、影响因素，及其在国家治理方面的表现，逐渐脱离了民主—专制的简单两分法。随着第三波民主化的结束以及威权主义在转型失败国家的回归，打破了转型范式关于专制体制崩溃必然向民主体制转型的论断，引起了学者们对介于民主和专制之间的混合型政体（hybrid regime）的关注。^②

① See Anders Åslund, *Building Capit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Former Soviet Blo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Anders Åslund, *Russia's Capitalist Revolution: Why Market Reform Succeeded and Democracy Failed*,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7; Anders Åslund, *How Russia Became a Market Economy*,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5; Stefan Hedlund, *Russia's "Market" Economy: A Bad Case of Predatory Capitalism*,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3; Stefan Hedlund, *Russian Path Dependence*, Routledge, 2005; Stefan Hedlund, *Invisible Hands, Russian Experience, and Social Science: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ing Systemic Fail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韩冬涛：“斯蒂芬·赫德兰事业中的俄罗斯转型路径依赖”，《俄罗斯研究》，2016 年第 3 期，第 64—92 页。

② Andreas Schedler, “The Logic of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in Andreas Schedler, ed.,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The Dynamics of Unfree Competition*,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06; Steven Levitsky, Lucan A.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张长东：“混合型政体与威权主义韧性研究”，《国外理论动态》，2014 年第 5 期，第 36—38 页。

混合型政体指的是具有选举特征的威权主义政体，选举存在有限的、有利于当权者的竞争，也被称为选举型威权主义或竞争型威权主义。斯堪的纳维亚学者在俄罗斯的案例中发现，选举威权主义政权通过建立政治垄断、控制国家机器和主导性政党，有效避免国内政治受到西方的直接影响，并且建立高壁垒限制外部政治力量的渗透，利用分而治之的策略聚集忠诚的支持者，压制体制外的反对者，从而强化政权。在压制的同时，政权通过制度调整、经济资源动员、精英吸纳、选举管理、灵活应对反对派活动等多元化手段提高适应性，为政权的长期稳定提供了必要基础。^①斯堪的纳维亚学者对俄罗斯政权长期稳定的分析与国际学界关于威权主义政权可持续的经验性研究成果存在一致性。对众多混合型政体和威权主义政权的比较研究显示，包括选举、政党、议会、暴力机构、司法制度、税收制度在内的制度和机构能力是影响混合型政体能否持续的主要因素，比如有选举制度的威权主义政体更具持久性。^②

斯堪的纳维亚的学者们也注意到，俄罗斯竞争型威权主义在治理方面存在的弊端可能影响政权的稳定。在分析路径上，斯堪的纳维亚的学者们借鉴了弗朗西斯·福山关于“治理”的定义，即政府制定和实施规则以及提供服务的能力，不管这个政府是否民主，该定义强调治理质量相对于政府结构的独立性。学者们认为，俄罗斯的治理质量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符，呈现出治理不善的特征，如法制缺失、寻租、腐败、监管不足、公共资金滥用以及政府效能低下等。造成治理不良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体制未能给良好治理提供足够的激励，国家监督机构的自由裁量权过大，缺乏独立媒体、专业机构监督和自我监管机制。赫尔辛基大学亚历山大研究所的研究员玛格丽塔·扎瓦德斯卡娅（Margarita Zavadskay）认为，俄罗斯选举性质的威权主义依赖于政治表现而非经济成就，地方官员的表现更多地通过选举结果而非社会经

① Vladimir Gel'ma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in Russia", *Demokratizatsiya*, September 2014.

② See Steven Levitsky, Lucan A.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Jennifer Gandhi, Adam Przeworski, "Authoritarian Institutions and the Survival of Autocrat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07, Vol.40, No.11; 张长东：“混合型政体与威权主义韧性研究”，《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5期，第39-41页。

济成果来评判，导致地方官员将政治忠诚置于专业效率之上，严重削弱了治理质量。^①乌普萨拉大学俄罗斯东欧研究所教授安-玛丽·萨特丽（Ann-Mari Sätre）则指出，贫困问题是俄罗斯治理不良的重要表现，对能源部门过分依赖，政府投入欠缺导致创新和高附加值产业缺乏；社会福利政策缺乏针对性，未能有效覆盖贫困人群，福利体系存在官僚主义和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造成的经济不确定性导致投资者信心不足、消费者减少消费支出，进一步限制了经济发展。^②

尽管俄罗斯存在治理不良的诸多表现，但民众对政权的支持度却保持较高水平，亚历山大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坎加斯普罗（Markku Kangaspuro）认为，普京政权通过“强国”叙事来弥补国家福利在物质上的供应不足。“强国”叙事一方面提供了精神性需求，如国家形象、民族自豪感和国际地位，另一方面提供民众对物质性需求的期待，如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等。他强调，并非民主制度才能获得民众支持，威权政权也能通过提供适当的激励和威胁获得支持、巩固权力。^③对混合型政体和威权主义持续性的研究仍是一个新兴领域，国际学界努力通过对不同地区、国家混合型政体的案例研究获得尽可能多的特殊性知识，并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寻求具有解释力的一般性理论框架。本地区学者在俄罗斯案例分析中获得的经验性知识，为威权主义可持续分析框架提供了新的比较分析对象和内容。

（四）新地缘政治现实下的对俄政策多元化分析

与 1992—2014 年研究特点相似的是，近十年对俄罗斯外交的研究也多是在欧盟-俄罗斯关系框架下展开的，不同的是，地缘政治背景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对俄研究取向趋于负面。2014 年乌克兰危机后，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特别报告明显反映出这一趋势。报告指出，克里米亚脱乌入俄是冷战结束后欧洲安全体系遭受的最大的地缘政治冲击，促使欧洲国家重新评估和调

^① Margarita Zavadskaya, Vladimir Gel'man, "Explaining Bad Governance in Russia: Institutions and Incentives", *PONARS Eurasia Policy Memos*, 2020, No.634,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20.

^② Ann-Mari Sätre, *The Politics of Poverty in Contemporary Russia*, Routledge, 2019.

^③ Markku Kangaspuro, "Back to normality in Russia's transformation – Demand on strong state and its consequences", in T. Oltenau, T. Spori, F. Jatiner, H. Asenbaum (eds.) *Osteuropa transformiert: Sozialismus, Demokratie und Utopie*, Springer, Wiesbaden, 2017.

整对俄政策和立场。报告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为对欧洲安全和稳定构成挑战，因此不能继续与其保持“正常”关系。在安全方面，欧洲国家需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包括北约增加在东欧国家的军事存在、举行联合演习、提高防御能力，以应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在经济方面，应寻求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提高能源供给多元化能力。在外交方面，仍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与俄罗斯的分歧，寻求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途径。报告主张对乌克兰危机进行政治经济竞争的认识和管理，通过包容性、合作性的欧洲-大西洋空间来管理东西方关系。^①在宏观探讨欧俄关系变化的过程中，学者们认为，俄罗斯从认知到政策的“攻击性”，都为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哥本哈根大学的学者拉斯姆斯·尼尔森（Rasmus Nilsson）认为，俄罗斯精英对西方持有复仇主义态度，强调西方的虚伪对俄罗斯的利益构成敌意，俄罗斯始终希望建立一个以自身为中心的“公正”的世界秩序，上述认知作用于对外政策，造成了政策的“攻击性”，包括对抗性立场，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批判，在邻近地区采取强硬的军事姿态，抵制西方推广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等。^②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本地区学者大多认为，深层次的差异和矛盾导致双边关系从合作走向恶化，俄罗斯与欧盟在地缘政治上有不同的利益和目标，俄罗斯倾向于维护自身在邻近地区的势力范围，欧盟则试图扩大其影响力和价值观；俄罗斯强调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欧盟强调人权、民主、法治；欧盟与俄罗斯在历史和文化上有不同背景，它们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和处理方式存在明显差异。这些深层次的差异和矛盾在乌克兰问题上集中爆发。^③

尽管乌克兰危机引发了对俄罗斯的负面认知，斯堪的纳维亚学者仍寻求在管控分歧和风险的基础上与俄罗斯进行合作，然而，俄乌冲突的爆发中断

① Henrik Boesen Lindbo Larsen, “Great Power Politics and the Ukrainian Crisis”, *DIIS Report*, 2014.

② Rasmus Nilsson, “Revanchism – Russians – Justice: Foreign Policy Perceptions in Russia”, Centre for military Studies,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2014.

③ Irina Busygina, *Russia-EU relations and the common neighborhood: coercion vs. authority*, Routledge, 2018; Valeria Stefania, “Quality of governance in the Eastern Partnership countries: the role of the EU, Russia and domestic conditions”, *Eastern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2020, Vol.11, Special Issue. Tuomas Forsberg, “Modernization of Russia’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M. Kivinen, B. G. Humphreys (eds.), *Russian Modernization: A New Paradigm.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Russia*, Routledge, 2021.

了这一进程。2022 年 2 月 16 日，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迈克·柯夫曼（Michael Kofman）在芬兰国防大学演讲时警告，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的大规模军事集结不是虚张声势，而是真实准备的行动。^①但对于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学者而言，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仍是出乎意料的，他们在反思中试图解释“俄罗斯为什么要这样做”，认为俄乌冲突实际上在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俄罗斯干预顿巴斯地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他们主张，西方没能在 2014 年阻止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三种误导性叙述促使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冷漠、闪烁其词合理化了：第一，乌克兰领土上的冲突是内战；第二，克里米亚是和平移交，而非战争行为；第三，军事干预是乌克兰和西方激怒莫斯科后被迫进行的。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行动是恢复自身对原苏联地区控制的长远战略规划的一部分，这项策略是精心策划的。他们进一步指出，《明斯克协议》是一纸空文，既没有解决乌克兰问题，也不能阻止俄罗斯。协议无视乌克兰主权，西方没有对俄施加明确压力，对协议的支持助长了俄罗斯违法行为的合理化，也成为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重要基础。^②

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学者在重新评估俄罗斯对外政策对国际秩序和欧洲安全影响的研究中，表现出强烈的不安和悲观情绪。他们将俄罗斯使用武力改变地缘政治边界的行为视为一种国际修正主义（international revisionism），是试图挑战 1945 年以来形成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包括国际法、国际机构和全球治理结构。而俄罗斯努力构建的新秩序是建立在基于力量和征服的等级制度逻辑之上的。^③俄罗斯将国际社会承认其对乌克兰

^① Michael Kofman, “Russian Maneuver Defenc and Their Concept of the Fragmented Batlefield”, *Russian Concept of War, Management and Use of Military Power*, Pentti Forsstrom ed., *Research Reports*, Finnish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2022, No.19.

^② Julia Kazdobin, Jakob Hedenskog, Andreas Umland, “Why the Russo-Ukrainian War Started Already in February 2014”, *SCEEUS Report*, 2024, No.2, <https://sceeus.se/en/publications/why-the-russo-ukrainian-war-started-already-in-february-2014/>; “Why the Donbas War Was Never Civil”, *SCEEUS Report*, 2024, No.6, <https://sceeus.se/en/publications/why-the-don-bas-war-was-never-civil/>; Andreas Umland, Hugo von Essen, “Why the Minsk Agreements Were Doomed from the Start and What Lessons They Teach”, *SCEEUS Report*, 2022, No.3, <https://sceeus.se/en/publications/russias-dictated-non-peace-for-ukraine-in-2014-2022/>

^③ Andreas Umland, “How Russia’s War Is Undermining World Order”, *SCEEUS Report*, 2024, No.4, <https://sceeus.se/en/publications/how-russias-war-is-undermining-world-order/>; Trine Flockhart, Elena A. Korosteleva, “War in Ukraine: Putin and the multi-order world”,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2022, Vol.43.

兰领土占领的合法化作为未来欧洲共同安全架构的最低要求，斯堪的纳维亚的学者们认为，欧盟和整个西方世界不可能接受这种要求，并强调，持续的敌对状态将导致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猜疑、敌意比冷战时期更加持久，长期脱钩不可避免。随着社会和文化交流进一步受到限制，将最终造成双方在政治和价值观上的矛盾继续扩大。^①特别军事行动引发了“传统遏制和威慑政策的回归，以及欧洲和跨大西洋团结的复兴。”^②斯堪的纳维亚学者呼吁，西方国家需要认真考虑大规模、高强度战争的可能性，在军事、地缘经济和技术遏制等方面加强对俄罗斯的政策协调，坚定支持乌克兰取得胜利的決心。但是，“援助不足的窘境难以支撑欧盟的策略”^③。他们主张从三方面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第一，强化现有的合作与支持措施，并将援助纳入欧盟和成员国的财政规划；第二，调整过时的政策和程序，扩大对俄制裁，引入允许乌克兰分阶段加入欧盟的程序，制定可行的安全协议；第三，创新国际合作和一体化模式，建立多机构捐助平台以协调和优化对乌克兰的援助。此外，要确保西方国家公众对援乌的支持，吸引私营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参与乌克兰重建。^④

俄乌冲突打破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维持中立平衡的希望。面对俄罗斯潜在威胁的增加，瑞典和芬兰意识到，现有的中立、不结盟政策和安全解决方案已经明显不足，需要通过集体安全联盟来保障国家安全，因而加入北约获得了国内民众压倒性的支持。^⑤

① Tyyne Karjalainen, Katariina Mustasilta, “War in Ukraine: The European Evolves as Putin Attacks”, *FIIA Report*, March 2022, <https://www.fiaa.fi/en/publication/war-in-ukraine?read>; Sergey Utkin, “A deep divide: The long-term EU-Russia decoupling”, November 9, 2023, <https://spectator.clingendael.org/en/publication/deep-divide-long-term-eu-russia-decoupling>

② Edward Hunter Christie, “Responding to Russian Aggression: Military Resolve, Geoeconomics, and Technological Containment”, *FIIA Report*, March 2022, https://www.fiaa.fi/wp-content/uploads/2022/03/comment6_responding-to-russian-aggression_military-resolve-geoeconomics-and-technological-containment_edward-hunter-christie.pdf

③ Tyyne Karjalainen, “EU Support for Ukraine: The Paradox of Insufficient Assistance”, *FIIA Report*, March 2024, <https://www.fiaa.fi/en/publication/eu-support-for-ukraine?read>

④ Andreas Umland, “How the West Can Help Ukraine: Three Strategies for Achieving a Ukrainian Victory and Rebirth”, *SCEEUS Report*, 2023, No.1, <https://www.ui.se/globalassets/ui.se-eng/publications/sceeu/how-the-west-can-help-ukraine-three-strategies-for-achieving-a-ukrainian-victory-and-rebirth.pdf>

⑤ Ilmari Ville August Käihkö, “Explaining the Finnish and Swedish Ascent to NATO”, *Social Anthropology*, 2023, Vol.31, No.2.

三、地区学者在外生冲击下对研究范式的探讨

欧美的区域国别研究是为了满足殖民扩张的需求而产生的，早期研究根植于殖民范式（colonial paradigm）。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殖民历史不像英国、法国那么长久，但大部分国家却有过作为其他帝国附庸的经历，这使得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兴趣来源于中小国家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应对超级大国潜在威胁的需求，因此，“了解苏联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①。冷战的终结不仅改变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对整体国际形势的认识，也对他们重新定义自身与俄罗斯、东欧地区的关系有着巨大的影响。“如何描述空间实体的边界和内容，不仅反映了对学科的自我认知，还揭示了研究资助机构的考量”^②。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学术界的研究通常在依靠公共支出维持的大学或研究机构中进行，因而决策者如何看待一个领域及其对国家利益的价值，对研究有着直接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建立稳定、合作的双边关系的目标促使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需要对俄罗斯有更多样化的了解。但是，在“如何使区域国别研究适应冷战之后的政治变化？”这一问题上出现了争议。在芬兰，年轻学者提出要摒弃“同情旧苏联政权”的惯性，主张俄罗斯、东欧研究的“后芬兰化”（post-Finlandisation），以批判性的态度关注新俄罗斯的转型进程。但老一辈学者却强调，如果放弃对苏联历史的研究，就无法研究任何当代问题，“分析调查中忽略广泛的时间比较角度，只会产生肤浅的表面知识”^③。这一争议一直持续到 2013—2014 年。是否支持西方对普京政权的“批判”被视为主要的评判标准，那些同情俄罗斯甚至是对俄罗斯的批评“过于温和”的研究者被视为“左派”。同时，争议也在推动反思，学者们意识到斯堪的纳维亚的俄罗斯、东欧研究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就受到欧盟规范性转型框架的影响和欧盟既定立场的限制，以至于研究并不充分。直到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才逐渐摆脱以西方为参照物的比较方法，转向以俄罗斯长期发展模

① Katalin Miklóssy,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with a Finnish Flavou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2015, Vol.23, No.1.

② Ibid.

③ Ibid.

式和本土概念为背景的研究范式。与此同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得到重视和推广。地区学者认为，使用跨学科方法，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能够更加细致地反映出来，避免了将事实过度简化而造成的理解偏差，也为研究范式转型提供了助力。

在争议和探讨还未有定论的时候，严重的外生冲击促使斯堪的纳维亚的俄罗斯、东欧研究面临新的调整。外部因素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造成的意外的、强烈的负面影响被称为“外生冲击”，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相对独特的机会。因为，外生冲击能够促使研究者识别和解释在长时间“正常条件下”被忽视或者解释不清的趋势和过程。^①大卫·英格曼 (David Engerman) 就曾指出，苏联学是冷战的副产品，口号是“了解你的敌人” (Know Your Enemy)，但后来建立起来的制度、思想、身份只有少部分与最初的起源相关。20 世纪 80 年代末，苏联学处于深度危机状态，与学科主流隔绝，但是苏联解体“催生了在苏联学废墟上崛起的俄罗斯研究。”^②俄乌冲突的外生冲击不亚于苏联解体，不同的是，苏联解体为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机会，而当前俄罗斯与西方社会的尖锐对立所导致的政治封闭，给田野调查和其他实证研究带来严重阻碍，许多西方与俄罗斯学者合作的学术框架已经过时，项目被迫中断或者取消。斯堪的纳维亚学者对俄罗斯、东欧研究未来的发展表现出一种复杂的心态：一方面，政府和私营机构对俄罗斯研究的兴趣再次增强，将会促进新的投入，产生新的学术进步；但另一方面，“了解你的敌人”的口号可能再次复活并影响研究的中立价值。

重新审视学术思想是全球俄罗斯、东欧研究学者正在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学术研究没能准确预测俄乌冲突及其对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剧烈影响，令俄罗斯、东欧研究学者陷入了一种集体性的知识危机，并掀起了反思浪潮。标志性事件是美国斯拉夫、欧亚和东欧研究协会 (ASEEES) 将 2023 年度主题确定为“去殖民化 (Decolonization)”，以及协会主席朱丽叶·琼森 (Juliet Johnson) 在协会年会发表的主旨演讲《去俄罗斯中心化：挑战与机遇》

① Richard Rosenfeld, “Studying Crime Trends: Normal Science and Exogenous Shocks”, *Criminology*, 2018, Vol.56, No.1.

② David Engerman, *Know Your Enemy: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s Soviet Exper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De-Centering Russia: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①美国斯拉夫、欧亚和东欧研究协会在公告中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导致人们广泛呼吁重新评估和转变该地区研究中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权力和等级关系（范式）。”^②琼森在发言中指出，传统研究围绕“大俄罗斯”叙事展开，会导致后苏联空间内其他民族和国家被边缘化，比如乌克兰。她强调，“去中心化（De-Centering）”不是停止研究俄罗斯，而是要放弃研究中将俄罗斯置于中心的特定理解，“后共产主义”和“后苏联”这两个概念在新形势下已不再适用。斯堪的纳维亚学者也就“后苏联”概念的适用性和研究范式转型进行了专门讨论，赫尔辛基大学亚历山大研究所为此专门组织了“后苏联研究：概念、惯例和妥协的危机”圆桌会议。对于“后苏联”概念的适用性，学者们一致持否定态度，认为苏联已经成为历史，但后苏联研究出于惰性仍在坚持研究对象的统一和研究方法的连续性，需要对这一空间进行重新定义。俄乌冲突标志着乌克兰研究已经脱离后苏联研究，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后苏联空间内的每一个国家需要平等对待。地区学者们还对后苏联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既定方法论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现有研究习惯于从西方理论范式中借用解释模型，简单移植到后苏联空间，并没有进行认真的批判性修订，以至于有时很难充分理解“后苏联进程”的具体情况。斯堪的纳维亚学者强调“后苏联研究的非殖民化”不应该简单等同于外围替代中心的研究路径，而是在重视外围的同时，考虑中心的权力影响。如果将殖民或帝国权力关系简单地套用，仍将陷于西方化的后殖民分析窠臼，“借用非殖民化方法没有错，但需要批判性地借用”^③。关于研究范式转型的讨论仍将持续，但斯堪的纳维亚学者对摒弃简单套用西方（主要是美国、英国^④）理论解释俄罗斯现象的主张具有共识。他们试图通过寻找新的研究重点和方法来应对外生冲击造成的智力和制度挑战。

^① Juliet Johnson, “De-Centering Russia: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SEES 2023 President’s Address, December 2023, <http://www.web19b.aseees.pitt.edu/news-events/aseees-blog-feed/2023-presidents-address-de-centering-russia-challenges-and>

^② “2023 ASEES Convention Theme”, *Convention of ASEES*, January 15, 2023, <https://aseees.org/convention/2023-convention/2023-aseees-convention-theme/>

^③ 会议讨论的详细内容参见 Marianna Muravyeva, “Post-Soviet Studies: Crisis of Concepts, Conventions, and Compromises”, *Laboratorium*, 2023, Vol.15, No.2.

^④ 同上。

四、结 论

2014—2024 年是冷战结束之后全球俄罗斯、东欧研究重振、反思和转型发展的十年。西方与俄罗斯关系从恶化到对立，不仅增加了对专业知识的需求，还推动了俄罗斯、东欧研究议题和方法的转变。斯堪的纳维亚学术群体虽并未处于全球俄罗斯、东欧研究的中心，但其发展和成就却十分亮眼。在政府投入持续增加的条件下，斯堪的纳维亚的俄罗斯、东欧研究机构和专门性研究人员延续了苏联解体以来稳步增长的态势；研究型教育的制度化不断加强，不但培养研究生的机构数量增加，针对本科生的相关语言、文化、历史、地理等课程也明显增多。学术群体规模增大带动了学术产出的增加和研究质量的提升，对于研究议题和方法的思考逐渐深入，学术特色也进一步凸显。

斯堪的纳维亚的俄罗斯、东欧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中观层面。相对于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大国，瑞典、挪威、丹麦、芬兰无论在体量还是影响力方面都是中小国家，缺乏全球层面战略考量的需求。因为主要目标和利益在于维护本国和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所以他们更加关注俄罗斯与欧盟、与邻国的关系，特别是与波罗的海国家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波罗的海三国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有着密切的历史、文化联系，而且从地缘上，波罗的海国家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重要缓冲区。作为北极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俄罗斯在北极地区划界和资源开发上存在争议，因而更加关注俄罗斯的北极战略以及相关的能源、通道等问题。在关注俄罗斯国家发展的同时，注重毗邻边境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斯堪的纳维亚学界注重跨学科、综合性研究。苏联解体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培养的第一代研究人员接受的是传统学科性思维训练，在区域国别研究实践中因缺少综合性知识，难以分析处理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所以，跨学科思维在斯堪的纳维亚的俄罗斯、东欧研究中得到重视和推广，作为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主要手段：一方面，通过项目形式将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集中到具体的俄罗斯、东欧研究问题下，通过灵活组合实现对具体问题的跨学科研究；另一方面，注重培养具有跨学科背景的俄罗斯、东欧研究人

才，在提高语言能力的同时，更加重视对俄罗斯、东欧国家历史、文化、地理、政治、经济等多领域知识的学习。

斯堪的纳维亚学界在方法上注重对西方主流范式的批判性吸收。从冷战到后冷战，从苏联学到转型学，美国和英国一直是俄罗斯、东欧研究范式的引领者。斯堪的纳维亚的俄罗斯、东欧研究学者从概念到方法基本与美英保持一致，但又能根据本地区的特点和利益诉求保持对主流范式的审慎态度，以形成符合本地区实际的研究路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作为欧洲大陆的延伸，虽然在精神和文化传统上与大陆国家、英国、美国系出同源，但在学科领域总能产生独树一帜的学派，如社会学法学派分支的斯堪的纳维亚法学派，注重宏观经济、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斯德哥尔摩经济学派，植物生态学的北欧学派，以及和平学的北欧学派。这种相对的独立性，在俄罗斯、东欧研究领域表现为排斥美英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标签式方法，追求对于问题或者现象的整体性认识。

在地缘政治变化的冲击下，相较于西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对安全威胁的感知更为敏锐，瑞典和芬兰甚至改变了长期以来奉行的中立政策。在安全、政治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斯堪的纳维亚的俄罗斯、东欧研究与欧美一样面临着概念、方法、议题等一系列调整，是否能催生出更具特色的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东欧研究仍有待观察。但作为一支快速壮大的研究力量，值得学界继续关注。

【 Abstract 】 The field of Russian and Eastern European studies in Scandinavian academia has not declined following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rather, it has shown growth, supported by increased governmental investment. Since the 2014 Ukraine crisis, external geopolitical shocks have led to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region’s research agenda and thematic distribution, accompanied by a critical reassessment of existing research methodologies. The ongoing deterioration and even decoupling of Russia-European relations have prompted Scandinavian scholars to focus more on Russia’s political system characteristics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overshadowing economic topics. This shift forms the basis for a reevaluation of future relations with Russia. Scandinavian scholars generally hold a negative perception of Russia, which has intensified after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emphasizing the need to guard against potential Russian threats. Regarding the American academic calls for “decolon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Russian studies, scholars in this region adopt a cautious approach, aiming to develop a research paradigm tailored to regional needs through critical assimilation, thus avoiding distortions that may arise from simply applying external models. Scandinavian research on Russia and Eastern Europe continues to undergo structural adjustments and reflection, maintaining an overall trend of growth and prosperity. However, further observation and study are needed to understand the emergence of more distinctive regional achievements.

【 Key Words 】 Scandinavia, Russian and Eastern European Studies, Theme and Method, Structural Adjustment, the Ukraine Crisis

【 Аннотация 】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оссии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в скандинавских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х кругах не пришли в упадок с распадом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а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ли тенденцию развития при поддержке увелич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инвестиций. После начала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в 2014 году, из-за экзогенного влияния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зменени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ая повестка и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тем в регионе претерпели структур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 этим проводились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и обсуждение существующих методо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родолжающееся ухудшение и даже разрыв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ЕС побудили скандинавские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е круги уделять больше внимания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м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и логике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че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вопросам, и на этом основании переоценить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отношений ЕС с Россией. Скандинавские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е круги в целом негативно воспринимают Россию и после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стали уделять больше внимания защите от потенциальных угроз со стороны Росси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деколонизации» и «децентрализ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пропагандируемых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и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ми кругами, учёные региона проявляют осторожность и настаивают н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ой парадигмы, отвечающей потребностям региона, на основе критического поглощения с целью избежать предвзятости, вызванной простыми соображениями. Скандинавия продолжает осуществлять структурные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и и переоценку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России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и по-прежнему демонстрирует общую тенденцию процветания и роста в данной сфере,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более характерных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достижений требует дальнейшего наблюдения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кандинав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оссии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темы и методы, структурная перестройка, укра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责任编辑 崔 珩）

区域国别研究的日本进路 ——兼论日本的俄罗斯研究

邱宇鹏 阎德学*

【内容提要】日本区域国别研究发端于明治维新时期。二战结束后，特别是经过冷战时期的学术发展，这一研究逐渐形成完备的体系，并在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随着时代的需求不断得到调整与更新。通过对日本区域国别研究发展历程的分析，可以揭示出其从服务殖民扩张到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学科转型过程，同时也梳理出日本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范式与典型特征。日本区域国别研究通过实地考察、跨学科融合、多语种研究等方法，在不同地区和领域内取得显著成就。比如，在俄苏研究、中国研究、美国研究、中东研究以及非洲研究等领域，日本学界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研究范式，特别是“斯拉夫-欧亚学”、“中国学”等研究，在全球区域国别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日本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路径和学科建设经验，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日本区域国别研究 斯拉夫-欧亚学 中国学 区域国别学

【中图分类号】D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4)05-0110(26)

随着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各国之间的互动日益频繁，区域国别研究逐渐成为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影响力及其发展路径的关键领域。特别是在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如何有效理解并应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成为全球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重要挑战。区域国别研究不仅在学术界占据着重要地位，也

* 邱宇鹏，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阎德学，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可为各国决策层在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时，提供理论支持和实际应用的依据。

作为东亚地区的重要国家，日本的区域国别研究具有特别的历史发展轨迹。二战结束后，日本不仅在经济、科技领域迅速崛起，其学术研究，尤其是区域国别研究也取得显著成就。日本区域国别研究通过多学科交叉、实地调查和多语种研究等方法，逐渐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框架与研究范式，不仅涵盖东亚、斯拉夫-欧亚学等领域，还涉及美国研究、中东研究和非洲研究等广泛领域，展现出较强的跨文化理解与国际化视野。因此，对日本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历史、学科特点进行系统梳理，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践意义。

对于日本的区域国别研究，国内学界已有研究进行了总结梳理，^①而主要局限在于，在日本区域国别研究整体学科体系的演进与发展方面，还需要更加系统且全面的梳理，包括对具体研究范式等内容的探讨；跨学科研究方法虽被广泛提及，但其具体的实施路径和理论依据仍需要进一步探讨。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种跨学科的方法，不仅限于对特定区域的描述，更应深入分析对象区域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复杂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所做的工作尝试对日本区域国别研究体系的相关内容进行一些补足，通过对日本区域国别研究的历史演进、学科体系及跨学科方法的深入探讨，增进理解日本区域国别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路径，作为我国在构建自己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时的有益借鉴。

一、日本区域国别研究的历史演进

日本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大致可分为几个主要发展阶段。最初阶段始于明治维新时期，研究以学习和模仿西方制度为主，与日本近代化的发展进程

^① 参见杨波、张帆、江时学等：“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形势、路径与国际视野”，《国际观察》，2023年第1期，第127-156页；初晓波：“日本地区研究的论争与发展”，《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5期，第50-64页；于铁军：“日本特色的地区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5期，第35-49页；国分良成等主编：《日本国际政治学（第三卷）：地区研究与国际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相伴随。随后在帝国主义扩张时期，研究重点转向对亚洲及其他殖民地的田野调查，以服务日本的殖民政策和扩张目标。二战后，日本的区域研究受到美国学术体系的影响，各大区域研究中心相继成立，推动了跨学科的区域研究的发展。冷战结束前期到 21 世纪初期，日本区域国别研究不仅继续深化，也开始回应全球化和冷战结束后的新世界格局，关注全球性问题和跨区域的多层次互动。总体来看，日本区域国别研究呈现出逐渐从本土走向世界、从单一学科到跨学科、从服务殖民战略到应对全球性问题的特征。在这一过程中，研究的视野和方法不断丰富，内容和重点也随着时代的需求而不断调整与更新。

如果不将更早的汉学研究涵括在内，日本的区域国别研究可以追溯至江户时代末期至明治时代初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近代化过程也是其“区域国别研究”的实践过程。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东亚地区的入侵对日本安全构成威胁，许多政府官员以及各种类型的政府资助的学者和留学生纷纷前往西欧和北美进行“实地考察”，目的是了解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和西方文化的精髓，并确保日本在 19 世纪末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开始逐渐接受西方文化，并将西方文化视为先进文化。在出国进行“实地考察”的过程中，日本学者与官员也访问了亚洲与非洲的部分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鄙夷与对西方的崇拜形成了强烈对比。比如，被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的福泽谕吉也在出使成员之列，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表现出对于埃及社会的贫穷和不发达的蔑视。^①随着这一进程的发展，日本很快就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西方的知识和方法具有现代和普遍的特征，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传统有着根本的不同。作为舶来品的西方文化在日本逐渐被接受，一方面，日本的知识体系被西方思想同化，另一方面，日本传统的思想却被“东方化”，成为“异质”的存在。^②这在语言上也有所体现，例如，日语“洋学”一词（意为“西方研究”）几乎从日常用语中消失，而在明治维新前后，曾被广泛使用。为了尽快培养出官僚、技术专家和学术精

① 福泽谕吉「西航記」、『福泽谕吉全集 第 19 卷』、岩波書店、1971 年、6—65 頁。

② 三浦研一：“二战后日本国际关系理论的演进——从‘双重输入’理论到‘中和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 10 期，第 43 页。

英，掌握使日本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所需的现代科学和技术知识，^①日本开始在制度上建立起对西方知识的规范化体系，建立了以西方为参照的教育体系和课程，尤其是由国家主导的大学系统。

出于殖民统治的需要，19世纪末甲午战后，日本田野研究的对象从发达的西方转向了亚洲，即日本帝国主义试图扩张领土的那些地区。特别是在甲午战争至二战结束期间，具有政策导向的区域研究项目在南满铁路调查部（日本在“满洲”和东亚地区的殖民政策情报机构）、东亚研究所（设立于内阁计划委员会下）、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得到了推进。在这一阶段，日本关于“海外”地区的研究分为两种类型：对欧洲和美国（世界政治中的主要力量）的国际关系研究，以及对亚洲、中东和非洲（殖民扩张的目标）的区域研究，与当时欧洲的东方学研究有着类似的目的。

19世纪末至二战结束前期，日本的区域研究在多方面有了发展，并为其殖民扩张服务。当时，日本政府开始资助专注于非西方文化和社会的学术性“区域研究”。东京外国语大学作为一所由政府开办的语言培训学校，成立于1873年，最初的课程只包括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和汉语。1880年，正值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干预行动开始之际，朝鲜语也被添加到课程之中。到了1911年，课程又增加了蒙古语、泰语、马来语、印地语和泰米尔语。1919年，专门致力于文化、贸易和发展的学院也开始设立，对应每个相应的领域。后来，东京帝国大学东方研究所成立。该研究所自日本1937年入侵中国时开始规划，1941年正式运作。研究所内部模仿大学机构设置了不同的部门（即哲学、文学、历史、法律与政治以及经济与商业），并按照部门借调研究人员。很难确定该研究所及其工作人员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具体参与到何种程度，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日本对殖民侵略所作的准备。此外，日俄战争结束后，《朴次茅斯和约》签订的第二年，日本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初任总裁是后藤新平。后藤新平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内部设立了“满铁调查部”，成为二战期间日本最大的智囊机构。“满铁调查部”名义上进行普通的调查工作，实际上则是情报收集机关，对中国东北的政治、

^① See I. P. Hall, "Organizational Paralysis: The Case of Today", in E. F. Vogel(ed.), *Modern Japanese Organiz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p.304-330.

经济、地形等情报均进行调查收集。随着日本入侵中国，满铁调查部也展开了对中国的全面研究调查。

出于殖民扩张目的，日本当时还针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进行研究。因为 20 世纪初来自中亚的鞑靼人穆斯林开始作为政治流亡者或传教士从俄罗斯逃往日本。^①日本帝国陆军考虑利用日本的穆斯林网络，通过加强与穆斯林的联系对抗苏联，动员维吾尔穆斯林作为对抗中国当局的间谍，并在日本占领下征服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穆斯林，以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当鞑靼人于 1938 年在东京建立东京清真寺时，泛亚主义和右翼民族主义领导人头山满也出席了开幕式。

到了二战之后，在战后知识真空的状态中，日本的学科体系极大地依靠美国而存在。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阻碍因素，但在战后的日本大学环境中，区域研究并非完全缺席。在 20 世纪 50 年代，这类知识的主要渠道是个别学者利用图书馆资源对世界特定领域进行研究，因为几乎没有财政资源支持海外实地考察。但也有少部分从战场回到大学的年轻人前往美国留学，他们被与日本大相径庭的美国知识环境所震惊和折服，并努力从中汲取营养。这批人回国后，开始向大学及研究机构传递美国式学术风格，地区研究也是其中之一。美国式的区域研究自此开始在日本迅速传播。

1955 年，北海道大学成立了斯拉夫与欧亚研究中心；1958 年，亚洲经济研究所和同志社大学美国研究所也相继成立；1959 年，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诞生。1963 年，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京都大学成立了东南亚研究中心，从“美国式”的角度来看，该中心的成立至关重要。该研究中心专注于“东南亚现代化”的跨学科综合研究，进行包括实地调查在内的研究计划，同时还开展旨在培养研究人员的地区研究培训计划，重点是派遣研究人员前往东南亚进行语言学习和研究。^②但也正是由于美国式学科体系与知识的影响，日本的区域研究发展在这一阶段无法脱离美国的政治战略关切。冷战期间，包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与欧亚研究中心在内，有日本外务省背景的欧亚

① H. Tanada, “Islamic Research Institutes in Wartime Japan Introductory Investigation of the ‘Deposited Materials by the Dai-Nippon Kaikyo Kyokai (Greater Japan Muslim League)’”, *Annals of Japan Association for Middle East Studies (AJAMES)*, 2013, No.28, pp.85-106.

② Ibid.

协会，以及 1959 年设立的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都承担了针对苏联的研究任务。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也曾成为学生和教师抗议的对象，理由是它被指控为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出了力。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アジア経済研究所，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的发展则更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总体趋势。该研究所与当时强调与非共产主义东南亚国家建立商业联系的日本外交政策密切相关。作为日本通产省下属研究机构（现下属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动员了相当一部分日本著名学者进行研究活动。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美元地位的迅速下降以及日元地位的迅速上升，1985 年《广场协议》后日本企业被迫向海外发展。来到日本的外国留学生，特别是亚洲各国的留学生急剧增加，单纯的劳工也开始大量流入日本，“国际化”成为当时在日本出现最多的词汇。日本人在海外的生活状况及日本社会如何应对来日外国人等，都成为广泛议论的话题。崛起的日本在“国际化”的推动下，对地区研究、国际关系教育等需求迅速扩大。^①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三个方面的变化使得区域国别研究在日本国内显得愈发重要。首先是国际体系的变化，其中包括日本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变化。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体系变化带来的冲击呈现出区域化和地方化的特征，放松管制的市场力量使得商品、信息和人口的流动日益全球化。这一发展对日本来说尤为重要，日本稳定的经济增长和不断扩大的贸易和投资，使其在国际上迅速提升到“经济大国”的地位。此前，日本被动地追随美国，但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日本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以及外部压力的增加，日本谋求发挥更大的国际政治作用。

特别是第一次伊拉克战争之后，日本开始在全球热点地区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日本官员开始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重要角色，例如国际关系学者绪方贞子被选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联合国副秘书长明石康参与监督柬埔寨和南斯拉夫冲突的国际调解活动。在参与国际事务的过程中，日本官员发现并不熟悉自己所涉足的相关地区，开始意识到有必要在国内生产有关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知识。

^① 国分良成：“地区研究与国际政治”，载国分良成等主编：《日本国际政治学（第三卷）：地区研究与国际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0-11 页。

其次，日本国内的大学制度也开始变革，变相促进了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当时大学教育的关键词可概括为“提升、多样化和个性化”，以及大学管理的“效率、问责制、重组和精简”。^①改革前，日本大学教育的“讲座制”存在诸多僵化的问题，包括教师流动性低、研究团队较为封闭、学术“同型繁殖”严重等，教育制度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这些弊端并促进了跨学科工作发展。

最后，冷战结束与全球化浪潮也给日本带来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新思考。美国学界在冷战后围绕世界秩序展开的争论也冲击着日本学界。如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提出，“由于冷战的结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体制的失败，而自由民主主义及资本主义制度获得了历史性的最终胜利，从历史哲学的观点宣告了‘历史的终结’”^②。而亨廷顿则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否定了福山的观点，认为世界上价值观存在明显差异，并预测将来的世界将分裂为几种文明。^③这些争论被熟悉西方的日本学者带到了日本学界。平野健一郎的评价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地区研究学者长期享受的“沉溺于特定地区研究的欢愉”、“迷恋于研究对象的快乐”等“特权”正在丧失，追求全局性、多层性、跨境性的国际社会结构为地区研究开辟了从个别性向普遍性发展的道路。^④日本的区域国别研究学界也开始更多地关注超越国家与地区界限的全球性问题，例如全球温室效应加剧问题，能源争夺问题，与国际金融体系不稳定有关的一些问题，各类歧视与贫困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交易和转移问题，走私问题，艾滋病、非典、禽流感、疟疾等全球性传染病问题，毒品与犯罪问题，以及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

日本的区域国别研究在进入 21 世纪之后得到了更多的重视，逐步发展，规模也有所扩大。从 2003 年开始，日本的区域国别研究被列入科学研究费

① I. Akihiro,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in Perspective: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Higher Education*, 2002, Vol.43, No.1, pp.7-25.

② F.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③ S.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④ 平野健一郎「グローバル化時代の地域研究——特権性の喪失」、西村成雄、田中仁編『現代中国地域研究の新たな視圏』、世界思想社教学社、2007 年、16—29 頁。

助成事业目录，作为复合新领域学科下的一个单独分项。^①相关课题立项在这期间也开始大量增加，2003年至2024年4月，共有2469个项目获得资助，多于同期相近领域其他学科（如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等）。^②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大型研究项目，以推动学科发展。2002年至2009年，文部科学省首先推出了一项多学科、全方位的研究和教育计划“21世纪COE项目”（21世紀COEプログラム）。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包括北海道大学的“斯拉夫-欧亚学的构建”、早稻田大学的“现代亚洲学的创建”、爱知大学的“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京都大学的“引领世界的综合性区域研究中心的创建”等多个项目得到了支持。日本政府希望借此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与研究机构，培养优秀的年轻学者，开拓新的学术领域，并提高学科整体研究水平。2006年至2015年，又推出了后续计划“全球COE项目”（グローバルCOEプログラム），早稻田大学的“为整合亚洲地区而培养世界型的人才基地”、北海道大学的“边境研究的基地建设”和京都大学的“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研究基地建设”等项目入选。这些大学中相应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也在政府的扶持下不断完善，在各自的研究领域确立了学术研究的权威地位。到2022年，文部科学省下属的国家人类文化研究机构推出了研究网络型基础研究项目“全球区域研究推进项目”，其中包括四个区域研究子项目：全球地中海地区研究、环印度洋地区研究、亚洲和大洋洲海域研究和东欧亚研究。由东京外国语大学、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北海道大学、大阪大学等多个日本顶尖高校的相关研究院承担各个子项目中的课题。日本学界认为，在现代全球化和无边界的背景下，传统的仅关注既存“地区”并阐明其基本特征和结构的研究已不再可行。同时，新形式的民族主义的高涨以及对地区固有性（地区内部特有的身份和文化认同等）的再发现和再创造的动向也在变得活跃，对全球化

① 日本的研究经费按经费类别主要分为竞争性科研经费和国家分配给各独立行政机构的经费。日本科学研究费助成事业（日语称“科学研究費助成事業”）设立于1939年，是日本最大的竞争性经费项目，占全部竞争性经费的一半，主要对人文、社会、自然科学全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和先驱性的基础和应用研究进行资助。区域国别研究（日语称“地域研究”）在2003年首次被列入资助目录。

② 科学研究費助成事業データベース（KAKEN）「研究課題をさがす」、<https://kaken.nii.ac.jp/ja/index/>

产生了重大影响。以往对全球化的理解常常将“市场化”或“民主化”等全球化力量视为来自地区之外的因素，并暗含地区是被动接受这些力量而发生变化的认识。然而，全球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联正在从地区的角度发生转变和被重新审视。未来的地区研究需揭示全球与地区之间的动态相关性。因此，日本试图通过启动“全球地区研究”项目，通过比较和关联的视角，来推进对全球秩序构建以及变革机制的理解，并开展探索超越后殖民地区形象的相关研究。^①

二、日本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范式

（一）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日本的区域国别研究十分注重实地考察。实地考察可以为研究人员提供直接观察和体验当地环境的机会。通过实际参与和观察当地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和社会活动，研究人员能够获得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通常比单纯依赖文献或统计数据更加生动和具体。在进行定性研究时，考察人员通过访谈、问卷调查、参与观察等手段直接与研究对象互动，这些互动能够提供无法通过二手资料获得的细节。日本区域国别学界在实地考察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如亚洲经济研究所早在 1960 年就已经开始开展亚洲地区调查研究项目（アジア地域等の調査研究等事業）并延续至今，通过访问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进行移民、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在此过程中，不仅收集了当地资料，还为两地之间的文化互动和合作提供了平台。实地考察成为文化理解与外交沟通的一种方式。如在俄苏研究领域，日本知名学者松里公孝为了研究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地方政治、投票地理学、地方政党政治、后苏联空间内的“不被承认的国家”等问题，常年前往原苏联地区档案馆查阅资料，并走访原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当地民众、学者和政府官员，他对当地实际情况的观察以及第一手细节资料的积累，最终确保了课题研究的质量与深度。

① 人間文化研究機構「『グローバル地域研究推進事業』基本計画」、2022 年、https://www.nihu.jp/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MasterPlan_4thNetworkBased_01.pdf

日本的区域国别研究还注重将田野调查与学科知识相结合,从更全面的角度对研究对象(区域)进行分析。山口博一在其著作《区域研究论》中指出,要成为一名区域研究者,除了学科知识之外,还需要一套工具,即“对该区域的关注和共鸣、在地的生活经历、地域感、与当地朋友和熟人的关系,以及对历史和习俗的了解、语言能力等。”他将这些与特定区域相关的知识称为“基础知识”。^①比如在研究特定国家的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时,一方面,可以基于统计分析和微观经济学方法收集数据并进行宏观层面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以基于田野调查或是人类学方法等进行实地考察的研究。为了深入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需要从多个视角观察它。通过村庄视角、地区视角、国家视角、跨国的区域视角、全球视角等多层次的反复观察,逐渐加深理解。还有,通过深入实地进行对象调查,或使用政治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从外部观察,对各类数据进行分析比较,这些都是加深理解对象国家或地区的重要过程。此外,与语言和文化相关的基础知识有助于从微观到宏观(国家)层面的理解,而与“学科”相关的专业知识则有助于培养区域和全球的整体视角。为了获得多层次的视角,学科知识和基础知识的结合是必不可少的。

日本区域国别学界非常重视资料的积累工作,为学术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譬如,北海道大学斯拉夫与欧亚研究中心的藏书,不仅推进了该中心学者的学术研究,还为日本的斯拉夫-欧亚研究者系统收集了资料与数据,也为日本各地和世界范围的专家提供了方便,获得了高度好评。根据其官网统计,该中心约有12.3万册图书,其中约11.6万册为外文图书,4.6万份缩微文献(几乎都是外文),1365种报纸和期刊出版物(外文1261种),其中包含大量有关俄国革命、日俄战争、共产国际问题的珍贵史料,以及以乌克兰语言学为中心、可以填补斯拉夫文献学空白的资料等。^②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同样如此,截至目前,收有中文藏书348707本、中文期刊2921册,其中包括汉籍十万余册,大部分是古珍本和善本,并设有专门的影像资料库。包括英语、日语、韩语、阿拉伯语等亚洲主要语种以及孟

① 山口博一『地域研究論』、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91年。

② 北海道大学附属図書館「スラブ—ユーラシア研究センター図書室：所蔵資料概要」、<http://www.lib.Hokudai.ac.jp/slv/collection-outline/>

加拉语、泰米尔语、藏语等小语种在内的藏书更是达到七十万余册，且大部分都有电子版本，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些库藏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靠、系统、可持续的资料支撑。

（二）研究内容

日本的区域国别学界在一些特定国家或区域研究领域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研究内容。总体来看，日本在“斯拉夫-欧亚学”、“中国学”以及对美国、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研究中，展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路径，结合了历史的传承与现实的需要，形成了有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日本区域国别学在传统区域划分的基础上，通过跨学科、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不断拓展对各个地区的理解，体现了对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动态变化的深入分析能力。以下将详细探讨各区域研究的特点与研究内容，以揭示这些研究所形成的深度、多样性和跨学科融合的方法论，及其反映出的日本特有的地区观——即在保持对具体地区细致研究的同时，强调其与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动态的密切联系，力求从多维度揭示各区域的独特性与普遍性。

1. 日本的斯拉夫-欧亚学

起初，苏联解体和欧洲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使得许多日本的斯拉夫研究专家失去了明确的研究对象和身份认同。北海道大学斯拉夫与欧亚研究中心（SRC）作为研究苏联和东欧地区的重要机构，面临着重新定义研究对象及研究意义的挑战，该中心的研究所地位及资金支持都受到了质疑。然而，这场危机也为重新定位带来了机遇。该研究中心的成员认识到：事实上，在苏联解体后，苏联和东欧国家与邻近地区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重要。过去的共产主义国家受到多种文化、政治和经济影响的冲击。不仅现实边界被重新划定，生活在该地区的人们的意识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该研究中心将这一重新塑造的区域称为“斯拉夫-欧亚地区”（スラブ・ユーラシア地域），并使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这一转型的、动态的研究领域，称之为“斯拉夫-欧亚学”（スラブ・ユーラシア学）。

在传统的地区研究领域中可以看见，日本区域国别学者认为过去的地区划分已失去了分析价值。诸如“斯拉夫-欧亚地区”、“东亚”、“南亚”、“中东”等空间划分已不足以分析日益全球化的国家和社会。地区研究需要

重新审视，并且应该吸纳其他学科的前瞻性成果，因为这些成果综合了国际法、政治地理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与文化、性别研究等多个学科的知识。日本的斯拉夫-欧亚学尝试通过跨地区、跨学科和比较研究的路径，将普遍性、全球化以及毗邻地区的诸多因素一并纳入研究范围后再加以综合分析，并同时关注“斯拉夫-欧亚区域”内发生的事件对外部世界的影响。^①

日本的斯拉夫-欧亚学也包括多方面的研究内容，如经济研究、政治研究、历史研究等，从不同方面的研究中观察斯拉夫-欧亚学的特点。

在经济研究方面，日本与美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之间有一个显著的差异。随着东西方冲突的结束，美国和西欧国家的政府（特别是情报和国防部门）大幅削减了对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研究的资金，因为这些国家不再被视为“敌人”。然而在日本，情况恰恰相反。由于日本政府希望推动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型，并且公众对这一转型的关注度很高，因此研究这些地区经济的学者从各个部门获得了更多的资金支持，并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展了包括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部门的研究、独联体框架下的区域一体化、劳动力市场、移民和养老金制度等一系列的研究，还建立了一个有关俄罗斯的涵盖从历史到现当代数据的数据库。

日本针对原苏联东欧地区的经济研究特点鲜明，其中，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始终占主导地位，研究成果和出版物集中在公司和土地的所有权、寡头政治、非生产性资产的收益以及企业管理实践等主题方面。而且，日本的研究以对特定制度或机构的某些方面进行详尽的分析而闻名，例如税收制度、补贴、财政转移或养老金制度，表明日本对制度经济学的关注度在增加。日本经济学家在统计分析方面也有出色表现，不仅仅是在计量经济学领域。他们非常关注细节以及计算和调查方法。日本专家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关于后苏联经济体的文章数量非常多。譬如，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部门对 GDP 的实际贡献的最初估算就是日本学者提出的。他们发现，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中的部分增值在贸易和运输部门被计为利润。此外，日本学界在地区主要经济体的比较研究方面也有重要贡献。曾经由日本文部省资助的“欧亚地区主要

^① 阎德学：《冷战后日本的俄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24页。

大国的比较研究”项目，对欧亚大陆的主要大国（包括俄罗斯、中国、印度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比较分析。

在“斯拉夫-欧亚地区”的政治学研究中，社会主义时期和后社会主义时期之间存在显著的断裂。在转型之前，大多数日本东欧研究学者的政治分析集中于苏联的政治史，特别是从十月革命到斯大林领导的时期。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行为主义革命”在美国政治学界的影响几乎没有传到日本，日本的政治学更多受到德国国家学的影响，后者更关注政治制度、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史，而非当代政治动态。其次，区域研究在日本更多的是以历史学为主导。苏联和俄罗斯问题专家皆川修吾和研究社会主义东欧国家政治的伊东孝之，是少数几位关注后社会主义时期政治的学者。在许多欧亚国家发生政权更迭后，日本政治学者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分析这些国家的政治局势，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始进入日本的政治学领域。新一代学者，如松里公孝、宇山智彦和大串敦，开始从比较的角度分析俄罗斯和其他后苏联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其他学者如林忠行、平田武、中田瑞穗和仙石学则主要研究政治制度、政党、选举以及经济和社会政策。近期的一些研究更侧重于使用统计学技能，并结合实地研究的方法，来分析东欧的政治。另外，传统的政治历史研究也得以延续。随着档案的开放和曾经的机密材料的解密，这一领域的研究得到了新的推动。

在历史研究方面，日本斯拉夫-欧亚学界呈现出多样、深入和进一步发散的特点。研究主题尤其多样化，不易加以概括。历史学领域的“帝国转向”（imperial turn）对日本历史学者产生了影响，尽管在冷战时期形成的稳固的制度和史学结构依然存在。革命时期的俄罗斯和苏联，特别是作为社会变革载体的农民，一直是日本历史学者的研究中心。这一兴趣也延续到了对沙俄帝国的研究中。由于日本学术界倾向于将斯拉夫人主导的“深层俄罗斯”视为单一文化，因此，对俄罗斯多民族历史的研究往往被当作社会运动史来处理。比如，丰川浩一研究了 18 世纪巴什基尔人的起义，^①西山克典则研究

① 参见豊川浩一『ロシア帝国民族統合史の研究：植民政策とバシキール人』、北海道大学出版会、2006 年。豊川浩一「ロシア史における民族史研究の意味と問題—バシキール史研究と M. K. リュバーフスキー」、『歴史学研究』第 946 号、2016 年、44—54 頁。

了乌拉尔南部和哈萨克草原的革命运动。^①

在苏联改革时期和南斯拉夫解体期间，这些国家内部的族群冲突、民族独立与自治运动等现象变得突出，日本学者对民族主义和帝国的研究兴趣大增，他们前往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档案馆和地方档案馆进行研究。这种对民族特性的迷恋使得几乎每一个原苏联或东欧的主体民族，甚至是较小的民族，都有了研究该民族的日本专家，并且他们都具备相应的语言能力。尽管日本学界总体上对宗教的兴趣并不强烈，但仍然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东正教（包括旧信徒）、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专家。日本学者松里公孝通过一些有影响力的研究，主要涉及乌克兰右岸地区和总督辖区等，使日本学界在国际帝国研究领域占据一席之地。^②以小松久男和宇山智彦为首的一些学者则致力于中亚、高加索和伏尔加-乌拉尔地区的研究，揭示了许多斯拉夫—欧亚地区中非俄罗斯的声音，从而阐明了俄罗斯及苏联作为帝国的角色。^③

随着帝国转向和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加强，日本历史学家不再孤立地看待俄罗斯及其所谓的自给自足道路，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欧洲、亚洲和全球背景之下。国家主义研究的深入使得桥本伸也的关于教育的社会史研究变得至关重要，这些研究帮助理解了广泛的泛欧洲文化环境中等级、民族和宗教特性的复杂互动。^④长绳宣博则重新评估了革命前鞑靼文献在伏尔加-乌拉尔地区的作用，揭示了国家与穆斯林臣民之间的公共领域，以及跨帝国的穆

① 参见西山克典『ロシア革命と東方辺境地域：帝国秩序からの自立を求めて』、北海道大学出版会、2002年。

② 参见松里公孝「19世紀から20世紀初頭にかけての右岸ウクライナにおけるポーランド・ファクター」、『スラヴ研究』第45号、1998年、101—138頁。「右岸ウクライナにおけるゼムストヴォ問題 1864—1906：ポーランド系貴族、総督、帝国政府」、『ロシア史研究』第68号、2001年、7—25頁。

③ 参见小松久男『革命の中央アジア あるジャディードの肖像(中東イスラム世界7)』、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小松久男「中央アジア地域研究の試み—ソ連時代の記憶を中心に」、『学術の動向』第19巻第8号、2014年、54—58頁。宇山智彦「カザフスタンにおける民族間関係：1986～93年」、『国際政治』第193巻第104号、1993年、117-135頁。宇山智彦「ペレストロイカ期中央アジアにおける共和国の自立と民族問題の関係」、『国際政治』第202巻第201号、2020年、98—113頁。

④ 参见橋本伸也「啓蒙と専制：ロシアにおける大学の社会文化史からの展開」、『ロシア史研究』第88巻、2011年、22—32頁。橋本伸也『記憶の政治——ヨーロッパの歴史認識紛争』、岩波書店、2016年。

斯林流动性和知识传播形式。^①

除此之外，从事“斯拉夫-欧亚地区”相关历史研究的学者分布于大学的各个学科中，生产了许多斯拉夫-欧亚学的成果。思想史、法律、哲学、文学等方面也产生了不少的研究成果。

2. 日本的中国学

自隋唐时期开始，日本便开始派出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先进的文化和制度，将汉字、儒学经典、法制和宗教等带回日本，并逐渐形成了汉学研究，即在英语中被称为“Sinology”的关于中国与历史文化的研究。到了明治时期，以近代学术体制的导入为契机，日本近代大学建制开始发展，传统汉学也逐渐式微，京都支那学成为近代日本中国学的代表。京都大学的内藤湖南、狩野直喜、武内义雄、宫崎市定与吉川幸次郎等学者奠定了以科学实证为方法的京都支那学，并形成了京都学派。京都学派的学者们通过精密的文献考证，树立了富有逻辑论理性的学说。这一时期的中国学主要以历史研究为主，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以及宫崎市定在其基础上发展的“东洋近世说”。内藤湖南以文化性“突破”的观点，说明宋代的社会文化诸象迥异于唐代，从而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的主张。他继承了富永仲基的“加上说”，论证中国古代思想形成的先后次第，强调“应仁之乱”是日本创造独自文化的划时代历史事件，说明文化形成经纬的“文化中心移动说”，究明文化发展路径的“螺旋循环说”等等，这些都是内藤湖南对东洋文化史研究的卓越论点。宫崎市定继承了内藤湖南的社会文化史学，探讨了中国古代至汉代的社会变迁，又取法桑原鹭藏的东洋史学，从世界史的视角，探讨中国在世界史中的角色和影响。他还继承发展加藤繁的经济史研究方法，分析中国古代的经济和制度，从经济和制度角度补足了内藤湖南的学说。立足于世界史的通观强调宋代的新文化是“东洋的近世”，是

① 参见长縄宣博「イスラーム教育ネットワークの形成と変容：19世紀から20世紀初頭のヴォルガ・ウラル地域」、橋本伸也編『ロシア帝国の民族知識人：大学・学知・ネットワーク』、昭和堂、2014年、294—316頁。长縄宣博『イスラームのロシア：帝国・宗教・公共圏1905—1917』、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7年。长縄宣博「帝国の協力者か攪乱者か：ロシア帝国のタタール人の場合」、野田仁、小松久男編著『近代中央ユーラシアの眺望』、山川出版社、2019年、287—304頁。

京都学派中国史学的创新所在。^①

京都支那学派在二战前基本上占据着中国学研究的主导地位，随着日本战败以及受到美式科学的影响，部分中国研究仍然继承了此前的汉学以及支那学等研究，分散在大学诸学科之中（哲学、文学、史学、法制史等），另一部分则向美式区域研究学习，将重心置于政治、经济、外交研究，并试图形成综合性的、理论性的方法论，将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包容进去，并运用这些学科工具展开分析。在日本的中国研究界也有许多学者尝试从理论上阐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试图找到中国的“本质”。

比如战后初期，一桥大学的经济学家村松祐次在《中国经济与社会态制》一书中研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史，提出了“态制”概念。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变动与社会经济结构密切相关，并指出政治的长期变化与经济的相对稳定性形成了动态与静态的对比。此外，村松还跨学科地分析了与经济相关的历史、结构以及中国的政治社会课题，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另外，加藤弘之在其著作《“暧昧的制度”——中国类型的资本主义》中考察了实现高度发展的中国经济体系背后隐藏的中国独特的制度本质，专注于中国独特性的研究。所谓的独特性，是指“在创造社会经济秩序的背景中，文化信念的制度所赋予的特征，”其特征在于“深藏于制度之中的暧昧性”。为了解析这一“暧昧性”，加藤尝试引入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论、法理论、契约观、国家-社会论等内容，使其理论化。这些研究都关注到中国作为区域的“区域独特性”，并试图通过理论来理解中国社会。

在方法论方面，日本学界也有创新。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提出了作为分析方法论的基础结构论，总结出了中国社会的“四个大规模性”：第一，领土的大规模性。中国的领土辽阔，对统治思想、人口、财政资源等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二，人口的大规模性。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与统治地域的扩张密切相关，对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定产生影响。第三，思想的大规模性。中国的传统思想强调“大一统”，这一思想至今对中国政治有着深远影响。

^① [日]连清吉：《日本中国学论考》，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273页。

第四，权力的大规模性。历代中国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使得中央政府拥有压倒性的权力。同时总结出中国社会的“四个断层”：一是干部和民众的断层。中国的权力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存在显著的隔离，影响着政治参与和社会意识的形成。二是关系与制度的断层。在中国，关系往往比制度和规则更为重要，这种现象在重大事件中尤为明显。三是城市与农村的断层。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流动增加，但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差距仍然严重。四是政治与经济的断层。中国形成了“经济开放-政治管控”的结构，经济发展难以带动政治改革。^①这些特点和断层为理解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旨在通过分析这些相对固定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推动对中国的研究，并为中国研究学界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从而对日本的中国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总体来看，从日本古代汉学到明治维新后的支那学，再到近现代的中国学，日本的中国研究学界产出了一系列研究范式与理论，包括实证主义的京都学派中国史研究，以及从区域或国家视角分析中国特征的区域国别研究，形成了一种具有日本特色的多维和综合的研究方式，也展现了日本在区域国别研究方面的独特学科特色。

3. 日本对其他地区的研究

日本的美国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留美学者们通过亲身体美国的社会、政治和教育制度等，将这些经验和知识带回日本，以促进日本的现代化进程。^②由于既有的学术领域（学科）难以对美国与欧洲不同的独特文化作出合理评价，因此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日本学界试图通过“整体论的视角”，以跨学科的方法来解析美国的独特文化。这种研究方法在战后日本关于第三世界的研究中也得到体现。战后，日本的美国研究也基于这类方法，开始以广义的文化为中心，全面研究理解美国社会，与美国学界的发展步调一致。随着学科发展，政治与外交研究、经济与社会研究等主题成为日本美国研究关注的重点。政治与外交领域的研究涵盖了美国的政治

① 天儿慧、吴日焕、安波：“地域研究方法与现代中国研究”，《国外社会科学》，2017 年第 4 期，第 4-9 页。

② S. Makoto, “American Studies in Pre-War Japan”, *The American Review*, 1970, No.4, pp.1-24.

体制、选举制度、政党政治、外交政策等。日本学者特别关注美日关系、美国的亚太政策、以及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外交行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深入，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及其对日本的影响继续成为研究的核心议题。经济与社会研究则主要关注美国的经济模式、劳动市场、社会福利制度等议题。美日经济关系，包括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等，是这一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还有一些学者采用批判理论和后殖民主义视角进行批判性研究，分析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行为。他们研究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以及美国文化如何在全球传播中强化了某些权力结构。日本的美国研究越来越注重从全球视角理解美国的角色和影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得到广泛应用，研究者们结合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和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期更全面地理解美国。

日本的中东研究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当时，日本的学者和外交官开始对中东地区产生兴趣，主要是关注伊斯兰教的文化和历史影响。然而，真正系统的中东研究是在二战后逐渐形成的。二战后，随着日本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特别是与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交往增加，学术界开始关注中东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二战后的中东研究很多都关注摆脱殖民统治的过程、冷战结构下中东的政治定位等问题，对属于左派民族主义思想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研究倍加关注。特别是，殖民统治遗留下的中东各国制度的人为性和国界划定的肆意性受到质疑，作为打破内嵌于各国制度中的殖民地结构的民族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发展格外引人注目。在日本的中东研究中，关于阿拉伯群众运动根基中的去殖民地化运动的研究占主流地位。板垣雄三就地区的他者规定性提出了“n 地区”论，针对殖民主义产生的民族、地区的可变性与多层性进行了理论探讨。^①这一研究视角被栗田禎子^②、白杵阳^③等继承，可以说开辟了独具特色的日本中东地区研究领域。另一方面，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后半期以来，以石油生产国实施石油战略（石油危机）为契机，石油稳定供给这一能源安全研究成为中心议题。之后的两伊战争、海湾战争等冲突，促成了不局限于石油领域的能源安全研究的出现。由于中东地区是

① 板垣雄三『歴史の現在と地域学—現代中東への視用』、岩波書店、1992 年。

② 栗田禎子『近代スーダンにおける体制変動と民族形成』、大月書店、2001 年。

③ 白杵陽『世界化するパレスチナ/イスラエル紛争』、岩波書店、2004 年。

世界主要的石油产区，日本作为石油进口大国开始加大对中东的研究投入，以更好地理解该地区的政治动态和经济发展。“能源外交理论”、“冲突理论”、以及各类安全学、和平学研究在这一时期得到发展。日本的中东研究从历史和宗教领域扩展到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领域，开始关注中东政治局势、民族冲突、能源政策等相关问题。

日本的非洲研究最初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官方资助的非洲调查队的调研活动。当时调研的目的是弄清非洲野生类人猿的社会生活，同时研究现存的非洲社会，特别是狩猎采集民众的社会生活，弄清人类社会进化的痕迹。梅棹忠夫曾提到，“最初的研究很明显是出于灵长类学的兴趣，后来研究者的兴趣扩大到灵长类学、自然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陆水生物学、古生物学、地理学、医学、农学等。与自然科学诸科学一起，涵括了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人文地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呈现出大综合的研究观”^①。在研究方法方面，早期日本的非洲研究主要基于实地考察、田野调查等区域国别学的基础方法，产出了《非洲社会研究——京都大学非洲学术调查队报告》（今西锦司与梅棹忠夫共同编著）、《非洲大草原学术调查项目报告：非洲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地域、城市、语言》（富川盛道编著）等研究成果。再往后发展，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日本非洲研究学界开始关注现代非洲冲突研究，武内进一将独立后的非洲国家称为“后殖民地家产国家”（Post-Colonial Patrimonial State），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他认为，这些以恩庇侍从关系为特征的非洲国家在冷战期间得以发展壮大。当这些国家面临经济危机并引入经济和政治自由化改革时，这个过程应被视为一种解体后的重组过程，从而理解非洲冲突的意义。^②武内进一从地区视角观察武装冲突，并据此考察决定冲突特性的诸多因素，通过比较研究，对冲突的特性和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最终总结出某地区冲突的固有性与普遍性，以及其中反映出的地区特性。将地区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并通过理论研究验证发展结果，这也是日本非洲研究界较为创新的尝试。

① 今西錦司、梅棹忠夫編『アフリカ社会の研究——京都大学アフリカ学術調査隊報告』、西村書店、1966 年。

② 武内進一編『国家・暴力・政治：アジア・アフリカの紛争をめぐる』、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アジア経済研究所、2003 年。

三、日本区域国别研究的典型特征

第一，日本在区域国别研究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在国际政治学界中占据较为重要的位置，并作为独立学科被纳入了学术体系。日本很早就设立了区域国别相关的研究机构，如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成立于1941年）、北海道大学斯拉夫与欧亚研究中心（成立于1955年）、亚洲经济研究所（成立于1960年）等，并在大学中开展相关教学研究活动。自1956年日本国际政治学会成立至今，区域国别研究分会始终是学会的下设分会之一。在日本学术会议^①中，地区研究也确保了专门委员会的地位，是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的资助领域之一（即确立为一个单独学科）。^②日本的区域国别研究学界很早就对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定位进行过争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坪内良博将区域研究视为“以对区域特殊性的综合理解为中心的方法论的集合，”并将其定位为不同于历史学、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现有专业领域的学科。^③而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立本成文则将“在既定学科内通过学会、学界、学派定位区域研究的人”（又称“右派”）与“认为狭义的区域研究可以作为独立学科形成的人”（又称“左派”）^④进行区分，并表示自己赞同“寻求区域的理解、整体区域形象，并致力于确立新的区域研究独有方法论的‘左派’”的意见。^⑤后来更进一步提出，希望区域研究能够以不同于历史学或政治学等传统学科的方式独立探索区域知识，并

① 日本学术会议（日本学術会議，Science Council of Japan）是隶属于日本内阁府的特别机关，属于国家级学术机构。该机构主要为代表日本科学界的机构、促进研究人员之间的国际合作、进行信息传播和信息收集、反映科学家对政策的意见而创设。在组织架构上，总会为最高决策机构，通常一年中召开春秋两次会议。总会下常设三部（人文·社会科学部、生命科学部、理学·工学部），三十个分学科委员会。区域国别研究系分学科委员会中的一个。

② 国分良成：《地区研究与国际政治》，载国分良成等主编：《日本国际政治学（第三卷）：地区研究与国际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2页。

③ 坪内良博「専門分野と地域研究」、矢野暢編『地域研究の手法』、弘文堂、1993年、61頁。

④ 立本成文『地域研究の問題と方法——社会文化生態学の試み（増補改訂）』、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1999年、14—15頁。

⑤ 同上、319頁。

主张将区域研究确立为一个独立的学科。^①日本的区域国别研究就在这样的争论中朝着综合理解现代世界的方向发展。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前所长原洋之介的看法为代表,现今日本学术界对于全球化课题,偏向于使用“地区研究”来诠释观点,也就是“从区域共存与互相关联的发展可能性中,寻找知识体系上的解释。”^②在地域上不仅包含发展中地区,也涵盖发达国家,在专业上不仅限于狭义的社会科学,还包括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

第二,日本的区域国别研究有着较为完整的组织架构及学术交流机制,培养出了众多知名学者以及产出了丰富的成果。日本以国家级课题立项为牵引,建设和完善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体系。21 世纪以来,日本文部科学省相继实施了“21 世纪 COE 项目”、“全球 COE 项目”以及全球区域研究推进项目等,由政府牵头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确立了宏观指导方向并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日本地区研究学会联络协议会(JCASA)和日本地区研究共同体(JCAS)也分别在 2003 年和 2004 年成立,帮助国内从事地区研究的各个机构与学会进行协调整合,形成联动机制,保障学术信息网络能够迅速铺开。此外,日本的区域国别研究不仅包括各大高等院校下属的研究所,如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京都大学非洲地区研究资料中心等,还包括许多政府官方机构,如防卫省下属防卫研究所、外务省下属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国文学研究资料馆、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等。高校与政府机构间有着较强的互补性,两边的学者不仅会在相关课题上进行合作,还会共同参加学术会议,呈现良性互动的关系。

日本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拥有很多优秀学者,如中国研究学者毛里和子、国分良成、高原明生等,东南亚研究学者白石隆、山影进等,俄苏研究学者木村汎、下斗米伸夫、松里公孝、岩下明裕、袴田茂树等,他们的成果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在后继人才培养方面,日本许多大学为区域国别研究专业设置了硕士与博士学位点,并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培养方案。相关

① 参见立本成文「21 世紀地域研究の方法論的課題」、『國際研究』第 19 号、2003 年、155—156 頁。

② 原洋之介「アジア学の方法とその可能性」、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編『アジア学の将来像』、東京大學出版會、2003 年、12 頁。

学会与研究机构也鼓励年轻学者发表学术成果，采取一系列激励措施，如保障年轻学人的论文发表机会、设定专门的奖励奖项、资助年轻学者出版专著、举办青年学者的学术研讨会等。整体来看，在政策支持、学科发展、人才培养与财政支持方面，日本的区域国别研究有着较为充足的资源保障。

第三，日本区域国别研究能够将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在各自保持相对独立的前提下有机地结合起来。隶属于日本各大学的研究机构多会偏向纯学术的研究，即便是政治经济等与时政问题密切相关的领域，也多会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问题进行学理上的分析与阐释。虽然在二战后一段时期可能受到美国学界的影响较多，如美国的决策学、战略学等研究，往往与政府的对外政策紧密相连，呈现出强烈的政策研究特征，但在后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呈现出本国特色。积累对世界各地的知识和信息，理解国际社会的整体与局部，拥有深刻的见解和确切的判断，对于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对于像日本这样以贸易立国的国家，依托与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来实现发展，掌握这样的知识对于准确理解现代世界、构思未来的进路和在国际上发挥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日本政府希望文科可以推行扎实、广泛的基础研究，进而形成对社会和政策的长期影响路径。

与注重学术研究的民间研究机构不同，对于日本政府和有相关背景的研究机构而言，服务政府的决策咨询是他们的一项研究宗旨，并且更注重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外交政策等直接相关的主题。譬如，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是日本外务省进行对外决策的智囊，防卫研究所是日本防卫省在安全保障方面进行决策分析的智囊，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是日本经济产业省在对外经济决策方面的调研机构，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动向进行及时的跟踪把握，尤其对经济情况的把握可用“全面准确、扎实细致”来形容。

然而，学界研究机构的纯学术研究与政府研究机构的政策研究，两者之间也并不是相互孤立、平行进行的，而是通过研究人员相互参与对方研究的课题，发挥彼此的专长，合力出台较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同时，参与者本人的研究领域也会得到深化。如外务省下属的智库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自2009年至今，每年都会与相应领域的专家学者合作开展研究项目，并定期邀请他们发表特定主题的研究报告。2024年10月，“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讲坛”

(JIIA プラットフォーム) 设立, 每三年为一个周期, 邀请政府官员、企业代表以及学界专家学者参与特定主题的讨论, 为日本未来发展建言献策, 最后将一个周期内的所有成果总结为《国家战略》意见书。日本政府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也会参与民间学术机构的学术活动, 比如, 防卫研究所主任研究官兵头慎治、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横川和穗等, 经常参与斯拉夫研究中心、俄罗斯-东欧学会等民间研究机构的学术会议和科研项目。学术研究与政策咨询之间存在有效的交流与互动。^①

第四, 日本的区域国别研究有注重区域内小国或是小范围主题的特点。比如在斯拉夫-欧亚研究领域, 有相对较多的学者专注乌克兰、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前南斯拉夫等地区的研究, 其中松里公孝等学者还关注后苏联空间(独联体地区)中如阿布哈兹、德涅斯特河沿岸以及南奥塞梯等未获国际社会承认的政治实体。在东南亚地区的研究中, 除了针对东盟整体的研究与印尼、泰国和越南等区域大国的研究之外, 也有不少对文莱、老挝、东帝汶等小国的研究, 分析其历史背景和政治体制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变迁和文化认同, 探讨其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在研究课题的选择上, 日本学者更偏向微观的研究课题。在人类文化研究机构发布的“东欧亚研究项目”中, 日本东北大学就选择以“少数群体的权利与媒体”作为主题, 北海道大学则以“跨境与性别”为主题, 都属于较为细致的小范围主题。松里公孝指出, 总体来说, 日本学者不大相信“民主化”、“市民社会”之类的抽象概念的有效性。日本学者追求的是在具体的知识与中等视距的理论阐述方面相互竞争发展, 而不是去创建一个宏大的理论。^②

第五, 日本的区域国别研究注重国际化、多语种的全方位研究。日本区域国别学界经常与国外相关领域的学者开展广泛合作, 推进共同研究, 目的是增强日本区域国别研究在国际上的发言权。如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与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学、印尼的雅加达大学等东南亚多所学术机构长期保持学术合作关系, 研究项目包括农业发展、移民问题、政治动荡等多个主题, 并创建了亚洲东南亚研究协会(SEASIA)。该协会自 2013 年成立后定期举办

① 阎德学:《冷战后日本的俄苏研究》,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第 512 页。

② 阎德学:“斯拉夫·欧亚研究的‘日本范式’”, 《俄罗斯研究》, 2016 年第 3 期, 第 37-63 页。

双年会，促进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北海道大学斯拉夫与欧亚研究中心每年固定在冬夏两季举行国际学术研讨会，汇集来自俄罗斯、欧洲、美国、日本等国的专家，讨论从俄罗斯历史、苏联遗产到当代俄日关系等各类议题，同时还与莫斯科大学、圣彼得堡大学等俄罗斯顶尖学府合作，在历史与文化研究、能源研究、北极研究等方面开展合作。

在语言方面，日本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有着较高的语言素养。比如，北海道大学斯拉夫与欧亚研究中心要求所有研究人员不仅要能够使用英语和俄语进行流利的写作和交谈，同时还要懂与具体研究对象相关的语言，如乌克兰语、鞑靼语、立陶宛语等，至少能读懂文章。该中心的学者精通英文与俄文，不少青年学者甚至通晓三四门外语，确保了国际同行间的无障碍交流。^①前面提到的白石隆、毛里和子、国分良成等学者也都是这样，熟悉自己研究领域的语言，能够直接阅读和分析相关语言的文献资料，或是通过实地调研获取第一手资料。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斯拉夫研究中心就开始重视国际化，国际学术交流频繁，在海外发表文章的数量也日渐增加，并积极参加各类国际学术会议，提升机构的国际影响力。

四、结 语

日本的区域国别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占据着重要地位，其发展历程既体现了对传统学术资源的继承，也展示了对新兴全球议题的回应。从战前的殖民扩张时期开始，日本就已建立起针对殖民地区的研究体系，这些研究在战后逐渐转向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日本的区域国别研究进一步深化，开始从个别性向普遍性方向发展，更加注重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日本的区域国别研究学界通过与国外学术机构的广泛合作，不断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他们注重资料收集、实地考察和田野调查以及多学科相融合的研究方法，均给日本的区域国别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有必要积极推进基础研究与咨政服务的有效结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区域观和国别观，注重多学科融合、

^① 阎德学：《冷战后日本的俄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518 页。

实地调查和国际合作，夯实理论基础，构建多维度的研究体系，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为中国的国际参与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Abstract】 Area studies in Japan originated during the Meiji Restoration period. After World War II, especially through academic developments during the Cold War era, this field gradually evolved into a comprehensive system and has been continuously adjusted and updated to meet the demands of globalization.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of area studies in Japan reveals the discipline's transformation from serving colonial expansion to addressing globalization challenges, while also outlining its academic paradigms and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Area studies in Japan have achieved remarkable success in various regions and fields through methods such as fieldwork,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multilingual research. For instance, in areas such as Russia and Soviet studies, Chinese studies, American studie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and African studies, Japanese scholars have developed research paradigms with their own unique characteristics. Notably, studies like “Slavic-Eurasian Studies” and “Sinology” hold significant positions in the global field of area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path and academic construction of area studies in Japan are distinctive, and its experience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for building an area studies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Area Studies in Japan, Slavic-Eurasian Studies, Sinology, 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

【Аннотац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и странов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Японии зародились в период Реставрации Мэйдзи.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особенно после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о врем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эт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степенно сформировали целостную систему и постоянно корректировались и обновлялись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потребностями времени в ходе развития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Анализируя процесс развития японских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 странов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можно

выявить процесс их 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й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от обслуживания колониальной экспансии до ответа на вызовы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можно также разобраться в 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й парадигме и типичных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х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странов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в Японии, которые достигли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х успехов в различных регионах и областях благодаря полевы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многоязычны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 и другим методам. Например, в обла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совет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американистики, 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 африканистики японские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е круги сформировали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е парадигмы со своими особенностями, особенно та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как славяно-евразий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 занимают важное место в мировых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 странов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Путь развития и построение дисциплин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 странов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Японии весьма своеобразны, а опыт Японии имеет определённую справочную ценность для построения системы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 странов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пецификой.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Японские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и странов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лавяно-евразий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 Зарубеж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и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责任编辑 宋羽竹)

乌克兰危机的多重影响

北极地缘政治反思：批判与重构*

易鑫磊**

【内容提要】当前北极地缘政治割裂与对抗加剧，颠覆了北极“例外论”，也凸显北极“冷战论”等对现实解释的失焦和乏力。在指出既有理论逻辑缺陷的基础上，本文以时代特征和空间关联的综合时空观，阐释北极地缘政治的本质特征和演化态势，通过界定关键因素、主要矛盾、演化区间及其动力机制等核心概念，构建北极地缘政治理论分析框架，并提出“耦合联动论”，作为对现有理论的回应和修正。本文结论认为，在全球气候变化加速、俄乌冲突持续延宕的背景下，俄美在北极的“内生性”矛盾和欧洲地缘态势对北极产生“外部性”影响的耦合联动作用愈发明显。北极地缘政治将呈现两大特征：地缘格局“北约化”加剧北极地缘态势紧张，而欧洲安全架构重塑将直接影响北极地缘态势的演化。

【关键词】例外论 冷战论 北极地缘政治 演化态势 耦合联动

【中图分类号】D8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4)05-0136(28)

20世纪末以来，北极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地缘安全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学界在不同时期出现了例外论、新冷战论、传统冷战论和安全困境论等描述性、评论性的北极地缘政治理论。这些论述是对北极地缘政治态势整体表象的概括。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现有理论不同程度地暴露出了逻辑缺陷和解释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俄罗斯北极新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与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21BGJ06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华东师范大学2023年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预研究项目“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理论基础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地缘政治理论研究”（项目批准号：2023ECNU-YYJ03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易鑫磊，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力不足。它们或静止地去观察某一时间段的北极地缘政治，或孤立地立足北极看北极，没有将北极放在国际形势演进的历时性视角、用发展的眼光去观察，也没有用联系的观点整体审视北极与其他地缘板块之间的关系。这必然导致这些理论解释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只看到北极多边合作与治理机制的进程而表现出理想主义的乐观，要么仍然以冷战思维狭隘地理解竞争与对抗的表象而表现出现实主义的悲观。当前，北极气候变暖加快，北极地缘政治态势演进加速，表现出的迷惑性或与现有理论相悖的表象，正提供了构建新的北极地缘政治理论的契机。如何破解迷思？如何理解相悖现象对立统一的内在逻辑？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既是理论创新的有效路径，也是客观理解北极地缘政治的最好办法。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北极海冰融化的加快，可达性提高等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大国战略竞争和地缘博弈回归背景下地缘安全环境的变化，作为核心行为体的俄罗斯和美国决定了北极地缘政治的两个关键因素。一是俄罗斯地缘类属身份从传统陆权国转变为在北冰洋地缘方向上同时面临巨大机遇和重大挑战的陆海复合型国家，迫使俄罗斯发展包括经济海权和军事海权在内的区域海权。二是美国在地缘战略价值不断提升的北极板块存在力量短板，而这在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可能会削弱其海外军力布局的整体效能，进而对其全球海权产生颠覆性影响。这迫使美国全力护持自身全球海权在北极板块的完整性。基于上述两个关键因素，北极地缘政治的主要矛盾是，发展北极区域海权的俄罗斯与护持全球海权的美国在北冰洋地缘板块形成了地缘结构性矛盾。美俄北极地缘结构性矛盾存在必然性，但同时也具有可控性。这决定了北极地缘政治态势演化存在着某种区间。演化动力则是美俄在欧洲板块博弈态势对北极板块影响的积极和消极外溢。本文提出，欧洲与北极两大地缘板块存在耦合联动关系。基于前述，本文尝试建构北极地缘政治理论的分析框架（见图1）。

一、既有理论的缺陷及其批判

例外论、冷战论和安全困境论等既有理论基本局限于对某一历史阶段北

极地缘政治态势的描述和评论，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包含基本概念和分析框架的理论。但是由于其给出了一些基本判断，也便于本文的分类，我们姑且将其称之为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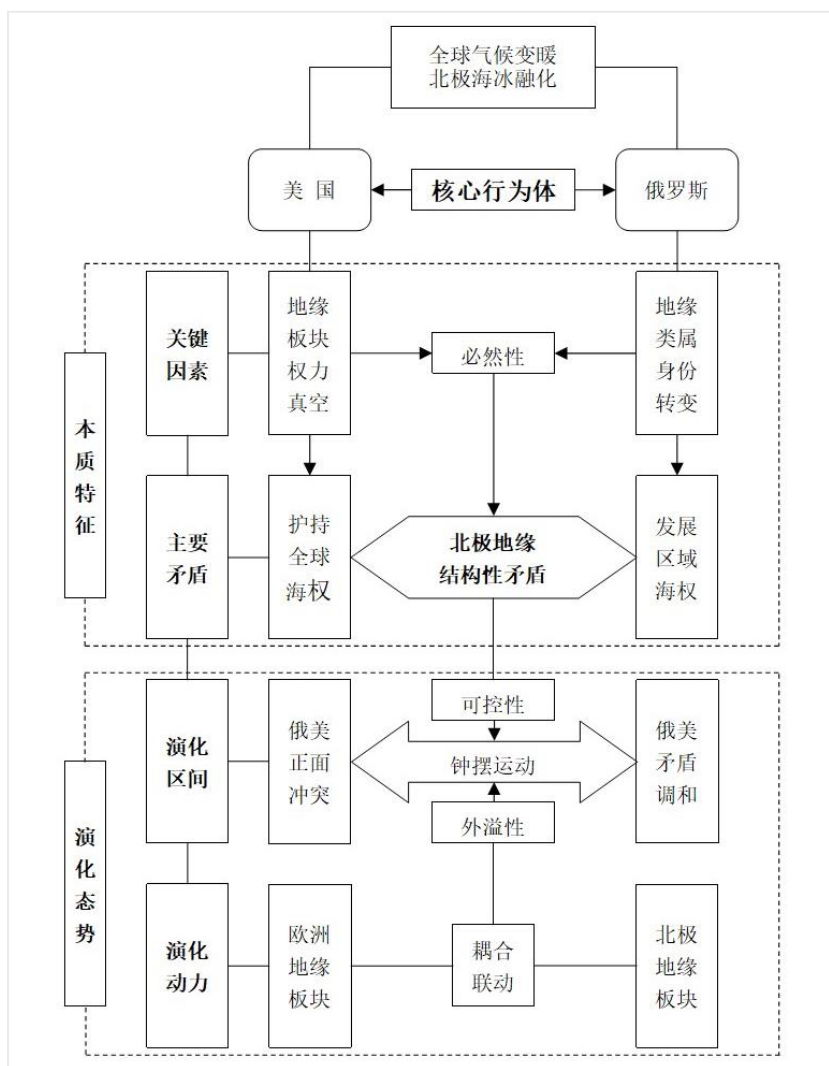


图 1 北极地缘政治理论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例外论主要观点及其批判

1987年戈尔巴乔夫的“摩尔曼斯克”讲话被认为是北极例外论出现的国际背景。两大阵营在北极开启缓和与和解进程。分属两大阵营的北极国家谋求共同利益开展“去安全化”合作。^①有学者提出，北极“越来越被视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独特区域”，是“脱离全球政治动态的”、“在地缘政治上孤立的”、“适合开展区域治理、功能性合作和大国和平共处的非政治空间。”^②从1989年芬兰率先召集八个北极国家讨论环境保护问题的“罗瓦涅米进程”，到1996年北极理事会的成立；从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北极国家仍能达成新的合作机制和协议，^③特别是2015年美俄在北极海岸警卫队论坛框架下开展安全合作，再到2019年北极理事会部长声明所彰显的成员国维护北极和平、稳定和建设性合作的共识，^④这些进展似乎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北极“例外”的现实。

在北极地缘政治研究中，持例外论的学者不在少数。但是随着全球和北极地缘政治态势的演进，例外论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其根本原因在于，例外论的逻辑基底有着时间静止和空间孤立的缺陷。

首先，例外论静止地看待20世纪90年代冷战末期国际格局的缓和与合作，忽视了国际形势的不断发展演进。一方面，从自然地理视角看，全球气候变暖和北极海冰加速融化，以及科学技术的全面进步，美苏相互威慑的北冰洋，不可通达性正在消失。潜在的通航前景和巨大的资源潜力，使其地缘

① Kristian Åtland, “Mikhail Gorbachev, the Murmansk Initiative, and the Desecuritization of Interstate Relations in the Arctic”,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the Nordic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Vol.43, No.3, 2008, pp.289-311.

② Oran R. Young, *Arctic Politics: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Circumpolar North*, Hanover: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2; Carina Keskitalo, “International Region-Building: Development of the Arctic as an International Reg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the Nordic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Vol.42, No.2, 2007, p.195; Oran R. Young, “Whither the Arctic? Conflict or Cooperation in the Circumpolar North”, *Polar Record*, 2009, Vol.45, No.232; Lassi Heininen, Heather Exner-Pirot, Joël Plouffe, “From Regional Transition to Global Change: Dualism in the Arctic”, in Lassi Heininen (ed.) *Arctic Yearbook 2013*, Akureyri, Iceland: Northern Research Forum, 2013, p.25.

③ 这些机制和协议包括2015年的“北极海岸警卫队论坛”、2017年的《加强北极国际科学合作协定》和《防止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

④ *Rovaniemi Ministerial Statements*, Arctic Council, May 7, 2019, <http://hdl.handle.net/11374/2418>

政治价值进一步凸显。^①另一方面，从地缘安全视角看，例外论只看到冷战末期与冷战结束初期北极地缘态势改善的单向度趋势，没有预计到一旦全球形势和大国关系发生逆转，北极是否还会是一个“例外”？

其次，例外论割裂了北极与邻近地缘板块态势发展的关联性。对例外论持批判态度的学者指出，“要理解今天的北极，需要有一个全球视角。北极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区域发展日益与全球动态交织在一起”^②，北极地缘政治具有全球性和外部性特征。^③戈尔巴乔夫摩尔曼斯克讲话和两德统一标志着美苏在欧洲的缓和态势外溢至北极地区。两个阵营的国家开始了在北极的合作进程。这表明北极地缘板块并非是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例外”，恰恰是欧洲与北极地缘板块存在某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例证”。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 2007 年以来，美俄在欧洲地缘板块重新开始战略竞争，北极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欧洲态势外溢的消极影响。^④

北极地缘关联的“全球性”与受美俄在欧洲板块对抗博弈外溢影响的外部性，使北极不可能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例外”。例外论对北极地缘政治现实解释力不足的原因如下：一是对于大国而言，北极只是整体地缘战略的一部分。因此，北极地缘政治与其他地缘板块联动，受其他地缘板块影响，无法被孤立地看待。二是北极地缘态势一直处于动态演化的进程之中。该地区的时代特征不断在对抗性的战略特征与合作性的战术特征之间切换。^⑤三是北极大国的主观意志是地区的规范秩序和权力平衡的决定性因素，一旦大国

① Wilfrid Greaves, “Arctic (in) security and Indigenous peoples: Comparing Inuit in Canada and Sámi in Norway”, *Security Dialogue*, 2016, Vol.47, No.6, pp.461-480.

② J. Kämpylä, H. Mikkola, “Arctic Conflict Potential: Towards an extra-Arctic perspective” (FIIA Briefing Paper), September 2013, No.138.

③ Juha Kaayla, Harri Mikkola, “On Arctic Exceptionalism” (FIIA Working Paper), 2015, No.85, p.4.

④ Rolf Tamnes, Sven Holsmark, “The geopolitics of the Arctic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Rolf Tamnes, Kristine Offerdal(eds.) *Geopolitics and Security in the Arctic: Regional Dynamics in a Global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⑤ Mathieu Boulègue, “Russia’s Military Posture in the Arctic Managing Hard Power in a ‘Low Tension’ Environment”, June 2019, <https://www.russiamatters.org/analysis/russias-military-posture-arctic-managing-hard-power-low-tension-environment>; Gunhild Hoogensen Gjørsv, Kara Hodgson, “Comprehensive Security in the Arctic: Beyond ‘Arctic Exceptionalism’”, in Duncan Depledge, P. Whitney Lackenbauer(eds.) *On Thin Ice? Perspectives on Arctic Security*, Peterborough: Trent university, 2021, p.1-11.

地缘战略的认知和意图发生改变，北极地区的秩序与平衡也会随之改变。^①

（二）冷战论的不同立场与缺陷

冷战论分为两派，一派是新冷战论，一派是传统冷战论。

新冷战论认为，随着北极自然地理环境变化，该地区在能源航道等方面的经济潜力和军事安全领域的战略价值可能引发地区国家间的对立甚至对抗。^②西方学者倾向于将冲突归因于俄罗斯，认为俄罗斯会采取强制性的军事手段来保护其在北极的国家利益，并由此引发北极地区的军备竞赛、再军事化和军事冲突。^③美欧指责俄罗斯是北极新冷战的挑起者。^④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俄罗斯与美欧关系恶化。2016年，时任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作出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处于新冷战态势的定性。^⑤新冷战似乎成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间不约而同形成的政治“共识”。

① Heather Exner-Pirot, Robert Murray, “Regional Order in the Arctic: Negotiated Exceptionalism”, *The Arctic Institute*, October 24, 2017, <https://www.thearcticinstitute.org/regional-order-arctic-negotiated-exceptionalism>

② Scott Borgerson, “Arctic Meltdown: The Economic and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global Warming”, *Foreign Affairs*, 2008, Vol.87, No.2, pp.66-69; Siemon T. Wezeman, “Military Capabilities in the Arctic: A New Cold War in the High North?” *SIPRI Background Paper*, October 2016.

③ Lassi Heininen, “Northern Geopolitics: Actors, Interests and Processes in the Circumpolar Arctic”, in Richard C. Powell, Klaus Dodds (eds.), *Polar Geopolitics: Knowledges, Resources and Legal Regimes*, Lond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4, pp.241-258; Robert N. Huebert, “The Newly Emerging Arctic Security Environment”, *Canadian Defense & Foreign Affairs Institute*, March 18, 2010; Robert Huebert, Heather Exner-Pirot, Adam Lajeunesse, Jay Gullledge, “Climate Change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Arctic as a Bellwether”, *Center for Climate and Energy Solutions*, May 2012, <https://www.c2es.org/wp-content/uploads/2012/04/arctic-security-report.pdf>; Terry Macalister, “Climate Change Could Lead to Arctic Conflict, Warns Senior NATO Commander”, *The Guardian*, October 11, 2010; Mark Smith, Keir Giles, *Russia and the Arctic: The “last Dash North”*, Shrivenham: Defense Academy of the United Kingdom (Russia Series 07/26), September 2007.

④ James Krask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Northwest Passage”,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2021, Vol.42, No.4, pp.1109-1132; Matthias Schepp, Gerald Traufetter, “Riches at the North Pole: Russia Unveils Aggressive Arctic Plans”, January 29, 2009,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riches-atthe-north-pole-russia-unveils-aggressive-arctic-plans-a-604338.html>; Lee Willett, “The Navy in Russia’s ‘Resurgence’” *RUSI Journal*, 2009, Vol.154, No.1, pp.50-55.

⑤ Dmitry Medvedev, “Russia-NATO relations reach level of new cold war”, February 13, 2016, <https://sputnikglobe.com/20160213/medvedev-msc-hato-cold-war-1034693133.html?ysclid=m0nvx88mb5370785566>; Siemon T. Wezeman. “Military capabilities in the Arctic: A new cold war in the High North?” (*SIPRI Background Paper*), October 2016.

传统冷战论作为例外论的批判者，以比新冷战论更为激进的态度出现，认为北极所发生的并不是围绕着能源、航道这些低政治领域议题展开的新冷战，而是传统冷战的回归。因为俄罗斯与西方潜在的战略安全需求从未真正消散。作出这一判断的依据包括：美国与俄罗斯在北极的地缘临近性；北极是美俄战略威慑力量和战略预警体系部署的前沿地带；一旦美俄发生冲突，北极将成为具有绝对战略重要性的地缘板块。^①

新冷战论聚焦于北极国家可能因航道、资源等低政治领域议题引发潜在对抗与争端而加强军事力量建设的表象。但是，不能把加强军事力量建设机械地等同于要发动冷战。从俄罗斯涉北极战略文件来看，俄罗斯北极军事力量发展是其北极地区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创造了新的安全能力。它们的目的是保障本国的领土和主权安全。俄罗斯在北极地区提升其北方舰队和其他陆空力量，给部署在这一地区的战略核威慑力量提供保护，并非是为争夺北极资源的军事斗争做准备。^②俄罗斯北极战略文件中更多关注的是非军事挑战，并强调所有北极国家合作的重要性。^③在北极开展能源开发和航道利用与发展必要的军事防卫和安全保障能力这两者之间，在强调风险挑战和强调国际合作这两者之间，俄罗斯北极战略有着内在的逻辑统一。此外，新冷战论一方面关注到了北极地缘政治主要矛盾的内生性，但其重点还是放在了能源、航道这些低政治领域，没有抓住美俄地缘结构性矛盾这个北极地缘政治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新冷战论关注到了美俄等北极国家发展军力，但忽视了激化美俄北极矛盾的“外部性”因素，即两国在欧洲地缘板块博弈态势对北极的外溢和传导作用。

传统冷战论出现在国际形势重回大国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这是一种自然的学术生理反应。特别是美俄都在北极加强和扩大各自的战略核威慑力量

① Robert Huebert, “A new Cold War in the Arctic?! The old one never ended!” (Arctic Yearbook 2019), pp.128-136, <https://arcticyearbook.com/arctic-yearbook/2019/2019-commentaries/325-a-new-cold-war-in-the-arctic-the-old-one-never-ended>

② Siemon T. Wezeman, “Military Capabilities in the Arctic: A New Cold War in the High North?” (SIPRI Background Paper), October 2016.

③ Основ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Арктике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ода и дальнейш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18 сентября 2008 г.; Стратегия развития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з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ода. 20 февраля 2013 г. <http://www.government.ru>

和针对对方的反制力量。^①但是传统冷战论也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一方面，从总体上讲，美俄恢复传统冷战的基础和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两国在北极多边治理方面具备基本政治共识。另一方面，传统冷战论机械地看待欧洲地缘态势影响外溢至北极的“外部性”因素，却忽视了在新的自然地理和地缘安全环境下，北极地缘政治主要矛盾这个内生性因素的根本作用。如果说，“北冰洋作为美俄战略威慑前沿地带的战略价值”这一常量没有变，那么在北极自然地理环境快速变化的背景下，带给美国和俄罗斯最关键的变化是什么？即美俄可能在北极爆发新冷战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传统冷战论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三）安全困境论及其不足

近年来，从冷战论中又衍生出北极安全困境论。有学者认为，欧洲地缘板块的持续动荡恶化了北极的安全环境，俄罗斯与北约在北极的军事竞争愈演愈烈，并且缺乏地区安全架构和机制。尽管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北约或俄罗斯寻求在北极进行直接的军事冲突，但双方加强军备的行为客观上已经使北极地缘政治具备了安全困境的特征。^②一方旨在表明决心的北极军事演习，往往导致另一方采取类似的举措作为回应，从而加剧了紧张局势和意外冲突的危险。例如，2021年2月，美国空军将B-1B轰炸机临时部署到挪威，这引起了俄罗斯空军大规模动员战斗机和轰炸机的反制措施，并在挪威北部进行了导弹试射演习。^③美军专家指出，北极的安全困境正在成为现实。^④

① Robert Huebert, “A new Cold War in the Arctic?! The old one never ended!” in Lassi Heininen, Justin Barnes, Heather Exner-Pirot (eds.) *Arctic Yearbook 2019*, pp.128-136.

② Michael Byers, “Northern exposure: As the sea ice melts, paranoia grows”, July 4, 2019,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opinion/article-northern-exposure-as-the-sea-ice-melts-paranoia-grows/>; Eugene Rumer, Richard Sokolsky, Paul Stronski, “Russia in the Arctic – a Critical Examinati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rch 1, 2021; Sebastian Sprenger, “Russian military buildup in the Arctic has Northern NATO members uneasy”, *Defense News*, April 12, 2021, <https://www.defensenews.com/smr/frozen-pathways/2021/04/12/russian-military-buildup-in-the-arctic-has-northern-nato-members-uneasy/>; James Kenneth Wither, “An Arctic security dilemma: assessing and mitigating the risk of unintended armed conflict in the High North”, *European Security*, 2021, Vol.30, No.4, pp.1-18.

③ D. Axe, “The U.S. Air Force’s Norwegian Bomber Jaunt has got the Russians all worked up”, February 18, 2021, <http://www.forbes.com/sites/davidaxe/2021/02/18/the-us-air-forces-norwegian-bomber-jaunt-has-got-the-russian-air-force-all-worked-up/?sh=1e60354c7480>

④ James Wither, “An Arctic security dilemma: assessing and mitigating the risk of unintended armed conflict in the High North”, *European Security*, 2021, Vol.30, No.4, pp.1-18.

安全困境论生硬地套用安全困境理论的一些概念,即行为体动机是进攻性还是防御性的,是维持现状还是修正主义的,来理解北极地缘政治。俄罗斯作为在北极拥有最长海岸线和最大经济利益的国家,本应在该地区拥有合法的、防御性的战略利益。在 20 世纪 90 年代军事能力下降之后,需要适当恢复以保卫其广袤的北冰洋沿岸领土的主权和安全。^①但是包括北约官员在内的一些分析人士则认为,俄罗斯在北极地区不断增强的军事能力、基础设施和行为举动,表明其寻求军事主导地位和恐吓邻国的决心。^②还有许多分析家指出,俄罗斯的北极政策是模棱两可的,既有维持现状的特点,也有修正主义的特点。^③这就使得安全困境论陷入了非黑即白的迷思,在“无法解决的不确定性”中无法自拔。^④

对此,俄罗斯学者批评,大多数文章都认为俄罗斯要么是由极端民族主义和重新获得大国地位的侵略性意图驱动,为冲突做准备;要么是出于经济考虑,务实地致力于国际合作。为什么没有一种摒弃这种教条主义的客观中立的立场,或者说一种更为贴近实际的,将俄罗斯北极战略视为多维的、复合型的观察视角?^⑤有西方学者分析,俄罗斯北极战略的差异性叙述可能是部门职能差异因素使然。例如,俄罗斯外交部、交通部和能源部倾向于在北

① Mathieu Boulègue, “Russia’s military posture in the Arctic: managing hard power in a ‘low tension’ environment” (Chatham House Research Paper), June 28, 2019, <https://policycommons.net/artifacts/613572/russias-military-posture-in-the-arctic/1593545>

② R. Farley, “Arctic aggression: Russia is better prepared for a North Pole conflict than America is”, *The National Interest*. February 12, 2020,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arctic-aggressionrussia-better-prepared-north-pole-conflict-america-122766>; M. Melino, H. A. Conley, “The ice curtain: Russia’s Arctic military presence”, *Cente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rch 2020. <https://www.csis.org/features/ice-curtain-russias-arctic-militarypresence>

③ M. L. Nonboe, “Is Russia an Arctic status quo power?” *Politik*, 2011, Vol.14, No.1, pp.25-32; Ingmar Oldberg, “Is Russia a status quo power?” *Swed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6, <https://www.ui.se/butiken/uis-publikationer/ui-paper/2016/is-russia-a-status-quo-power>; Jørgen Stavn, “Russia’s strategy in the Arctic: cooperation not confrontation”, *Polar Record*, 2017, Vol.53, No.3, pp.314-332,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services/aop-cambridge-core/content/view/0A3C2909C0E881ACEE00D50A5287F047/S0032247417000158a.pdf/russias_strategy_in_the_arctic_cooperation_not_confrontation.pdf

④ Nick Wheeler, Ken Booth,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John Baylis and Nick J. Renger (eds.) *Dilemmas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issues in a changing worl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p.29-60.

⑤ Pavel Devyatkin, “Russia’s Arctic Strategy: Aimed at Conflict or Cooperation?” *The Arctic Institute Report*, February 6, 2018, <https://www.thearcticinstitute.org/russias-arctic-strategy-aimed-conflict-cooperation-part-one/>

极事务中开展合作。相反，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则关注国家安全，因此倾向于通过军事手段进行控制。^①有学者指出，俄罗斯的北极战略既不仁慈，也不好战。其目的是实现对该地区某种程度上的管控，但并非与其他北极国家为敌。^②无论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差异，还是次国家行为体的功能差异，看似对立的问题，实则是同一事物的一体两面，但是学者们始终没有阐明其内在的逻辑和机理。

二、理解北极地缘政治的本质特征

科学、准确地把握北极地缘政治的本质特征，需要秉持历史发展和空间关联的时空观。应当在通达性不断提高、全球和地区转向大国战略竞争以及“欧洲-北极”地缘板块空间关联等综合视角下，界定北极地缘政治的核心行为体，进而厘清以关键因素和主要矛盾等为主要内容的北极地缘政治本质特征。

从历史发展的维度看，有两条时间线值得关注。第一，全球气候变暖和北极海冰融化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极地装备技术的进步，北极的通达性不断提高。第二，北极地缘安全环境也在经历着从安全化、去安全化到向安全化、再安全化的历时性演进。冷战时期，美苏地缘博弈的核心是欧洲板块，而北极是美苏战略威慑的前沿，北极地缘安全环境表现出“强安全化”特征。冷战后期，美苏两极和两大阵营的国家开始缓和与合作，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在欧洲地缘板块从此前的缓和进一步转变为谋求融入，北极地缘安全环境表现为“去安全化”的特征，这也催生了北极“例外论”。进入 21 世纪，由于北约东扩、科索沃危机、东欧反导系统等问题，美俄在欧洲板块的安全关系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北极自然地理环境也出现显著变化，美俄在北极板块的合作与对抗基本平衡，北极地缘安全环境出现“向安

^① Jørgen Staun, “Russia’s strategy in the Arctic: cooperation, not confrontation”, Copenhagen: Institute for Strategy at the Royal Danish Defence College, 2015,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polar-record/article/abs/russias-strategy-in-the-arctic-cooperation-not-confrontation/0A3C2909C0E881ACEE00D50A5287F047>.

^② Lincoln Flake, “Russia’s Security Intentions in a Melting Arctic”, *Military and Strategic Affairs*, 2014, Vol.6, No.1, pp.99-116.

全化”态势，出现了“新冷战论”。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洲板块对抗冲突加剧，北极板块的对抗超越了合作，北极地缘安全环境呈现“再安全化”特征，这一时期出现了“传统冷战论”和“安全困境论”。自 2022 年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美俄在欧洲板块的对抗进一步恶化为代理战争状态，北极板块的对抗完全取代了合作，北极地缘安全环境表现为阵营化割裂和集团化对抗的“深安全化”态势。

表 1 北极地缘政治的历史断代与安全特征演化

历史断代	地区整体态势	地缘安全特征	理论阐释
冷战时期（1940—1970 年代）	战略威慑前沿	安全化	
后冷战时期（1980—2000 年代）	缓和与合作	去安全化	例外论
进入 21 世纪（2007—2014 年）	合作对抗并存	向安全化	新冷战论
乌克兰危机后（2014—2022 年）	对抗超越合作	再安全化	传统冷战论 安全困境论
俄乌冲突后（2022 年至今）	对抗取代合作	深安全化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从空间关联的视角看，北极联通太平洋和大西洋，毗邻欧亚大陆和北美大陆，周围环绕着俄罗斯、美国等世界大国和西欧、东亚两大世界经济增长极，蕴藏着可观的资源储量，这些空间区位要素决定了北极地缘板块的“全球性”和“外部性”特征，使其必然与邻近地缘板块态势的变化有着天然的正向耦合关系。

在北极地缘格局中，俄罗斯和美国是核心行为体。二者中又以俄罗斯最为核心。原因在于，北极自然地理环境快速变化，对于美俄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尽管美国因阿拉斯加而成为地理意义上的北极国家，但是作为飞地的阿拉斯加无论是人口、GDP、海岸线长度还是该州在美国经济结构中的地位都处在边缘位置。反观俄罗斯，其在北冰洋拥有超过一万公里的绵长海岸线。俄罗斯北极地区生活着近 250 万人口，这里潜藏着储量巨大的能源和资源。

俄罗斯领海范围内的“北方海航路”是北极东北航道的主要航段，具备成为国际航运大动脉的潜力。北冰洋边缘海巴伦支海和沿岸的科拉半岛部署着俄罗斯三位一体的战略威慑力量。这一系列因素都使得北冰洋对于俄罗斯的战略价值和意义远远超过对于美国的。更为关键的是，在北极海冰加速融化的背景下，其价值和意义被进一步快速放大。这就决定了俄罗斯在面对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地缘安全环境的情况下，调整其地缘战略，加快发展北极区域海权。

（一）美俄地缘安全环境变化：北极地缘政治的关键因素

1. 俄罗斯地缘类属身份的转变

地理特征是决定一国地缘类属身份的核心要素。无论是聚焦“心脏地带”的麦金德，还是关注“边缘地带”的斯皮克曼，都将欧亚大陆西南缘的高原沙漠带、北极海冰和青藏高原等视为“心脏地带”的天然地理屏障。^①正是由于北冰洋的对外屏障和对内封固作用，“心脏地带”的泛北部地区受到了保护。尽管历史上先后在波罗的海、黑海和太平洋获得不冻港和出海口，但俄罗斯从未将自己定位为陆海复合型国家。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家杜金在相关论述中，一直强调俄罗斯地缘类属身份的大陆特性。^②

北极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颠覆了古典地缘政治理论的假设，也重塑着俄罗斯的地缘安全环境和地缘类属身份。北极有可能取代国际体系欧洲中心时代麦金德所认定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东欧地区，而成为当今全球体系时代特征下欧亚大陆与北美大陆之间的“心脏地带”。^③并且这里还是远未被完全控制、规范和管理，是对大国战略竞争开放的地缘政治板块。^④如果说

① [英]哈·麦金德著：《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61页；[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和平地理学》，俞海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4页。

② Alexander Dugin, *Last War Of The World-Island: The Geopolitics of Contemporary Russia*, London: Arktos, 2015, p.67; John Dunlop, “Aleksandr Dugin’s Foundations of Geopolitics”, *The Fourth Political Theory*, 2003, Vol.1, No.1, p.1; Marlene Laruelle, *Aleksandr Dugin: A Russian Version of the European Radical Right?*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p.23.

③ Hans W. Weigert, *New Compass of the World: A Symposium on Political Geography*,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49, pp.86-89.

④ Эмануэль Пьетробон. Арктика: последний разворот Евразии. 7 марта 2023 г.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arktika-posledniy-razvorot-evrazii>

300 年前在欧洲体系时代，彼得大帝定都圣彼得堡是为俄国打开了面向欧洲的一扇窗，那么 300 年后全球气候变暖为俄罗斯在北方打开了一扇直面开阔大洋、通达世界的大门。但与此同时，也推倒了俄罗斯北面的一堵墙。北冰洋已然成为俄罗斯的第四地缘政治维度。^①这里也是一个即将展开地缘政治竞争的地区。^②北极方向可能成为俄罗斯未来国家安全的首要方向。^③从自然地理和地缘安全两个角度讲，俄罗斯将成为面向北冰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

2. 美国北极地缘板块权力真空

从 19 世纪末美国海权扩张以来，北冰洋并不是其着力的重点。二战期间，美国第二舰队辖区主要覆盖大西洋和加勒比海地区，不包括北冰洋。随着冷战结束和俄罗斯威胁的减弱，自 2005 年起，第二舰队甚至不再担负大西洋打击舰队的职能。2011 年，美国还曾一度撤销第二舰队的建制。而北约则是在 2003 年撤销了大西洋盟军司令的职位设置。但是北极海冰加速融化，特别是 2014 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促使美国和北约开始恢复北大西洋和北冰洋的军事建制。美国在 2018 年重建第二舰队，北约则在 2020 年重新设立大西洋司令部。两机构合署办公，总部都在美国的诺福克军港，辖区包括北大西洋和整个北冰洋。^④这标志着美国和北约已经将北冰洋调整为军力部署的重点。

从北大西洋防御的视角看，巴伦支海是北大西洋和北冰洋连接处的战略

① “俄罗斯第四个地缘政治维度”这个概念是由俄罗斯学者特列宁在其专著中提出的，意指进入 21 世纪以后，地缘战略价值不断显现的北冰洋成为俄罗斯继西部、南部和东部方向以外的第四个的地缘政治维度。参见[俄]德米特里·特列宁著：《帝国之后：21 世纪俄罗斯的国家发展与转型》，韩凝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 年，第 146 页。

② Pavel Baev, “Russia and geopolitical contestation in the Arctic”, in Karsten Friis, Elana Rowe, Ulf Sverdrup, Mike Sfraga, Pavel Baev, Navigating Breakup: Security realities of freezing politics and thawing landscapes in the Arctic, Norweg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UPI), January 1, 2023.

③ 孙迁杰、马建光：“论北极地缘政治博弈中俄罗斯的威慑战略”，《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1 期，第 14 页。

④ “NATO’s new Atlantic command declared operational”, September 17, 2020, http://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178031.htm; “NATO’s new Atlantic command declared operational”, September 17, 2020,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178031.htm; Sam Lagrone, “New 2nd Fleet Boundary Will Extend North to the Edge of Russian Waters”, August 24, 2018, <https://news.usni.org/2018/08/24/cno-new-2nd-fleet-boundary-will-extend-north-edge-russian-waters>; Michael Fabey, “US 2nd fleet plans for full operational capability by year end. *Jane’s Defence Weekly*, 2019, Vol.56, No.23, p.12.

要冲。巴伦支海是连接美国北方司令部、欧洲司令部、北美防空司令部和北约四大防御板块的通衢险隘，是美国北大西洋防御岛链 GIUK（格陵兰岛-冰岛-英国）的所在地，更是阻遏俄舰艇进出北大西洋扩大态势感知和威慑打击能力的咽喉海域。^①

从全球海权格局的视角看，北冰洋板块直接关系到美国海外军事力量布局的完整性和有效性。19 世纪末，美国的“海权之父”马汉就极力主张美国要向海洋扩张，大力发展海军，以控制关键的海峡、群岛和航道。此后，作为“遏制教父”的斯皮克曼则将美国的海权进一步聚焦在了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将其作为围堵大陆国家的“桥头堡”。^②美国的地缘战略呈现出从大洋两翼（大西洋和太平洋）环扼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态势。因此，其海外军力部署也主要集中在欧亚大陆的东、西、南三个方向，主要包括欧洲-大西洋、中东-印度洋和亚洲-太平洋三大板块。^③美国在地缘战略价值进一步凸显的北冰洋存在力量短板。

（二）美俄北极地缘结构性矛盾：北极地缘政治的主要矛盾

1. 俄罗斯发展北极区域海权的必然性

地缘类属身份的转变必然要求俄罗斯调整地缘战略，这堪称俄罗斯历史上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俄罗斯 2022 年版《海洋学说》明确指出，21 世纪的俄罗斯将同时作为一个陆地和海洋大国而生存和发展。^④然而，俄罗斯在北冰洋地缘方向上面临着现实矛盾。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人口等资源要素布局集中在西部和南部这一客观现实具有悠久历史和强大惯性，短期内难以扭转和均衡。而经济社会发展资源要素严重匮乏的俄北极地区却显露出拥有支撑国家转型发展和开展国际合作的巨大空间与资源潜力。与此同时，俄罗斯北极地区军事力量在冷战结束后大幅削减，但日益开放的自然

^① The Barents Observer, “NATO’s new Atlantic command to keep watch over the European Arctic”, September 18, 2020, <https://thebarentsobserver.com/en/security/2020/09/natos-new-atlantic-command-keep-watch-over-european-arctic>

^② 刘中民、黎兴亚：“地缘政治理论中的海权问题研究——从马汉的海权论到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太平洋学报》，2006 年第 7 期，第 34-45 页。

^③ 樊高月、宫旭平：《美国全球军事基地览要》，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4 年。

^④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31.07.2022 г. № 512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Морской доктри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6 августа 2022 г.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8215/page/1>

地理环境和日益显现内部挑战与外部威胁的地缘安全环境又必然要求俄罗斯加强这一方向上的安全和防卫力量。

从俄罗斯涉北极战略文件来看，俄罗斯北极战略目标的核心指向包括两个方面，即经济海权和军事海权。首先，俄罗斯国家经济严重依赖能源工业和油气资源出口，而俄罗斯现有油气产区储量持续走低，迫切需要开发北极地区新的油气产区。其次，北极东北航道可能使俄罗斯获得“世界新航运枢纽”的战略区位优势。北极东北航道的绝大部分航段（俄称“北方海航路”）紧邻俄北冰洋沿岸领土。北方海航路对俄资源开发和能源项目建设、环境保护和科学考察等领域的政策落实起着基础性的关键作用。^①俄罗斯相关文件中强调，将俄罗斯北极地区建设成为自然资源基地，将北方海航路打造成新的世界航运枢纽。^②最后，北冰洋的可达性带来的是更多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一方面，开放的洋面可能会有更多的走私、偷渡、非法捕捞、非法越界等违法行为。另一方面，美国和北约的海空力量不断提升在北冰洋西部，特别是巴伦支海海域的力量水平与活动频率。而巴伦支海域，相较于俄罗斯西部波罗的海、南部黑海和东部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方向，是北约无法完全封堵、俄罗斯军舰能够相对自由进出北大西洋的豁口。

综上所述，俄罗斯北极战略同时聚焦以航道建设、能源开发为代表的经济海权，和以加强军事建制与机动能力为代表的军事海权，以经济海权和军事海权为双轮驱动，是俄罗斯发展北极区域海权的必然选择。

2. 美国护持北冰洋海权完整的必然性

美国越来越重视北极的地缘战略价值。美国时任北方司令部司令特伦斯·奥肖内西（Terrence O'Shaughnessy）曾表示，美国本土不再是避难所，北极已然成为第一道防线。^③2019 年，美国海岸警卫队发布《北极战略展望》

① 韦进深、舒景林：“北方航道与俄罗斯的北极发展战略评析”，《东北亚学刊》，2013 年第 6 期，第 52 页。

② Основ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Арктике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ода и дальнейш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18 сентября 2008 г.; Стратегия развития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з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ода. 20 февраля 2013 г. <http://www.government.ru>

③ Kyle Rempfer, “Northcom: Arctic now America’s ‘first line of Defence’” May 7, 2019, <https://www.defensenews.com/news/your-military/2019/05/06/northcom-arctic-now-americas-first-line-of-defense>

(Arctic Strategic Outlook)，认为在过去 15 年间，相较于俄罗斯在北极地区进行的大量武器装备和基础设施投资，美国远远落后。^①2020 年美国海军部发布《北极战略蓝图》(A Strategic Blueprint for the Arctic)，为保障北极利益提出三大举措：一是在北极地区常驻海军部队；二是强化各部门、各军种和与盟友(伙伴)间的战略合作联系；三是推动美国海军人员、装备、技术和基建等的现代化升级。^②此后，美国陆军也发布相关报告，提出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军力部署，以“重获北极优势”。^③

总之，美国不会接受北冰洋成为自己全球海权缺口和力量真空的地缘板块。为了遏制俄罗斯获得北冰洋区域海权优势，美国必然要全力护持和提升自身在北极地缘板块的海权存在。美国和俄罗斯在北冰洋发展海权的重叠和碰撞导致双方在北极形成了内生性的地缘结构性矛盾，这是北极地缘政治的主要矛盾。

三、刻画北极地缘政治的演化态势

如果说，美俄在北冰洋的地缘结构性矛盾不可调和，那么一方面，美俄是否会在北极发生正面军事冲突？另一方面，北极地缘态势的演化动力来自哪里？纵观美俄(苏)关系史，两国没有发生过正面军事冲突。相似的多重因素使北极地缘政治主要矛盾具有可控性，对俄美在北冰洋发生正面军事冲突同样起到抑制作用。与此同时，这种可控性并不意味着北极地缘政治态势是一成不变的静止状态，欧洲地缘板块态势变化对北极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外溢影响，这种影响与北极地缘政治主要矛盾同频共振，表现出一种耦合联动效应。

① U.S. Coast Guard, “U.S. Coast Guard releases new Arctic Strategic Outlook”, April 22, 2019, <https://chuckhillscgblog.net/2019/04/22/u-s-coast-guard-releases-new-arctic-strategic-outlook>

② “U.S. Department of The Navy. A strategic blueprint for the arctic”, January 7, 2021, <https://www.navalnews.com/naval-news/2021/01/new-u-s-strategic-blueprint-for-a-blue-arctic-is-no-revolution>

③ Kyle Rempfer, “Army’s new Arctic strategy aims to build expeditionary capability”, March 18, 2021, <https://www.militarytimes.com/news/your-army/2021/03/17/armys-new-arctic-strategy-aims-to-build-expeditionary-capability/>

（一）北极地缘政治演化区间：美俄地缘结构性矛盾可控性

美俄在北极发生正面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①这种可控性源于以下三方面因素。

第一，“大国无战争”。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②经济的相互依赖^③和核威慑^④等因素，使得“大国无战争”已经成为二战后大国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⑤当今时代，战争并非大国战略竞争和地缘博弈的有效手段，甚至可能出现赢得战争但没有获得利益的结果。俄罗斯和美国作为世界两个最大的核

① Ernie Regehr, “Military infrastructure and strategic capabilities: Russia’s Arctic defense posture”, in Kristina Spohr, Daniel Hamilton (eds.) *The Arctic and world order*. Washington, DC: John Hopkins, 2020, pp.187-218.

② John Mueller, *Retreat from Doomsday: 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9; John Mueller, *The Remnants of Wa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Carl Kaysen, “Is War Obsolete: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0, Vol.14, No.4, pp. 42-64; Robert Jervis,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 Will It Resemble the Pa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1/1992, Vol.16, No.3, pp.39-78; Shiping Tang,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Mearsheimer to Jervi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0, Vol.16, No.1, pp.31-55.

③ Richard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Edward D. Ansfield, *Power, Trade and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Alfred Tovas, “The Economic Aspects of Stable Peace-Making”, in Arie M. Karowicz, et al. (eds.) *Stable Peace among Nations*, New York: 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0, pp.150-164; Philippe Martin, Thierry Mayer, Mathias Thoenig, “Make Trade Not War?”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8, Vol.75, No.3, pp.865-900; Solomon Polachek, Jun Xiang, “How Opportunity Costs De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War in an Incomplete Information Gam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10, Vol.64, No.1, pp.133-144; Eric Gartzke, Quan Li, Charles Boehmer, “Investment in the Peace: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1, Vol.55, No.2, pp.391-438; Erik Gartzke, Quan Li, “War and Peace, and the Invisible Hand: Positive Political Externalitie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03, Vol.47, No.4, pp.561-586.

④ Robert J. Art, Kenneth N. Waltz, “Technology, Strategy, and the Use of Force”, in Robert J. Art, Kenneth N. Waltz (eds.) *The Use of Force(2nd edi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3, p.28; Kenneth N. Waltz, “Nuclear Myths and Political Realiti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0, Vol.84, No.3, p.740; Robert L. O’Connell, “War: Institution Without Portfolio”, in Richard W. Bulliet (ed.) ,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New York: Colo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253-258. Philip Delmas, *The Rosy Future of War*,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p.146;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232-233. Martin van Creveld, “The Future of War”, in Robert G. Patman (ed.) *Security in a Post Cold War World*, St. Martin’s, 1999, p.31; Martin van Creveld,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44.

⑤ 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第14页。

国家更是如此。两国在北极地区还保留着大量战略威慑和预警力量与装备。从这个层面讲，北极甚至是不容出现试探和误判的禁区。

第二，美俄在北极没有直接冲突点。尽管美俄在北冰洋大陆架划界原则上存在分歧，如俄罗斯认为在北冰洋底穿过极点的罗蒙诺索夫海岭是本国大陆架自然延伸的一部分，而美国则认为该海岭是独立地质结构，并非大陆架的自然延伸。但该问题仍在国际法框架下寻求解决。俄罗斯还在不断地收集科学数据和证据，向联合国大陆架划界委员会提出认定申请。两国在白令海峡的划界虽然处于“在协议外执行协议”的状态，但是“默契的秩序”一直没有被破坏。甚至在克里米亚事件发生之后的 2015 年，美俄相关职能部门还在北极海岸警卫队论坛框架下在白令海峡开展联合巡航演习。

第三，美俄在北冰洋没有代理人。无论是冷战期间发生在两大阵营边缘地带的战争冲突，还是冷战结束后美俄之间的地缘博弈，双方会选择在幕后操纵代理人的方式进行。但是在北极，双方都没有可以利用的代理人。尽管美国有北约的北欧盟国作为其北极“大棋局”的重要支轴，但北欧国家间没有可以被美俄利用的现实冲突。更重要的是，北欧国家更多地奉行“双重二分”平衡战略，^①即一方面在军事安全领域对美坚定追随的同时，对美政策进行筛选，防止其过分挑衅俄罗斯的安全底线，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秩序；另一方面，在对俄实施有效威慑的同时，对俄作出适当的安全保障承诺，以降低其威胁感知。

北冰洋海岸线绵长的俄罗斯，就像 1962 年加勒比海沿岸的美国一样，希望获得和平、稳定的地缘安全环境，以专注于本国北极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应对生态环境安全等一系列挑战和风险。^②而美国北极战略更多地表现出“为我所控”的诉求。北欧国家也不希望本国所处的地缘板块动荡和失序，会对美国和北约的政策进行筛选和限制，避免过度刺激俄罗斯。因此，美俄北极地缘结构性矛盾具有可控性。这种可控性决定了美俄双方在北极不会发

^① Jacob Børresen, “Alliance Naval Strategies and Norway in the Final Years of the Cold War”,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2011, Vol.64, No.2, pp.105-106; Robin Allers, et al. *Dealing with Russia in the Arctic: Between Exceptionalism and Militarization*, Germ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o.4, October 2021, <https://www.ssoar.info/ssoar/handle/document/75746>

^② Основ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Арктике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35 года. 5 марта 2020 г. <http://kremlin.ru/acts/news/62947>

生正面冲突。因此，北极地缘政治的演化区间，一端是美俄正面冲突，另一端是美俄矛盾调和，北极地缘态势演化将在两端之间作钟摆运动，但不会触及两端。

（二）北极地缘政治演化动力：欧洲板块影响外溢的联动性

从历史上看，北极与欧洲地缘板块有着天然的耦合联动关系。一战结束后，大地地缘博弈与协调的版图从欧洲大陆伸展到了北冰洋海域。围绕斯瓦尔巴德群岛的争端，以及后来包括中国在内的 50 余个国家缔结的《斯匹次卑尔根条约》，表明从那时起欧洲就与北极形成了地缘联动关系。二战期间，位于北大西洋和北冰洋连接处的巴伦支海航线是同盟国共同对抗法西斯进行战争物资运输的北欧“胡志明小道”。

冷战期间，北冰洋成为美苏相互战略威慑的前沿核心地带。尽管美苏地缘战略博弈的重心仍然在欧洲板块，但是北冰洋已经成为美苏实施战略威慑和预警的前沿地带。因此，北冰洋成了全球地缘格局中的重要板块，与欧洲板块耦合联动的特征更加明显。当美苏在欧洲板块对抗加剧时，这种压力消极外溢至北极，北极板块的威慑张力增加。例如，美国冷战初期就在阿拉斯加设立防空识别区，在阿拉斯加和格陵兰岛部署大型空军基地和战略轰炸机。苏联在北冰洋新地岛试验 5000 万吨当量的氢弹以示威慑。苏联的第一枚核鱼雷也在新地岛成功试射。美苏的战略轰炸机和核潜艇在北冰洋的空中和冰盖之下进行着较量，旨在对对方实施战略威慑，同时提升己方发动穿极战略打击的机动能力。美苏在北极地缘板块所展现的“相互确保摧毁”的能力，是双方在欧洲板块对抗博弈的实力依托。但是，自冷战后期开始，北极地缘态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欧洲与北极地缘板块的耦合联动也更加明显、紧密。

1. 后冷战时代欧洲板块“去安全化”积极影响外溢北极

冷战末期和冷战结束后，美苏（俄）在欧洲板块的缓和态势外溢到了北极，北冰洋成为两大阵营“破冰”合作的先行地区。首先，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美苏就欧洲安全架构达成了建立“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共识。其中最为关键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签署地正是北极国家芬兰。冷战期间，芬兰一直在两大阵营夹缝中保持中立，又同时与双方保持沟通和合作关系。

其次，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苏缓和与冷战缓解的进程加快。作为冷战结束的标志性事件，1987年戈尔巴乔夫的“摩尔曼斯克讲话”就是在北极圈内发表的。最后，破除阵营藩篱的北极合作进程启动，奠定了当今北极多边治理架构的基础。从1989年芬兰召集八个北极国家讨论环境保护问题的“罗瓦涅米进程”、1990年跨越东西方阵营的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IASC）成立，到1996年北极理事会在加拿大渥太华宣告成立；从1993年的挪威倡议的巴伦支-欧洲北极区域合作机制到1998年的欧盟北方维度合作机制，欧洲板块的缓和态势与北极板块的合作进程有着明显的耦合联动效应。北极地缘政治态势演化趋向调和一端，北极地缘政治总体呈现出合作治理取代竞争博弈的特征。

2. 2007年以后欧洲安全关系恶化与北极地缘政治形势逆转

进入21世纪之后，欧洲板块形势逆转，北极与欧洲板块的耦合联动更加频密和敏感。2004年，北约宣布进入21世纪后的首轮、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东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7个国家加入了北约。这些国家不仅有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还有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此外，美国和俄罗斯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的问题上矛盾逐渐尖锐化。2007年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对美西方的警示性讲话宣告了冷战结束后美俄缓和与合作进程开始逆转。^①

无独有偶，2007年，北极海冰面积缩减至有监测历史以来的最低点。2008年，美国地质调查局公布《北极地区油气潜力评估报告》，向世人揭示了北极所蕴藏的巨大能源储量。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与欧洲板块对抗加剧消极外溢至北极导致的地缘安全环境变化，两种变化的影响双重叠加，这与美俄北极地缘结构性矛盾共同作用，使北极板块重现对抗态势。

俄罗斯方面，2007年8月，俄罗斯在北冰洋底插旗，被认为是点燃北极地缘政治博弈的标志性事件。^②俄罗斯还先后恢复了包括北冰洋在内的三

^① Katarzyna Zysk, "Military Aspects of Russia's Arctic Policy: Hard Power and Natural Resources", in James Kraska (ed.) *Arctic Security in an Age of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② C. J. Chivers, "Russians Plant Flag on the Arctic Seabed", *New York Times*, August 3, 2007.

大洋远程轰炸机和核潜艇战略巡航。^①美国方面，俄罗斯插旗事件当月，美国“希利”号破冰船赴北冰洋进行科考，美国务院提出自阿拉斯加海岸以北 600 海里的外大陆架划界主张。2009 年，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联合发布《21 世纪海权合作战略》，指出气候变化正在逐渐打开北极水域的大门，不仅为开发能源资源带来了可能，还可能开辟重塑全球运输体系的新航线。虽然这些发展为增长提供了机会，但也存在着为争夺航行准入权和自然资源开发而产生竞争和冲突的潜在风险。2009 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签署首份阐述北极区域政策的“国土安全和国家安全总统令”。这表明北极重新进入美国国家安全的战略视野。

进入 21 世纪，北极地缘政治态势演化回摆趋向对抗一端。但总体来说，北极地缘政治总体特征仍呈现合作治理与竞争博弈基本平衡的态势。2008 年，包括美俄在内的北冰洋沿岸五国发表《伊鲁丽萨特宣言》（Ilulissat Declaration），这一宣言有着浓厚的北极“门罗主义”色彩，但也表明美俄在北极问题上仍能达成政治共识。在北极理事会框架下，2011 年和 2013 年先后签署了《北极地区空海搜救协议》和《北极海洋油污防范及应变合作协议》。这表明北极的多边治理合作机制仍然在大国共识下积极运转。

3. 2014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与北极地缘政治对抗加剧

2014 年以后，受到克里米亚事件和乌克兰冲突的影响，欧洲地缘板块态势立即传导至北极。2015 年北极理事会第九次部长级会议上，北极八国未签署任何合作协议。这是继 2011 年和 2013 年后的首个无协议成果年。美俄两国在北极加紧提升军事能力。

俄罗斯方面，2014 年俄国防部宣布组建北方联合战略司令部，进一步整合和强化北冰洋方向的军事力量与建制。此后，俄罗斯在北极圈内规划建设多座新型现代化“三叶草”军事基地。同时，加快建造大吨位常规动力和核动力主航道破冰船和武装破冰巡逻船，加快北冰洋沿岸军民两用基础设施建设，如“罗蒙诺索夫院士”号海上移动核电站等。

美国方面，2017 年和 2018 年，美国先后两轮在挪威境内轮换部署海军

^① Katarzyna Zysk, “Military Aspects of Russia’s Arctic Policy: Hard Power and Natural Resources”, in James Kraska (ed.) *Arctic Security in an Age of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陆战队员近 800 人，实现了军事力量的常态化存在。美国不仅于 2018 年恢复了第二舰队建制，其辖区明确包括至巴伦支海俄罗斯海上边界的北冰洋海域，而且还纠集北约盟国开展多场针对性军事演习。比如，2018 年，北约在挪威举行史上最大规模的“三叉戟”演习。美俄军事力量在北冰洋海域展开近身博弈。美国“杜鲁门”号航母借此演习的机会在冷战结束近 30 年之后再次进入北冰洋。而俄罗斯则多次抵近侦察并对演习成功实施了电子干扰。再如，2020 年 5 月，美英海军在挪威海开展联合演习。从参演装备看，美英此次联合军演主要战术目的是反导和反潜，而战略目的则包括重建北约凝聚力，抵制俄罗斯的北极“野心”。面对美英的“贴脸”军演，俄方同样以临近海域的大规模军演作出强力回应。

2014 年以后，北极地缘政治态势演化受到欧洲地缘板块消极外溢的影响，进一步向对抗冲突一端摆动，其总体特征已经打破了合作治理与竞争博弈的平衡态势，大国战略竞争和地缘博弈成为北极地缘政治的主旋律。

4. 2022 年以来欧洲地缘板块冲突与北极地缘政治割裂

2022 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欧洲板块爆发武装冲突的态势外溢至北极，导致北极地缘格局的阵营化割裂和集团化对抗，具体表现为政治外交斗争、经济技术脱钩和军事安全博弈这三个方面。

在政治外交领域，美西方国家在北极几乎所有的多边治理和国际合作机制中排斥或孤立俄罗斯。2022 年 3 月，北极理事会除俄罗斯外的七国宣布暂停工作，以抵制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6 月，北极七国宣布恢复北极理事会无俄方参与的项目和事务。俄罗斯当时作为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被排除在外。巴伦支欧洲-北极理事会（Barents Euro-Arctic Council）和欧盟“北方维度倡议”（Northern Dimension Initiative）也先后暂停了与俄罗斯有关的活动。2023 年 2 月，美国正式任命首位北极大使。10 月，美国在挪威北部城市特罗瑟姆恢复设立外交机构，旨在加强美国在北欧和北极地区的影响力。冷战时期，美国曾在这里设立的外交办事处于 1994 年关闭。可以预见，美国新设立的北极大使将成为统筹北极盟国军力的总召集人、协调盟国行动的总牵头人和对俄威慑对抗的总指挥官的角色。

在经济技术领域，美西方国家终止或暂停同俄罗斯的北极合作。2022

年 6 月，美国贝克休斯公司停止向俄罗斯“北极-2”液化天然气项目交付作为天然气液化压缩关键装备的燃气轮机。7 月，全球领先的机械制造企业 ABB 俄罗斯分公司宣布退出俄罗斯市场。其大功率吊舱推进系统是俄罗斯核动力和常规动力主航道破冰船、高冰级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北极高端装备的核心部件。10 月，法国德西尼布集团（Technip）和意大利能源工程集团萨伊佩姆（Saipem）退出俄罗斯“北极-2”液化天然气项目建设的 EPC 承包商团组。同月，芬兰外交部拒绝为俄罗斯公司向芬兰赫尔辛基造船厂订购的最新型破冰船发放出口许可证。2023 年 5 月起，韩国韩华海洋（前身是大宇造船）和三星重工宣布，由于俄方无法履约支付款项，相继停止 21 艘 ARC7 级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建造合同。2024 年 1 月，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宣布退出“北极-2”液化天然气项目。

在军事安全领域，美西方对俄军事遏制力度进一步升级。2022 年 6 月，美国陆军重启第 11 空降师，驻扎在阿拉斯加，遂行北极作战任务。9 月，美国国防部宣布成立北极战略与全球复原力办公室，旨在支持各军种提升在北极地区遂行任务的能力，深化与盟友和伙伴的合作关系，加强各军种的北极作战能力训练。

如果说，2022 年以前，美国北极军力建设基本处于国内恢复力量、海外轮换部署、利用与盟国联合军演实现力量间接存在的状态，那么，2022 年以后，美国开始在北极部署战略性、威慑性武器装备，轮换部署转变为不限期或常驻状态，强化在北极前沿的军事力量直接存在。2023 年 2 月，美国空军首次将可携带核弹的 F-35A 战斗机部署至格陵兰岛图勒空军基地。6 月，美国 B-1B 战略轰炸机首次飞抵瑞典吕勒奥卡拉克斯空军基地。2024 年 2 月，两架 B-1B 战略轰炸机再次飞抵瑞典并作不定期停留。美国还在挪威部署了四架 B-1B 战略轰炸机。自 2023 年 6 月以来，美国密集地同北欧国家挪威、丹麦、瑞典、芬兰达成一系列双边防务协议。根据这些协议，美军实现了在北欧国家常驻，北欧国家的 44 个军事基地对美军开放。北欧国家突破了二战以来拒绝外国驻军的传统政策。未来，美国和北约在北极的联合军演将更加频繁。

2023 年以来，北欧国家牵头组织或参与北约框架下的一系列大规模联

合军事演习，如“北极挑战-2023”、“北欧响应-2024”、“坚定捍卫者-2024”、“联合战士-2024”、“辉煌跳跃-2024”和“北极冲击-2024”等。演习主要地点集中在与俄罗斯接壤的北欧北部陆地和巴伦支海等海空域。在“北欧响应-2024”演习期间，还对北欧联合空中作战中心进行了首次测试，旨在落实 2023 年挪威、瑞典、丹麦和芬兰四国空军参谋长签署的建立联合空军的意向书。在“北极冲击-2024”演习期间，美国第 11 空降师约 150 名空降兵从驻地阿拉斯加飞越北极跳伞降落在挪威北部。这些演习不仅国家有交叉重合，时间也有所重叠，表明北欧国家对欧洲战事扩大化的担忧和防备。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演习已经具备了对俄战备动员的特征。此外，美国还在推动整合北欧盟国的“军事申根”。在双边协议的基础上，推动实现在北欧国家间自由跨境调动军队。这将使美国不仅能够能够在北欧国家部署军队、军事基础设施和防空系统，还能够不受驻在国行政和法律约束的条件下自由调动军队和装备，以提升机动和作战能力。

总之，2022 年以来，北极地缘政治态势演化已经逼近正面冲突，其总体特征已经呈现出竞争博弈完全取代合作治理的趋势。

梳理北极地缘政治演化历史可以发现，欧洲地缘板块态势与北极地缘板块态势存在着正向的耦合联动效应，即美俄（苏）在欧洲板块的关系缓和，北极的多边治理与国际合作便得以推进；美俄在欧洲板块的安全关系恶化，则北极板块对抗张力加剧。而欧洲地缘态势变化的影响之所以会对北极地缘态势产生作用，主要是由于美俄在北极的地缘结构性矛盾。概而言之，欧洲地缘板块态势变化是触发美俄在北极的地缘结构性矛盾进而导致北极地缘政治演化的主要动力。

四、结 语

北极变暖的速度是全球的 2.5~3 倍。有研究表明，北冰洋“无冰的夏天”可能会从原来预计的 2050 年代提前到 2030 年代。^①乌军进攻库尔斯克以后，

① Kim Yeon-Hee, Min Seung-Ki, Nathan Gillett, Dirk Notz, Elizaveta Malinina, “Observationally-constrained projections of an ice-free Arctic even under a low emission scenario”,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3, Vol.14, No.1, p.3139.

俄乌冲突短期内实现停火和谈的希望更加渺茫。美俄将在缺少缓和契机和协调机制的情况下推进各自的北极地缘战略。美国将在加强北极力量存在同时，更多地利用盟国护持其全球海权在北极地缘板块的完整性。俄罗斯也将继续发展包括经济海权和军事海权的北冰洋区域海权，以维护本国的安全和主权权益。在欧洲地缘板块的“外部性”影响和俄美北极地缘结构的“内生性”矛盾加剧的共同作用下，北极地缘政治将呈现以下两大特征。

1. 地缘格局“北约化”将加剧北极地缘态势紧张。如果正如当前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北约成为主导欧洲地缘格局的安全架构，那么美俄在北极地缘板块的对抗张力不会减弱。当然美俄不会在北极发生正面冲突，而是更多地表现为在关键区域的竞争与博弈加剧。俄、美、欧交界的“巴伦支-欧洲”陆海区域作为北极地缘板块战略要冲的特征将进一步凸显。美国会充分利用北约北欧盟国对俄罗斯实施遏制和威慑。俄罗斯也会全力维护在这一战略方向的利益，不排除其采取试探性举措的可能性。一方面是为了缓解地缘安全压力，另一方面是以“进攻性楔子”分化或弱化敌对同盟。北欧国家将不得不在“与美国结盟”和“靠俄罗斯太近”的地缘安全环境中微妙拿捏。北欧国家可能继续强化“双重二分”战略，即在追随美国的同时，限制北约对俄罗斯的挑衅性行为；在遏制威慑俄罗斯的同时，承诺保障俄罗斯的正当安全关切。北欧国家可能扮演美俄北极博弈“防波堤”的角色。这一判断的关键依据在于，如果说欧洲大陆的地缘态势因波罗的海而与北欧相阻隔，那么“巴伦支-欧洲”则是北欧国家赖以生存的家园。

2. 欧洲安全架构重塑直接影响北极地缘态势演化。俄乌冲突带给欧洲乃至全球地缘格局的最大影响是冷战后期确立的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为基础的欧洲安全架构的坍塌。俄乌冲突以何种方式结束仍不明朗，但其必然与欧洲安全架构的重塑相伴随。后俄乌冲突时代，欧洲安全架构会是美国主导的北约来全面接管，还是由谋求战略自主的欧盟来探索构建，抑或是英、法、德和北欧国家各自发展小多边安全架构，并以某种形式相关联的、碎片化的、无架构的架构形式呈现？答案显然是不确定的。但可以确定的是，欧洲安全架构的形制将直接决定俄、美、欧三方的地缘战略关系，并直接影响北极地缘政治态势的演化趋向。

2024年3月25日,美国的B-1B战略轰炸机与俄罗斯米格-31战斗机在巴伦支海空域发生对峙。这似乎印证了本文的如下结论:美俄北极地缘结构性矛盾是北极地缘政治的内生性主要矛盾,具有必然性和可控性。在受到欧洲板块影响外溢的耦合联动作用下,以巴伦支海为战略要冲,以美俄矛盾“不可调和”但又“斗而不破”为主要特征,以北欧国家“双重二分战略”为主要平衡砝码,北极地缘政治态势将在加剧与缓和的演化区间内做钟摆运动。

【Abstract】 The increasing fragmentation and confrontation in the Arctic geopolitics today have overturned the notion of Arctic “exceptionalism” and highlighted the inadequacies of theories like the “Cold War” perspective in explaining current realities. Building on the critique of these existing theoretical flaws, this paper adopts a comprehensive spatiotemporal perspective, integrating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connections to explain the fundamental nature and evolutionary dynamics of the arctic geopolitics. By defining core concepts such as key factors, primary contradictions, evolutionary intervals, and driving mechanisms, it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Arctic geopolitics and proposes the “Coupled Interaction Theory” as a response and refinement to existing theorie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ccelerating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the prolonged Russia-Ukraine conflict, the “endogenous” conflicts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Arctic, coupled with the “exogenous” influences of the European geopolitical landscape,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evident. Arctic geopolitics will manifest two main features: the intensification of a NATO-like geopolitical pattern, heightening tensions in the Arctic, and the reshaping of the European security architecture, which will directly impact the evolution of the Arctic geopolitical landscape.

【 Key Words 】 Exceptionalism, Cold War Perspective, the Arctic Geopolitics, Evolutionary Dynamics, Coupled Interaction

【 Аннотация 】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фрагментация и усиление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в Арктике ниспровергли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сть» Арктики и подчеркнули недостаток внимания и неспособность объяснить реальность «теорией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в Арктике. На основе критики логических дефектов существующих теорий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анализируются основ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и эволюция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геополитики с интегрированны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о-временным взглядом на эпохаль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ые связи, строится теоретическая основа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геополитики путём определения

основных понятий, таких как ключевые факторы, основны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эволюционные интервалы и движущий механизм, и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теория сопряжённости и сцепления» в качестве ответа на и коррекции существующих теорий. В статье делается вывод о том, что на фоне ускоряющегося глобального изменения климата и продолжающегося затяги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всё более очевидной становится сопряжённость «эндогенных» конфликтов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США в Арктике и влияние «экстернальности»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и Европы на Арктику.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Арктики будет иметь две основ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НАТОзация»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будет усиливать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напряжённость в Арктике, а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архитектуры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окажет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эволюцию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Арктике.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Теория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сти, теор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арктическая геополитика, эволюция, сопряжённая связь

(责任编辑 李 恪)

全球产业链竞争加剧背景下 俄罗斯战略性矿产政策调整的分析*

石稚瑄**

【内容提要】战略性矿产是国防建设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基础，重要性不言而喻。俄罗斯于1996年首次发布战略性矿产清单，此后以资源民族主义为导向对战略性矿产资源进行管理。在全球产业链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俄罗斯对战略性矿产政策进行了调整，具体包括更新战略性矿产清单、加强对战略性矿产资源的管理、加快战略性矿产勘探与开采、推动国际战略性矿产合作四个方面，旨在参与地缘博弈、减少外部依赖以及应对经济制裁。俄罗斯战略性矿产政策的调整将提升其在全球矿产供应链产业链中的地位，加剧全球矿产供应链产业链的安全化和阵营化发展趋势，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的关键矿产地缘竞争压力。然而，俄罗斯战略性矿产政策的落实也面临一系列挑战。一方面，西方国家的制裁阻碍了俄罗斯矿业现代化的进程；另一方面，部分发展中国家开发优质矿产冲击了俄罗斯的矿产出口地位，并且，这些资源出口国的资源民族主义抬头，增加了俄罗斯矿产进口的不确定性。

【关键词】俄罗斯战略性矿产 关键矿产 全球产业链 资源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D8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4)05-0164(33)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俄乌冲突、经济制裁与俄罗斯经济转型研究”（项目批准号：22JJD810008）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 石稚瑄，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矿产资源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国防安全的重要保障。随着全球产业升级以及绿色、数字科技的发展，关键矿产（critical mineral）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在关键矿产成为大国竞争新场域的背景下，各国纷纷出台相关战略和政策，例如美国的《确保关键矿产安全可靠供应的联邦战略》、欧盟的《关键原材料法案》、澳大利亚的《关键矿产战略》、日本的《保障重要矿产稳定供应举措政策》等。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上述发达国家以及部分资源出口国的矿产战略，^①忽视了俄罗斯将矿产资源打造成战略资产的努力。继2018年12月俄罗斯联邦政府第2914号令批准《2035年前俄罗斯联邦矿物原料基地发展战略》（以下简称《2035年发展战略》）后，2024年7月俄联邦政府第1838号令批准了《2050年前俄罗斯联邦矿物原料基地发展战略》（以下简称《2050年发展战略》）。^②尽管俄罗斯“矿产大国”的身份不似“油气大国”一般引人注目，但俄罗斯矿产资源的丰富程度也不容小觑。^③在全球产业链竞争加剧的形势下，矿产潜能或将为俄罗斯带来新的地缘战略筹码。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必要对俄罗斯矿产政策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并未使用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关键矿产或关键原材料（critical raw material）概念。根据美欧各国的官方界定，关键矿产主要有

① 参见于宏源、关成龙、马哲：“拜登政府的关键矿产战略”，《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11期，第1-8页；丁思齐、刘国柱：“美国的关键矿物战略论析”，《当代美国评论》，2023年第1期，第43-63页；李刚：“双转型、地缘政治与欧盟关键原材料战略新动向”，《德国研究》，2023年第5期，第45-75页；刘雪莲、康喜顺：“日本关键矿产供应链保障措施评析与思考”，《现代日本经济》，2023年第5期，第27-41页；许善品、罗雪妮：“澳大利亚的关键矿产战略：战略取向、内在动因和潜在影响”，《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第64-72页；杨沛鑫：“资源民族主义主导下的印尼关键矿产战略论析”，《东南亚研究》，2024年第3期，第44-66页。

②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Стратегии развития минерально-сырьевой базы России до 2035 года. 28 декабря 2018 г. <http://government.ru/docs/35247/>;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актуализировало и продлило Стратегию развития минерально-сырьевой базы до 2050 года. 29 июля 2024 г. <http://government.ru/docs/52250/>

③ 俄罗斯矿产资源丰富并不意味着所有矿种都能自给自足。如后文所述，在历史矿床耗尽、新矿床地理位置不利、国内需求低迷等因素影响下，俄罗斯部分矿产仍依赖进口。

两个特征：第一，对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至关重要；第二，供应链面临较大的中断风险。^①俄罗斯使用的概念是战略性矿物原料（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минеральное сырье，以下简称战略性矿产）。《2050 年发展战略》明确指出了它的特点，即“对于保障国民经济的可持续运行、确保国防安全、满足高科技产业部门的需求、保证在全球矿产及其深加工产品贸易中取得国际竞争优势尤为重要。”^②对比可知，战略性矿产包含了关键矿产的第一个特征。而且，与西方国家制定关键矿产清单类似，俄罗斯联邦政府分别于 1996 年和 2022 年两次发布战略性矿产清单。有俄罗斯学者认为，稀缺性矿物原料（дефицитное минеральное сырье，以下简称稀缺性矿产）在内容上更接近于关键矿产。^③

本文认为，稀缺性矿产只强调了关键矿产的第二个特征，完全对应关键矿产的应当是战略性矿物原料的稀缺类型（дефицитные виды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минерального сырья，以下简称稀缺型战略性矿产）。但稀缺性矿产和稀缺型战略性矿产这两个概念都没有明确的标准和定义。俄罗斯自然资源部仅在一份 2019 年颁布的关于调整稀有金属（редкий металл）矿产开采税的法案中，根据稀有性以及提取的复杂性、高成本列出了 36 种稀有金属，且其中的 30 种都被纳入 2022 年的战略性矿产清单。有鉴于此，本文尝试梳理俄罗斯的战略矿产政策，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分析在全球产业链竞争加剧背景下的政策调整，探讨普京政府进行政策调整的动因，并展望

① “A Federal Strategy To Ensure Secure and Reliable Supplies of Critical Minerals”, December 26, 2017, <http://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17/12/26/2017-27899/a-federal-strategy-to-ensure-secure-and-reliable-supplies-of-critical-minerals>; Milan Grohol, Constanze Veeh, “Study on the critical raw materials for the EU 2023 – Final report”, European Commission, 2023, <https://ec.europa.eu/docsroom/documents/42883/attachments/1/t ranslations/en/renditions/native>; “Resilience for the Future: The UK’s Critical Minerals Strategy”,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2022,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62f36baf90e07714288b188/resilience_for_the_future_the_uk_s_critical_minerals_strategy.pdf; “Critical Minerals Strategy 2023-2030”, Department of Industry, Science and Resources of Australia, June 20, 2023, <https://www.industry.gov.au/sites/default/files/2023-06/critical-minerals-strategy-2023-2030.pdf>

②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1 июля 2024 г. № 1838-р.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стратегии развития минерально-сырьевой базы РФ до 2050 г.1 августа 2024 г. <https://www.garant.ru/products/ipo/prime/doc/409341699/#1000>

③ Ерёмин Н.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дефицитное и критическое минеральное сырье: интерактивное учебно-методическое пособие. М.: КДУ, 2020. С.9-12.

调整的影响以及可能面临的挑战（俄罗斯主要矿产及矿产品的世界排名情况见表1）。^①

表1 2019年俄罗斯主要矿产及矿产品的世界排名

排名	矿产及矿产品（俄罗斯产量占世界产量的百分比）
第一名	石棉（68%）、金刚石（36%）、钶（43%）
第二名	铝（5.8%）、锑（19%）、钴（4.4%）、镓（2.3%）、锗（3.8%）、镁化合物（5.5%）、镁（6.0%）、氮（11%）、铂（13%）、硅（7.3%）、碲（10%）、钒（21%）
第三名	砷（4.6%）、金（9.2%）、镍（11%）、钾肥（18%）、硫（9.4%）、海绵钛（22%）、钨（2.6%）
第四名	石灰（2.5%）、生铁（3.9%）、磷矿石（5.8%）、白银（7.5%）
第五名	氧化铝（2.1%）、铁矿石（4.2%）、生钢（3.9%）、精炼铜（4.2%）、硒（5.2%）、蛭石（6.4%）
第六名	石墨（2.3%）、铅（4.9%）、稀土（2.3%）
第八名	镉（3.7%）、水泥（1.4%）、石膏（3.7%）、铟（0.5%）、泥炭（2.8%）
第九名	铝土矿（1.6%）、钼（1.0%）、钽（1.4%）、沸石（3.2%）
第十名	重晶石（1.8%）、硅藻土（2.3%）、盐（2.4%）、锌（2.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2019俄罗斯矿业年鉴整理。^②

二、俄罗斯战略性矿产政策的历史演进

俄罗斯的战略矿产政策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因缺乏资金，大幅削减了地质勘探项目，矿产资源新增探明储量的速度

^① 本文认为俄罗斯的“战略性矿产”概念在国家重视程度上等同于西方国家的“关键矿产”概念。本文将根据提到的国家交叉使用这两个概念。

^② 美国地质调查局俄罗斯矿业年鉴目前仅更新到2019年；根据年鉴，硼、镉、镁化合物、镁、硒和碲的世界排名及占世界产量的百分比都不包括美国。Elena Safirova, “The Mineral Industry of Russia”, U.S. Geological Survey, 2019, p.1.

远远赶不上原有储量被开采的速度。以 1996 年为例，探明储量仅补充了当年铅锌开采量的 37%、锡的 28%、钨的 21%、铜的 18%、镍的 16% 和铝土矿的 15%。^①在此背景下，明确具有战略重要性的矿产，有利于俄政府集中资源重点勘探和开采。1996 年 1 月，俄罗斯联邦政府第 50 号令首次发布了战略性矿产清单，确定了 29 种主要的战略性矿产。^②

在制定清单的基础上，俄罗斯以资源民族主义为导向，对战略性矿产资源进行管理。一是明确战略性矿藏。进入 21 世纪后，西方资本迅速涌向俄罗斯以石油行业为代表的战略性行业，引发了俄罗斯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担忧。^③在 2005 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总统指出，对于关系到俄罗斯独立和安全利益的经济领域，民族资本或国家资本必须占绝对控制地位，其中包括“对国家未来和子孙后代具有战略意义的矿藏。”^④2005 年 10 月，自然资源部以矿床种类、储量和位置为标准划定战略性矿藏。^⑤2008 年 4 月，俄罗斯修订《地下资源法》，将以下战略性矿藏认定为联邦级别：含有铀、金刚石、高纯石英、钷族稀土、镍、钴、钽、铌、铍、锂、铂族金属的矿藏，储量超过 7000 万吨的油田，储量超过 50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田，位于本土且储量超过 50 吨的金矿，储量超过 50 万吨的铜矿等。^⑥为吸引投资，自然资源部曾多次提议将战略性金矿的划定标准由 50 吨提高到 200 吨或 250 吨，但都

① Richard M. Levine, “The Mineral Industry of Russia”, *U.S. Geological Survey*, 1996, p.20.

②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от 16.01.1996 N 50-р «Об основных видах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минерального сырья». 16 января 1996 г. <https://legalacts.ru/doc/rasporjzhenie-pravitelstva-rf-ot-16011996-n-50-r/>

③ 关雪凌、张猛：“普京总统政治经济学解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 年第 2 期，第 160-161 页。

④ [俄]普京：《普京文集（2002—2008）》，张树华、李俊升、许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86 页。

⑤ МПР определило, какие участки недр станут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и». 17 октября 2005 г. <https://www.rbc.ru/economics/17/10/2005/5703c26b9a7947dde8e09e05>

⑥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29 апреля 2008 г. N 58-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отдельны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признании утратившими силу отдельных положений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х а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связи с принятием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О порядке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инвестиций в 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е общества, имеющи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обороны страны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и дополнениями). 29 апреля 2008 г. <https://base.garant.ru/12160211/1cafb24d049dcd1e7707a22d98e9858f/>

因俄罗斯安全部门的反对而失败。^①

二是限制外资进入战略性矿藏领域。2008年4月，俄罗斯通过了《战略领域外国投资法》，涵盖核工业、国防和航空等42个行业。在矿产方面，该法规定，对于联邦级战略性矿藏，如果外国私人投资者或外国政府控制的企业持有具有表决权的股份超过10%或5%，必须事先经过政府部门批准。^②为降低外资进入的门槛，该法2011年修订后放宽了对外国私人投资者的限制，将需要政府部门批准的持股比例提高到25%。^③

三、俄罗斯战略性矿产政策的调整

近年来，各国围绕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等产业展开激烈博弈。^④关

① 2012年，俄罗斯自然资源部提议将战略性金矿的划定标准由50吨提高为250吨，2019年，俄罗斯自然资源部提议将战略性金矿的划定标准由50吨提高为200吨，俄罗斯安全部门反对上述提议。См. МПР осенью ждет закона, увеличивающего долю иностранцев в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проектах. 31 июля 2012 г. <https://www.mineral.ru/News/49511.html>; Минприроды предложило повысить порог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месторождений золота в четыре раза. 29 января 2019 г. <https://www.pnp.ru/economics/minprirody-predlozhiло-povysit-porog-strategicheskikh-mestorozhdeniy-zolota-v-chetyre-raza.html>;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не облегчит доступ частных инвесторов к крупным золотым месторождениям. 18 декабря 2019 г. <https://www.kommersant.ru/doc/4197787>

②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29 апреля 2008 года N 57-ФЗ «О порядке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инвестиций в 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е общества, имеющи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обороны страны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6 мая 2008 г. <https://rg.ru/documents/2008/05/07/investicii-fz-dok.html>

③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статью 6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Об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инвестициях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порядке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инвестиций в 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е общества, имеющи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обороны страны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6 ноября 2011 г.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34281/print>

④ 参见蔡翠红：“全球芯片半导体产业的竞争态势与中国机遇”，《人民论坛》，2022年第14期，第92-96页；李金峰：“美国对华半导体产业链竞争：东亚地区的视角”，《外交评论》，2023年第3期，第51-77页；李巍、邹玥、竺彩华：“电动汽车革命：大国产业竞争‘新赛道’”，《国际经济评论》，2023年第4期，第93-117页；丁纯、张铭鑫、孙露：“中欧新能源汽车产业争端：现状、原因和前景”，《欧洲研究》，2024年第2期，第36-62页；吴泽林：“全球动力电池竞争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24年第3期，第5-24页；孔繁颖：“‘再铸强权’：美国对华大容量电池产业的战略竞争”，《国际论坛》，2024年第4期，第103-122页。

键矿产在上述高新技术产业链中不可或缺,^①其产业链^②也由此成为全球产业链竞争的焦点之一。^③在全球产业链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俄罗斯对其战略性矿产政策进行了完善和扩展。具体而言,包括更新战略性矿产清单、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管理、加快战略性矿产勘探与开采、推动国际战略性矿产合作四个方面。

(一) 更新战略性矿产清单

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俄罗斯对某些特定矿产的需求增加。然而,俄罗斯面临的困境在于,苏联时期发现和勘探的矿床储量即将耗尽,对矿产进口的依赖又因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受到威胁。为刺激国内矿产的勘探与开采,俄罗斯着手更新其战略性矿产清单。2019 年 8 月,普京总统签署关于调整稀有金属矿产开采税的法案,列出了 36 种稀有金属。^④2022 年 8 月,俄罗斯联邦政府第 2473 号令发布了新的战略性矿产清单(包含 61 种矿产),明确提出战略性矿产清单至少每 3 年更新一次,并要求自然资源部联合经济发展部、财政部和联邦地下资源利用局,通过联邦预算优先拨款的方式,优化稀缺型战略性矿产基地布局(见图 1)。^⑤

如图 1 所示,与 1996 年清单相比,2022 年清单新增了 13 种矿产,将钇族稀土金属扩展为稀土金属(包含钪族稀土、钇族稀土)^⑥并具体列出,同时具体列出的还有铂族金属。在 2019 年列出的稀有金属中,除了锶、镉、铊、铋、硒、碲 6 种外,其余 30 种都已包含在 2022 年清单内。

① 关键矿产在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作用见本文第三部分。

② 关键矿产产业链环节为“勘探开采-冶炼加工(运输)生产-行业使用-回收循环利用”。参见张宇祺、李华姣、安海忠、王安建:“产业链视角下关键矿产资源可供性研究进展”,《资源科学》,2024 年第 4 期,第 671 页。

③ 参见刘建伟:“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稀土产业链的重建及其影响”,《太平洋学报》,2022 年第 12 期,第 52-63 页;崔守军、李竺畔:“关键矿产‘权力三角’:基于全球镍产业链的考察”,《拉丁美洲研究》,2023 年第 5 期,第 96-118 页。

④ Госдума приняла закон о стимулировании добычи редких металлов. 23 июля 2019 г. <https://tass.ru/ekonomika/6692387>

⑤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30.08.2022 № 2473-р. 30 августа 2022 г. <http://actual.pravo.gov.ru/content/content.html#pnun=0001202208310002>

⑥ 从原子序数和质量角度分类,稀土可以被分为轻稀土元素和重稀土元素。镧、铈、镨、钕、钷、铽、钆七个元素是轻稀土元素,具有较低的原子序数和较小质量,也被称为钪族稀土;钐、铕、镱、铥、镱、镱、镱,具有较高的原子序数和较大质量,以及化学性质与其相近、在自然界也与其共生的钇,被划分为重稀土元素,也被称为钇族稀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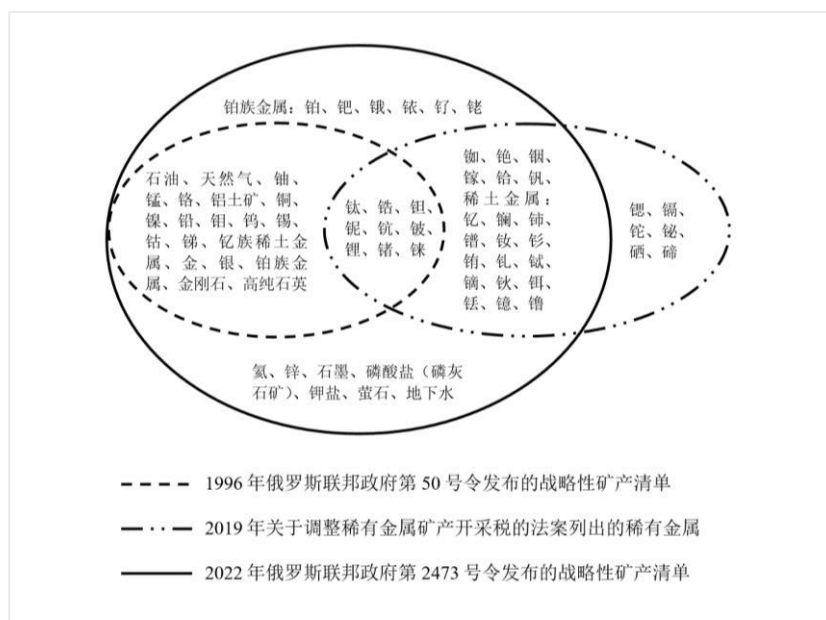


图 1 俄罗斯 1996 年战略性矿产清单、2019 年稀有金属清单与 2022 年战略性矿产清单的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俄罗斯联邦政府 1996 年第 50 号令、2022 年第 2473 号令、塔斯社新闻资料整理绘制。^①

（二）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管理

2020 年 7 月，普京总统签署了一项关于加强战略领域外资监管的法令。在此之前，俄罗斯政府对外资在战略领域企业中股比的认定，是基于其直接表决权大小而非其所持股份。但表决权可以通过信托协议、抵押合同、回购协议等方式临时转给第三方，以使官方认定的具有表决权的外资股比保持较低水平，使其可继续收购俄企股份，而无需向俄政府申请，导致外资最终获

^①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от 16.01.1996 N 50-р «Об основных видах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минерального сырья». 16 января 1996 г. <https://legalacts.ru/doc/rasporjzhenie-pravitelstva-uf-ot-16011996-n-50-r/>;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30.08.2022 № 2473-р. 30 августа 2022 г. <http://actual.pravo.gov.ru/content/content.html#pnun=0001202208310002>; Госдума приняла закон о стимулировании добычи редких металлов. 23 июля 2019 г. <https://tass.ru/ekonomika/6692387>

得绝对控制权。为防止上述情况出现，新法令在计算外企所持股份时，将计入其直接或间接拥有的所有股份。^①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对外资的管制进一步加强。2022 年 8 月，普京总统签署法令，禁止持有俄战略领域企业股份的“不友好国家”^②投资者交易股份。^③2023 年 4 月，俄罗斯联邦委员会通过法律，简化了从“不道德的外国投资者”手中追回财产的程序，并剥夺外国投资者在年度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④以上限制外资的种种措施意在保证俄罗斯对其国内包括战略性矿产在内的战略资产的绝对控制。

（三）加快战略性矿产的勘探与开采

地质勘探是矿产开发的基础。2021 年，俄罗斯联邦审计院将俄需要从国外进口锰、铬、钛、锂等稀缺型战略性矿产的情况归咎于地质勘探系统工作的滞后，并指出，86%以上的固体矿种未得到勘探，其中包括 29 种进口矿物中的 12 种。^⑤自然资源部也在 2021 年推出了“地质学：复兴传奇”

（Геология.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легенды）项目，旨在利用高效、环保的矿产勘探和生产技术提高地质勘探的速度和质量。^⑥目前该项目涉及 37 个地质勘探目标，其中油气占 8 个，固体矿产占 15 个，地下水占 14 个。^⑦2023 年 11 月，

① “普京总统签署关于加强战略领域外资监管的法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20 年 8 月 10 日，<http://m.mofcom.gov.cn/article/tongjiziliao/fuwzn/oymytj/202008/20200802990726.shtml>

② 2022 年 3 月，为回应西方在俄乌冲突后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俄罗斯联邦政府批准了一份对其国家、企业和公民采取不友好行动的地区清单。具体包括：美国、加拿大、欧盟国家、英国（包括泽西岛、安圭拉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直布罗陀）、乌克兰、黑山、瑞士、阿尔巴尼亚、安道尔、冰岛、列支敦士登、摩纳哥、挪威、圣马力诺、北马其顿，以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新西兰、新加坡和中国台湾。See “Russian government approves list of unfriendly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TASS, March 7, 2022, <https://tass.com/politics/1418197>

③ 田冰：“普京总统签署法令禁止‘不友好国家’交易俄战略企业股份”，中国新闻网，2022 年 8 月 6 日，<https://www.chinanews.com/gj/2022/08-06/9821153.shtml>

④ “Russia’s Federation Council passes law tightening rules for foreign investment in strategic enterprises”, *Interfax*, April 26, 2023, <https://interfax.com/newsroom/top-stories/90047/>

⑤ “俄罗斯是世界矿产资源宝库的观点严重失实”，光明网，2021 年 6 月 2 日，<https://m.gmw.cn/baijia/2021-06/02/1302334339.html>

⑥ Реализация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инициативы «Геология.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легенды» по нефти и газу в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м федеральном округе в 2022-2024 годах. 3 февраля 2022 г. <https://www.rosnedra.gov.ru/article/14078.html>

⑦ Геологоразведка в России в 2023 году: подводим итоги и строим планы. 10 января 2024 г. <https://dprom.online/mtindustry/gyeologorazvedka-v-rosseeee-v-2023-godu/>

普京总统下令制定远东和西伯利亚地质勘探计划，并将这两个计划纳入“地质学：复兴传奇”项目。^①相关数据显示，远东联邦区被勘探过的底土^②仅为35%，西伯利亚联邦区仅为45%。^③据俄罗斯自然资源部估计，到2030年，远东联邦区将发现1000多个新矿床，并增加570吨黄金、1.1亿克拉金刚石、200万吨铜、70万吨锌、100万吨铅、30万吨镍等；西伯利亚联邦区将增加19万吨铀、11万吨锂、5万吨钨、5000万吨钛、67万吨铬、325吨黄金和160万吨铜。^④

北极地区是俄罗斯战略性矿产政策的重中之重。^⑤2017年3月，普京总统在视察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时指出，从储量看，北极地区蕴藏着俄罗斯100%的金刚石、90%的铬和锰、60%~90%的天然气、60%的石油、47%的铂族金属与40%的黄金；从产量看，俄罗斯100%的金刚石、锑、磷灰石、稀有金属、稀土，98%的铂族金属、95%的天然气、90%的镍和钴、60%的石油和铜都是在北极地区开采的。^⑥除油气等一直备受重视的传统资源外，俄罗斯也在加速开发北极的其他矿产资源。比如，位于萨哈（雅库特）共和国的托姆托尔铈和稀土矿床可能成为全球三大稀土矿床之一。^⑦2020年，俄罗斯政府表示将在稀土领域投资15亿美元，通过开发包括该项目在内的11个项目，力争在2025年实现稀土自给自足，2026年开始出口，2030年成为仅

① Путин поручил разработать программы геологоразведки недр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Сибири. 14 ноября 2023 г. <https://tass.ru/ekonomika/19281229>

② 底土（subsoil）指地下物质、能量、结构与空间。由于矿产资源主要埋藏在地下，同时孕育产出矿产资源的地质构造也主要赋存于地下，因而底土就代表了地质调查研究和矿产勘查开发的空间。参见李裕伟：“基于底土资源管理的俄罗斯矿业权制度”，《国土资源情报》，2018年第1期，第3页。

③ «Геология.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легенды»: промежуточные итоги. 28 февраля 2024 г. <https://dprom.online/mtindustry/gyeologeeeya-vozhrozhdyleneeye-legendi-etoge/>

④ Геологоразведка в России в 2023 году: подводим итоги и строим планы. 10 января 2024 г. <https://dprom.online/mtindustry/gyeologorazvyedka-v-rosseeee-v-2023-godu/>

⑤ 参见刘涵、邓贝西：“北极关键矿产博弈与中国应对”，《太平洋学报》，2024年第8期，第90-104页。

⑥ Совещание по вопросу комплекс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Арктики. 29 марта 2017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4147>

⑦ “Russia’s Tomtor among largest rare earths reserves, Polymetal says”, Reuters, April 19, 2021,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markets/commodities/russias-tomtor-among-lar-gest-rar-e-earths-reserves-polymetal-says-idUSL8N2MC1ZL/>

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稀土生产国。^①位于摩尔曼斯克州的科尔莫泽尔锂矿床是俄罗斯最大的锂矿床，由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和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联合开发，计划在 2030 年投产。^②另外，俄罗斯计划为北极矿产开发打造一个“浮动核电+北极航线”的供能运输体系。国家原子能公司开发和运营了全球首座浮动核电站“罗蒙诺索夫院士号”，并将在 2030 年底前再建造 5 座，且全部用于采矿项目供能。^③

南极与深海等新疆域是俄罗斯进行矿产勘探的未来方向。俄罗斯大洋地质与矿产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格尔蒙·莱琴科夫（Герман Лейченков）指出，南极地区的地质勘探主要在三个领域进行：航空地球物理、海洋地球物理和环境研究。^④但俄罗斯也在南极勘探矿产。2024 年 5 月，英国下议院环境审计委员会发布的文件显示，俄罗斯在英国声称拥有的领地发现大量石油和天然气。^⑤截至目前，俄罗斯与国际海底管理局（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签订了 3 份深海矿产勘探合同：铁锰结核勘探合同（太平洋）、多金属硫化物勘探合同（大西洋）、富含钴铁锰结壳勘探合同（太平洋）。^⑥《2050 年发展战略》提出，俄罗斯将开展全方位工作，确保履行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的矿产勘探合同规定的义务，并将根据国际海底管理局的要求，从正在进行的勘探工作过渡到开采工作。^⑦

此外，为减少矿业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俄罗斯政府采取了提供税收优惠、

① Anastasia Lyrchikova, Gleb Stolyarov, “Russia has \$1.5 billion plan to dent China's rare earth dominance”, Reuters, August 12, 202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russia-rareearths/russia-has-1-5-billion-plan-to-dent-chinas-rare-earth-dominance-idUSL8N2F73F4/>

② “Nornickel-Rosatom JV receives rights to Kolmozerskoye lithium field”, Interfax, February 8, 2023, <https://interfax.com/newsroom/top-stories/87780/>

③ 王林：“俄罗斯加速开发北极能源矿产”，《中国能源报》，2021 年 12 月 20 日第 5 版。

④ «Геология.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легенды»: промежуточные итоги. 28 февраля 2024 г. <https://dprom.online/mtindustry/gyeologeeya-vozrozhdyeneeye-legendi-etoge/>

⑤ Jonathan Leake, “Russia finds vast oil and gas reserves in British Antarctic territory”, The Telegraph, May 11, 2024, <https://www.telegraph.co.uk/business/2024/05/11/russia-uncovers-oil-and-gas-reserves-british-antarctic/>

⑥ Россия нацелена перейти от разведочных работ к добыче минерального сырья на дне Мирового океана. 29 июля 2024 г. <https://www.finmarket.ru/news/6221407>

⑦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1 июля 2024 г. № 1838-р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стратегии развития минерально-сырьевой базы РФ до 2050 г. 1 августа 2024 г. <https://www.garant.ru/products/ipo/prime/doc/409341699/#1000>

加快政务流程、扩大民间参与等多种措施。2019年8月，普京总统签署法案，将稀有金属矿产资源开采税从原来的8%降低至4.8%，自2020年起生效。该法案规定，自开采相关矿产起，10年内税率适用0.1的减免系数。^①2023年1月，联邦地下资源利用局局长叶夫根尼·彼得罗夫（Евгений Петров）向总理米哈伊尔·米舒斯京（Михаил Мишустин）汇报2022年机关工作成果时表示，已将底土使用权的审批时间由65天缩短到7天，并完全过渡到电子拍卖。^②12月，国家杜马通过一项法案，允许拥有五年以上地质勘探经验且最近两年没有任何违规行为的俄罗斯公司参与区域地质勘探。^③自然资源部估计这一举措将让新矿床的发现数量翻倍。^④

（四）推动国际战略性矿产合作

国际合作是俄罗斯矿产政策的重要内容。俄罗斯的矿产国际合作可以追溯到苏联时期。当时，矿产资源较少依赖进口，且进口首先来自经互会国家，例如匈牙利的氧化铝、蒙古的萤石；其次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比如朝鲜的氢氧化钡、南斯拉夫的锑和铝土矿、中国的钨、几内亚的铝土矿；最后来自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玻利维亚和马来西亚的锡、牙买加的铝矾土。^⑤《2050年发展战略》指出：必要时应在友好国家境内寻找、勘探和开发矿藏，为国家提供稀缺型战略性矿产。^⑥

在双边层面，由于与西方国家对抗日趋激烈，俄罗斯选择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矿产合作。2024年2月，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Александр Новак）在俄罗斯伊朗贸易与经济合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指出，伊朗正

① В России снизили ставку НДС на добычу редких металлов. 3 января 2020 г. <https://tass.ru/ekonomika/7456165>

② Встреча Михаила Мишустина с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м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агентства по недропользованию Евгением Петровым. 24 января 2023 г. <http://government.ru/news/47606/>

③ Дума приняла закон о продаже ГРП-лицензий и допуске бизнеса в ранний этап геологоразведки. 14 декабря 2023 г. <https://www.interfax.ru/russia/936162>

④ Геологоразведка в России в 2023 году: подводим итоги и строим планы. 10 января 2024 г. <https://dprom.online/mtindustry/gyeologorazvyedka-v-rosseeee-v-2023-godu/>

⑤ 参见李凡斌：“苏联在非能源矿产资源方面的战略”，《地质技术经济研究动态》，1984年第30期，第26页。

⑥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1 июля 2024 г. № 1838-р.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стратегии развития минерально-сырьевой базы РФ до 2050 г. 1 августа 2024 г. <https://www.garant.ru/products/ipo/prime/doc/409341699/#1000>

在俄罗斯公司的参与下进行矿产勘探和开采。^①5 月，中俄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在冶金业、铁矿开采业等领域加强技术和生产合作。^②6 月，俄罗斯与印度就提供稀有矿产开采技术以及扩大矿业合作进行谈判。^③8 月，俄罗斯与蒙古就扩大矿业、能源等领域的合作达成了协议。^④

除上述国家外，非洲国家是俄罗斯的主要合作对象，且双方已形成独特的合作模式。非洲矿产资源丰富，如图 2 所示，其铬、钴、锰、铂族金属的储量和产量均在全球占据较高比重，能够为俄罗斯提供其所需的战略性矿产和稀有金属。^⑤

俄罗斯与非洲国家在矿产领域的合作主要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利用先进的专业技术和经验加强对产业链的控制。^⑥例如，俄罗斯钻石生产商阿尔罗萨已将其业务扩展到安哥拉、刚果（金）和津巴布韦。^⑦2018 年，受到美国制裁的俄罗斯铝业公司重启了其位于几内亚的氧化铝精炼厂。^⑧

第二种模式，通过以瓦格纳集团为代表的私营军事公司为非洲国家提供军事安全服务，获得其矿产等自然资源的特许开采权或经营权，即“军事安

① “Alexander Novak holds 17th meeting of Russian-Iranian Commission o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Russian Government, February 28, 2024, <http://government.ru/en/news/51000/>

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两国建交 75 周年之际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4 年 5 月 16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5/content_6951404.htm

③ Nitin Kumar, Subhayan Chakraborty, “India looks at Russia to secure rare mineral mining tech, partnership”, Business Standard, June 12, 2024, https://www.business-standard.com/industry/news/india-looks-at-russia-to-secure-rare-mineral-mining-tech-partnership-124061200858_1.html

④ Монголия и РФ расширяют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горнодобывающей и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сферах. 13 августа 2024 г. <https://tass.ru/ekonomika/21590281>

⑤ 郭锐、赵俊杰：“‘全球南方’视野下的俄非‘特殊关系模式’分析”，《俄罗斯研究》，2024 年第 2 期，第 124 页。

⑥ Florian Vidal, “Russia’s Mining Strategy: Geopolitical Ambitions and Industrial Challenges”, Institut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April 2023, p.23, https://www.ifri.org/sites/default/files/atoms/files/vidal_russiaminingstrategy_2023.pdf

⑦ Mathieu Droin, Tina Dolbaia, “Russia Is Still Progressing in Africa. What’s the Limit?”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ugust 15, 2023, <https://www.csis.org/analysis/russia-still-progressing-africa-whats-limit>

⑧ “Sanctions-hit Rusal restarts alumina refinery in Guinea-minister”, Reuters, June 21, 2018,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markets/sanctions-hit-rusal-restarts-alumina-refinery-in-guinea-minister-idUSL8N1TM6DL/>

全-资源贸易”模式。^①比如，在中非共和国，瓦格纳通过支持中非总统福斯坦-阿尔尚热·图瓦德拉（Faustin- Archange Touadéra），获得了该国最大金矿恩达西马的独家开采权；^②在苏丹，瓦格纳为前总统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Bashir）提供政治和军事支持，后者为其提供了一系列金矿开采特许权。^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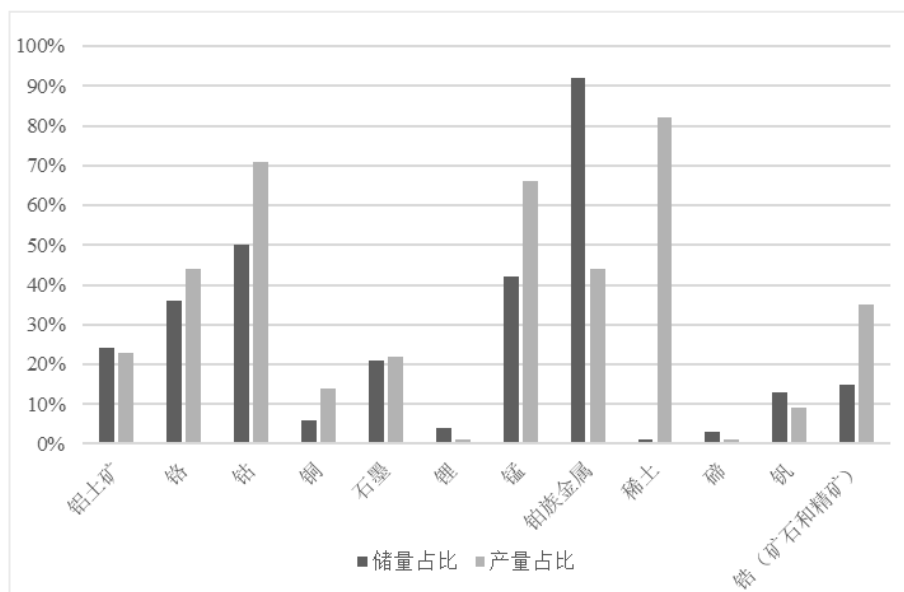


图 2 非洲部分矿产储量和产量的全球占比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处为 2023 年版《非洲经济发展报告》委托撰写的背景文件绘制。^④

① 蔺陆洲：“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对国际安全的影响：起源、现状与未来”，《俄罗斯研究》，2024 年第 2 期，第 169-194 页。

② Jessica Berlin, David Clement, Lanre Peter Elufisan, Elizabeth Hicks, Zoltán Kész, “How the Kremlin is using Wagner to launder billions in African gold”, *The Blood Gold Report*, December 2023, p.3, <https://bloodgoldreport.com/wp-content/uploads/2023/12/The-Blood-Gold-Report-2023-December.pdf>

③ “Russian mercenaries in Sudan: What is the Wagner Group’s role?” Al Jazeera, April 17, 2023,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3/4/17/what-is-the-wagner-groups-role-in-sudan>

④ Antonio Andreoni, Elvis Avenyo, “Critical Minerals and Routes to Diversification in Africa: Linkages, Pulling Dynamics and Opportunities in Medium-High Tech Supply Chains”, Background paper commissioned by the UNCTAD secretariat for the 2023 editio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Report*, August 2023, p.25.

欧洲议会的一项研究显示，俄罗斯获得开采权的矿产包括：几内亚的铝土矿、中非共和国的黄金和金刚石、刚果（金）的钴和铜钼铁矿、苏丹的黄金和石油、马达加斯加的铬铁矿、莫桑比克的天然气、安哥拉的金刚石、津巴布韦的铂和金刚石、纳米比亚的铀以及南非的镍和锰。^①此外，俄罗斯还寻求与加纳、喀麦隆、尼日尔等非洲国家开展合作。^②

在多边层面，俄罗斯自然资源部部长亚历山大·科兹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Козлов）曾提议建立一个类似欧佩克的固体矿产平台，成员包括俄罗斯、非洲和中东国家，在关键矿产的勘探、开采和加工等方面进行协调。^③但在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下，该提议恐难取得实质性进展。对俄罗斯而言，在金砖国家等现有机制内扩展合作或是更好的选择。

在金砖国家创始成员国中，中国在稀土的生产提炼以及锂、钴、铜、镍的精炼方面占据全球主导地位。从资源储量、开采加工能力、消费需求和贸易规模等各方面看，中国都是关键矿产大国。^④如图 3 所示，自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正式加入金砖国家以来，金砖国家在矿产资源供应链中的份额更加举足轻重。不仅如此，与多边战略伙伴关系类似，金砖国家会增加对彼此矿产供应链的投资。例如，2023 年 7 月，沙特斥资 26 亿美元购买巴西最大矿业公司淡水河谷基本金属部门 10% 的股权，以保证铜和镍的供应。^⑤有学者认为，金砖国家凭借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及对全球

① Anna Caprile, Eric Pichon, “Russia in Africa: An atlas”,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February 2024, p.10,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4/757654/EPRS_BRI\(2024\)757654_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4/757654/EPRS_BRI(2024)757654_EN.pdf)

② “Russia’s proposals on geological, subsoil use cooperation handed to Ghana”, TASS, August 17, 2023, <https://tass.com/economy/1661811>; “Russia plans to expand cooperation on geological exploration with Cameroon – ambassador”, TASS, March 18, 2024, <https://tass.com/politics/1761279>; “Russia Is Said to Seek French-Held Uranium Assets in Niger”, June 3, 2024,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4-06-03/russia-said-to-seek-takeover-of-france-s-uranium-assets-in-niger>

③ “Russia proposing platform analogous to OPEC for solid minerals”, Interfax, January 9, 2024, <https://interfax.com/newsroom/top-stories/98213/>

④ 万军、陈震：“中国关键矿产供应链面临的挑战与应对”，《世界知识》，2024 年第 4 期，第 22-24 页。

⑤ “Vale announces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Manara Minerals and Engine No.1 to accelerate growth of energy transition metals business”, July 27, 2023, <https://vale.com/fr/w/vale-announces-strategic-partnership-with-manara-minerals-and-engine-no-1-to-accelerate-growth-of-energy-transition-metals-business>

南方国家的吸引力，有望提出一种新的关键矿产叙事，可与美国主导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inerals Security Partnership）相抗衡。^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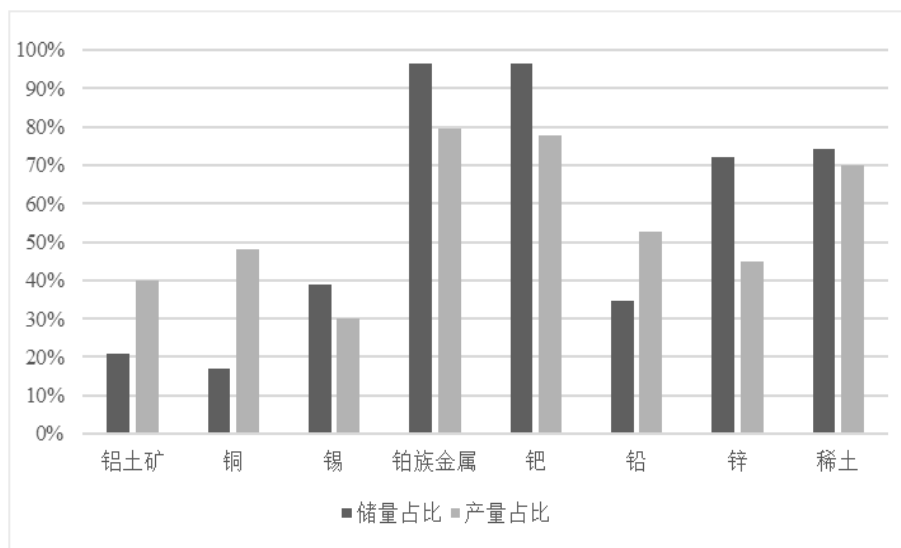


图3 金砖国家部分矿产储量和产量的全球占比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金砖+：经济联盟或未来的原材料俱乐部？》一文的资料绘制。^②

事实上，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正在成为俄罗斯战略性矿产政策的重要依托。2023年3月，俄罗斯自然资源部部长科兹洛夫提议，在金砖国家间建立一个地质合作平台，使成员国可以共享矿物储备和采矿技术的相关数据，加强各国地质、矿产部门的合作。^③2024年7月，金砖国家地质部门负责人在莫斯科举行首次会晤，召开地质问题圆桌会议。成员国一致支持创建金砖国家地质平台，在地质勘探、地质数字化、区域地质研究和战略性矿产资源

① Vlado Vivoda, Ron Matthews, Neil McGregor, “A critical minerals perspective on the emergence of geopolitical trade blocs”, *Resources Policy*, 2024, Vol.89, pp.1-9.

② Emmanuel Hache, Candice Roche, “The BRICS+: economic alliance or future private club of raw materials?” Polytechnique insights, May 14, 2024, <https://www.polytechnique-insights.com/en/columns/geopolitics/the-brics-economic-alliance-or-future-private-club-of-raw-materials/>

③ Россия предложила создать геологическую платформу стран БРИКС. 27 марта 2023 г. <https://tass.ru/ekonomika/17378629>

等领域开展合作。^①俄联邦地下资源利用局局长彼得罗夫表示，金砖国家在矿产资源的储量和产量以及勘探、开采和加工技术方面都具有垄断地位，在降低采矿成本方面联合行动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②此外，他以中俄两国各自的战略性矿产清单为例，建议金砖国家的其他成员国依据自身地质条件编制战略性、关键性矿产清单。^③预计未来金砖国家将在俄罗斯可持续且自主的矿产供应链建设中扮演更为关键的角色。

四、俄罗斯战略性矿产政策调整的动因

受资源禀赋、经济结构、历史文化、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关键矿产/战略性矿产战略、政策的内容与实施动因也不尽相同。在全球产业链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俄罗斯战略性矿产政策的调整主要受到三方面意识的影响：参与地缘博弈的竞争意识、减少外部依赖的危机意识以及应对经济制裁的工具意识。

（一）竞争意识：参与地缘博弈

关键矿产在国防建设、高科技产业和能源转型中的重要作用及供应链风险，使其成为各国地缘博弈的焦点。第一，关键矿产在国防建设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比如，稀土可用于制导控制、激光瞄准、卫星通信等领域，美国每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需要近 4.17 吨，每艘宙斯盾驱逐舰需要近 2.36 吨，每架 F-35 战斗机需要近 417.30 千克。^④第二，关键矿产与计算机、电子、航空航天等高科技产业紧密相关。例如，镓、锰、镍、锑、稀土、铂族金属在数据传输网络、数据储存和服务器、机器人、太空发射器中都发挥着重要

① В России впервые прошла встреча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г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служб стран-участниц БРИКС. 18 июля 2024 г. <https://rosnedra.gov.ru/press/news/v-rossii-vpervye-proshla-vstrecha-rukovoditeley-geologicheskikh-sluzhb-stran-uchastnits-briks/>

② “Russia’s Rosnedra touts economic benefits of BRICS countries joining forces on mining costs”, Interfax, July 22, 2024, <https://interfax.com/newsroom/top-stories/104422/>

③ “BRICS geological services to compile lists of critical minerals”, Interfax, July 22, 2024, <https://interfax.com/newsroom/top-stories/104419/>

④ Valerie Bailey Grasso, “Rare Earth Elements in National Defense: Background, Oversight Issues, and Options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December 23, 2013, pp.4-13, <https://sgp.fas.org/crs/natsec/R41744.pdf>

作用。^①第三，关键矿产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的相关技术与材料的基础。具体而言，光伏产业需要晶体硅和基于碲化镉、铜铟镓锡薄膜的技术；风能产业依赖稀土永磁体；新能源汽车使用镍、钴、锰、石墨等作为动力电池材料，利用铂族金属作为催化剂，同时需要稀土及镓、锗、铟等来保证续航能力和安全性能。^②第四，关键矿产供应链分工高度集中。当前，上游的开采环节集中于资源大国（且绝大多数关键矿产的储量分布集中于前三个国家），中游的精炼加工集中于具有资金和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下游的终端应用集中于亚洲、欧洲和北美等重点发展清洁能源的地区。^③这种上中下游由少数不同国家主导的分工格局，使供应链易受非经济因素干扰而中断，各国对于被“卡脖子”的担忧与日俱增。

在此情况下，关键矿产已然成为大国博弈的新战场。一方面，美国试图打造关键矿产盟伴体系，对中俄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围堵，以维持自身霸权地位。具体而言，美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挪威等盟友达成双边矿产协定，建立了美蒙韩、美刚赞等三边矿产机制，在印太经济框架、四方安全对话、五眼联盟、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七国集团等现有机制内拓展矿产合作，并推动建立能源资源治理倡议、关键矿物测绘倡议、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等排他性多边矿产机制。另一方面，成为大国竞相拉拢对象的资源国顺势谋求提升地缘政治影响力。比如，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筹谋建立“锂佩克”，印尼提出成立“镍佩克”，试图提升关键矿产定价话语权。

诚然，俄罗斯作为油气能源的获益者，甚至还是气候变化的潜在受益方，能源转型的动力及其引发的矿产需求并不强烈。^④但如果因为矿产供应链被“卡脖子”，而在国防建设、高科技产业发展方面落后于其他国家，就将阻

① “Supply chain analysis and material demand forecast in strategic technologies and sectors in the EU – A foresight study”, European Commission, March 16, 2023, pp.4-5, https://single-market-economy.ec.europa.eu/document/download/a5a7b598-6542-42c3-9b32-ba98b6a959f8_en?filename=Raw%20Materials%20Foresight%20Study%202023.pdf

② 葛建平、刘佳琦：“关键矿产战略国际比较：历史演进与工具选择”，《资源科学》，2020年第8期，第1465页。

③ 田慧芳：“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风险加剧”，《世界知识》，2024年第4期，第17-18页。

④ 夏启繁、杜德斌：“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地缘政治研究”，《地理学报》，2024年第6期，第1615页。

碍俄罗斯重振大国地位目标的实现。如前文所述，军工革新离不开战略性矿产。2014 年出版的《俄罗斯军事学说》提出，要研制高精度武器，空天防御设备，以及通信、侦察、指挥、无线电电子对抗、无人机、自动化打击等系统。^①战略性矿产是实现这些目标不可或缺的材料。例如，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投入使用了大量导弹和无人机，钽电容器是这些装备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②并且，科技革命也需要战略性矿产。2024 年 2 月，普京总统向俄联邦议会发表国情咨文，将航空航天、核能和新能源技术、机器人技术、数字经济等领域列入俄罗斯科技发展的主要方向，并强调要重点勘探稀土等与新技术相关的原材料。^③在地缘政治回归与科学技术迭代的浪潮中，俄罗斯不可能置身事外。只有制定并执行有效的战略性矿产政策，才能在地缘政治竞争中取得优势。

（二）危机意识：减少外部依赖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曾指出，尽管俄罗斯幅员辽阔，矿产资源丰富，但仍有部分依赖进口，这严重威胁了俄罗斯的经济安全。^④《2035 年发展战略》和《2050 年发展战略》都根据矿产储量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原料基地的地质前景，将战略性矿产以及其他重要矿产分为三类（见表 2）。第一类矿产在经济发展的任何情况下，其储量都满足 2035 年以前的必要需求；第二类矿产 2035 年以前所开采的矿床储量不足以保障其开采所达到的水平；第三类矿产较为稀缺，国内消费主要依赖进口。从第一类到第三类，稀缺程度依次递增。经过 2018—2024 年的勘探与开采，这三个类别包含的矿种也发生了些微变化，主要体现在：原先属于第一类的钨、钼、钽、铌现在属于第三类；原先属于第三类的溴现在属于第一类；钇族稀土扩展为稀土金属，依然属于第三类；此外，第一类新增了氦、钒、铷、铯、铟、镓、

① Военная доктри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30 декабря 2014 г. <https://rg.ru/documents/2014/12/30/doktrina-dok.html>

② Andrey Zayakin, “Worth their weight in tantalum: indispensable capacitors for missiles and drones make their way into Russia via Lithuania and China”, April 30, 2024, <https://theins.ru/en/economics/271217>

③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29 февраля 2024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3585>

④ “Dependence on import threatens Russia’s economic security – Security Council”, TASS, February 15, 2022, <https://tass.com/politics/1403639>

铅，第二类新增了凝析气，第三类新增了石墨并删除了长石原料和光学原料。

表 2 《2035 年发展战略》与《2050 年发展战略》的分类比较

分 类	《2035 年发展战略》	《2050 年发展战略》
在经济发展的任何情况下，其储量都满足 2035 年前的必要需求	天然气、铜、镍、锡、钨、钼、钽、铌、钴、钨、钨、锆、铂类、磷灰石矿、铁矿石、钾盐、煤炭、水泥原料	天然气、氦、铜、镍、钴、铂类、铁矿石、磷灰石矿、钾盐、煤炭、水泥原料、溴、锡、钒、锆、铷、铯、钨、铟、镓、铅
2035 年以前所开采的矿床储量不足以保障其开采所达到的水平	石油、铅、铋、金、银、金刚石、铍、高纯石英	石油、凝析气、铅、铍、铋、金、银、金刚石、高纯石英
国内消费主要依赖进口的稀缺矿产	铀、锰、铬、钛、铝土矿、锆、铍、锂、铯、钷族稀土、萤石、膨润土、长石原料、高岭石、白云母、碘、溴和光学原料	铀、锰、铬、钛、铝土矿、钼、钨、铍、锆、铌、钽、铯、钷族稀土金属、石墨、萤石、膨润土、高岭石、碘、白云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035 年发展战略》和《2050 年发展战略》自制。^①

《2050 年发展战略》提出了第一类矿产和第三类矿产短缺的原因。第一类矿产中部分矿种存在区域性短缺，主要与矿产生产与消费分布不平衡有关。苏联时期发现和勘探的矿床储量即将耗尽，包括俄罗斯欧洲部分和乌拉尔地区的煤炭，乌拉尔、西西伯利亚南部和俄罗斯西北部的铁矿石，乌拉尔的铜矿石。与此同时，矿产资源潜力较大的远东地区缺乏大型冶金及其他矿物加工工业，矿企以出口矿石为主。第三类矿产虽被勘探出大量储量，但开发程度不高。其原因主要包括：企业缺乏必要的生产力和有效的工业技术，矿物加工成本高，矿床地理位置不利，国内需求低迷以及产品缺乏国际市场竞争能力，因而抑制了投资者的兴趣等。^②

①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Стратегии развития минерально-сырьевой базы России до 2035 года. 28 декабря 2018 г. <http://government.ru/docs/35247>;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актуализировало и продлило Стратегию развития минерально-сырьевой базы до 2050 года. 29 июля 2024 г. <http://government.ru/docs/52250/>

②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1 июля 2024 г. № 1838-р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стратегии развития минерально-сырьевой базы РФ до 2050 г. 1 августа 2024 г. <https://www.garant.ru/products/ipo/prime/doc/409341699/#1000>

2021 年 7 月，俄罗斯联邦审计院曾发布一份关于 2018—2020 年国家地下资源基金管理有效性审计结果的报告，指出俄罗斯战略性矿产严重依赖进口。^①如表 3 所示，该报告详细描述了俄罗斯的矿产进口结构。对于锰、铬、钛、锂等矿产，俄罗斯完全依赖进口。乌克兰、哈萨克斯坦、智利、中国、蒙古国、南非等国是俄罗斯进口矿产的主要供应国。2018—2020 年，乌克兰提供了 82.9% 的钛、51.2% 的锆和 70% 的高岭土；哈萨克斯坦提供了 87% 的铬和 73.2% 的铜；智利提供了 70.7% 的锂；中国提供了 83.3% 的铝土矿；蒙古国提供了 85.2% 的萤石。^②

对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外部依赖，特别是主要供应国将这种依赖武器化的可能，引发了俄罗斯的安全焦虑。俄罗斯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大国竞争使得全球供应链向安全化和意识形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加剧，各国将“断链”的威胁和行动作为竞争新武器的可能性也在增加。^③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因矿产供应链中断风险引发的不安全感正在变为现实。例如，受制裁影响，安哥拉要求阿尔罗萨退出其与安哥拉国家钻石公司共同持股的卡托卡矿业公司。^④针对俄罗斯近 20% 的氧化铝依赖，澳大利亚将禁止向俄出口氧化铝和铝矿石（包括铝土矿）作为对俄制裁的一部分。^⑤欧盟对俄实施新制裁，禁止向其出口锰矿石和氧化铝。^⑥这不仅严重影响俄罗斯的国防建设、高科技产业发展，而且威胁其国家安全。对此，米舒斯京总理呼吁加

① Отчет о результатах контрольного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Оценка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управл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 фондом недр в 2018-2019 годах и истекшем периоде 2020 года в целях устойчивого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базовых отраслей экономики страны видами минерального сырья, ресурсы которых недостаточны и обеспечиваются в том числе за счет импорта». 16 июля 2021 г. <https://ach.gov.ru/upload/iblock/64f/86t1xajzpwu5blnw66q0rieuy094t8oj.pdf>

② 此处为主要供应国三年供应份额的平均值。

③ 李巍、许悦：“地缘政治回归与国际产业地理变迁——以苹果公司的供应链战略调整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 年第 1 期，第 76-77 页。

④ “Alrosa will have to sell stake in Angola’s Catoca, deal under discussion with investors - Deputy Finance Minister Moiseyev”, Interfax, April 26, 2024, <https://interfax.com/newsroom/top-stories/101857/>

⑤ “Australia bans alumina exports to Russia, sources coal for Ukraine”, Reuters, March 20,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ustralia-bans-alumina-exports-russia-sources-coal-ukraine-2022-03-19/>

⑥ “New EU sanctions will apply to supplies of manganese ore and aluminum oxide to Russia-Latvian authorities”, Interfax, May 3, 2024, <https://interfax.com/newsroom/top-stories/101993>

强对战略性矿产的勘探、开采和加工，减少对锰、铬、钛等矿产的进口依赖，充分满足经济对战略性矿产的长期需求。^①

表3 2018—2020年俄罗斯经济基本部门矿产进口结构^②

矿产	年份	进口量占经济部门需求的比例	主要供应国及份额
锰	2018年	100%	南非 64%；加蓬 25%；哈萨克斯坦 10%
	2019年	100%	南非 63%；加蓬 23%；哈萨克斯坦 13%
	2020年	100%	南非 71%；加蓬 17%；哈萨克斯坦 11%
铬	2018年	100%	哈萨克斯坦 88%；土耳其 6%；南非 5%
	2019年	100%	哈萨克斯坦 86%；土耳其 7%；南非 6%
	2020年	100%	哈萨克斯坦 87%；南非 11%
钛	2018年	100%	乌克兰 89%；巴西 8.3%；哈萨克斯坦 1.4%
	2019年	100%	乌克兰 85%；哈萨克斯坦 25%；越南 7.8%
	2020年	99.9%	乌克兰 74.6%；越南 20%；挪威 4.5%
铝土矿	2018年	66.9%	中国 84.2%；荷兰 9.6%；乌克兰 3%
	2019年	67.7%	中国 82%；荷兰 9.6%；乌克兰 4.6%
	2020年	71.2%	中国 83%；荷兰 8.1%；乌克兰 3.1%
铜	2018年	58.4%	哈萨克斯坦 66.8%；智利 25.9%；秘鲁 7.2%
	2019年	44.5%	哈萨克斯坦 57.8%；秘鲁 16.2%；智利 15.3%
	2020年	45.9%	哈萨克斯坦 94.9%；智利 5%
钼	2018年	35%	比利时 39.8%；荷兰 29.7%；智利 13.5%
	2019年	44.5%	荷兰 44%；美国 25.9%；智利 12.5%
	2020年	42%	荷兰 37%；美国 34.4%；智利 20.1%
钨	2018年	18.2%	越南 30.3%；蒙古国 13.7%；巴西 7.6%
	2019年	11.8%	马来西亚 41.1%；巴西 14.8%；越南 13.6%
	2020年	25%	法国 52.2%；马来西亚 24.8%；美国 13.2%
锡	2018年	2.4%	哈萨克斯坦 100%
	2019年	0.2%	哈萨克斯坦 100%
	2020年	0	-

① Мишустин призвал сократить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от импорта марганца, хрома и титана. 29 июля 2024 г. <https://tass.ru/ekonomika/21474367>

② 2020年锡和2018年、2019年溴的进口量占经济部门需求的比例约等于0，是因为当年俄罗斯从所有供应国的进口总量很小。

(续上表)

矿产	年份	进口量占经济部门需求的比例	主要供应国及份额
锆	2018 年	90%	乌克兰 51.3%；荷兰 31.7%；德国 5.3%
	2019 年	86.6%	乌克兰 52.7%；荷兰 20.6%；德国 8.6%
	2020 年	85%	乌克兰 49.6%；荷兰 23.5%；印度尼西亚 6.3%
锂	2018 年	100%	智利 72.5%；中国 16%；阿根廷 11.5%
	2019 年	100%	智利 71.4%；阿根廷 22.4%；中国 6.2%
	2020 年	100%	智利 68.2%；阿根廷 30.8%；中国 1%
金刚石	2018 年	1%	安哥拉 83.9%；比利时 13.3%；以色列 1.3%
	2019 年	1%	安哥拉 79.3%；比利时 6.7%；阿联酋 4.9%
	2020 年	1%	博茨瓦纳 21.7%；纳米比亚 21.7%；安哥拉 13%
萤石	2018 年	95%	蒙古国 86.7%；哈萨克斯坦 10.4%
	2019 年	95%	蒙古国 82.4%；哈萨克斯坦 12.4%
	2020 年	95%	蒙古国 86.4%；哈萨克斯坦 12.5%
膨润土	2018 年	88%	阿塞拜疆 36.7%；中国 11.8%；美国 11.5%
	2019 年	90%	阿塞拜疆 39.3%；中国 9.8%；美国 7.0%
	2020 年	91%	阿塞拜疆 34.5%；中国 12.3%；美国 10.5%
高岭土	2018 年	70%	乌克兰 70%；土耳其 20%；伊朗 10%
	2019 年	70%	乌克兰 70%；土耳其 20%；伊朗 10%
	2020 年	65%	乌克兰 70%；土耳其 20%；伊朗 10%
碘	2018 年	100%	智利 53%；阿塞拜疆 27%；白俄罗斯 7.6%
	2019 年	100%	智利 55%；阿塞拜疆 30%；土库曼斯坦 8%
	2020 年	100%	智利 44%；土库曼斯坦 28%；印度 14%
溴	2018 年	0	印度 89%；美国 1%；以色列 0.1%
	2019 年	0	以色列 79%；美国 7%；西班牙 3%
	2020 年	2%	印度 96.6%；乌克兰 3%；以色列 0.2%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俄罗斯联邦审计院的报告及附录七整理绘制。^①

① Отчет о результатах контрольного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Оценка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управл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 фондом недр в 2018-2019 годах и истекшем периоде 2020 года в целях устойчивого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базовых отраслей экономики страны видами минерального сырья, ресурсы которых недостаточны и обеспечиваются в том числе за счет импорта». 16 июля 2021 г. <https://ach.gov.ru/upload/iblock/64f/86t1xajzpwu5blnw66q0rieuy094t8oj.pdf>; Приложение №7. Сведения о структуре и объемах импорта видом минерального сырья для базовых отраслей экономики за период 2018-2020 годов. 16 июля 2021 г. <https://ach.gov.ru/upload/iblock/d16/3nq3liu2fr8yo5vi02u22nzspolflctr.xlsx>

（三）工具意识：应对经济制裁

自 2014 年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一直面临西方国家的制裁，俄乌冲突爆发后，制裁正在走向全面升级的极限。^①但由于俄罗斯在全球矿产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西方国家对关键矿产领域的制裁速度较慢、范围较窄、力度较弱。^②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西方国家仍然依赖俄罗斯提供部分关键矿产，短期内难以实现进口替代，贸然制裁只会伤及自身。

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西方国家仍从俄罗斯进口钛产品。^③在钛产业链上游，俄罗斯潜力较大。位于科米共和国的皮日姆斯科耶钛矿床是世界最大的钛矿床之一，但尚未开采，计划 2026 年启动。^④2018—2020 年乌克兰提供了俄罗斯 82.9% 的钛，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罗斯在乌东地区控制了至少 2 个钛矿。^⑤俄罗斯钛产业链的最大优势在中游加工环节。阿维斯马镁钛联合企业是全球最大的钛合金加工企业，生产海绵钛，并将其制成钛锭，进而加工成管材、饼材和环材等各种形状的锻件。^⑥阿维斯马镁钛联合企业 2022 年和 2023 年每年向西方国家出口钛的金额都超过 3.5 亿美元，且大部分出售给了德国、法国、美国 and 英国；仅 2024 年前三个月，欧盟就从俄罗斯进口了约 1442.3 吨钛。^⑦根据俄罗斯菲纳姆投资集团的评估，阿维斯马镁钛联合企业占全球航空航天业钛供应量的 30%，分别满足了波音公司 40%

① 刘军梅：“俄乌冲突背景下极限制裁的作用机制与俄罗斯反制的对冲逻辑”，《俄罗斯研究》，2022 年第 2 期，第 62-87 页。

② Jocelyn Trainer, Nicholas Lokker, Kristen Taylor, Uliana Certan, “Sanctions by The Numbers: The Russian Energy Sector”,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April 4, 2024,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sanctions-by-the-numbers-the-russian-energy-sector>

③ 钛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业，被列入美国、欧盟的关键矿产清单和俄罗斯的战略关键矿产清单。

④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титана в России: каковы перспективы? 17 апреля 2024 г. <https://dprom.online/mtindustry/proizvodstvo-titana-v-rossii-kakovy-perspektivy/>

⑤ Anthony Faiola, Dalton Bennett, “In the Ukraine war, a battle for the nation’s mineral and energy wealth”,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0, 202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2/08/10/ukraine-russia-energy-mineral-wealth/>

⑥ Willy Shih, “The Titanium Supply Chain for The Aerospace Industry Goes Through Russia”, *Forbes*, March 7, 2022, <https://www.forbes.com/sites/willyshih/2022/03/06/the-titanium-supply-chain-for-the-aerospace-industry-goes-through-russia/>

⑦ Почему российский титан пока невозможно заменить? 30 мая 2024 г. https://www.prometall.info/intrigi/trendi/pochemu_rossiyskiy_titan_poka_nevozmozhno_zamenit

的需求和空客公司 60% 的需求。^①尽管波音公司于 2023 年 3 月宣布暂停从俄罗斯购买钛，空客公司仍继续与阿维斯马镁钛联合企业合作。^②早在 2022 年 4 月，空客公司就呼吁欧盟领导人不要对俄罗斯的钛进行制裁，因为这对俄罗斯经济的伤害不大，但会损害欧洲的航空航天业。^③2024 年 4 月，法国总统马克龙亲自说服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加拿大针对俄罗斯的钛金属制裁中对空客和其他航空航天公司网开一面。^④此外，西方国家继续购买俄罗斯的浓缩铀、镍、钇、铝等产品。

不仅如此，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与俄罗斯反制措施还会引发全球矿业市场的震荡，进而导致西方国家自身的供应链风险上升。比如，2023 年 5 月，英国对俄罗斯的金金刚石、铜、铝和镍实施禁运，并且还冻结了 40 亿美元的金金刚石出口市场。^⑤2023 年 8 月，西澳氧化铝离岸价格上涨至 340 美元/吨。^⑥2024 年 4 月，美国和英国宣布对俄罗斯产的铝、铜和镍实施新的交易限制，禁止伦敦金属交易所和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交易俄罗斯于 2024 年 4 月 13 日新生产的上述矿产，2024 年 4 月 13 日之前生产的不受限制。^⑦2024 年 4 月 15 日，伦敦金属交易所铜价上涨至 9640.5 美元/吨，刷新了 2022 年 6 月以来的高点；铝价涨幅一度高达 9.4%，为 1987 年以来的最大涨幅；镍

① “外媒：美国希望从乌克兰获得其军工业必需的钛”，新华网，2023 年 1 月 31 日，http://www.xinhuanet.com/mil/2023-01/31/c_1211723360.htm

② Aishwarya Nair, Tim Hepher, “Boeing suspends Russian titanium as Airbus keeps buying”, Reuters, March 8, 2022,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erospace-defense/boeing-suspends-part-its-business-russia-wsj-2022-03-07/>

③ Tim Hepher, “Airbus urges European leaders to refrain from Russian titanium sanctions”, Reuters, April 13, 2022,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erospace-defense/airbus-accelerate-s-hunt-alternative-titanium-supplies-2022-04-12/>

④ “Airbus wins reprieve from Canadian sanctions on Russian titanium”, Reuters, April 24, 2024,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erospace-defense/airbus-wins-reprieve-canadian-sanctions-russian-titanium-2024-04-23/>; David Ljunggren, Michel Rose, Allison Lampert, Tim Hepher, “Exclusive: To help Airbus, Macron pressed Canada to ease Russia titanium sanctions”, Reuters, May 30, 2024,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erospace-defense/help-airbus-macron-pressed-canada-ease-russia-titanium-sanctions-2024-05-30/>

⑤ “G7: New sanctions will make sure Russia pays a price, Sunak says”, BBC News, May 19, 2023, <https://www.bbc.com/news/uk-politics-65632568>

⑥ 朱清、牛茂林、朱海碧：“俄乌冲突与国际矿业市场演化”，《太平洋学报》，2023 年第 10 期，第 25 页。

⑦ “United States and United Kingdom Take Action to Reduce Russian Revenue from Metals”,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April 12, 2024,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jy2249>

价的涨幅也一度高达 8.8%。^①对于美英两国最新的贸易禁令，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Анатолий Антонов）回应称：“这一决定甚至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是某种鲁莽的开火。”^②西方国家对俄制裁措施引起的矿产价格上涨，除了增加自身的矿产供应压力，还将影响下游产业，进而推高其国内通胀水平。

对俄罗斯而言，丰富的矿产资源不仅维系了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还创造了可持续的财政收入，更提供了战略博弈的筹码。西方国家一直担心俄罗斯将矿产“武器化”^③，俄罗斯也已意识到矿产资源可以作为自己应对西方经济制裁的重要工具。以钯为例，^④俄罗斯钯的产量占全球的 38%，但出口额只占其 GDP 的 0.43%。这意味着俄罗斯放缓钯出口或实施禁运对自身财政影响极小，但对西方汽车工业的打击较大。^⑤俄联邦委员会宪法委员会主席安德烈·克里沙斯（Андрей Клишас）曾提议只接受以卢布结算镍、铂、钯，并表示没有俄罗斯的钯，“所有（西方）汽车制造商都会很快沉没”。2022 年 3 月，在俄罗斯发出上述威胁后，欧盟从俄罗斯进口了 4.6 吨钯，价值约 4.25 亿美元，为 2002 年以来最高的月度购买量。^⑥以浓缩铀为例，^⑦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浓缩铀供应商，2022 年产能占全球的

① Harry Dempsey, “Aluminium and nickel prices jump after sanctions on Russian supply”, *Financial Times*, April 16, 2024, <https://www.ft.com/content/e6e47a90-0b1f-41ac-9e70-f440e64d1463>; Colin Hay, “Base metal prices surge as new sanctions target Russian nickel, copper and aluminium”, April 17, 2024, <https://smallcaps.com.au/global-base-metal-prices-surge-sanctions-russian-nickel-copper-aluminium/>

② “US ban on import of Russian metals is a politicized step – Russian ambassador to US”, TASS, April 13, 2024, <https://tass.com/politics/1774657>

③ Leslie Hook, Harry Dempsey, “Citi warns clients about risks of Russia ‘weaponising’ metals”, *Financial Times*, March 9, 2023, <https://www.ft.com/content/6653aaaa-f6fd-4f20-91d0-3dd37e037da8>

④ 钯广泛用作汽车工业催化剂，被列入美国、欧盟的关键矿产清单和俄罗斯的战略性和关键矿产清单。

⑤ Florian Vidal, “Russia’s Mining Strategy: Geopolitical Ambitions and Industrial Challenges”, *Institut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April 2023, p.23, https://www.ifri.org/sites/default/files/atoms/files/vidal_russiaminingstrategy_2023.pdf

⑥ “Europe scrambles for palladium as Russia threatens supply”, *Automotive Logistics*, July 1, 2022, <https://www.automotive-logistics.media/trade-and-customs/europe-scrambles-for-palladium-as-russia-threatens-supply/43189.article>

⑦ 铀作为能源矿产，被列入俄罗斯的战略性和关键矿产清单，但未被列入美国、欧盟的关键矿产清单。

44%，为美国公用事业公司提供的浓缩铀占该公司购买量的 24%。^①2024 年 5 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法案禁止从俄罗斯进口铀，但允许没有替代来源的核电厂运营商获得豁免，直至 2028 年 1 月。^②对此，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托夫表示，没有俄罗斯的铀产品，西方的绿色项目可能会失败。^③实际上，这一法案于 2023 年 2 月就已提出，其历时之久以及最终保留的豁免选项都说明了美国的两难境地：既要切断俄罗斯的重要收入来源，又要获取浓缩铀以维持核反应堆运转。隶属于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的俄罗斯技术装备出口公司（Tenex）曾于 2023 年 12 月警告，如果美国立法禁止进口俄罗斯浓缩铀，俄罗斯政府可能会先发制人地禁止向美国出口。^④2024 年 9 月，普京总统在电视会议上表示，俄罗斯在多种战略性原材料储备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反击西方制裁，应考虑限制铀、钛和镍的出口，但不能损害自身利益。^⑤

五、俄罗斯战略性矿产政策的展望

俄罗斯战略性矿产政策的调整，将对其自身矿业地位、全球矿产供应链产业链发展趋势以及中美关键矿产地缘竞争格局产生影响。但由于面临多重挑战，俄罗斯落实战略性矿产政策任重道远。

（一）俄罗斯战略性矿产政策调整的影响

1. 提升俄罗斯在全球矿产供应链产业链中的地位。由于关键矿产在高新技术产业中具有重要作用，如果一个国家在全球矿产供应链产业链中占据

① Darya Dolzikova, “Power Plays: Developments in Russian Enriched Uranium Trade”,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March 2024, pp.1-9, <https://static.rusi.org/SR-power-plays-we-b-final.pdf>

② “Prohibiting Imports of Uranium Products from the Russian Federatio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14, 2024, <https://www.state.gov/prohibiting-imports-of-uranium-products-from-the-russian-federation/>

③ Антонов: запрет США на импорт урана из РФ ведет к потрясениям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4 мая 2024 г. <https://tass.ru/politika/20786577>

④ Ari Natter, “Russia Uranium Supplier Warns US Clients to Brace for Ban”, Bloomberg News, December 15, 2023,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3-12-14/russia-uranium-supplier-warns-us-clients-to-brace-for-export-ban>

⑤ “Putin says Russia should consider restricting uranium, titanium and nickel exports”, Reuters, September 12, 2024, <https://www.reuters.com/markets/commodities/putin-says-russia-should-consider-restricting-exports-uranium-titanium-nickel-2024-09-11/>

优势地位，那么它也将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主动地位，进而在国际权力格局中处于有利地位。随着战略性矿产的勘探和开采，俄罗斯将逐渐释放其矿产资源潜力，成为全球矿业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作为新的地缘战略筹码，战略性矿产可以部分弥补欧盟大幅降低俄油气进口所造成的俄罗斯能源权力损失。

2. 加剧全球矿产供应链产业链的安全化和阵营化发展趋势。当前，各国纷纷采取去全球化政策，试图缩短国际产业链以增强自身经济安全。西方国家以“去风险化”为主要特征的关键矿产政策正在对全球关键矿产产业链造成消极影响，使其从复杂网状向线性、树形转变，从“完全开放式”向“有限开放式”转变，从相对通畅向堵点卡点增加转变。^①在全球产业链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俄罗斯战略性矿产政策的调整也与西方国家有相似之处。无论是限制外资进入战略性矿产领域，还是限制与西方国家的战略性矿产进出口贸易，抑或加强与友好国家的战略性矿产合作，经济安全都成为俄罗斯的主要考量。与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类似，^②俄罗斯等国提升战略性矿产供应链韧性的政策又会刺激西方国家的经济不安全感，进而加剧全球矿产供应链产业链的安全化和阵营化。

3.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的关键矿产地缘竞争压力。美国为实现霸权主张，致力于在关键矿产领域抢占先机，而中国等新兴大国暂时占据了该领域的优势地位，中美博弈因此成为当前全球关键矿产竞争的主轴。^③美国试图通过建立局部化和封闭化的关键矿产供应链，设置技术壁垒，操纵全球关键矿产与技术标准等举措，孤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制约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④俄罗斯战略性矿产政策调整后对中国以及金砖

① 徐德顺：“‘去风险化’下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重塑”，《当代世界》，2023年第12期，第38-39页。

② 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指以下情境：对别国意图无法确定的国家为了安全而武装自己；由于国家增强自身安全的手段同样有可能对别国构成威胁，从而别国也开始加强武装，由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参见[美]肯尼思·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0页。

③ 夏启繁、杜德斌：“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地缘政治研究”，《地理学报》，2024年第6期，第1619页。

④ 阙天舒、闫姗姗：“美国关键矿产安全的脆弱性识别与韧性操作逻辑”，《国际安全研究》，2024年第4期，第128页。

国家合作机制的重视，为中俄矿业合作提供了新机遇。中俄之间的互补性矿产贸易、矿业技术产学研合作、相关制造业市场开放、矿产与技术标准共享等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的地缘竞争压力。矿产大国俄罗斯参与关键矿产竞争，或将影响全球关键矿产产业链的权力流动和格局变迁。

（二）俄罗斯战略性矿产政策的挑战

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分化重组的背景下，俄罗斯战略性矿产政策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西方国家的制裁，二是部分矿产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的冲击。

1. 西方国家的制裁阻碍了俄罗斯矿业现代化的进程。苏联时代的矿业设备已经过时，且不易获得替换零部件，维护困难。但俄罗斯制造业无法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矿业需求。为解决上述问题，俄罗斯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致使对外技术依赖覆盖了地质勘探、储量评估、开采加工等各个领域。据统计，俄罗斯超过 90% 的钻探设备以及采矿分析软件、50% 的采矿机械、30% 的地面物探设备、20% 的矿石技术研究设备和 10% 的测井物探设备依赖进口。^①对俄罗斯而言，这种程度的依赖导致西方国家切断设备供应比其撤出外资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大。设备、零部件以及资金的缺乏，严重阻碍了俄罗斯矿业产业链、供应链的升级。以稀土为例，俄罗斯原子能公司称俄罗斯不缺矿产资源，也不缺终端应用，缺的是中游环节，需要建立一条从氧化物到金属再到合金最终到产品的产业链。^②然而，俄罗斯几乎不能生产从多金属矿石中分离出单一稀土氧化物的技术设备。苏联解体后，原加盟共和国企业之间的合作瓦解，哈萨克斯坦的稀土加工厂已停产，爱沙尼亚的稀土加工厂已由加拿大新材料公司（Neo Performance Materials）掌控。^③俄罗斯只有索利卡姆斯克镁厂使用洛沃泽尔斯克采选公司的钛铈酸钠铈矿精

①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констатировало тотальную зависимость России от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технологий в добыче сырья. 29 июля 2024 г. <https://www.moscowtimes.ru/2024/07/29/pravitelstvo-konstatirovalo-totalnuyu-zavisimost-rossii-otinostrannih-tehnologii-vdobiche-sirya-a138066>

② «Это отразится на всем»: в России возродят важнейшую отрасль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6 декабря 2022 г. <https://ria.ru/20221206/rzm-1836479079.html>

③ Большая гонка: зачем Россия вкладывает миллиарды в нерентабельные редкие металлы. 17 июля 2024 г. <https://www.forbes.ru/biznes/516422-bol-saa-gonka-zacem-rossia-vkladyvaet-milliardy-v-nerentabel-nye-redkie-metally>

矿生产铈族稀土金属。^①此外，斯卡伊格拉德公司（Скайград）开发了一种从工业废弃物磷石膏中提取稀土元素的方法，但是，由于难以从西方国家获得相关设备及零部件，且本土化生产尚需时日，该公司扩大生产的计划面临阻碍。^②

2. 部分资源出口国的资源民族主义对俄罗斯的矿产贸易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方面，这些国家优质矿产的开发冲击了俄罗斯的矿产出口地位。以镍为例，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全球镍矿储量超过 3.5 亿吨，其中，红土镍矿占 54%，岩浆硫化镍矿占 35%，铁镍合金、沉积多金属和火山成因块状硫化物矿床等热液系统以及海底锰结壳和结核占 10%，尾矿等其他资源占 1%。^③早年镍矿的开采以加拿大、俄罗斯等中高纬度的硫化镍矿大国为主，但近年来，硫化镍矿普遍面临高品位镍矿资源贫化的问题，加上湿法冶炼技术的发展，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中低纬度的红土镍矿成为开采主流。^④2023 年，印尼的镍矿产量为 180 万吨，占全球镍矿总产量的 1/2；菲律宾是仅次于印尼的全球第二大镍矿生产国，产量为 40 万吨；俄罗斯的镍矿产量则为 20 万吨，远少于印尼和菲律宾。^⑤另一方面，部分国家资源民族主义抬头，导致俄罗斯进口不确定性增加。矿产资源的供应短缺和价格上涨引发了非洲、拉美和亚太地区的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体现为提高税率或特许权使用费率，实施征收或资产国有化，重新谈判或停止已有合同，限制或禁止原矿石出口，以及探讨建立产销联盟等。^⑥例如，2018 年，刚果（金）通过了新的采矿法，将铜矿的特许权使用费从 2% 提高到 3.5%，黄金的特许权使用费

① 王晓民：“俄罗斯稀有金属矿床资源利用现状与发展战略”，《世界有色金属》，2010 年第 3 期，第 26 页。

② Emily J. Holland, “Russia’s Challenges in Mineral Extraction”, *Memo Prepared for Critical Minerals and the Clean Energy Transition Workshop*, September 21, 2023, <https://sites.utexas.edu/mineralstransition/files/2023/10/Holland-Russias-Challenges-in-Mineral-Extraction.pdf>

③ *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4*, U.S. Geological Survey, January 31, 2024, p.125, <https://pubs.usgs.gov/periodicals/mcs2024/mcs2024.pdf>

④ 崔守军、李竺畔：“关键矿产‘权力三角’：基于全球镍产业链的考察”，《拉丁美洲研究》，2023 年第 5 期，第 107 页。

⑤ *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4*, U.S. Geological Survey, January 31, 2024, p.125, <https://pubs.usgs.gov/periodicals/mcs2024/mcs2024.pdf>

⑥ 王永中：“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抬头”，《世界知识》，2024 年第 4 期，第 20-22 页。

从 2.5% 提高到 3.5%，钴如果被视为“战略物质”，则其特许权使用费从 2% 提高到 10%。^①哈萨克斯坦也准备进一步上调矿产开采税率。^②这些措施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俄罗斯矿产进口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六、结 语

在国防建设、高科技产业和能源转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以及较高的供应链风险，使关键矿产/战略性矿产成为大国竞争的新场域。随着全球产业链竞争愈演愈烈，俄罗斯着手更新战略性矿产清单，加强对战略性矿产资源的控制，加快战略性矿产勘探与开采，推动与友好国家的战略性矿产合作。上述调整将提升俄罗斯在全球矿产供应链产业链中的地位，加剧全球矿产供应链产业链的安全化和阵营化发展趋势，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的关键矿产地缘竞争压力。尽管面临西方国家的制裁以及部分矿产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的冲击，但在参与地缘博弈的竞争意识、减少外部依赖的危机意识以及应对经济制裁的工具意识的联合驱动下，战略性矿产政策的实施将得到俄罗斯政府的全力支持。凭借丰富的矿产资源加持，如果俄罗斯能够避开当前西方国家的制裁，从其他国家进口必要的设备和技术以实现矿业现代化转型，并建立一个横跨资源、交通、通信等多部门的产业协同机制，那么俄罗斯有望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全球矿业大国。^③

① “Adoption of a mining code”, UN Trade and Development, March 10, 2018,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vestment-policy-monitor/measures/3227/adoption-of-a-mining-code>

② Mariya Gordeyeva, Tamara Vaal, “Exclusive: Kazakhstan plans to hike mining tax, VAT, economy minister says”, Reuters, June 9, 2023,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kazakhstan-plans-hike-mining-tax-vat-economy-minister-2023-06-09/>

③ Florian Vidal, “Russia’s Mining Strategy: Geopolitical Ambitions and Industrial Challenges”, Institut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April 2023, pp.35-37. https://www.ifri.org/sites/default/files/atoms/files/vidal_russiaminingstrategy_2023.pdf

【Abstract】 Strategic minerals are fundamental to national defens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industries, underscoring their undeniable importance. Russia first published its list of strategic minerals in 1996 and has since managed these resources with a focus on resource nationalism. In the context of intensifying global supply chain competition, Russia has adjusted its strategic mineral policies in four main areas: updating the list of strategic minerals, strengthening management of these resources, accelerating the exploration and extraction of strategic minerals, and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strategic minerals. These adjustments aim to engage in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reduce external dependencies, and counter economic sanctions. The adjustments in Russian strategic mineral policy are expected to enhance its position within the global mineral supply chain, intensify the securitization and bloc formation within global mineral supply chains, and, to some extent, alleviate the pressure of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over critical minerals for China. However, implementing Russian strategic mineral policy faces several challenges. On one hand, Western sanctions have hindered the modernization of Russian mining sector; on the other,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mineral resources has impacted Russia's mineral export position. Moreover, the rise of resource nationalism in these resource-exporting countries increases the uncertainty of Russia's mineral imports.

【Key Words】 Russian Strategic Minerals, Critical Minerals, Global Industry Chains, Resource Nationalism

【 Аннотация 】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полезные ископаемые являются основой оборон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и развития высокотехнологичных отраслей, и их значение невозможно переоценить. Россия впервые опубликовала список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полезных ископаемых в 1996 году и с тех пор управляет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и минеральными ресурсами на основе ресурс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На фоне усиления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ой цепочке Россия скорректировала свою стратегию в

област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минерального сырья, включая обновление списка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полезных ископаемых, усиление управлен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и минеральными ресурсами, ускорение разведки и добыч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полезных ископаемых, а также содейств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Эти усилия направлены на участие в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грах, снижение внешней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и реагирование н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анкции.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а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в област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минерального сырья повысит её позицию в глобальных цепочках поставок и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ых цепочках критических минералов, усилит тенденцию к секьюритизации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ю лагерей внутри этих цепочек и до некоторой степени снизит гео-конкурентное давление Китая в области критических минералов. Однако реализац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в област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минерального сырья также 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с рядом вызовов.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санкции со стороны западных стран затруднил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р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развитие высококачественных минералов в нескольких развивающихся странах сказалось на позиции России в области экспорта минералов,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рост ресурс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в этих странах увеличил неопределённость в отношении импорта российских минералов.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йско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минеральное сырьё, критическое минеральное сырьё, глобальны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ые цепочки, ресурсны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责任编辑 崔 珩)

《俄罗斯研究》来稿须知与注释示例

《俄罗斯研究》多年来形成了以扎实的俄罗斯欧亚国别与区域研究为依托，有效服务中国外交政策的办刊特色。旨在刊发各领域、各学科中外学者在俄罗斯及欧亚问题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尤其欢迎融经验性、理论性、时效性于一体的、有中国思想和中国关怀的研究俄罗斯及欧亚问题的论文，为推动国内外学界沟通，尤其是国内学界、青年学者的发展提供平台。常设议题主要包括俄罗斯及欧亚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对外关系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大国关系研究等。本刊议题不囿于上述方面，诚挚欢迎有创新性的高水平成果向本刊提供新的议题引领。

一、来稿须知

1. 请使用信箱投稿或在线投稿系统：

投稿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在线投稿系统：<http://ru.ecnu.edu.cn>；

电话：021-62233816；传真：021-62238113。

2. 来稿字数 1.5 万-2 万字，需有 300-500 字的内容提要，3-5 个关键词。

3.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稿件一经采用，会向作者支付稿酬，邮寄样刊。

4.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二、注释示例

1. 中文文献

(1) 著作：冯绍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 年以来的俄罗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66 页。

(2) 期刊文章：杨洁勉：“疫情下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变化趋势分析”，《俄罗斯研究》，2020 年第 5 期，第 18 页。

2. 英文文献

(1) 著作：R. Sakwa, *Russia against the Rest: The Post-Cold War Crisis of World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20.

(2) 期刊文章：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9, Vol.43, No.4, pp.7-8.

3. 俄文文献

(1) 著作：Замятин Д.Н. Культура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бразов. М.: Знак, 2006. С.86.

(2) 期刊文章：Лукьянов Ф. Укра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8. Том 16. №.2-3. С.175.

完整版本请参阅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网站 <https://rus.ecnu.edu.cn/>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24年第5期(总第249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刘军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 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网址：<http://ru.ecnu.edu.cn/>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

ISSN 1009-721X



公开发行

定价：30.00元